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17

河北教育出版社

Въ Голядкина

[illegible]

[illegible]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十七卷

文论（上）

陈燊 主编
白春仁 刘文飞（按姓氏笔画顺序） 副主编
白春仁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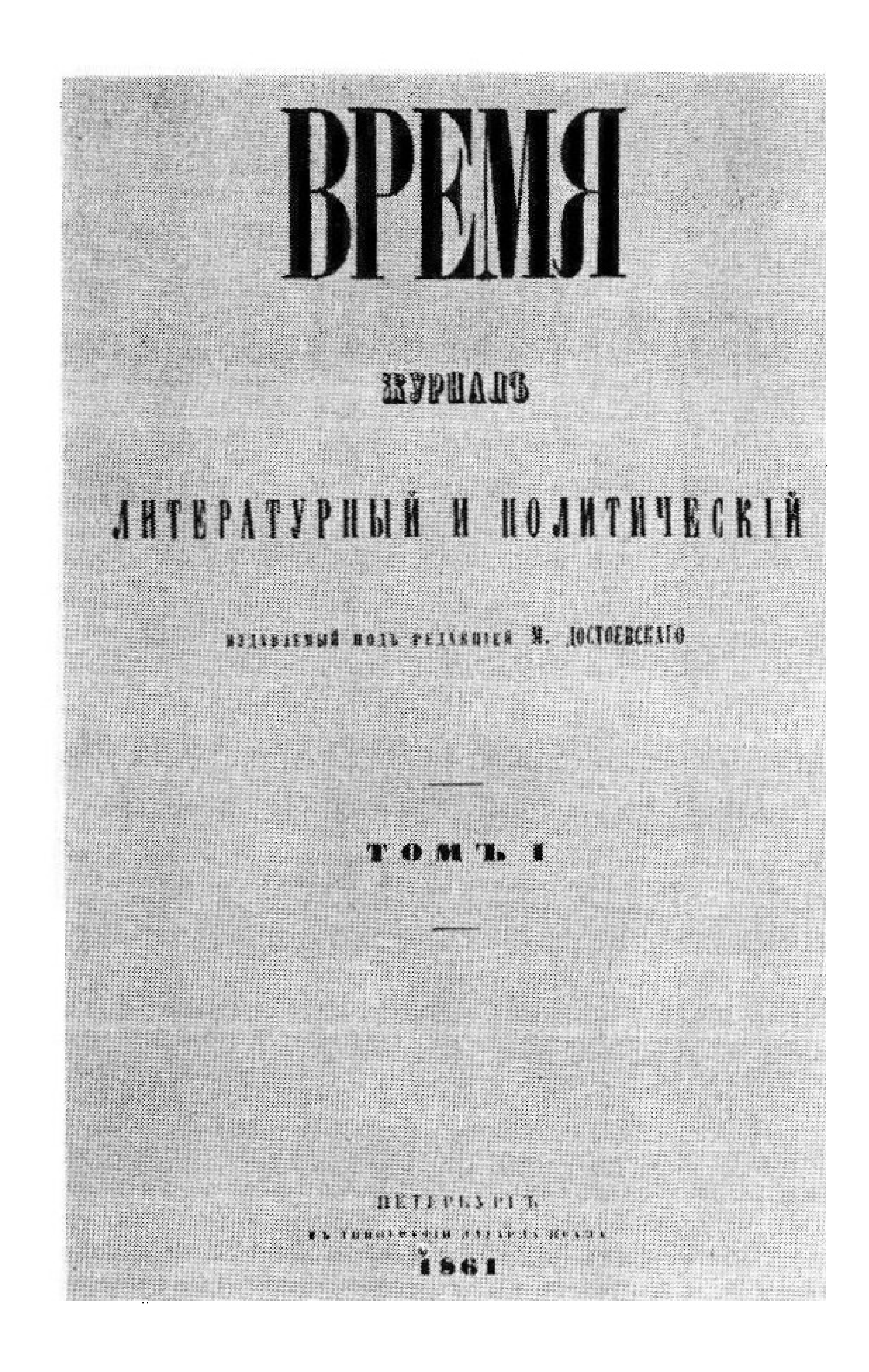
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1



阿·尼·格里戈里耶夫
19世纪50年代



尼·尼·斯特拉霍夫
19世纪50年代



ВРЕМЯ

ЖУРНАЛЪ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И ПОЛИТИЧЕСКІЙ

издаваемый подъ редакціей М. ДОСТОЕВСКАГО

ТОМЪ I

ПЕТЕРБУРГЪ

1861

《时代》1861 年第 1 期扉页



ПОДПИСКА НА 1864 ГОДЪ.

ОБЪ ИЗДАНІИ

НОВАГО ЕЖЕМѢСЯЧНАГО ЖУРНАЛА

ЭПОХА

ЛИТЕРАТУРНАГО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ГО

подъ редакціею М. ДОСТОЕВСКАГО

[illegible]

ЦѢНА

безъ доставки 14 р. 50 к.

съ пересылкою и доставкою 16 р.

РАЗСЧЕТЪ СЪ ПОДПИСЧИКАМИ ВРЕМЕНИ 1863 ГОДА

[illegible]

《时世》1864 年征订启事



作家 1861—1863 年的住处

(《时代》和《时事》编辑部所在地　彼得堡)

译　　序

《文论》卷收入了作者报刊时评和文学论文的主要部分，写于 19 世纪 40 年代与 60 年代，记录下这一时期内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文论和时评家的创作历程。在小说虚构的艺术世界之外，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充满矛盾、追求、变化的俄国文坛，乃至社会，其中的主人公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称是眷恋时事到着迷程度的作家。他认为，文学家不只是关注生活中已经积淀成型的人物和情况，也有权捕捉处于形成变化中的人物和情况。步入文坛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贯始终地关心时局和时事，关心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潮的走向。他不仅如饥似渴地吸收和思考社会信息，以此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更直接参与社会生活，撰写时评文章，从 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的报章讽刺小品，到 60 年代上半期的在他与兄长创办的《时代》与《时世》杂志上发表的报刊政论与文论，再到 70 年代的《作家日记》（见本集第 17—18 卷），忧世忧民之心跃然纸上。这构成了一位现实主义大师的精神魅力的鲜明标志。

最早表现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社会激情和论辩才华的，是 1847 年创作的《彼得堡纪事》。1849 年因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

被捕判刑，他在狱中写的说明和供词（收在本卷的附录中），不仅是他早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实录，也是他进步思想的出色的申述。例如，对尼古拉时代书刊检查制度的评论，对 1848 年欧洲革命的分析，对 19 世纪 40 年代空想社会主义的批评等等，据理力争，言之凿凿，令人难以置辩。

流放服役期间，他渴望重回文坛，梦寐以求，在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甚至献诗皇上，希图获准发表作品。1859 年刑满返回阔别十载的彼得堡，立即与兄长米哈伊尔创办大型杂志《时代》，在连续刊出自己的小说新作的同时，以旺盛的精力投入政论写作。《时代》月刊自 1861 年 1 月出版，很快得到普及，当年订户即达两千多，次年激增至四千。1863 年 4 月号出刊后，因其中尼·尼·斯特拉霍夫一篇涉及波兰事件的文章，触怒了当局，被迫停刊。由于多方努力，八个月后，杂志出版人米哈伊尔获准出版一份新的月刊，刊名为《时世》，实际上就是《时代》的继续。新杂志于 1864 年 1 月创刊，出到 1865 年第 2 期即因订数锐减而负债累累，不得不破产停办。

1862 年到 1865 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旺盛期，每有新作都发表在《时代》和《时世》杂志上。这期间，他的个人生活多遭变故。他的妻子涅恰耶娃病故，他与阿·普·苏斯洛娃发生恋情复又破裂，兄长米哈伊尔于 1864 年 7 月病逝。在这之后，他不得不担起办刊的全部责任，又要照顾兄长家小的生计。尤其是米哈伊尔遗留的巨额债务，给了他沉重的负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笔耕不辍。在这一时期内，他的思想立场是中立的。他一方面与米·卡特科夫、斯拉夫派论争，另一方面与革命民主派进行论战；也正是在论战中，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思想——根基论。他主张为改善农民的社会处境必须消除阶层的壁垒，赋予民众发挥力

量的自由空间，提倡村社式的生活，强调俄国民众能够捍卫自己世代的社会结构，承认社会的分裂标志着人民向往真理和对现实的不满。而所有这些证明俄国民众有能力参与政治生活。凡此种种，表现出作家的民主倾向。但与此同时，他越来越赞同用和平的渐进的方法改造现实，幻想以道德感化作为改造社会与个人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奉东正教教义为道德的理想和规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思想复杂性和矛盾性，在当时他的文论时评中得到了展示。

收在《文论》卷里的作品，主要是《时代》和《时世》两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它们集中地反映了当时（1861—1865）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社会立场和文学观念。

在这之前，他的思想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折。早自第一部小说《穷人》（1846年）起，他便继承普希金和果戈理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真实地表现了民众的疾苦和心声。《穷人》深受别林斯基的赞赏，他也因此一度与别林斯基接近。但与果戈理不同，他不仅表现下层人民的贫困生活，而且还展示他们的精神世界。不久，他与别林斯基在艺术观上产生分歧，终于离开了别林斯基的圈子，转而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他渐渐赞同用革命的手段改变不公平的现实，而且他在小组的一次“星期五”聚会上当众宣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这是一份激烈反农奴制的地下传抄的违禁文件，因此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案发后，他也遭到逮捕并被判处死刑，——虽然这是一次假死刑，此后改为流放服苦役和当列兵。在这一连串痛苦遭遇中，他的社会思想发生了一次根本的转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背叛”了“原来的信仰”。这一转变的主要内容，就是由赞成激进的社会变革转向主张和平的渐进，由反对专制制度转到寄望

于开明君主。新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恰好坚定了他的这一信念。而这基本的立场又决定了他与革命民主派不可避免地产生意见分歧。此后，他接近弗·彼·梅谢尔斯基公爵（并担任他的刊物《公民周刊》的主编），接近东正教总监康·彼·波别达诺斯采夫，他向皇储呈献自己的作品《群魔》，以及他在《作家日记》中谈沙皇与俄国人民亲如父子等等，从而在社会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屡屡被人诟病，根源就在这里。苏联的官方史学，甚至长期加给他思想反动、立场反动的罪名。然而，如果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如果全面看待一位作家的建树，看到他创作中表现的人道主义思想，反对社会压迫、同情穷苦人民的思想，同时也看到他终生受到沙皇政府的秘密监视等处境，我们应当摆脱过去知人论事那种简单化政治化的流弊。不能不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虽有其弱点和不足，但在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终究不失为思想、特别是在艺术上，是天分极高而出类拔萃者。他洞察俄国社会的种种矛盾和积弊，他尤其深悉形形色色人物的心灵。他热爱人民，珍惜民族传统，以赤子之心期盼民众的自由幸福，期盼知识界与民众的团结。即便在他改变政治激进立场之后，即便在19世纪60—70年代反动统治趋于强化之时，他在作品中对统治阶级思想生活的批判，对人民历史作用的信心，并没有减弱。在公民激情的驱使下，他思索，争论，辛勤笔耕，不遗余力，时而也出现失误，不尽公允，却始终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卓越的文论家、批评家、时评家。

《时代》杂志创办伊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编辑部同事尼·尼·斯特拉霍夫、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便卷入当时文坛上不同派别之间的论战。一方面他们与自由主义者展开了争论，另一

方面同情革命民主派的刊物《现代人》。但后来逐渐转而与民主派发生了争执，到《时世》时期甚至愈演愈烈。《时代》的征订启事申明办刊的宗旨和立场，标志着“根基主义”、或“根基派”的思想的开始形成。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 1861 年的农奴制改革为俄国的历史进程开启了新阶段，而后的基本任务就是使脱离人民的上层阶级同人民这个根基重新团结起来。而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则主张发动农民进行反对地主和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也就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在俄国发展方向的问题上分裂为两派：西方派主张西欧的发展模式，斯拉夫派要维系斯拉夫民族的根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根基论的理想能够成为协调民主派和自由派、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基础。

在《时代》上刊出的文论作品，篇幅最大也最为重要的，是《俄国文学论丛》（1861 年）。这里鲜明地阐发了作家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初期的社会立场和文学立场。文章字里行间透露着他对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文学的挚爱，表现出他对俄罗斯未来充满信心。围绕普希金作品的人民性与大众对文学读物的需求，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阐述了文学与人民的关系，和人民性的本质所在。

《——波夫先生与艺术问题》一文提出的是另一个至关重要的观点——如何看待文学艺术的功能。争论先是在“纯艺术”派和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之间展开的。杜勃罗留波夫同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在当时严厉批评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倾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赞同他们的这种立场，对他们一系列的深刻见解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同时他又认为杜勃罗留波夫对艺术使命的看法，有狭隘的功利主义之嫌，这是他撰文的主旨。早在 40 年代，对文学艺术的使命见解不同，

就是他与别林斯基失和的一个原因。别林斯基要求文学自觉地服务于特定的政治倾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是给文学派定了一种有局限的有损其价值的任务。后来当彼得拉舍夫斯基强调作家的社会使命时，他同样坚持自己原来的立场。据他看来，艺术从来都是现代的，也是现实的，而不是相反，主要的是它不可能不如此；不过，人类发展的历史道路，以及艺术作用于人类的方式，是不可能事先规定的，是极其复杂的，以致批评家很难断定什么有害什么有益。因此他认为，批评家对艺术不该提出任何政治的要求。他认为艺术所表现的，是人类精神对美的永恒性需求，所以无法在艺术中明确划分有益和无益、进步和落后的界限。据此，他维护了阿·迈科夫和谢尔比纳的诗作，而不同意他所认为的杜勃罗留波夫的功利主义立场。另一方面又不同意杜勃罗留波夫给女作家马尔科·沃夫乔克小说的高度肯定的评价，认为他只重视倾向不顾艺术，而在艺术中应该摆在首位的恰是艺术性。尼·乌斯宾斯基的小说集出版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将它视为民主主义文学反映民众生活的创新之举，预示着文学的新嬗变。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赞誉了小说的成功，但不认为尼·乌斯宾斯基是开风气之先，因为此前已有作家表现出了上层社会对民众的新见解。在对人民的理解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看重民众的宽厚精神，否认其存在落后保守的一面，否认其缺乏政治觉悟。这些都反映了斯拉夫主义的立场。由于观点的分歧，他指责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热衷于抽象的论辩，揶揄地称革命民主派是理论家。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论中，与民主派的争论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初起一直不断，而且愈演愈烈。1863—1864 年间一场旷日持久的笔战更深入到美学的层次。参战者一方是《现代

人》的编者谢德林和阿·马·安东诺维奇，另一方是《时代》、《时世》的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尼·斯特拉霍夫。谢德林嘲笑《时代》编者企图超脱于进步与反动两阵营的斗争之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回敬谢德林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实际上是取消美学而鼓吹简单的复制现实。这一切使得两刊物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但由于《时世》被迫停刊，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转入小说的创作，他的文学批评活动中止了数年。在 60 年代下半期和 70 年代初期，作家只是在书信中发表过一些文学评论方面的意见，大多也是针对民主派文论和创作的，明显带有论战性质，还不时流露出个人的激愤。1873—1874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公民周刊》任主编时，重又写过一些评论文章，在该刊的《作家日记》栏目中发表。他离开《公民周刊》后，在 1876—1881 年，他自己以独立的刊物形式出版《作家日记》，专门发表他个人的著作，其中有少许文学作品，大多是政论时评，却很少文论（这是他自己声明过的），但这为数无多的文论也反映了作家晚期的一些文艺思想。尤其是 1880 年纪念普希金的著名演说，更显重要，因为它可以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观的最后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论》卷只收入了 1865 年上半年以前的文章，并非作家文论建树的全貌（因为《全集》中《作家日记》是单独出版的）。单只说这一阶段的文章，其内容也远非上文着重说明的文坛论争所能涵盖的。如果再把《作家日记》和《书信集》加进来整体地看，他一生对文艺问题的思考和见解，是相当丰富而又富于创意的。他继承和发扬了普希金、果

戈理的现实主义传统，对现实主义小说艺术做出了多方面的创新，有时提升到理论上给予独到的阐发。例如他指出文学的深刻全在于典型与性格，写典型的现实也写形成中的现实，开发源自现实的创造性想象，作家对艺术现实持有自觉而明确的态度，借重奇险也要发掘平淡，最高的现实主义在于深刻揭示人的内心世界，如此等等。对当时俄国的重要作家与作品，他有某些独具慧眼的分析评论，例如对别林斯基的回忆，对尼·谢·列斯科夫小说的分析，对列宾画作的阐释，与作家兼评论家瓦·格·阿夫谢延科的争论等等。更不用说他有关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等大艺术家的论述，虽未必全都公允、中肯，却也能发人深思。对西欧文学的介绍、评论、接受，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论的一个重要部分。他熟悉和喜爱的经典作家包括荷马、塞万提斯、莎士比亚、高乃依和拉辛、孟德斯鸠和勒萨日、斯威夫特和伏尔泰、莫里哀和博马舍、歌德、席勒、司各特、霍夫曼、拜伦、海涅、密茨凯维奇、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欧仁·苏、爱伦·坡。无论其中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作家，不少作品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注和分析。而透过文学的接受，他对西欧社会和西欧文化，有时做出了深刻的观察和独到的评论。可以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恰好充分地印证了他自己的一个论断：别国人民的伟大诗人和思想家除了在自己国土之外，最易被理解接受和最令人感到亲切的就是在俄国。作家在这方面留下来的文字，也是研究俄国同西欧文学交往的可贵资料。

在《文论》卷的附录中，收进了有关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的材料，对了解作家生平和思想发展均十分重要。同时也收入了一些文档中未曾发表和不供发表的旧稿片断（包括少许诗歌

习作），聊供参考。

毫无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论作品正如他的小说创作，也是一份颇有意义的思想遗产，对研究作家的创作及其文艺观以至社会政治观点，极有价值。而且它们也是俄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现象，对了解和思考今日俄国也不无启示的作用。

《文论》卷据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 1978—1980 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 18、19、20 卷译出。翻译的分工是：苗澍——《〈时代〉杂志 1861 年征订启事》、《俄国文学论丛　引言》和《附录》。柳若梅——由《文学界的歇斯底里》至《俄国文学论丛　关于大学问题》。何芳——由《谢德林先生，或虚无主义者的分裂》至《阿·安·戈洛瓦切夫论古典教育一文读后感》。白春仁翻译其余全部文章，并对全卷译文进行了校对通读，撰写了译序、题解和部分注释。陈燊先生在审校过程中又增补了大量注释，对理解作品大有助益。对上述诸位的支持和协助，谨致谢忱。

白春仁

2005 年 12 月于北京

目　录

一八四五

龇牙一笑

幽默文集。两卷（八分之一开本）。分十二册，每册三至五印张。画版装饰。

文雅的广告读者先生们，首先请你们看了预告文集的这个怪书名，甚至是好玩的、也许好玩得过了头的书名，不要生气也不要抗议。“哼！龇牙一笑！”我们早就想到，不少人甚至许许多多的人单凭这书名便会对文集不屑一顾。他们要取笑这个题名，甚至愤愤然，甚至感到难堪，称之为陈腐、神话、扯淡，最后则认为这是绝对做不到的。主要的还是嫌它陈腐过时。“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龇牙一笑？在我们这个铁的时代、实干时代、金钱时代、充斥种种表格数字的谋算时代？再说，请问诸位，你们要笑什么呀？还有，这位‘龇牙一笑’的先生怎么个笑法呢？最后，这位先生能够笑得起来吗？他真有足够的手段吗？如果真的掌握着足够的手段，那他为着什么笑呢……有趣的正是笑从何来？当然——反对‘龇牙一笑’的人们继续说——笑是可以的，大家都在笑，为什么不能笑呢？但要笑得恰当，适逢其时，要笑得有尊严；不是随便地就龇牙咧嘴，像这里书名说的那样。总之，笑从何来大家是清楚的。比

如说办成了什么事人们要笑，比如说看到什么离谱过分的事人们会笑，还有……怎么说呢？……打纸牌时手气好会笑，上剧院看演出《费拉特卡》① 时会笑。这就是笑得适逢其时，不是这里说的那样，是笑得有尊严、得体，不是随随便便，不是龇牙咧嘴，不是笑得没边儿。而且又怎能保证这里面不隐藏着什么目的？——那些喜欢在一切不相干的事情里搜寻动机，甚至是不良目的的人们最后还会这么说——这里说不定是一种假象呢，甚至可能是为某种事想出的不光彩的借口；还说不定是什么自由思想哩！哼！可能啊，很可能啊！在当今的风气之下特别可能是这样。最后，'龇牙一笑'是个多么俗气的、粗野的、不伦不类的、很不文雅的书名！为什么是'龇牙一笑'？干吗要'龇牙一笑'？这'龇牙一笑'又能说明什么？"

先生们，看你们已在责难和怪罪了，没有听完我的话就问罪了！等一等，先听我说完。我给你们解释一下什么是"龇牙一笑"，我觉得有责任向你们解释清楚。我敢说，听完我的说明你们定会改变看法，甚至可能以赞赏的微笑来欢迎"龇牙一笑"者，可能会喜欢他，可能（谁说不会呢）还会尊敬他。先生们，要不喜欢他那才是怪事呢！"龇牙一笑"者，是位唯一而不可多得的好人，单纯质朴，主要的是没什么奢望。只凭这一条，只凭没有奢望，他就已经值得十分敬重了。你们朝周围打量一下，谁现在能没奢望，啊？可你们看他，他不会触动你们，不会伤害任何人的自尊心，不会要任何人靠边让路。他只有一个贪图，只有一种奢望，就是有时逗先生们一笑。不过，

① 指П. Г. 格里戈里耶夫（1807—1854）创作的轻松喜剧《费拉特卡和米罗什卡》。19 世纪 30 年代在亚历山大剧院上演，颇受观众欢迎。

这不是说他要为尊贵的听众们坐着冥思苦想，最后学着德国人的样子弄出点儿笑料来。不是这样！他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产生愿望，马上便会龇牙一笑，天生的本领！不费吹灰之力，为了说笑也不吝惜头号的密友。既然话说到这里，我就给诸君讲一讲“龇牙一笑”者是个何等人，经过什么事，干成了什么事，现在想做什么。总之一句话，把他从头到脚地描写一番。

你们可以想象，这人还算年轻，但快奔中年了，愉快活泼，兴冲冲的，好动好玩，吵吵嚷嚷，无忧无虑，脸蛋儿红红的，吃得胖墩墩，望他一眼准能引起食欲。他脸上总是笑容可掬。哪怕是最严肃的人，在班上一本正经，整个上午在办公室里坐饿了，没有好气，嗓子都嘶哑了，忙赶着回家吃午饭，这时要是看上我们这位主人公一眼，也会顿时心花怒放，意识到在世上还能活得如此快活，人生还是不乏欢乐的哟。你们可以想象他就是这么个人。欧！我忘了主要的，现在简单介绍一下他的经历。首先，我们认为他是莫斯科出生的人，而且，他肯定是莫斯科人，就是说他豪爽健谈，总有自己内心的思想，喜欢美餐，喜欢争论，有几分愚钝，又有几分狡黠。总之，一个好人的品质他都占全了……不过，他受教育是在彼得堡，肯定是在彼得堡。而且可以不含糊地说，他受的是极好的现代的教育。其实他是到处求学，无所不知，无所不学，全都熟记在心，没有未到过的地方。起初想当一个军人，后来到大学里听课，也了解医学院里干些什么；用不着瞒着，他甚至到过瓦西里岛上第四街[①]。就在这时，他突如其来地发现自己有艺术家气质，科学和艺术对他产生了诱惑。但科学和艺术也没维持许久，之后我们的主人公就坐了办公室（别无可为!），一待可不

① 或译四条，当时为美术学院所在地。

短，整整两个月。直到突来巨变，他忽然成了自身和自己财产的全权主人。打那时起，他双手往兜里一揣，吹着口哨溜达，过着只为自己的生活（原谅我用这个词儿，先生们!）。

他或许是在彼得堡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唯一的浪荡子。他既年轻可又不很年轻，随您怎么说好了。年轻的朝气失去了许多，新增点精神立刻也衰退。只剩了一桩事，就是笑。不过我敢保证，他的笑是一种天真的质朴的童心的笑，笑一切人笑一切事。再说，他不断地想笑，难道真是他的过错吗？在你们看来是挺严肃挺正经的事，在他看来只是一场玩笑，这一点可是他的错吗？你们看是快乐仙境，他却看出了自己的瓦西里岛；你们看是希望和向往，他却认为是迷途，是不自量力，是纯粹的欺骗；你们看是坚定不移的前程，他却看出了是自己的那个办公室；你们一本正经的样子，在他眼里却是那个瓦尔索诺菲·彼得洛维奇，也就是他过去的处长，这人其实是位可敬的先生。这一切，难道是他的过错吗？你们只见舞台的正面，他则看见了幕后，这是他的过失吗？最后，这个华美富丽的彼得堡，它的喧声轰响，它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绵延不绝的尘事，内心深处的向往，绅士和浑蛋——杰尔查文所称的“大堆的垃圾”，金玉其外的和原形毕露的垃圾[①]以及投机家、书商、高利贷者、催眠者、骗子、农夫等等三教九流，在他眼里不啻是一个无穷无尽、精美绝伦的画册；只有悠闲无聊或饭后茶余，可以翻阅一番，看着它打个哈欠或是会意地一笑。这——难道是他的错吗？的确，在这一切之后，我们的主人公还笑得出来，还能龇牙咧嘴，已属难能可贵了。至少，这还多少有些益

① 加·罗·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古典主义诗人。这里引自他的颂诗《大臣》（1774—1794）。

处。不过，不正规的生活最近开始令他感到厌倦。而且有些小说、杂志、文集、杂文、报纸① 纷纷在读者面前议论他非难他利用他，致使他痛下决心，今后要多多节制，行为要庄重一些……为了这一目的，他本打算向读者奉献一本特别的书，收有自己的随笔、回忆、观感、心得、自白，如此等等。可是由于做过了头多有不当，由于最好的美味吃多了也会腻味，由于他本人就反对消化不良，于是便决定把这本书来个化整为零……

他手头素材多得很，时间也难打发。我们说过，他没有任何公务，什么厅啊局啊，什么办公室啊理事会啊，什么档案室啊，他全不沾边。他甚至从没受人之托办过什么事。他如我们上面说的，是最反对腻味人的事了。还有，他到处跑，到处观察，哪里都钻得进。一旦需要，他能熟悉彼得堡了如指掌。你们随处可以看到他，在剧院，在剧场门口，在包厢，在幕后，在俱乐部，在舞会上，在展览会上，在拍卖场，在涅瓦大街，在文学集会上。就连你们根本没想能见到他的地方，像彼得堡一些偏僻小巷和角落，竟也遇得上他。他从不挑挑拣拣，到哪里都攥着铅笔，提着夹鼻镜，嘿嘿地发出浑厚的笑声。“龇牙一笑”者还有个长处，他的第一要义，头等大事，就是讲实话。真实高于一切。“龇牙一笑”将会成为真实的回声，实话的传播者，要夜以继日为真理而战，要当真理的堡垒、卫士，尤其是如今，因为自从不久以前他对真实变得格外喜欢了。不过，他偶尔也说点儿瞎话。能说干吗不说呢！有时他就瞎说，

① 这里指的当是19世纪40年代“自然派”的反对者，反动文人法·韦·布尔加林（1789—1859）和作家、东方学家奥·伊·先科夫斯基（1800—1858）的小说、文集、杂文以及布尔加林办的《北方蜜蜂》报和先科夫斯基办的《读者文库》杂志等刊物。

只是不太过分。请问谁不如此啊？大家偶尔地都爱说个谎。噢，不是说谎，怎么会呢！是说走了嘴，说得花哨一些罢了。“龇牙一笑”就是这样，有时会打个比方；不过每当瞎说也就是打比方的时候，他能说得完全像实话，比实话还实话，有这个本事！不过一般说来，他会为真实而斗争，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其次，“龇牙一笑”反对针对任何个人，甚至反对排斥任何个人。于是，比如伊凡·彼得洛维奇读了我们这本书，绝对找不出任何针对自己的不敬之词，倒有可能发现一点儿挖苦自己的好友和同事彼得·伊凡诺维奇的话，挖苦但完全没有恶意①。反过来亦然，彼得·伊凡诺维奇读此书找不到说自己的什么话，却会看出讲伊凡·彼得洛维奇的一些话。如此一来，两人皆大欢喜，全都十分开心。这就靠“龇牙一笑”的安排了。你们可以亲眼看到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最令人惊讶的是，伊凡·彼得洛维奇首先惊呼书里没有一句写到他，不仅没有近似之词，连一点儿影子也不见！不要说什么不雅和恶意的暗示，这种念头压根儿就不存在。要说还有点什么，那完全是针对彼得·伊凡诺维奇的。你们看奇也不奇！总之，我们再说一遍：真实高于一切。“龇牙一笑”将靠真实生存，将维护真实，追随真实不放；上帝保佑，如果不得不死，他将只为真实而死！是的，他只能献身于真实！

也许在我们介绍了“龇牙一笑”的性格、习惯和嗜好以至行为之后，有人还会问：我们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呢？对它能

---

① 伊凡·彼得洛维奇和彼得·伊凡诺维奇这两个名字，不仅在这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的几个作品里也一再出现，当是他虚构的人物。

够期望什么，又不能期望什么呢？对此最好的回答，就是“龇牙一笑”的第1册，它的出版不会迟于今年11月上半个月。不过我们现在就准备满足读者的愿望。这里有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幽默小诗、对著名小说戏剧诗歌的戏拟、生理学札记、文学和戏剧及其他性质的随笔、著名的书札、笔记、各类简讯、笑话、假消息等等。总之，是一切合于“龇牙一笑”者个性的东西，除了他所不擅长的以外。这些便是我们文集的内容。有些文章根据“龇牙一笑”的意见，将配上木刻插图，请彼得堡优秀的木刻家和绘画家来完成。全书出齐时，亦即第12册问世时，“龇牙一笑”将赠给自己的读者极漂亮的插图封套，把全书包起来。“龇牙一笑”认为有必要告诉读者，他已备好许多精美的图画和多样的文章，所以坚信全书各册的出版不会超过四个星期。因此，整套文集在一年内定可出齐。

最后还有一点……一个重要的又很微妙的问题……“龇牙一笑”十分热爱、尊敬、重视自己的读者，未来的读者（他一定会有读者的，一定会有！），以至于想免费赠书，不管打字、纸张、图画必定需要开支，插图在我们这儿可真是难得而且昂贵！……可是第一，不好接受他这么个人的馈赠啊，他的名衔自己都不敢告人，生怕失掉读者的敬意，他只不过是个“龇牙一笑”者；只消设想一下收他的馈赠，不就够令人难堪了吗！第二呢，还有一个原因。怎么，到了如今还要白送书给人家？谁都知道我们这个时代已是真正锱铢必较的时代，是铁的时代，金钱的时代！① ……这种做法准定会贬低此书，失去读者。

① 这里依据的是普希金的《书商与诗人的谈话》（1824）一诗。书商同诗人说：“我们的时代是唯利是图的时代，在这个铁的时代里，没有金钱就没有自由。”

读者对强加给他的东西，不是躲避唯恐不及吗！有什么意义呢？算什么策略呢？最后，这不是丢脸吗？个人的尊严感到哪里去了？这些原因，使“龇牙一笑”的仁慈之怀望而却步。因此，“龇牙一笑”考虑到出版费用，考虑到个人自尊感，只好违心地宣布：他将以一个银卢布一册的价格，在M. 奥里欣、A. 伊凡诺夫、П. 拉季科夫书店，在A. 索罗金[①] 公司以及彼得堡其他书店里出售自己的文集。寄书每磅另附邮资。

龇牙一笑者

① 这四个人是当时彼得堡的书商或出版商。

彼得堡纪事

[4 月 27 日]

要是在不久以前，我很难想象彼得堡人怎么能不穿着睡袍，戴着圆顶帽，关在封得严严实实的房子里，每隔两小时一定服上一汤匙什么药。自然，并非所有的人全都生病。有的职务在身，不允许他生病。有的体格健壮，不会染病。终于，太阳露出了笑脸，这个消息无疑比什么都重要。正在康复的人犹豫起来，他踌躇着掀去圆帽，若有所思地整理一下衣着，这才同意出去走走，当然仍得全副武装，穿上毛衣、皮袄、毡靴。空气温暖，街上人群如同过节，马车跑在袒露的大道上轰隆震耳，这些令他惊讶开心。然后，他走上涅瓦大街，张口吸进了新鲜的尘灰！他的心怦怦地跳起来，嘴角仿佛浮出微笑，替代了刚才的疑惑。在泥泞和潮湿过后，彼得堡街头初现的尘埃，

自然比家乡古老烟囱冒出的烟更觉亲切[1]。这位出来散步的人，脸上怀疑的神情完全消失不见了，决心好好品味一下春天的气息。每当彼得堡的居民下决心领略春光的时候，无不表现出一种温厚和天真的神情，令你不由得与之分享喜悦。这时他若遇到朋友，甚至会忘了平时的问题："有什么新闻？"换上另一个有趣得多的问题："天气不错吧？"大家都知道，问完天气，特别是天气不好的时候，便该是彼得堡最讨人厌的问话了："有什么新闻？"我时常发现，彼得堡的两个友人相遇寒暄之后，都会异口同声互问"有什么新闻"，这时不管他们用怎样的语调，声音里总透着深深的沮丧。的确，这句彼得堡问话，带上了彻底无望的意味。不过最令人不快的是，老彼得堡人问这个话根本是心不在焉的。他很了解这里的习俗，早知道得不到回答，什么新闻都没有，他问过上千次毫无结果，已经心平气和，可还是得询问，好像在关心这事。好像不参与社会生活，不关心公众利益，会有失体面。可关心什么公众……噢，不，关心公众利益还是有的，我们无须争论。我们大家都热爱祖国，热爱我们的家乡彼得堡，有机会也愿意一起玩玩牌，总之有不少公共的兴趣。不过我们这里最风行的是建立小圈子。甚至不妨说整个彼得堡是由无数个小圈子凑合起来的。每个圈子有自己的章程，自己的礼节，自己的规矩，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先知。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们民族性格的产物，就是多少还怯于过社会生活而盼望回家。再说为了过社会生活，是需要艺术的，需要准备好许多条件，一句话，还是家

---

① 俄国诗人加·罗·杰尔查文（《竖琴》）和亚·谢·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智慧的痛苦》）都写过一句后来成为名言的诗句：祖国的烟也是甜美的。这里是反用其意。

里好。这里自然得多，不需要艺术，比较安稳。在小圈子里会痛痛快快地回答您的问题：有什么新闻。这问题一下子变成了个人的问题，别人可说段闲话回答，或是打个哈欠，或是说点儿什么引得您毫无顾忌地回敬一个哈欠。在小圈子里能够无忧无虑地甜甜蜜蜜地度过自己有益的一生，打着哈欠说着闲话。直到有一天流感或热病造访您的家园，您撒手而去，坚毅地不动声色，很幸运地不知道这一生何以如此，不知道这一切都为了什么。人就死在黑暗之中，在黄昏时分，在暗淡无光的、哭泣的日子里，自己完全不明白一生的原委，活了一场（似乎生活过)，也有所收获，可如今怎么就得离开这个惬意和安宁的世界，去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去。在一些小圈子里则是认真地论事，几位有教养的充满善意的人，聚会一起热烈地讨论。他们无情地排斥了一切无害的娱乐，比如说点儿闲话，玩玩纸牌（当然不是在文学圈子里)，而是不知哪来一股热情，大谈各种重要的话题。等大家说完论毕，解决了几个公益问题，相互完全说服了对方，整个小圈子里的人不知怎么生起气来，陷入不快。终于他们相对怒目而视，讲了几句不顾情面的实话，还指名道姓，口出不逊。最后呢，一切平息下来，人们找到了更多的生活理智，渐渐地接近了第一类的小圈子。当然，能这样生活是很愉快的，可结果叫人懊丧，极不称心。比方我就对我们保持古风的小圈子颇感懊丧，因为那里总要冒出一位最难忍受的先生。这位先生你们大家是了解的。他这号人多得不可胜数。这位先生有一颗善良的心，可是除一颗善良的心则一无所有。乍看起来，在我们这时代有颗善良的心算什么稀奇！再说，不正该有这么一颗永远善良的心吗?！这位心地如此美好的先生，到了社会上信心十足，觉得有这颗善良的心足可以使他的生活永远满意，永远幸福。他对前程如此自信，当踏上人

生征途时，对任何其他的东西全不屑一顾。比如他遇什么事都不知节制，不讲分寸，一切直出直人，开诚布公。

这人有种特别的能耐，一下子爱上个人，与他交上朋友，同时完全相信因为他爱所有的人，人们也马上回报给他的爱心。他那颗善良的心，做梦也想不到光是爱的热烈还不够，需要掌握让人爱上自己的艺术；没有这个本领，无论他这颗爱心还是不幸选他为热恋对象的别人，都将一筹莫展，生活会一塌糊涂。此人要交上个朋友，这朋友马上就成了他家居的器皿，像只痰盂缸什么的。内心的念头，犹如果戈理说的天知道什么破烂儿①，一股脑儿冲口而出钻到朋友的心里。朋友呢，什么都得听着，对什么都得表示同情。这人或是生活中受人欺骗，或是上了情妇的当，或者打牌输了钱，立刻像只狗熊凑上来，往朋友心里大量倾注自己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常常根本看不到朋友为自己的操心事已是眉头紧锁，这朋友要么是孩子病死，要么是妻子发生不幸。结果是这位善心的先生惹得朋友心烦意乱，人家委婉地暗示这会儿天气真棒，意思是他趁机可以立刻独自去游玩一番。他要是爱上个女人，就凭这天性非得上百上千次得罪她，之后这颗爱心才能发现得罪了人，才能发现（如果真能发现的话）这女人由于他的爱不胜其苦，同他一起厌烦痛苦之极，他那穆罗马人② 特有的爱心毁了她的生活。的确，只有在宁静之中，在角落里，特别是在小圈子里，才能产生这

① 果戈理在谈《死魂灵》的信里，说到本来是自己想克服自身的一些毛病，竟连带也改起了自己作品中主人公的恶习，称这是把自己的破烂儿加给了主人公。

② 公元前 1 世纪起居住于奥卡河流域的芬兰-乌戈尔部落，从事农业、狩猎和手工业，向罗斯进贡。12 世纪后为俄罗斯人所同化，此处大概是用以比喻原始、粗野的民族。

种美好的天性。用美国人的话说，是我们一种未曾加工的原料的样品。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艺术，一切全是自然形态，纯粹是自生自长的，不受任何的约束。这种人忘记了，或是出于完全的天真根本想不到，生活整个是一种艺术，生活意味着把自己变成一部艺术作品；必须有共同的兴趣，必须同情社会大众，同情大众的直接要求，人的财富、资本和善心才可能磨炼成真正光芒四射的珍贵钻石；在昏睡中，在冷漠中（在冷漠中大众就会解体），在离群索居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我的天哪！古代的情节剧和小说里的古老强人到哪里去了，先生们？他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是多么好哇！好就好在您身边立刻能出现一个行侠仗义的人，保护无辜惩治恶行。这种强人，这种 tirano ingrato[①]，生来就是强横之辈，是命运以神秘而完全不可解的方法预先决定了的。在他那里一切全是强横的化身。他在母腹里便已是强人。不仅如此，他的先人大概预感到他的出世，特意给他选定了一个姓氏，完全符合他未来的社会地位。仅从他的姓名上您就听得出，他这人走路提着刀，动不动就杀人，视同儿戏，不知为什么。好像他是一部机器，专用来杀人放火的。这倒挺好！起码可以理解。可如今，天知道写作者又是怎么写的呢。如今，出现了一个大善人，一个完全不会作恶的人，忽然间竟能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可自己还不觉得。更遗憾的是没有人发现这一点，没有人告诉他本人。您看哪，他就这么活着，活得挺长，也受人尊敬，最后在荣耀中、在一片赞扬声中死去，真令人羡慕，还博得人们打心眼儿里动情地恸哭。最可笑的是，恸哭者正是他的牺牲品。尽管如此，世上有时还是那么多的理智和冷静，简直不明白怎么

① 拉丁文：不由自主的暴君。

盛得下它们。闲来无事，就琢磨出这许多理智和冷静，好让人享清福！远的不说，日前就有一件事，我的一位很要好的熟人，从前是个善心人，对我多少还有过些庇护，名叫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最近打算结婚。说实话，他这年纪结婚再合适不过了。婚还没有结，离婚礼还有三个星期，他每天晚上都穿上白坎肩，戴好假发和各种徽章，买些鲜花和糖果，坐车去格拉菲拉·彼得洛芙娜家炫耀。那就是他的未婚妻，十七岁的姑娘，天真无邪，不谙世事。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一想到最后这一点，甜蜜的嘴角便浮出浅笑。是啊，这个年纪结婚真还不赖！依我看，说得公开些，年纪太轻，比如三十五岁以前这么干都不体面。毛毛躁躁的！这会儿人快五十了，能坐得住，有了身份，语调也稳重了，体形和道德上都有了富态，这不是很好吗？的确不错！于是我想：看哪，一个人活着，日久天长，终于熬出了头……正因此我感到莫名其妙，这两天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晚上在自己的办公室，倒背着双手走来走去，脸上无光，脏兮兮的一副苦相。办公室角落里一个小官吏，忙着办他那一大摞紧急公务。倘如他还有些灵气，只消望一眼上司，准定会变得委靡不振。我现在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此事我都不愿启齿，无聊透顶，思想正派的人是根本想不到的。在豌豆街的一个四层楼上，朝街有套住宅，从前我曾想租来住的，现在租给了一个陪审员的妻子。她过去是陪审员的妻子，现在是寡妇，相当漂亮的年轻女人，模样极可爱。这个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心里正嘀咕，娶妻之后如何还能依旧来这里，虽说少几趟，晚上仍可会会索菲娅·伊万诺芙娜，同她聊一聊法院诉讼之事。她两年前提交一份讼状，由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这位善心人担任辩护律师。为了这个缘故，他宽阔的额头才爬满了皱纹。最后他还是穿上白坎肩，拿上一束鲜花和糖果，满脸

高兴地去看格拉菲拉·彼得洛芙娜。“有的人真有福气呀!”我想到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心里琢磨。“已经上了年纪，还找到了完全理解他的十七岁姑娘，纯洁无邪，受过教育，一个月前刚从贵族女校毕业。这人会过上好日子，富裕幸福!”我心里不由妒忌起来。那会儿街上肮脏灰暗，我沿着干草市场走着。先生们，我是写小品文的，我得给你们讲些最新的趣闻，最叫人怦怦心跳的消息。我不能不用这个古老的可敬的形容词，造这个形容词，大概真的为使彼得堡的读者听到什么新闻，能高兴得怦怦心跳。比方说是热尼·林德抵达伦敦①。不过热尼·林德同彼得堡的读者有什么相干!他自己的事已经够多的了……然而，先生们，我们自己却没有趣闻，根本没有!我沿着干草市场走，绞着脑汁，可写点儿什么呢。我十分烦恼!那是个阴冷有雾的早上，彼得堡一起来就没好气，活似一个社交界的女子不满意昨晚的舞会而怒气冲冲。这个彼得堡从头到脚，怒不可遏。是没有睡好觉，是夜里贪杯灌得太多，是受凉得了感冒，是晚上打牌像个孩子似的输得精光，早起衣袋里空空如也，是愤恨惯坏的丑老婆，愤恨懒惰粗野的孩子，愤恨大群板着面孔没刮脸的佣人，愤恨债主犹太佬，愤恨坏蛋官吏，愤恨形形色色的搬弄是非的诽谤者，到底是为了什么很难说。只是他那么气鼓鼓的，望着他的高墙、大理石、浮雕、塑像、圆柱，不由得心头郁闷。这些东西也仿佛怨恨坏天气，颤抖着，冻得上牙打下牙。还有裸露的湿漉漉的马路，好像在行人脚下气得要断裂开来。最后，路人同样令人不快，有的灰头土脸，有的一本正经，有的气呼呼直冒火，大部分把脸刮得光

① 热尼·林德（1820—1887）——瑞典歌唱家，从1843年起蜚声于欧洲与美国的歌剧舞台。1847年曾出访伦敦献艺。

洁整齐，匆匆地南来北往赶去上班。极目远眺，全城地平线上一片萧森……彼得堡动气了。此刻他像爱发火的先生一样，恨不得把一腔恼怒发泄在旁边某个倒霉的第三者身上，同他大吵一通，闹得最后绝交，再臭骂一顿，完事后自己跑开，说什么也不留在这因格曼兰德[1] 的沉闷沼泽里了。就连出于某种必然原因夜里暂时离开，到地球背面去的太阳，清早本想以亲切的笑容和慷慨的爱心跑来同自己这个娇惯有病的孩子亲吻一通，升到半路竟也停了下来。它奇怪又遗憾地望了一眼嘟哝没完、满脸怨气的病弱孩子，败兴地躲进了浓重的乌云里。只有一束鲜亮愉快的阳光，想一睹人世，从黑云深处飞快地钻出，照亮一片房顶，闪过阴冷的墙垣，散落成无数金星映在雨珠里，便倏然不见了，似乎因为孤单而不胜委屈。这倏忽遁去的光束，就像突如其来的一种喜悦，不知怎的钻进了斯拉夫人多疑的心灵，这心灵立刻不胜羞愧，绝不肯承认有什么喜悦。接着，彼得堡弥漫起恼人的阴霾。时至中午，城里自鸣钟仿佛很不情愿，凭什么在这昏暗的时刻得由它来叩响?!

这时，我遇到了一排送葬的队伍。作为小品文作者，我马上联想到：流感和热病几乎成了当今彼得堡的大问题。葬礼很隆重。死者躺在华贵的灵柩里，双脚朝前，威严地行进，去那世上最舒适的居所。长长一队僧侣，穿着沉重的靴子，踩在散落的松树枝上，弄得满街都是松油。棺木上摆了一顶缨帽，向路人宣告着死者的官阶[2]。后面是一排奖章系在绒垫上。棺木旁一位白发上校号啕大哭，多半是死者的女婿或是表兄弟。在

---

① 圣彼得堡省的古老名称，它的疆域包括涅瓦河和芬兰湾沿岸一带。

② 这帽子制式表明死者是五等文官。

送葬马车的长队里，和往常一样闪现着一张张哭丧的面孔，也有的低声讲些永不绝迹的闲话，衣服上带有白纱的孩子们快活地嬉笑着。我感到有些忧伤不快。我根本无人好责备，就露出一种责备的表情，甚至是十分委屈的表情，望了望车队里静静站立的一匹委靡疲乏的老马。它从邻车上偷了口草料不停地咀嚼，又闲得无聊想玩个花样，就是找一个凝神专注的行人（大概认准了是我），轻轻咬住衣领或衣袖拉向自己，又若无其事地向人转过那张充满善意的毛脸。弄得我浑身一颤，完全摆脱了清晨抑郁的念头。可怜的老马！我回到家，坐下来打算写我的纪事，可不知怎么翻开了一本杂志，读起一个中篇来①。

小说写莫斯科一个不知做什么的中等家庭。里面也讲了爱情，不过我不喜欢读爱情的故事，不晓得你们怎样。我仿佛到了莫斯科，回到遥远的家乡。先生们，你们如果没读过这篇小说，劝你们读一读。那么，我能给你们讲点儿什么新闻呢？讲点儿什么更有意思的东西呢？说涅瓦大街上时兴新的公共马车？说《涅瓦》杂志这一周吸引了所有的人的注意？说沙龙里的人们继续在打哈欠，定期聚合起来等待夏天的到来？难道讲这些吗？可这些你们早就听得厌烦了。你们刚刚读完一段北方清晨的描写，难道不是很乏味吗？所以在这坏天气里，在这阴冷的早晨，你们还是读一读这篇小说吧！它讲莫斯科一个小家庭，讲祖传衣镜被打碎的故事。我好像童年时就见过这位可怜的安娜·伊万诺芙娜，这个家庭里的母亲。连伊万·基里洛维奇我也熟悉。他是个善良的人，只是在娱乐时壮着胆说几句各样

① 指《祖国纪事》1847 年第 3 期刊载的彼·尼·库德里亚夫采夫（1816—1858）所著中篇小说《斯博耶夫》。下文谈的就是该书中人物的故事。

的笑话。比如他的妻子是个病人，总担心会死去。他在人们面前开玩笑，戏言成了鳏夫后就再结婚。妻子忍着忍着笑了起来，是强打精神。丈夫性格如此，有什么办法呢？这时，她把一只茶壶摔破了，当然要破财了。不过当着人叫丈夫数落，说笨手笨脚，总是不大舒服。这天到了谢肉节[①]，伊万·基里洛维奇没在家。晚上大女儿奥利娅的许多年轻女友偷偷来聚会，也有不少男青年，其中有的很能闹。一个叫帕维尔·卢基奇的，简直就是司各特小说里的人物。他煽动大家戏闹，出个点子玩捉迷藏。患病的安娜·伊万诺芙娜似乎有不祥的预感，可看到大家都想玩就应允了。先生们哪，从我玩捉迷藏的时候算起，整整过了十五年啦！好个帕维尔·卢基奇！难怪奥利娅的女友、黑眼睛的萨莎，贴着墙浑身发抖，低声呻吟说自己要倒霉了。帕维尔·卢基奇这人就这么可怕，如今又蒙上了眼睛。结果，几个年幼的孩子钻到桌子下边，在衣镜旁弄出声响。帕维尔·卢基奇朝响声扑过去，镜子晃了一下，从生锈的合叶里滑出来，越过他的头掉到地上，摔了个粉碎。哎呀，我读到这里，好像是自己打碎了衣镜，好像全由于我的过错。安娜·伊万诺芙娜脸都吓白了。人们四散而逃，一片惊慌。要出什么事吗？我提心吊胆地等伊万·基里洛维奇快些回来，心里惦着安娜·伊万诺芙娜。到了半夜他醉醺醺回来，在门廊迎着他的是老奶奶，莫斯科老派的刀子嘴。她嘀咕了半天，大概是讲发生的灾祸。我的心剧烈地跳起来，突然雷雨交加，四野轰响，随后慢慢寂静下来。我听到了安娜·伊万诺芙娜的声音，会出事吗？三天之后她病倒在床，一个月后死于可恶的肺结核。怎么会呢？是因为衣镜破碎吗？这怎么可能？但她确实去世了。作者

---

① 在大斋前一个星期，此期间可以吃荤食肉。

描写这个默默无闻的生命最后的弥留时刻，表现出了某种狄更斯的传神之美！

伊万·基里洛维奇也够意思。他几乎发了疯，自己跑到药房，同大夫争吵起来，一边哭诉妻子怎么把他抛下不管。是啊，这引起了许多回忆。彼得堡也有不少这样的家庭。我本人就认识这么一位伊万·基里洛维奇。其实这类人到处不可胜数。先生们，我讲起了这篇小说，是因为自己也打算给你们说个故事……不过要等下一次了。顺便讲讲文学。我们听说许多人十分满意今冬这个文学季节。没有大叫大嚷，也没有特别冲动，没有唇枪舌剑，虽然出现了几份新的报刊。好像一切变得认真起来，严肃起来。各方面显得老练成熟，更加深思熟虑，更加和谐了。倒是入冬时，果戈理的书① 引发了不少议论。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几乎所有报刊众口一词地反对它，而一般说来它们的态度总是相互矛盾的。

对不起，忘了主要的一点。刚才讲着的时候还一直记得，后来给忘了。恩斯特② 还要演出一场音乐会，收入捐给济贫会和德国慈善会。我们可没有说剧场会满座，我们深信这一点。

---

① 指果戈理与友人通信的片段摘录。1847 年初，果戈理出版了新著《与友人书信选》，反映出他深刻的思想矛盾。他在书信中否定了自己过去的创作方向，追求一种神秘的宗教解脱，因此受到许多人的批评。别林斯基致信果戈理，尖锐指出此书招致亲者痛仇者快的社会后果。总的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报刊众口一词的反对”，是表示同意的。

② 亨利·威廉·恩斯特（1814—1865），作曲家和小提琴手。1847 年 3—5 月间到彼得堡演出。

［5月11日］

先生们，你们可知道在我们广大的首都，一个人要是掌握着无人知晓的新闻，又有才能生动地把它讲出来，这意味着什么吗？依我看来，他几乎就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而且毫无疑问，掌握新闻要胜过掌握资本。一个彼得堡人听到某种稀罕的新闻，飞跑去讲给人家听，此刻他先就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他快乐的嗓音干涩，浑身颤抖，而他的心就像在玫瑰油里沐浴。这时，他还没把消息讲出去，还在涅瓦大街上奔向友人，仿佛一下子摆脱了自己的一切不愉快，甚至（据观察）甩掉了难治的痼疾，甚至心甘情愿地宽恕自己的仇敌。他是那么平和而伟大！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于这位彼得堡人在这庄严的时刻，意识到了自己的尊严，自己的举足轻重，同时也还自己一个公道。不仅如此，我连同你们这些先生们，都知道不少这样的人士。如果不在上面说的紧急情况下，你们是不会让这些人士登门，不会让他们去你们的仆从屋中做客的。太差劲了！这种人自知理亏，所以像只小狗卷起尾巴，垂下耳朵，等待时机。时机一到，这位先生就来按铃找您，勇敢而自得，在不胜惊愕的仆从面前昂然走过，堆着笑脸无拘无束地向您伸过手去。您立刻明白他有这样的权利，因为他有新闻、传说或什么十分有趣的事，否则这位先生谅也不敢登门找您。您便会不无兴致地听他说。当然，您可能完全不像那种可敬的社交女士，她根本不喜欢任何新闻，可极爱听各种笑话；您也不像那

种妻子，她教孩子们讲英语，却抽打丈夫①。

闲话传说是很吸引人的呀，先生们。我常常想，如果咱们彼得堡出现一个有才气的人，能发现某种为社会所喜爱的、而且任何国家都还没有的新东西，那我不知道此人可以得到多少钱。可咱们还老是靠着土生土长的艺人、食客、丑角。能人是有的呀！人这东西造得真奇妙！突然间，完全不是由于为人卑鄙，人变得不再是人，却成了蚊虫，一个普通的小飞虫。脸不像脸，蒙了一层湿漉漉的特别亮色。身材忽然缩得不能同您比拟。独立性完全消失。他望着您的眼睛，就好比等着赏赐的小宠物，丝毫不差。此外，他身上虽穿了非常帅气的燕尾服，却能当众躺到地板上，兴奋得摇打尾巴，叫着舔着，不听到说“吃吧”绝不进食，厌恶犹太人的面包。特别可笑、特别有趣的是，他丝毫没有失去尊严。他维护它，神圣不可侵犯，甚至您自己也深信如此，而且这一切显得非常自然。您当然是忠诚的雷古卢斯②，至少是亚里斯泰迪兹③，一句话，要为真理而死。您能洞察自己的这个人。而这小人本身也相信他完全可以令人看清。结果一切顺利，您的感觉很好，这个小人也没有丧失尊严。这么看来，先生，他是在夸奖您。当面夸赞您，自然不太好。这很无聊，很讨厌。可最后您会发现，这人做得很聪明，他的夸赞恰好指出了您在自己身上最喜欢的东西。由此可见，这里有智慧，有分寸，甚至有感情，有心灵的体验。因为

① 果戈理。（这是作者注的，没有说明，可能是指果戈理作品中的人物。——译者）

② 雷古卢斯（？—前248），传说中公元前3世纪的罗马统帅，为祖国痛苦地献出生命。

③ 亚里斯泰迪兹（约前540—约前467），雅典军事统帅和国务活动家，提洛同盟的组织者之一。

他在甚至承认您身上有那些可能被世人不公正地、出于妒忌而不肯接受的东西。您要说，谁知道呢，也许他不是个谄媚者，只不过太天真太真诚了，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拒绝他呢。他这个人也可以获得想要得到的一切，正像一个犹太人对走来的先生说不用买他的商品，干吗要买呢?！只让他看一眼犹太人的包袱，朝货物唾上一口就走好了。犹太人便打开了包袱，而这位先生买下了犹太人要卖的一切。我们这个首都人，同样根本不是出于卑鄙才这么干的。为什么夸大其词呢！这绝不是一个龌龊的心灵。这是个聪明的心灵，可爱的心灵，是共同的心灵，是盼望获取的心灵，探索的心灵，世俗的心灵。不错，是超前了一点儿，但终归是心灵。我不敢说大家都这样，许多人都这样。所以说这还很不错，没有这个心灵您会寂寞死的，你们要自相残杀。两面三刀，阴一套阳一套，假面具，这些都极要不得，我同意。但如果此刻人人都以本来面貌出现，天哪！那就更糟。

当彼得堡倾城来到夏花园和涅瓦大街上，展示自己新制的春装时，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上面那些不无益处的思索。

天哪！只是在涅瓦大街上同熟人相遇，就够写一本书的。不过呢，凭自己愉快的经验你们很了解这种种情形，书我想不需要再写了。我倒产生了另一个想法，就是彼得堡太会挥霍。很希望知道彼得堡是不是有许多花钱不愁的人，就是通常所说的生活富裕之人。不知对不对，但我总觉着彼得堡（如果可以这么比方）像个娇惯的老儿子；可敬的爸爸是老派人物，富有，能干，明白事理而且十分慈善。爸爸最后摆脱了公务，到乡间定居，很高兴，可以在穷乡僻壤穿自己的黄土布礼服而不失礼仪。而把儿子送到社会上，他要学习各种学问，要成为年轻的欧洲人。爸爸虽然只是听人说过教育是怎么回事，还是一

定要儿子成为最有教养的年轻人。儿子迅速地学到些皮毛，就投身于生活之中，穿上了欧式西装，留起了唇髭，留起了短尖胡子。可是爸爸完全看不到，与此同时，儿子也有了头脑，有了经验，有了独立性。他想过自己的生活，而且二十岁时经历之事已经超过爸爸恪守祖先传统终生的所闻所见。爸爸吃惊地看到了短尖胡子，看到了儿子不知节制地从父母衣袋里掏钱，看到儿子有些像分裂教派，又很有心计。于是就唠叨，就生气，埋怨教育，埋怨西方，最主要的是不满“鸡蛋教训起母鸡来”。可儿子得过自己的生活呀，于是忙得不可开交，那风风火火的劲头儿自然引人沉思。是啊，他挥霍起来大手大脚。

比方说冬天已经过去，彼得堡至少按日历说已算春季。报纸上开始登出一排排出国人士的名单。您马上会惊奇地发现，彼得堡的健康失调要比钱袋羞涩厉害得多。说实在的，当我比较这两种失调时，不由得大为震惊，觉着自己不是在首都，而是在一家医院里。不过我马上就清醒地意识到没有必要不安，在外省的爸爸，钱袋还是鼓鼓的。

您会看到人们住进多么阔绰的别墅，白桦林里出现多么鲜艳无比的时装，人们全是那么满意和幸福。我甚至完全相信，连穷人看到普遍的欢乐，也立刻会感到满意和幸福。他起码可以不费分文看到我们广大国土中任何城市里即使花钱也看不到的东西。

顺便讲一讲穷人。依我们看来，在所有可能的贫穷中，最可恶、最讨厌、最不高尚、最卑鄙而肮脏的贫穷，是上流社会的贫穷，虽然这极为少见。这种贫穷是挥霍光了一切家当，可又不得不照例驾着轿车出门，把泥泞溅到汗流满面、凭诚实劳动挣面包吃的路人身上；而且无论如何还得使用戴白领带、白手套的仆役。这种贫穷，是羞于向人乞讨、却不惜用最蛮横最

缺德的手段去掠夺。好了，不谈这类丑恶的事了。我们诚心希望彼得堡人在别墅里过得快活而少打哈欠。谁不知道打哈欠在彼得堡犹如流感、痔疮、热病一样，是任何医药一时都治不了的病，就连彼得堡时兴的疗法也无济于事。彼得堡早上起床要打哈欠，执行公务时要打哈欠，快入梦乡时还要打哈欠。不过彼得堡打哈欠最多的，是在自己的化装舞会上和歌剧里。说到歌剧，它在我们这里是十全十美的。绝妙的歌手的歌喉是那么嘹亮纯净，早在我国广大的疆域，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得到满意的评价。现今已是家喻户晓，彼得堡有歌剧看，大家都羡慕不已。其实呢，彼得堡仍多少感到有些寂寞，到冬季将尽之时，歌剧也变得枯燥乏味了，就像……冬天最后的那次音乐会。这个话绝不是针对恩斯特音乐会的演奏说的，这个音乐会为的是美好的慈善目的。当时出了件怪事，剧场拥挤不堪，许多人为了保命，决定到夏花园① 里去散步。夏花园那天恰巧是头一天向公众开放，所以音乐会上似乎有些冷清。这只不过是个误解。为穷人的募集，是圆满完成了的。我们听说许多人寄来了捐款，自己因担心拥挤而未到场。这种担心是十分自然的。

先生们，你们想象不出，给你们讲彼得堡新闻写彼得堡纪事是件多么愉快的差事。我更要说，这不能叫差事，这是莫大的享受。我不知你们是否能理解我的满心喜悦。当然，最惬意的还是人们聚到一起，坐下来聊聊公众的事情。我参加这种聚会，看到极有教养和身份的人们围坐在一起，郑重交谈，一点儿也不失态，不由兴奋得想引吭高歌。至于谈什么事，那是次

① 或译夏苑，始建于1704年（彼得大帝时代），19世纪起向大众开放。

要的问题。我有时甚至忘记了大家的话题，有这个景象，有这体面的集会，我就心满意足了，感到一种最虔敬的喜悦。

不过，我们这些社会人士，社交人士，可不是小圈子，到底讲了什么意思和内容，我却至今没闹明白。天晓得谈些什么。当然，无疑是非常美好的话题。再有，这全是些有身份的可亲可爱的人们，却好像总弄不明白。仿佛老在开始谈话，老在乐器上调音。坐了两个小时，仍刚刚开始话题。有时看到人们似乎在议论某些严肃的事情，发人深思的事情。可是过后您问自己讲的是什么，竟怎么也说不清到底讲了什么，是讲手套，是讲农业，还是讲“爱情是否长久”？所以我得承认，有时似乎感到乏味。这很像您在昏黑的傍晚往家里走，无意地忧郁地四面张望，突然间听到音乐声。舞会！准是舞会！灯火通明的窗子里，闪动着人影，传来沙沙声、窸窣声，低音提琴有力地响着，小提琴尖叫不停；人群、灯光、门厅的卫兵。您受了感动，很兴奋，但却过门而去。只是心底萌生某种愿望，某种向往。您似乎听到了生活，其实却仅仅带走了生活的苍白旋律，一种念头，一个影子，几乎是一无所有。您过门不入，像是因为不相信什么，您听见有另一种声音。透过我们日常生活的苍白旋律，传来另一个极其生动又忧伤的旋律，犹如柏辽兹① 在卡普列季家举行的舞会。忧郁和疑惑折磨你，撕裂您的心灵，这恰似俄罗斯悲歌那悠长曲调里深沉的忧愁。试听它亲切的呼唤之音：

① 柏辽兹（1803—1869），法国作曲家、指挥家、浪漫主义标题音乐的创始人。他于 1847 年 4 月间从莫斯科回到彼得堡，卡普列季家的晚会当在此期间举行。

请屏息静听……有另一种声音，
是忧郁和绝望的吼叫……
莫不是强盗唱起了歌，
莫不是姑娘送别的哭泣？
不是，那是镰农收了工……
谁为他们谱出了歌？这还要问，
看看周围——森林和萨拉多夫草原……①

刚过了悼亡节②。这是俄国民间节日。这一天民众迎接春天的到来，在整个俄罗斯大地上都要编织花圈。但彼得堡的天气寒冷阴郁，下了雪，白桦还没有开花，头天晚上冰雹袭击了树上的幼芽。这气候极像 11 月的情形，人们等着第一场雪，涅瓦河上大风刮得波涛翻滚，大风还沿街来回呼啸狂叫，路灯噼噼啪啪响个不停。我常常觉得彼得堡人每到这种时候就特别地没好气，十分忧郁。我的心连同我的小品文一起，也收紧起来。我总是觉得，他们都心烦意乱，懒洋洋地坐在家里，有的用闲话来排遣，有的在同妻子誓不两立的争吵中过日子，有的安安静静地翻看公事，有的分纸牌打算一直玩下去，有的独自闷闷不乐地在角落里煮咖啡，听着奇特的沸水声昏昏欲睡。我认为，街上的行人顾不上什么节日或公众兴趣，在那里只关心淋湿自己的身子；再就是蓄络腮胡的农夫，看来他宁愿挨雨浇也不愿晒太阳；还有穿海狸皮的绅士，他在这般潮湿的阴冷天

① 此处引用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友、诗人阿·尼·迈科夫的诗《两种命运》（1845）的第 7 章。但却删去了最后一行，因为该诗发表时，审查官以这一行诗有强烈的社会内容而加以删节。

② 是复活节后第七个星期四俄国民间举行的悼念亡灵的节日。这是异教徒信仰的残余。

上街，只能是去投资……总之，先生们，多么烦闷哪！①

[6月1日]

如今你们已完全摆脱了不知眼下是何季节的苦恼，确信现在我们不是在过第二个秋天，而是在春季，并且春天终于决心转入夏日。初现的新绿慢慢把彼得堡人吸引到别墅里去，直到泥泞来临。这时我们的彼得堡变得空荡荡，聚起大量垃圾，有人在兴土木，有人在清扫，好像在休假，短时间里生活似乎停顿下来。灼热的空气中浮着厚厚一层白色的雾霭。一群群工人抬着灰浆，拿着锹镐、斧头等工具，在涅瓦大街上散布开来，如在家中，好像把大街买了下来。这下子过路行人、闲逛者、旁观者可倒了霉，除非他们真的想象那个罗马狂欢节上浑身洒满面粉的皮埃罗那样②。街上的生活似乎进入梦乡，演员们到外省度假，文学家们在休息，咖啡馆和商店空无一人。那么，不得不留在首都与夏季共命运的城里人能做些什么呢？是研究楼房的建筑吗？是观看城市如何更新如何建设吗？这自然也是很重要甚或很有教益的活动。彼得堡人冬天太懒散了，有许多娱乐、私事、公务、牌局、闲谈等等，加之街道肮脏，未必有工夫张望四周，仔细瞧瞧彼得堡，研究它的风貌，在这大量的石头建筑中，在这些雄伟的大厦、宫殿、雕塑中读出城市历史

① 这一段文字很像果戈理中篇小说《伊凡·伊凡诺维奇是怎样同伊凡·尼基法罗维奇吵架的》（1834）的末尾的几句话："先生们，在这世界上真苦闷哪！"

② 在17世纪初，法国民间戏剧中有传统人物皮埃罗（Pierrot），与这里的皮埃罗（Пъерро）可能有关。

以及当今时代的历史。再说谁也不会想到用这种无可非议却毫无进项的方法来消磨宝贵的光阴。彼得堡有的居民，十多年未曾离开过自己的街区，只熟悉一条上班走的路。还有的人从没参观过埃尔米塔日[①]、植物园、博物馆，甚至没有上过艺术馆。有的连火车都没坐过。实际上，研究城市是件不无益处的事情。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曾经读到一本法文书，全书都是对俄国现状的观察。当然，外国人对现代俄国状况会有什么观感，是尽人皆知的。不知怎的，我们总是很难适合欧洲人的衡量尺度。尽管如此，著名旅行家的这本书，在整个欧洲被人争相阅读[②]。书里有个地方写道，彼得堡的建筑没有任何个性可言，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惊异的东西，没有任何民族的特色，整个京城是对某些欧洲首都的可笑模仿。最后还说，仅从建筑方面看，彼得堡便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杂烩，每走一步都不由得惊讶不止。这里有希腊建筑、罗马建筑、拜占庭建筑、荷兰建筑、哥特式建筑、洛可可式建筑、现代意大利建筑、我们的东正教建筑。旅行家认为这一切以令人发笑的方式糅杂到一起，结论是没有一座真正优秀的建筑。接着，他却因克里姆林宫而对莫斯科虔敬有加，针对克里姆林宫说了些冠冕堂皇的话，为莫斯科的民族特色感到骄傲，但却咒骂四轮轻便马车，因为远离了古代的古色古香的敞篷马车，由此一来，俄国便失去了自己的民族特色。那意思是说，俄国人为自己的民族性感到惭愧，因此不愿意坐旧时的马车，因为理所当然地担心在古老的

① 彼得堡的美术、文化历史博物馆，为世界最大的博物馆之一。始建于 1764 年。

② 指法国人德·屈斯蒂纳（1790—1857）著的《1839 年的俄国》，用三十六封信写出了游俄观感。此书本是游记，因写到的一些人与事触怒俄官方，一直被禁，却为人们私下广泛传阅。

敞篷马车里会把心给颠出来。

这是一个法国人写的，也就是说一个聪明人写的，几乎每个法国人都是聪明人。可他看得太肤浅，而且十分愚蠢。无论在艺术、文学、科学中，甚至是在民众历史中，凡不同于法国的东西他概不承认。尤其是他会因为有别的民族存在，因为别的民族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民族性格、自己的发展而愤愤不平。不过，同我们办公室里某些无谓的思想，我不叫它是俄罗斯思想，这个法国人却是深感合拍。[1] 法国人眼里看到的俄罗斯民族性，正是当今许多人希望看到的东西，那就是僵死的文字、陈腐的思想，似乎会唤起古代罗斯回忆的用大堆石头建成的建筑，最后还有盲目而忘我地怀念自己的古代风俗。毫无疑问，克里姆林宫是历史悠久的珍贵文物，观赏这样的稀世古迹，会感到特别新奇，也产生深深的敬意。但何以说它完全是民族的，我们无法理解。有的民族性文物，经过一段时间便不再是民族性的了。有人会说，俄罗斯人民了解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他们笃信宗教，所以从俄国四面八方会聚来此，亲吻莫斯科的圣尸。这很好，但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人民成群结队地也去基辅、索罗韦茨群岛[2]、拉多加湖[3]、圣山、

---

① 作者认为此书对俄罗斯民族性的理解，与斯拉夫派观点接近，即把民族性仅仅归结为民族的生活习俗。

② 俄国白海沿岸岛屿，在奥涅加湾口，面积三百四十七平方公里，在索罗韦茨岛上有索罗韦茨修道院建筑群，在修道院附近及其他岛上还有隐修士修道院、教堂、住房及生产建筑。

③ 古称涅瓦河，在俄国的欧洲部分西北部。约有六百六十个岛屿，涅瓦河的发源地。沿岸城市有普里奥焦尔斯克，彼得要塞，索尔塔瓦拉。

耶路撒冷等地朝拜呀。人民知道莫斯科圣徒圣彼得[①] 和菲利普[②] 的历史吗？当然不知道，所以也根本不了解俄国历史上两个极重要的时期。有人会说，我们的人民要祭奠葬在莫斯科阿尔汉格尔教堂的古代俄国沙皇和大公。很好，可是在罗曼诺夫皇室[③] 之前，人民又知道哪些俄国皇帝和大公呢？他只知道三个名字：德米特里·顿斯科伊、伊凡雷帝、鲍里斯·戈都诺夫（后者葬于圣特洛依大寺院）[④]。不过人们知道鲍里斯·戈都

① 彼得（？—1326），自1308年起为俄罗斯都主教，将都主教布道坛从弗拉基米尔迁至莫斯科，这里谈及的莫斯科的圣徒圣彼得当指此人。

② 菲利普，当为18世纪初出现的菲利普派的教导者。普利普派是旧礼仪派反教堂派中的一个小教派，菲利普率领该教脱离北方沿海教派。由于政府镇压，该派教徒开始以自焚作为"恪守信仰"的手段。到18世纪末，这种宗教狂热有所减弱。

③ 俄国自基辅罗斯（9世纪）到1917年二月革命，共经历四个王朝，除戈都诺夫与舒伊斯基王朝很短促外，基本上只有留里克与罗曼诺夫两大王朝。罗曼诺夫王朝的始祖为罗曼·尤里耶维奇（1543年卒），原姓扎哈林，其后代将其名字变为姓氏，此后开始有了罗曼诺夫家族。他家的阿娜斯塔霞后来成了伊凡雷帝的皇后，她的第三个儿子曾登上皇位（1854—1888），是留里克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他亡故后，中经鲍利斯·戈都诺夫篡位自立，最后至1613年，罗曼诺夫家族的成员，十六岁的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在他父亲、罗斯托夫总主教菲拉列特的支持下，由扩大的缙绅会议拥上皇位，成了延续三百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的开国皇帝。

④ 德米特里·顿斯科伊（1350—1389），莫斯科大公（自1359年起）。他在任大公期间，确立了莫斯科在俄国的地位。伊凡雷帝（1530—1584），即伊凡四世，曾为"全俄罗斯"大公（1533年起），1547年起改称"沙皇"，成为俄国第一个沙皇。鲍里斯·戈都诺夫（1551—1605），以外戚、亲属登上沙皇宝座，是他结束了留里克王朝，在位期间为1598—1605年。

诺夫，只是因为他修起了“伊凡大帝”①。至于说德米特里·顿斯科依和伊凡·瓦西利耶维奇，那人民会讲得千奇百怪，最好还是不要听吧！人民对于格拉诺维陈列馆里的珍奇文物② 同样完全不知道，而且俄国人民不了解自己的历史文物，多半是有原因的。有人大概会说，那人民成了啥啦？人民是愚昧无知，没有文化。有人要举出有教养的人来说，但有文化的人们赞赏自己的古迹，一往情深，在我们看来总是做作轻浮的，是脱离生活的。因为我们之间谁了解历史呢？历史传说倒是大家都知道，而历史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算是最不普及，它成了书斋里的东西，学者的领地③。可学者们争来争去，讨论权衡，至今连最基本的思想还不能一致。他们在为一些今天最令人疑惑的事实，寻找可能解决的关键。我们绝不怀疑，任何一个俄国人都不会对本民族的历史漠然置之，不论这历史以什么形态出现。不过，如果要求大家全忘记和放弃自己当代的生活，仅仅为着可算作古董的一些可敬的文物，那么就极不正确而且十分荒唐。

---

① 指为纪念伊凡·卡利塔和伊凡三世建造的石质钟楼，奠基于1329年，定名为“伊凡大帝”。鲍里斯·戈都诺夫成为沙皇后下令续建，完成后钟楼高达八十一米。

② 格拉诺维陈列馆（格拉诺维在原文中意为磨光的石料）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它是大公伊凡三世于1487—1497年间兴建的，其中最主要的地方是“红角”和沙皇的宝座。在这里经常接见外国使臣，举行重要的宫廷典礼。外国统治者赠给俄国沙皇的银制器皿都收藏在此博物馆专制的大橱中。

③ 俄国在19世纪40年代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代表：通史方面是季·尼·格拉诺夫斯基；俄国史方面是谢·米·索洛维约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此文前不久，康·德·卡维林（1818—1885）发表过几篇关于俄国史的文章，他认为，俄国历史科学处于某种过渡状况。以前的历史著作已经枯竭，同时，显然在现代生活的深处萌生出新的历史意识，它正在探索形式和表现。

彼得堡可不是这样。这里每走一步，全能看到听到感觉到现代的因素，还有现代的思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里的一切都是混乱的，是糅杂的，不少东西可做漫画的材料。然而一切又充满生机，并处于运动之中。彼得堡既是俄国的眼，又是俄国的心。我们先讲城里的建筑。就连城市建筑的多样，也证明思想的统一和行动的统一。这一排荷兰建筑物标志着彼得大帝的时代；这一幢拉斯特列① 风格的建筑，提示着叶卡捷琳娜时期；而这座希腊与罗马风格的大厦出现较晚，却让我们想起彼得堡连同整个俄国进入欧洲生活的历史。直到今天，彼得堡仍旧处于尘土和垃圾之中，它还在建设中，它的未来还是一张蓝图。不过这张蓝图属于彼得大帝，它日复一日地实现着，壮大着，打下根基，不仅是在彼得堡这块沼泽地，而是在整个俄国，整个俄罗斯都同彼得堡共呼吸。所有的人都亲身感受到彼得大帝路线的力量和好处，所有阶层都投入共同事业来实现他的伟大思想。于是，一切人全参与生活，一切工业、商业、科学、文学、教育、社会生活的出现和组织，都活跃起来，而以彼得堡为支柱。甚至不爱思考的人们，也听到、感受到了新的生活，起而追求新的生活。试问，谁会来责怪这个民族呢？即使这民族在某些方面不由自主地忘记了自己的古昔，而更敬重当代，也就是第一次开始真正生活的时刻。不，我们在现代的追求中看到的不是民族性的沦丧，而是民族性的胜利。我们觉得民族性处于欧洲的影响之下，并非像许多人想的那样轻易地消亡了。据我们的看法，如果一个民族积极地热爱

① B. B. 拉斯特列（1700—1771），俄国建筑师，曾在皇村主持建筑工程。叶卡捷琳娜宫气势宏大，线条明快，饰有大量浮雕，精美生动。

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今天，并能理解今天这个时代，那么这个民族就是强壮健康的。这样的人民能够生活下去，他的生命和原则将永世长存。

过去还从未像如今，像最近这么多地谈论现代潮流、现代思想，等等。文学以至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还从未表现出如此高涨的兴趣。彼得堡的冬季，公务和生产最忙的冬季，只是到现在，到眼下，也就是5月底，才告结束。这时出了最新一批书，学校课程讲完，正举行考试；从乡下来了许多新的居民。每个人都在思索来年冬天怎样，自己准备做什么，不管用什么方式来思索。这时您比任何时候更会相信，公众最关注的是我们今天这一时刻，这只消深入地看一看彼得堡经历的最后一个季节就清楚了。自然，我们不是说我们当今的生活如飓风飞旋，令人心惊胆战，连回头望望都不敢。相反，倒好像我们正准备上路，忙着收拾东西，捆好各种用品，仿佛要走远路。现代思想可不是不顾一切地朝前冲，它反而怕跑得太快。倒好像在半途停了下来，达到一定的限度就左右打量，摸摸周围情况，自我审视一番。几乎每个人都开始分析研究世界，互相研究，也研究自身①。人们全都四处张望，相互好奇地打量。于是普遍地展开了某种忏悔。人们倾诉着，反省着，向世人解剖自己，常常怀着痛苦的心情。有些人从来没想过对什么能有自己的见解，如今也产生了千百种新的观点。有人过去以为，凡属攻击全来自不道德的人，不安分的人，甚至是些败类，起因于某种暗地里的怨恨和仇视；过去还以为批评只是针对社会上

① 别林斯基在1835年曾著文指出，新近作品的最突出一点就是揭露的无情和坦率。而其中就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等小说。批评家瓦·尼·迈科夫在1847年的文章中也指出了这一点。

的某种阶级，于是就说闲话，兴师问罪，向公众抱怨。如今这种误解也消除了，怨气日见减少，终于明白过来，即使分析者本人也难免被人家解剖。最好还是多些自知之明，而不要对文章作者产生不满。写文章的人都是温和的人，并不想攻讦别人。不过有些先生是最不高兴的，似乎即使没有人得罪他们，他们也觉着受到伤害，以致引起公众的疑虑和不快。总之，这方面出现了许许多多非常可疑而且至今无法解释的传闻。若能把这些满腹委屈的先生们的生理反应描述一番，那是十分有趣的。这是特殊的非常奇特的一种类型。他们中间有人大声疾呼，反对普遍的道德沦丧，反对遗弃礼仪，而遵循一种特殊的原则：这虽说不关我的事，虽说是针对别人，可是何必要刊登这类文章，为什么要允许刊登这类文章呢！另一些人则说，行善做好事自古有之，许多道德和警世文章里有详细记述，论证得无可非议，尤其是在儿童图书里。既然如此，何劳费心去寻找什么德行呢，只不过是白白滥用道德的神圣名词罢了。当然，这类先生需要德行，犹如需要去年的橡实果一样（十分不解的是，他怎么会想到这里涉及了道德问题）。他一听人大喊道德，马上坐立不安，气鼓鼓地怨人家说他不道德。另一位先生同样仪表堂堂，一向过着平和安宁的生活，看到他的样子，就莫名其妙地拍案而起，也义愤填膺地四处宣称自己是正派人，受人尊敬，绝不允许别人欺侮。这类先生中有些人就因为整日喋喋不休，大讲自己的正直高尚，以至于自己变得对这话深信不疑，要是觉得有谁提到他的大名时不够敬重，就会当真地怒气冲天。最后，还有第三类人对善良的甚至理智的老人大肆鼓吹，硬说老人迄今所见的最高尚的德行和道德，突然已经变为不善良和不道德的，成了别的什么东西而绝非好事，这一切又是某些人某些人干出来的。总而言之，许许多多的人感到

十分懊恼。他们惊呼危险，行动起来大喊大叫，忙个不亦乐乎，弄到最后连自己也为这种呼声不胜羞愧。而如今类似的情形就少得多了……

近期创办的某些慈善团体和学术团体的出现，文学界和学术界的积极活动，某些十分优秀的新人在科学和文学中的崭露头角[①]，某些新报刊的问世，强烈地吸引着所有公众的注意力，也得到人们充分的赞许。要抱怨我们的文学在上一个季节里无所收获，无所作为，那可太不公道了。在不同期刊上发表的几部中篇和长篇小说，可算大获成功。杂志上出现了一些精彩的文章，主要是学术和文学方面的评论，还有关于俄国史和统计方面的。出版了几本历史和统计的著作、小册子。斯米尔津[②]刊印俄国经典作家著作的计划得以实现，极为成功，将继续不停地出下去。克雷洛夫全集得以问世。杂志、报纸及其他出版物订数大增，阅读热情开始遍及各个阶层。艺术家的画笔和刻刀也没有闲着，别尔纳尔茨基和阿金两位先生的出色创作，《死魂灵》的插图，正接近完成，他们精益求精的精神真堪称楷模。有些版画十分精彩，无以复加。米·涅瓦赫维奇目前是我们唯一的一位漫画家，在孜孜不倦地继续创作他的《叶拉拉什》。这种出版物从一开始就以其新颖奇特，引起人们普遍的强烈好奇心。的确，现在恐怕是涌现漫画家的最好时机了。现在的思想很多，都是社会总结出来的切身经历。虽然我

---

① 当时俄国文学界出现许多新的作品，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普罗哈尔钦先生》（1846），德·瓦·格里戈罗维奇的《乡村》（1846），赫尔岑的《谁之罪?》（1846），亚·瓦·德鲁日宁的《波琳娜·萨克斯》（1846），伊·亚·冈察洛夫的《平凡的故事》（1847）等。

② 亚·菲·斯米尔津（1795—1857），俄国19世纪30—40年代的著名出版家。

们时常听人说：有什么可说的可写的呢？其实找故事用不着犯愁。不过艺术家天分越高，他向社会表述自己思想的手段便越丰富。对他来说既不存在障碍，也没有一般的困难。他要的故事情节多得很，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有。这个时代，艺术家在哪里也可找到艺术养料，也可讲自己要讲的一切。再说每个人都有这种要求，想不管怎样表述一下自己的见解，也都要求听一听并了解别人的见解……下次我们准备详细谈一谈涅瓦赫维奇先生的漫画……这个话题比乍然一看的感觉要远为重要。

[6月15日]

六月天热，城里空荡荡的。人们都在别墅里感受自然风光，享乐其中。我们彼得堡的风光，每当骤然一展威力，变得葱翠繁茂，姹紫嫣红，您会发现其中有某种难以名状的天真，甚至心灵都受到感动……不知为什么，这里的大自然在我眼里好似一个病弱的姑娘，你望着她有时婉惜，有时怜爱，有时干脆毫不理会，可她却突然在刹那间容光焕发，异常娇媚。您惊讶之余不由得自问：是什么力量使这双总是忧郁沉思的眼睛如此炯炯有神？是什么使苍白的双颊充满血色？是什么给秀丽的面容增添了激情和愿望？为什么乳峰如此地高耸？为什么这女子的表情忽然变得生动活泼而又妩媚？怎么会一下子这样笑容可掬？怎么会发出这般爽朗的笑声？您不由得左右张望，您要寻找什么，您在猜想……这一刹那过去了，明天您也许重又看见那忧郁的目光，那苍白的面庞，那驯顺胆怯的动作，那倦怠和绝望，甚至还有对一时冲动的极度不满。可是何苦打这种比方呢！有谁如今要听这个呢？我们来到别墅，是想生活在自然

中，在直观中，用不着什么比喻，什么观点。我们要享受自然，要休息，要尽兴地发一阵懒，把冗繁多余的生活琐事全扔在寒冬的家宅里，直到天气好转。我有个朋友，最近曾对我说，咱们就是发懒也懒不出个样子来。懒得很累，没有乐趣，心里总不踏实。我们的休息，带着焦躁不安，烦闷而不尽兴。休息的同时我们还总有什么分析、比喻、疑虑、心事，手头总有永远没完的缠人的生活杂务。我们每逢去发懒，去休假，就像去做一件紧迫严肃的事。我们要是想去享受一番自然，多半一周以前就得在日历上记好某日某时去享受自然。这很像那个循规蹈矩的德国人，离开柏林时在自己的记事本上慢条斯理地写上："路过纽伦堡时不要忘记成亲。"当然，德国人的脑子里首先有个系统在，依赖这个系统，他不感觉事实是杂乱无章的。可真的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行为有时是毫无系统，好像随意怎么就做了，似乎依照东方的某种成规。我那位朋友说得有点道理，我们像是使出吃奶之力来拉自己的生活之车，忙忙碌碌，为着义务，而且羞于承认已经疲惫无力。样子像是真的来别墅休息，领略自然风光。可您先看看我们什么东西没有带上？且不说没有摆脱冬季的事，从前的旧事，因为经历时间太久了，反而又加上了新的事，用回忆充填生活，把陈年闲话、生活旧闻当成新鲜事看。不然就觉得无聊，不然就得在夜莺啼啭时到露天里去玩纸牌。实际上也正是这样。此外，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天生不适于欣赏自然，再说我们的自然似乎也理解我们的秉性，并不费心变得舒适一些。比方说，为什么我们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却十分令人不快的习惯（我们不否认，这习惯也许对我们的共同事业多少有些好处）：我们总是（时常并无此必要）凭着习惯相信自己的感受，过于看重自己的感受，有时仅仅是看重未来将有而尚未实现的欣悦。看重便满足于此，满

足于幻想，耽于想象，自然后来便不善于真正做事了。我们总爱掰开花瓣，折磨着鲜花去多闻些幽香，等闻不到香气时又发一通抱怨。可话说回来，一年要没这么几天休假，要没有多样的大自然缓解我们对现实自然生活的渴求，我们可怎么受得了呢？如果我们只是一味追逐感受，像蹩脚的诗行追求韵脚那样，一味渴望外在直感的生活，一味畏惧自己的空想、幻觉和如今用来填补空虚生活的那些手段，那么我们怎么能不疲惫不堪，气息奄奄呢?!

而我们对行动的渴求，却达到了狂热而不可遏制的焦躁程度。人人都想干点儿正经的事，许多人满心希望做好事，做贡献，并且逐渐明白：幸福并不在于具有某种社会地位而可坐享其成，或仅仅为了换个活法遇到机会来个见义勇为。幸福在于永不疲倦地从事活动，在实践中发展我们的一切天赋和能力。可是，我们这里所谓 con amore[①] 和乐意热衷事业的人，是不是很多呢？人们说，我们俄国人好像天生懒惰，总想逃避干事；如果强迫我们去干，结果也是不成样子。此论可以休矣！不是吗？凭什么来证明这种不值得羡慕的性格是我们的民族特性呢？总的说，近期以来我们有人大讲特讲普遍的懒惰，无所事事，意在相互促进，更好地从事有益的活动。不过应该承认，这也只是促进一下而已。于是，人们便毫无根据地责备起自己的同胞来。多半是因为自己的同胞，如同果戈理曾经指出的那样，不大会咬人吧[②]。但先生们，你们自己试试迈出第一步，去从事更好的有益的活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活动的某种具体的形式；把事业拿给我们看一看，最重要的是吸引我们

① 意大利文：喜欢。

② 这是果戈理在《外套》(1842) 中关于巴什马奇金说的话。

去从事这个事业，让我们亲自去干，真正开始我们自己的个人创造。性急的先生们，你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不能，那就别责备别人，不要白费口舌！问题恰恰在于，事业在我们这里总是自然而来，在我们这里它好像是外在的东西，并不能在我们心里唤起特别的同情。这一点才纯粹是俄国的特点：干事情不可强求，不可违心，那就破罐破摔吧。这一特征鲜明地体现出我们的民族习惯，反映在一切方面，甚至在一些无关紧要的生活事实上。比方说，我们这里如果有人没有钱能像阔佬住进老爷的大宅里，或者没有钱能像别人一样（其实是同极少数人一样）穿着讲究，那么他的住处时常就像狗窝，而衣服简直不堪入目。人一旦失意，一旦没有办法发泄出来，不能表现出自己身上较为优秀的一面（不是出于好面子，而是出于人的最自然的一种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意识到自己、实现自己、把握自己），他马上就会做出最不可思议的举动：要么喝得酩酊大醉，要么打牌作假，要么去打斗，要么干脆出于自负而发疯。可与此同时，他心里又相当鄙视自负，甚至因为自己无法摆脱自负而感到痛苦。这样一来，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得出一个几乎可说是不公正的甚至是侮辱人的结论，但看起来很像是正确的。这就是：我们缺少自己尊严的意识，我们缺少必要的利己主义，我们不习惯于做善事而不要任何奖赏。而倘若您把一件事情交给规规矩矩、始终一贯的德国人去做，哪怕这事不符合他的愿望和性情，只要讲清楚这事能使他有出头之日，能养活他和家庭，能使他有出息，达到预期的目的，那么德国人会立即干起来，甚至毫无条件地完成它，甚至还在这事业中立起某种特别的新章程。但这好不好呢？也有不好的一面，因为这时人会走到另一个可怕的极端，冷漠呆滞，有时完全排斥了人而代之以规章、义务、公式，盲从先人习俗，尽管祖先习俗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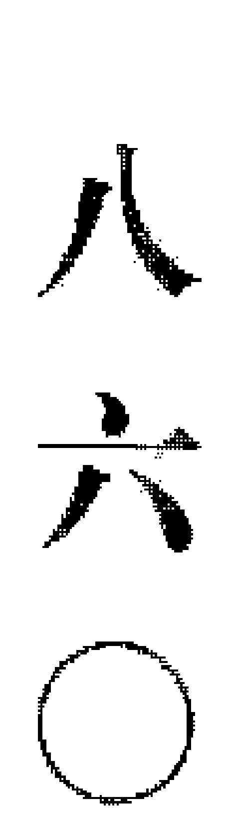
现在的时代很不合拍。彼得一世的改革，在俄国创造了自由的活动，但如果民族性格中存在这种因素，时常表现为天真美好的样子，有时则十分可笑，那么彼得的改革也是不可能的。您看到了，德国人五十岁以前订了婚不娶妻，给俄国地主家庭教育孩子，积攒几个钱，最后才正式成婚，未婚妻已经等得老了，却还忠贞不渝。俄国人就受不了，不是变心就是堕落，要么干出别的事情来。这里倒是相当准确地从反面应验了一句有名的谚语：对德国人合适，对俄国人就要命。再说我们俄国人中间没有多少具备热爱事业的条件，因为这要求从业者有愿望，有爱心，要求全身心的投入。有的事业还要求先有经费，有保障。有的事情非得具备这方面的才能，有人干干便放弃了，一无所获。这么一来，在那渴求事业、渴求实际生活、渴求现实，然而却软弱、柔顺、温和的性格里，便会逐渐地产生所谓幻想性。人最后不成其为人，而是某种中性的怪物——幻想家。先生们，你们可明白什么是幻想家吗？这是彼得堡的一种可怕的事物，是人格化了的罪过，是无言而神秘的、沉闷而粗野的悲剧，充满恐惧、不幸、曲折、纠葛和结局。我们这么说，是完全认真的，不开玩笑。您有时会遇到一种心不在焉的人，眼色游移无光，脸常常显得苍白困倦，总像忙着某件十分艰难、伤透脑筋的事。偶尔又仿佛因过度劳累而心身疲惫，其实他是无所事事。这就是幻想家的外貌。幻想家总是难以相处的，因为他喜怒无常。一会儿非常快乐，一会儿满脸阴沉；有时粗暴，有时又体贴温柔；此刻是个利己主义者，过一刻却能产生最高尚的情操。在公务方面，这些先生们简直一筹莫展，虽然也都有公职，却什么也干不来，不过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这实际上比不干事更糟。他们对任何形式的东西都深恶痛绝。虽然如此，正因为他们随和友善，怕别人伤害自己，他

们才又是最注重形式的。可在家里完全是另一副样子。他们大多居住在僻静处，在人迹难到的角落，像是要躲避人们和世界。第一眼看到他们，甚至会觉得他们身上有某种过于感伤的东西。他们同家人在一起时沉默寡言，只顾想自己的事，然而却特别喜欢一切慵懒的、轻松的、直观的东西，喜欢一切动情的或刺激感官的东西。他们喜爱读书，什么都看，甚至是严肃的专业性的著作，不过一般读到第二页、第三页就搁下不读了，因为已经相当满足。他们那种轻飘变幻的想象力已被激起，情绪已被调动，幻想家的整个生活突然被一个完整的想象世界所控制。这里充满欢乐和痛苦，有着天堂和地狱，有摄魂的美女和英雄的功绩，有高尚的事业，又总有某种严重的斗争，有种种罪行和恐怖。这时，房间消失了，空间也消失了。时间要么停下来，要么变得飞快，一个钟点似乎瞬间即逝。有的时候几乎整夜整夜地沉浸在难以描写的欢悦之中而不察觉，时常又一连几个小时仿佛处于爱情的天堂里，或者过着一种前所未闻的伟大无比的生活，奇妙如梦，壮美无限。无缘无故地，脉搏加剧了，眼里涌出泪水，苍白的脸颊泛起红晕。而当晚霞把玫瑰色光线投进幻想家的小窗时，他变得一脸憔悴的病容，既痛苦又幸福。他一头扑到床上，几乎失去知觉，在蒙眬中还久久感到自己的心在具体地体验，甜蜜得难以承受……每当清醒过来时，他尤其觉得可怕，于是再次服用这种毒药，加大剂量。于是又来了，只消有一本书，有一段音乐，有对现实生活的一段往事回忆，总之出现千百个微不足道的缘由中的某一个，这毒药便制好了。幽静神秘的幻想，重又发挥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奇异魔力。走在街上，他低垂着头，不理会四周的行人，有时竟完全忘记了周围的现实。但如果他要发现点儿什么，哪怕是最普通的生活小事，最不起眼的琐细，也会立刻赋

予它幻想的色彩。他看事情的角度，天生就如此，一切在他眼里都具有了幻想的内容。白日里关闭的窗板，一个面貌扭曲的老妪，常常可遇见的边走边比画议论的先生，贫苦农家窗台上的一幅合家照片，所有这一切都几乎可代表着一个个传奇的故事。

想象力准备好腾飞了，马上会产生整个的故事，中篇的长篇的小说……往往现实在幻想家心里唤起沉重的讨厌的印象，于是他急着躲进自己梦寐以求的宝贵角落里，那地方实际上常常落满灰尘，又脏又乱。渐渐地，我们这位不安分的人开始不合群，不关心大众的事，在他身上，处理现实生活的才干不知不觉地萎缩了。他很自然地开始觉得，随心所欲驰骋想象带来的快意比真实的生活更为充实、丰富、可爱。在这种迷误中，他终于完全失去能够认识全部今日之美的道德敏感，他迷惘了，他不知所措，他失去现实幸福的机遇。他变得冷漠，慵懒地抱着胳膊，不懂得人的生命就在于不断地在自然界和实际生活里进行自我观照。有些爱幻想的人，甚至会纪念自己产生某些幻觉的日子。他们常想到，是几月几号曾经感到特别幸福，因为想象力发挥出最愉悦的效果。假如当时是在某条街上漫步，或者在读一本什么书，那么在一年后的纪念日里就一定要重新体验一遍，回味自己那番缥缈幸福的每一个细节。那种生活可不是什么悲剧！也不是什么罪过，不是什么恐怖！也不是什么可笑的事。况且，我们之间并非每个人都够得上幻想家！……住一住别墅，饱尝外界的感受，接触自然，活动身体，沐浴阳光，看看绿茵和女人，夏天的女人是何等美丽善良！所有这一切对病恹恹的奇怪而又阴郁的彼得堡来说，实在是异常有益的。因为在这里转眼间青春就消逝了，转眼间希望就枯萎了，转眼间身体就垮掉了，转眼间整个人就变成了另一

个样子。我们这儿阳光是稀客，绿茵非常可贵，我们习惯蹲在角落里过冬，所以一接触新鲜的习俗，一换地方和生活，定会给我们十分有益的影响。可城里是如此豪华而空虚！虽说有些怪人偏偏最喜欢城里的夏天。再说，我们这可怜的夏季也太短促，不知不觉树叶就枯黄了，最后一茬鲜花也凋谢了，天气开始阴湿，雾蒙蒙的，眼看又是病态的秋天，人们开始像从前那样混日子……瞻望未来，真不愉快，至少现在是这样。



一八六〇

《时代》杂志1861年征订启事

从1861年1月起将出版
《时代》
政治和文学刊物，将以二十五
至三十印张的大开本按月出刊

在说明应该在我们文坛创办一种新刊物的原因之前，先简略讲一讲我们怎样理解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社会生活的现状。这是为了我们阐明我们杂志的精神和宗旨。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美好的、转变期的时代。我们不想为证明这看法特别地一一指出近些年社会上一切有识之士异口同声提出的新思想和俄国社会的新要求，也不想指出我们时代提出的重大的农民问题……这些都仅是一场重大变革的现象与征兆，变革将在我们整个祖国内和平、协调地完成。尽管就其意义来说，它与我们历史上所有的重大事件，甚至彼得大帝的改革，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这场变革是受教育阶层及其代表人物与人民本原的结合，能使整个伟大的俄罗斯人民参与我们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民众在一百七十年前就远离了彼得的改

革[1]，从那时起就与受教育阶层隔绝开来，过着自己特别的、独立的生活。

我们谈到了现象与征兆。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改善农民生活问题。现在已经不是几千几万人，而是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人进入俄罗斯生活，带来了自己无穷的新生力量，发出了自己新的声音。我国生活未来发展的基础，不应该像整个欧洲一样，到处是阶层之间的相互敌对，胜者与败者的相互敌对。我们不是欧洲，我们这里不会有，也不应该有胜利者与失败者[2]。

彼得大帝的改革已经使我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它把我们同人民分离开来。从一开始人民就拒绝改革。改革后的生活形式，既不适应人民及其精神，也违背他们的愿望，对人民来说既不合适，又不是时候。人民称其为德国生活，把追随伟大沙皇的人称作外国佬。人民与他们的高层、领路人以及领袖之间这种精神上的离心离德，本身就说明当时的新生活使我们付出了怎样沉重的代价。但人民脱离改革后没有泄气。他们不止一次显示自己的独立性，为此做出的努力是非同寻常的，因为他们孤立无援，非常困难。他们在黑暗中摸索，但却有力地坚持着自己特别的道路。他们深思自身和自己的处境，尝试着建立自己的观点与自己的哲学，分裂成神秘的古怪派别，寻找生活的新出路、新形式。我们的人民为踏上自己历尽千辛万苦找到的新道路，表现出远远摆脱旧岸、破釜沉舟的最大勇气。可是有

---

① 作者认为，彼得大帝于 18 世纪初推行改革，走西欧强国之路，但未能解决农民问题。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阶层与民众一直处于隔绝分离的状态。

② 这里是针对法国历史学家蒂埃里（1795—1856）的理论而说的。他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在欧洲，社会的阶级分化，最初是由于一个民族征服另一民族的结果。

人还是说他们是要维护彼得改革前的旧生活、呆板的旧教派。

当然，在没有引导而仅靠自己力量的时候，人民的思想有时是很可怕的，他们对新生活的尝试是怪异的。但其中体现出共同的初衷、共同的精神和坚定的自信、无尽的力量。在改革之后，民众和我们受教育阶层只有一次联合了起来，这就是1812年①，我们看到人民是如何显示了自己。我们当时明白了人民是什么。可悲的是他们不知道我们，不理解我们。

但现在这种分离正趋于结束。延续至今的彼得改革，最终走到了尽头。再也无法走下去，也无处可去，因为没有路了，都走过了。彼得的追随者认识了欧洲，进入了欧洲生活，却没变为欧洲人。我们也曾责备自己不善于欧化，现在我们不那么想了。现在我们懂得，我们不能成为能工巧匠，成为欧洲人，我们无法把自己塞进欧洲的生活方式之中，因为那是欧洲立足于同我们格格不入的相反的民族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正如我们不能穿不合身的别人的衣服一样。我们终于确信，我们也是个独立的民族，有极大的独特性，我们的任务是为自己建立新形式，它应是我们自己的，取自我们的根基②，取自人民的精神

① 指1812年俄国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奋起抗击并击溃法国拿破仑的入侵。

② 根基也就是土壤或基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提出他形成于此时而坚持终生的“根基”论思想。他所谓的“根基”就是“人民”，而他所谓的“人民”，一般是指信奉东正教、崇敬并效忠沙皇的俄国驯服的宗法制农民。他反对文学界以及知识分子脱离这个“根基”。当时知识界、文学界的确有脱离人民的，但民主派就不是这样。而像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的革命民主派有时批评人民，往往因其落后，“怒其不争”。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对此加以区别。他反对知识界脱离“根基”，特别在后期，主要是指责他们不像他的“人民”那样信奉东正教而宣扬无神论，不效忠沙皇而主张革命。这种“根基”论，实质上与当时俄国的斯拉夫主义很近似。“根基”论的具体内容，在作者后来的《作家日记》中有最明确最无保留的表述。

和人民的土壤。但回到我们的根基上时，我们并未被征服。我们不拒绝自己的过去，因为我们认识到它有合理性。我们懂得，改革打开了我们的视野，通过它我们明白了我们在未来各国人民大家庭里具有的意义。

我们知道，现在再不会有“中国长城”把我们同全人类分开了。我们虔诚地预想，今后我们行动的性质应该在最大程度上具有全人类的特点，俄罗斯思想可能成为欧洲一些民族勇敢顽强地加以发展的那些思想的综合，很可能那些思想中的敌对因素会在俄国人民中得到和解与进一步发展。难怪我们能使用各国的语言，能理解所有文明，能同情欧洲每一个民族的利益，能理解我们完全陌生的那些现象所具有的意义和合理性。难怪我们如此有力地自我谴责，以致使所有的外国人为之震惊。他们为此责备我们，说我们缺乏个性，没有祖国，却不懂得能暂时脱离根基以便更清醒、更客观地看待自己，这本身就是极有特色的表现。善于心平气和地看待陌生事物，更是自然界最大和最高的恩赐，只有为数不多的民族才会如此。外国人还没认识到我们取之不尽的力量……但现在，大概我们也正走入新生活。

在进入新生活之前，彼得改革的追随者与人民本原之间的和解，成了一件必须做的事。我们这里说的不是斯拉夫派和西欧派。我们的时代对他们之间的家庭纷争不感兴趣，我们说的是文明与人民本原之间的和解。我们感到双方最终应该相互理解，应该澄清他们之间积累下来的众多误解，而后和谐一致地共同走上宽阔美好的新路。无论如何要团结起来，不管有任何牺牲，而且越快越好——这就是我们的先进的思想，我们的座右铭。

但与人民的交会点在何处呢？如何走出接近人民的第一步

呢？问题就在这里，这是所有珍视俄罗斯、热爱人民、珍视人民幸福的人都应关心的问题。而人民的幸福就是我们的幸福。当然，取得任何和谐的第一步，都是识字和受教育。如果人民预先不做好准备，他们永远不会理解我们。没有别的途径。我们知道这些话不是什么新东西。但受过教育的阶层先得走出这第一步，他们应当利用自己的地位，并且应该充分地利用。大力普及教育，越快越好，不惜一切代价——这就是我们时代的首要任务，是任何行动的第一步。

我们只讲了我们杂志的一个主要的进步思想，点出了杂志未来行事的性质和精神。但我们还有另一个原因促使创办一个新的、独立的文学刊物。我们早已发现，我们的期刊近年来对文学权威产生了某种特别的、自愿的依赖性。当然，我们不是责备我们的期刊自私自利与出卖灵魂。欧洲几乎各国文学中都有些杂志和报纸，为了金钱叛卖自己的信仰；仅因为有人出更多的钱，它们就会卑鄙地更换主人。我们没有这样的杂志和报纸。但我们却发现，不为了钱也可以出卖自己的信仰。比如，出卖自己可能是因为天生的过分唯唯诺诺，或者害怕与文学权威的观点不同而被人视为傻瓜。平庸之辈有时甚至并非出于自私却害怕与文学泰斗所确立的见解对立，尤其是当这些意见讲得很大胆、粗鲁和蛮横时。有时正是这种蛮横、粗鲁给见机行事的聪明作家带来了“泰斗”与权威的称号，同时又给“泰斗”造成了对群众的虽短暂却是非凡的影响。平庸者在这方面几乎总是异常地，战战兢兢地，尽管看上去很傲慢，却常常是乐于服从的。胆怯能产生文学的奴性。由于渴望文坛上的权力、优势和高衔，甚至有的德高望重的文学家有时也会做出这出人意料的奇怪举动。它将不由得成为一种诱惑，令当代人惊异，而且必然传给后代成为 19 世纪中期俄罗斯文学的丑闻与

笑话。而且这种事越来越多，那些人的影响持续不断，期刊保持沉默，不敢碰他们。我们文学中至今有几种定见，没有一丝的独创性，却被视为无疑的真理而存在，只是因为文学领袖们曾那样说过。评论界变得日趋庸俗与浅薄。有些刊物则对一些作家完全避而不谈，怕说错话。争吵是为了占个上风，而不是为了真理。一文不值的怀疑主义，对大多数人的影响是有害的，但却有效地掩盖了平庸，可以用来吸引人订阅。而表达真诚深刻的见解的严肃语言越来越难以听到。最终，文学中普遍流行的投机性，使一些期刊变成了主要是商业行为，文学及其功效退居次要位置，有时对此竟不加考虑。

我们决定创立的杂志，完全独立于文学权威之外（尽管我们对之十分尊重），要充分而勇敢地揭露我们时代的全部文学怪事。我们进行这种揭露，源于对俄罗斯文学最深沉的尊重。我们的杂志将不带有任何非文学的反感和偏见。我们甚至准备承认自己的错误与失误，而且是公之于众。我们不认为夸耀这一点（尽管是提前地）有什么可笑。我们也不回避争论。我们不怕有时得“触怒”一下文坛上的大鹅。鹅的叫声有时是有益的，它能预测天气，尽管并不总能保护卡庇托林山丘①。我们将特别注重“批评”栏目。不仅是任何一本好书，还有其他杂志中任何一篇出色的文学论文，我们的杂志都一定会加以分析。批评不应仅因为作品不像以前那样单独出书，而是登在杂

① 这里作者是同俄国寓言作家伊·克雷洛夫争论，克雷洛夫写有寓言《鹅群》（1811）。卡庇托林，罗马城发源地的七丘之一。上有卡庇托林神庙，是元老院和民众大会聚会场所。据传说，当高卢人（罗马人称居住于高卢地区的克里特人为高卢人）的部队夜间爬上卡庇托林神庙的墙壁时，一群鹅以其嘎嘎的叫声惊醒守卫者，并因此拯救了罗马。

志上就销声匿迹。《时代》杂志将不涉及任何个人，不过问任何平庸的东西，只要它无害。但它将关注、追踪文学中所有的重要事件，特别突出的事件，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并将毫不躲闪地揭露愚蠢、恶意、坏嗜好、傲慢与文学中的贵族派头等等，而不论它们出现在何处。还有种种生活现象、流行见解、固定原则（它们由于经常地恰当或不恰当的运用而变得俗气，成了怪诞讨厌的熟套），这些也像新出的书籍或杂志文章一样需要加以评论。我们的杂志为自己规定了一条不变的原则：直言不讳地说出我们对任何诚实的文学劳作的意见。作品上的署名如果赫赫有名，则要求我们对它应更加严格，我们的杂志永远不会采用现在通行的做法：对著名作家先说上十句奉承话，然后才给他提一条不很恭维的意见。夸赞总是纯洁的，唯有谄媚是十足的奴才相。我们在简短的启事中没有可能详述本杂志的细节，我们要说的只是经政府批准的杂志栏目是十分丰富多样的。现分列于下：

栏目计划

1. 文学专栏。长、中、短篇小说，回忆录、诗歌等。

2. 对俄国与外国书籍的评论、对所用参考书的评述。包括对我国舞台上演新剧的评析。

3. 学术文章。有现实意义的经济、财政和哲学问题。行文通俗，能让不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读者看懂。

4. 国内新闻。政府法令、国内事件、外省来信等。

5. 政治述评。国内政治生活的每月全面综述。最新消息、政治传闻、外国记者的报道。

6. 混合栏目。(1) 小故事、国外与国内外省来信等。(2) 小品文。(3) 幽默文章。

从目录可以看出，这里包括了当代读者感兴趣的一切问题。每期结尾都辟有幽默作品的专栏。

我们不拟列出参加我们刊物写作的作家名单。这一吸引读者注意的方法，近来变得完全不可行了。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名家的名字仅仅出现在启事中。虽然我们也能举出不止一个我国文坛的名人，但有意不取这种做法，因为尽管尊重文坛名家，却认为他们并非杂志的力量所在。

《时代》杂志将于每月初出版，大开本二十五至三十印张，篇幅一如我国的大型月刊。

一八六一

俄国文学论丛

一　引言

I

如果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让遥远的或邻近的其他国家感到很陌生，没有研究，没有人理解也难以理解，那么对西方邻国来说这无疑就是俄国。无论中国、日本，都不像俄国这样神秘而引起欧洲人的好奇，以前、现在，甚至将来在很长时间内全都如此。我们不是夸张。中国和日本首先是离欧洲太远，其次是有时几乎很难去那里。俄罗斯对欧洲却是敞开的，俄国人对欧洲人也是敞开胸怀的。但同时俄罗斯人的性格在欧洲人眼里可能比中国人或日本人的性格更模糊。对欧洲来说俄罗斯像是斯芬克司之谜。让西方了解俄国的真实、精神、性格和它的走向，比发明永动机和长命水更难。在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甚至对月球也比对俄罗斯研究得要更详尽。至少已确切知道月球那里没有人住。关于俄国，人们虽然知道那里住着人，甚至知道

是俄国人，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却至今是个谜，尽管欧洲人自信已经了解了我们。在不同的时代，我们好奇的邻居下了很大力气来了解我们和我们的生活，收集了各种材料、数据和事实，进行过各种研究。我们非常感谢这些研究者，因为他们的研究对我们自己也十分有用。但要想从这些材料、数据、事实里得出些充分、有益、有见地的结论来说明什么是俄国人，得出些综合的、可信的结论，那么所有这些努力都注定是徒劳的，好像是有人故意这么安排的。有些人本事很大，能数出天上的很多星星，甚至最终相信能把星星从天上摘下来。当事关俄国时，这些本来聪明的人就迟钝得反常。无论是小事情上，无论是关系我国命运、意义与未来的深刻研究，都能证明这一点。不过，他们对我们也有所了解，比方说，俄国的经纬度，盛产哪些东西，还有些地方是让狗拉雪橇。除了狗之外，他们也知道俄国还有人，但人们很怪，像别的人，同时又不像任何人。俄国人像欧洲人，但又像是野蛮人。他们知道，我们的人民相当伶俐，却没有天才；我们的人长得很漂亮，住在木屋里，但因为严寒不能达到高度的发展。他们还知道，俄国有军队，数量也很大；但认为俄国士兵是彻底的机械，由木头做成，上着发条，不会思考也没有感觉，因此作战坚强却没有任何自主性，在各方面都逊色于法国人。他们知道，俄国有个皇帝叫彼得，被称为大帝，是个不乏才干的君主，但没多少文化，全凭自己的喜好；日内瓦人列福尔特① 是他的老师，使

① 弗兰茨·列福尔特（1655/56—1699），海军上将（1695），后任海军元帅。瑞士人。十九岁就来俄国，很快就得到青年时代的彼得的赏识。1678 年起在俄国任职，后来成为彼得大帝的挚友。在远征中指挥舰队，1697—1698 年为俄国大使团的领导人之一。

他从野蛮变得聪明，怂恿他建立海军，剪短俄国长袍和胡髭。彼得果真剪了胡髭，因此俄国人马上变成了欧洲人。他们还知道，如果日内瓦没出生列福尔特这个人，俄国人到现在还会留着胡髭，当然也就不会有俄国的改革。上述的例子已经够多了，对其他方面的了解，也是如此或大体相同。我们这样说是很认真的。你不妨翻开外国来访的子爵、男爵，主要是侯爵写我们的书籍，它们都上万册地在欧洲发行。仔细读读它们您就会发现，我们说的是不是事实，是否在开玩笑。而最有趣的是，这些书里有的无疑是非常聪明的人写的。这些外国旅游者想居高临下地观察俄国，掌握它的主要思想，结果是无能为力。同样地，几乎任何外国人尽管因环境所迫在俄国生活上十五甚至二十年，也都不能习惯俄国，不能彻底搞懂，不能引出接近实际的某种思想。先举我们的近邻德国人为例。来我们这里的德国人有各种各样的：有毫无主见的，有心中有数的，有的学者怀着认真的目的来了解和描写，对俄国科学有所助益。也有非学者的普通人，目的简单却同样美好，来烤面包或熏香肠，各种韦伯尔和柳杰肯斯①。还有人甚至认为自己有一条“一成不变的准则，甚至是神圣的义务”，就是给俄国人看欧洲的各种珍奇事物，因此便运来男女巨人、有学问的土拨鼠，或是德国人专为俄国人取乐想出来的猴子。但无论德国学者与普通人在观念、社会地位、教育程度或来俄目的上有多么大的不同，所有这些德国人一到俄国，在印象上迅速趋于一致。他们都有某种病态的不信任，看到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完全不能理解俄国人无论如何变不成德国人，因此不

① 当时俄国特别是彼得堡有许多德国人开面包房和香肠店。韦伯尔是有名的面包师和房产主，柳杰肯斯是著名的香肠店。

能什么都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还有，他们都或明或暗地对俄国人极端傲慢——这些几乎是任何一个德国人看俄国时的态度。有些人来俄国是为布耶拉金[①] 一类地主服务，当管家。有些人是作为自然科学家来的，捉俄国的甲虫，靠此获得不朽的荣誉，当上某种委员。另外有些人顺利地做了十五年委员，终于决定成为一个现代的有用的人，决心要详尽地描写俄罗斯建国千年纪念碑的基座将用什么岩石雕成。他们之中也有非常善良的人，几乎总要开始专门学习俄语，非常喜欢俄语和俄国文学，最终还能运用俄语，当然也要费不少气力。在兴奋之余，他们会想为自己，为俄国人和全人类做件确实有益的事，于是决定“把赫拉斯科夫写的《俄罗斯》[②] 译成梵语”。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译《俄罗斯》。有些人是来写自己的《俄罗斯》，然后拿到德国出版。这类作品中有极出色的。读一下这个《俄罗斯》，会觉得很严肃、充实、聪敏，甚至俏皮。事实准确新鲜，有些现象上看法深刻、独到、准确，原因就在于有些俄国现象更易于外国人而不是俄国人来观察。但突然间，在某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上，这位学者陷入了困境，而抛开这个问题，花最诚实的劳动得来的任何关于俄国的知识、事实，都不能引出任何见解，要么只能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如果不说是毫无用处的结论。于是学者突然中止了分析，断了线索，只好提出非常荒谬的结论[③]，这会让书从您手中滑出来，甚至会掉到桌子底下。

外来的法国人则与德国人毫不相同，这好像是完全相反的

---

① 谢德林著的《外省散记》中的一个地主形象。

② 米·米·赫拉斯科夫（1733—1807），俄国作家，著作甚丰，《俄罗斯》（1779）是他的叙事诗。

③ 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针对不少“著名的”德国论著而言的。

一类。法国人不会去把什么译成梵语。但这不是因为他们不会梵语，法国人什么都会，甚至不学就会，而是因为：第一，他们到我国来是用洞察的眼光打量我们，用鹰一般的目光一下看透我们的全部底细，并得出最终的不容反驳的意见。第二，他们还在巴黎时就知道关于俄国该写些什么，甚至会在来俄国之前在巴黎写好自己的游记，把它卖给书商，然后再到我们这儿来，为了炫耀一下，迷惑人们，之后就飞走了。法国人总是自信他不用感谢任何人，没什么理由，即使别人真为他做了什么。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不好，恰恰相反，因为他完全相信，不是别人给他带来了乐趣，而是他自己的出现就能使别人幸福、得到安慰和鼓励，他使路上碰到的人个个都感到满足。他们中最无用最平庸的人，在俄国住些年，走的时候都坚信他给俄国人带来了幸福，而且哪怕部分地改造了俄国。他们中有人怀着严肃的、重要的目的，甚至来上二十八天这么长的时间①。这数字本身就表明了研究者的诚意，因为用这么多时间他足以做一次环球旅行，并把它写出来。他先在彼得堡得了一些最初的印象，而这印象往往是很不错的，顺便以批评的眼光看了些英国人办的机构，捎带教俄国贵族（les boyards）学会算命或是造谣。不过这要比我们这儿的那些聚会有趣得多，好得多，不那样枯燥和妄自尊大。最后他决定仔细认真研究俄国，就启程去莫斯科。在那儿他看了看克里姆林宫，想到了拿破仑，夸奖了一番茶叶，赞叹人们的美丽、健康，也感慨人民过早的沉沦，叹惜嫁接文明的不良后果，觉得民族风俗在消失，证据就是原来挂轮架的马车已换成了两侧背对背坐的敞篷马车，更像

① 这里是讥笑那些在俄国作短期游览、走马观花的法国作者，如德·屈斯蒂纳（详见下文注）与大仲马等人关于俄国的著作。

欧洲的两轮轻便马车了。因为这一切，他猛烈攻击彼得大帝。然后马上很自然地给读者讲起自己的经历，充满惊人的奇遇[①]。法国人什么事都做得出，而且对他毫无损害，所以讲完自己的经历之后，立即又开始讲一个俄国的故事，当然是真正的故事，取自俄国生活习俗的，题目是"Petroucha"[②]。这故事有两个优点：第一，它真实地描写了俄国生活；第二，同时也准确地反映了夏威夷群岛的生活。顺便他也会关注一下俄国文学：他要讲到普希金，宽容地说这是个不无才华的诗人，很有民族性，并且很成功地模仿了安德烈·舍尼埃[③]和德祖利埃夫人[④]。他要夸赞几句罗蒙诺索夫[⑤]。不无尊敬地谈起杰尔查文[⑥]，说他是个小有才气的寓言家，模仿了拉封丹[⑦]。他会特别同情地说到克雷洛夫[⑧]，说他是位英年早逝的作家（讲讲他的生平），说他的小说成功地模仿了大仲马。此后这位旅行家告别莫斯科继续旅行，很赞赏俄国的三套马车，最终到达高加索某处，与俄国哥萨克步兵一起射击高加索北部的契尔克斯

---

① 这里指的主要是法国文学家A·德·屈斯蒂纳（1790—1857），他曾访问俄国，著有《1839年的俄国》，对尼古拉的专制制度作了否定的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除此处外，在《彼得堡纪事》中也曾对此书进行讽刺。

② 法文：义不详，疑为讽刺性用语。

③ 安德烈·舍尼埃（1762—1794），法国诗人。他承袭古典主义审美观，又超越它的樊篱，具有浪漫主义情调，雨果称他为"古典派中的浪漫派"。普希金的确很欣赏他的创作。

④ 德祖利埃夫人(1637—1694)，法国女诗人。她的田园诗于18—19世纪初在俄国颇受欢迎。但这些诗对民间生活作虚假的恬适安逸的描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同时代人所轻视的。

⑤ 米·瓦·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第一位伟大学者、思想家、诗人。

⑥ 加·罗·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诗人。

⑦ 拉封丹（1621—1695），法国著名的寓言作家。

⑧ 伊·安·克雷洛夫（1769—1844），俄国寓言作家。

人，还与沙米尔结识，一起读《三个火枪手》[①] ……

重申一下，我们这样讲并不是在说笑话，也不是夸张。同时我们自己也感到，我们的话似乎带点儿嘲讽和漫画的味道。不过说实在的，世上没有不能用戏谑目光来看待的东西。会有人对我们说，一切都可以加以嘲笑，话是那些话，但口气不对劲，不是那么个讲法。这我们同意。但只要您拿出外国人讲我们的最认真的意见看一看，您就会相信，我们说的一点儿都不夸张。

Ⅱ

但有一点要说明一下。外国人关于我们的最为荒谬的叫嚷，大都是在不太平的情况下说出的，那是不久前交恶的时候[②]。现在感谢上帝，纷争总算暂时停止了，如果不是永远结束的话。那时是在战争中，充满凶狠的厮杀声。不过，如果举出战争与交恶之前的所有观点的精华，所得出的结论几乎是同样的。这有书在，可资佐证。

那么，我们能因这些观念去责备外国人吗？怪他们仇恨我们，怪他们愚笨？笑他们没有远见，目光短浅？然而，他们的观点并非某个人说了一次。它代表整个西方的看法，以不同方

---

① 从上文“……关注一下俄国文学”到此为止，都是讽刺法国作家大仲马的《旅途散记》(1858—1859)。在这里大仲马说普希金模仿安德烈·舍尼埃，尤其是德祖利埃夫人；说俄国诗人加·罗·杰尔查文是模仿拉封丹的寓言作家；说俄国寓言作家伊·克雷洛夫是“英年早逝”的“作家”，甚至是“模仿了大仲马”……全是无稽之谈。沙米尔(1799—1871)，是高加索山民反对沙皇和当地封建主的解放斗争的领导人，伊玛目国的创始人。《三个火枪手》是大仲马的小说。

② 指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当时土耳其联合英、法和撒丁王国与俄国作战，以俄国战败结束。

式表达出来，有冷静的，有憎恨的，有目光敏锐的；有浑蛋也有极正直的人；有散文也有诗歌；有的写成小说，有的写成历史；有 premier -Paris①，也有讲坛上的演讲。总之，这几乎是普遍的意见，而责备大家都错了似乎很困难。而且凭什么怪罪人呢？没什么错误嘛！我们直说吧：这里不仅没什么错误，我们甚至自己承认这些观点是完全正常的，即直接从事件进程中引出的，尽管它自然是不对的。问题在于，外国人也不可能不这样理解我们，哪怕我们劝他们改变看法。然而难道我们有必要去劝吗？第一，法国人肯定不会订阅《时代》，哪怕本人是我们刊物的撰稿人，甚至就是西塞罗②，再说我们也未必请他撰稿。因而，他们读不到我们的回答。其他德国人就更不用提了。第二，应该承认，他们的确不大能够理解我们。他们相互之间也不是很理解。

英国人至今还想不通法国人存在的合理性。法国人对待英国人也是同样，甚至更变本加厉，别看有什么同盟、ententes cordiales③ 等等。但同时他们双方都是真正的欧洲人，主要的欧洲人。是欧洲人的代表。他们哪里能猜透我们俄罗斯人呢？再说我们对自己也还是个谜，至少我们经常互相提些关于自己的难题。斯拉夫派不是向亲西方派提出过难题吗？后者也给前者提出过。我们这里的人们至今还喜欢字谜、画谜。只要读一下杂志的创刊启事，您就会完全相信这一点。我们的主要特点之一在于我们不是欧洲人，而他们又无法不用自己的标准衡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怎么能理解我们呢？更重要的是我

① 法文：巴黎报纸的社论。
② 西塞罗（公元前 106—前 43），古罗马的雄辩家、哲学家和政治家。
③ 法文：真诚的和谐。

们自己几乎至今不断地硬把自己说成是欧洲人。他们看着我们这样子，又哪里能从这堆乱麻中理出头绪呢？至今甚至没有足够的事实来形成对我们的不含偏见的认识，这难道是他们的错吗？我们自己表现出了什么特别和独到之处呢？相反，我们甚至害怕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不仅对他们，也对自己隐瞒了这一点。我们羞于承认，身上哪怕还有一丁点儿自己的印记，羞于承认无论如何成不了完全的欧洲人并为此自责，因此对他们就一味点头称是，随声附和，甚至不去尝试说服他们改变看法。况且他们过去看到的俄罗斯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以什么人作为评判的标准呢？是的，一个半世纪以来，他们见过了我们中的许多人。其中格列奇① 先生就去过他们那里，还写回来巴黎书信。关于格列奇先生，我们知道，他曾试图让法国人改变看法，同圣伯夫②，同维克多·雨果谈过话，这从他的巴黎来信中可以看出。“我坦率地对圣伯夫说过”，他曾这样写道，“我坦率地对维克多·雨果讲明”。事情是这样，格列奇先生对圣伯夫或者是维克多·雨果（记不准对谁了，该查一查），坦率地说了，文学若是宣扬不道德的东西就错了，就不配称为文学。（可能不全是原话，但意思是这样的，我们敢担保。）看来圣伯夫是等了五十年才听到格列奇先生讲这尽人皆知的真理。当时圣伯夫大概惊得瞪大了眼睛！不过我们可以放心：法国人是很讲礼貌的。我们知道，格列奇先生从巴黎顺利返回，安然

① 尼·伊·格列奇（1787—1867），俄国作家、语文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祖国之子》杂志（1812—1839）、《北方蜜蜂》报（1831—1859）主编。他仰承官方意旨，深深为人诟病。这里谈的是他的《巴黎书简，以及关于丹麦、法国、荷兰、比利时的札记》。

② 圣伯夫（1804—1869），法国文学评论家。

无恙。不过我们说，不能凭一个格列奇先生来判断所有的俄国人，大概也不会错的。关于格列奇先生就说到这里吧。我们只是顺便提到了他，除他之外还有别人也去过巴黎。

古时就有我们退休的军官[①]去那里，他们是些快活、善良的人。他们检阅时笔挺的军服、驼鹿皮裤令观众倾倒；退休后则不用服役操劳，可以颐养天年了。大批拥向国外的也有浮躁的年轻人，他们不任公职，却很在意自己的庄园。去那里的还有我们的本土地主，携着家眷，带上箱子。他们怀着诚心认真地登上高塔[②]，俯瞰巴黎，暗地里却背着妻子追逐轻浮的法国女子。还有一些牙齿掉光、耳朵很背的老太太，在那里度过了残年，最后已经不说俄语，其实以前也并不会说。从国外回到我们这里的，有那些所谓妈妈的宝贝（译成法语该是 enfants de bonne maison，fils de famille[③]）。他们深知帕麦斯顿[④]的底细，了解法国的一切无足轻重的钩心斗角，直至妇人的闲话；他们吃饭时请自己的邻座命令仆人倒杯白开水，只是为的不说一句俄语，哪怕对仆人也不说。格里戈罗维奇先生在其不久前创作的《庄稼汉与大阔佬》中亲自证明了这类事[⑤]。他们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讽刺多个兵种军官写的旅途札记。对赫尔岑《法德来信》中也有所讽刺。

② 指巴黎圣母院的钟塔。

③ 法文，原意是：阔人的孩子，妈妈娇养惯的儿子。

④ 帕默斯顿（1784—1865），英国首相（1855—1858 及 1859 年）、辉格党首脑。他于 1830—1851 年间三次任外交大臣，曾挑起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5）。

⑤ 德·瓦·格里戈罗维奇的小说主要反映农村中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这里是简要地叙述了他的《庄稼汉与大阔佬》里的人物伊帕托夫的作为。这个从西欧回来的穿着华丽的阔佬，终生没读完一本俄国书，对祖国的历史几乎不屑一顾，同时却如饥似渴地阅读外国报刊以至小册子，对西欧的政治等问题了如指掌。

中也有人懂俄语，甚至不知为什么搞了俄国文学，在俄国舞台上演出过喜剧，类似于阿尔弗雷德·缪塞[1]的谣谚剧，剧名比方可以叫做《拉坎们》[2]（这名字当然是虚构的）。既然《拉坎们》的剧情不仅表现排演这类喜剧的整个一个社会阶层，同时也代表了类似的其他作品，那我就给你们简要地讲讲这个情节吧。在上个世纪的巴黎，有个极庸俗的蹩脚诗人走红，叫拉坎，其实他甚至不配为斯鲁切夫斯基先生[3]擦皮鞋。一位小姐迷上了他的诗，想认识他。三个调皮鬼说好一个接一个地去她那里自称是拉坎。她还没来得及送走一个拉坎，又来了下一个。喜剧的俏皮和精彩之处，全在于轻浮小姐看到三个拉坎时目瞪口呆的神情[4]。继《钦差大臣》之后，这些先生（有的已经到了四十岁）写出这样的喜剧，竟自信为俄国文学奉献出了珍品。这样的人不是一两个，他们的名字叫群[5]。当然，他们中间谁都没写什么东西，《拉坎们》的作者几乎是个例外。不过每个人都做出样子，仿佛马上就写出《拉坎们》来。倘如

① 阿尔弗雷德·缪塞（1810—1857），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他在1830—1840间写作并推广一种谚语剧。在这种剧中几乎没有舞台动作，没有情节，它的主要优点在于十分细腻和文雅的上流社会的谈话，这种小剧在巴黎和彼得堡上演时取得了成功，但也遭到剧评家的激烈批评。

② 实为俄国作家H. B. 苏什科夫（1796—1871）所写的剧作。

③ 康·康·斯鲁切夫斯基（1837—1904），俄国诗人、作家。曾在《现代人》等杂志上发表作品。

④ 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似在做文字游戏，把两件事混为一谈。法国诗人中确有拉坎·奥诺拉（1589—1670），但其最著名的作品是写牧人季尔西斯的田园诗。而写三个拉坎的趣闻的则是法国作家塔勒芒·德·雷奥的作品。

⑤ 《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8章，第30节）：“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

（请原谅我插一句）我们的小品文作家中有谁写一写这类喜剧、小说、谣谚的情节，那会是很有趣的，因为它们至今还不时出现在俄国文学中。警察局局长循规蹈矩，拒绝娶将军的女儿，这难道不也是拉坎吗？当然这只是一种特殊的也更坏的情形。我知道有一部小说的情节，是写吞进了一只小表，到胃里还嗒嗒走着，简直太妙了！当然写这小说也只能遵守一条原则，那就是：艺术本身就是目的。我们处的时代就是如此，连写拉坎的人们现在也离不开"原则"和"当今的问题"。现在言归正传。我们要问：迄今为止，外国人靠这些先生的话对我们会得出怎样的看法呢？不过有人会说，难道只有这些人去过国外吗？法国人难道就没见过某某人吗？问题正在于他们至今没能发现这些人。即使发现了，仍然是不得要领。如果一个人不知从何而至，忽然对法国人说，他们落后了，如今光明在东方，légion d'honneur'e[①] 并不能救他们，如此等等。对此，法国人能说什么呢？他们干脆就不再听他说了。

如果他们能不忽略我们，如果他们肯听我们说，那我们会对他们讲："是的，你们忽略了我们的许多东西。"我们又会对他们说："你们完全不了解我们，尽管你们的梅里美甚至知道我们的古代史，写出了话剧"Le Faux Démetrius"[②] 开头那样的东西。不过从中能了解到的俄国历史，并不比从卡拉姆津的

① 法文：荣誉兵团勋章。这一勋章是拿破仑一世于 1802 年设立的。

② 法文：伪德米特里。据说他原名 Г. 奥特列皮耶夫，于 1601 年在波兰自称是俄国伊凡四世（雷帝）之子，自立为王，1605 年起为俄国沙皇。1606 年为贵族阴谋家所杀。

《市政官夫人马尔法》[1] 中读出的多。有趣的是，他笔下的伪德米特里酷似亚历山大·仲马，却不像他小说的主人公，而是像仲马本人，真正的侯爵 Davis de la Pailletterie[2]。我们还要第三次向他们说："你们既不懂我们，也不懂我们的历史。"至今你们只知道一点：日内瓦人列福尔特如何如何。这个日内瓦人对你们认识俄国历史那么不可或缺，我甚至想，连巴黎的每个女看门人都知道他，一看到俄国人夜里叫她开门，就会暗自嘀咕："要不是日内瓦出了个列福尔特，你现在还是个蛮夷呢，也不会来巴黎这个文明的中心，不会夜里把我吵醒，大声喊开门。"但别看我们连说三次，你们一点儿都不了解我们，但我们并没怪你们只知道一个列福尔特。要说列福尔特，你们反倒该谅解，因为他救了你们中间的许多人没有饿死。有多少家庭教师，什么圣热罗姆[3] 哇，或是蒙·雷韦什[4] 啊，很早就从莱茵河畔来俄国教书，他们不懂得任何科学，仅仅知道一个日内瓦人列福尔特如何如何。就因为他们教给俄国孩子唯一一点知识，他们获得了报酬，有了社会地位。说真的，他们干吗要研究我们呢？有什么合理的原因吗？难道是为了艺术？然而你们

① 尼·米·卡拉姆津（1766—1826），俄国作家、历史学家。他的《市政官夫人马尔法》（1803）是历史小说，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它与《伪德米特里》比较。他对《市政官夫人马尔法》是评价不高的。

② 法文：达维·德·拉帕耶特里。按：大仲马的父亲仲马·达维是德·拉帕耶特里侯爵同女黑奴生的混血儿。

③ 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少年》中的家庭教师。

④ 《蒙·雷韦什》是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一部小说。而蒙·雷韦什则是该作品中主人公的祖遗城堡的名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舒米洛娃引以自豪的是：她是在侨民蒙·雷韦什的高贵的贵族女子中学宿舍受的教育。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是记忆错误，而将两者混为一谈。

是干练、务实的人，大概不会花时间在为艺术而艺术这种小事上，虽然也让蓬萨尔[1] 进了科学院（或许是认为他也该去那里）。那么是为了科学吗？但问题恰恰在于我们的人至今干不了任何一门科学。先生们，正因此你们至今不明白，如果我们仅有你们的一种文明，那我们可太单薄也太丢人了。我们已经尝试过了，现在凭经验明白这一点。

因此我们明白而你们不明白，你们的文明来此是应我们土壤的要求自然产生的结果，并不是因为有个日内瓦人列福尔特。不仅如此，文明在我们这里已经走完一个历程。我们已整个地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东西，接受了该接受的一切，现在能自由地运用于自己的土壤之上。我们接受文明的人数还不多，但这无关紧要。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我们已经历史地结束了欧洲文化的转折，开始了另一个转折，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问题的关键在于意识。我们意识到，文明只会给我们的民众生活带来新的因素，丝毫不会损害它，不会使它走上歧途。正相反，文明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帮助我们自己认清目标，并给我们提供未来建立功勋的新武器。就算觉悟的人还不多，但关键在于他们已不是拉玟。再重说一遍，事情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觉悟的过程已经完成，而对这觉悟的人群你们还毫无概念。你们（至少是你们中所有的子爵）到今天还确信，俄国只有两个阶层：les boyards 与 les serfs[2]。今后你们很长时间还不会相信，我们早已形成了中间的土壤，在这个土壤上，一切都融为一个整体，协调一致的整体。所有阶层都和

---

① 弗朗索瓦·蓬萨尔（1814—1867），法国剧作家。1855 年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

② 法文：贵族与农奴。

平地、和谐地、兄弟般地融合在一起，包括 les boyards，也包括 les serfs。而且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过你们西方那种意义上的地主，也就是说胜利者与被战胜者，我们这里同样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奴隶，像你们理解的那样。一切融会得非常轻松、自然、平和，而主要是平和，这一点正是我们与你们的不同之处。因为你们每一步都要靠斗争，为每一项权利和特权都得斗争。我们这里即使有不和谐，那也是表面的、暂时的、偶然的，不难消除，在我们的根基里并无基础。我们很清楚这一点。这样一种秩序，在古代就已奠基，它是大自然本身赋予俄国精神的，赋予人民理想的。而最后的外来障碍，在我们的时代又被英明祥瑞、最得民望的沙皇所消除。他为我们做的盛举将使他名垂后世。我们这里没有阶层的利益，因为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阶层。我们这里没有什么高卢人、法兰克人，也没有根据外在标准决定个人价值的那种条件①。因为我们只应该根据受的教育和精神品德来看人的价值。人们都意识到这一点，这成了人们的信念，因为俄国的精神是超越阶层间敌意与利益的。新罗斯在逐渐摸索，逐渐意识自己，即使它人数不多也不碍事。它也许是不自觉的，但却生活在所有俄国人的心里，存在于所有俄国人的愿望和欲念之中。我们的新罗斯明白了：只有一块水泥，一个纽带，一个根基，所有的东西都在上面汇集并和谐相处，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普遍和解，它的基础靠教育。这个新罗斯已经表现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你们想象的

① 高卢人（当时罗马人称居住于高卢地区的克里特人为高卢人）为使用印欧语东支阿利安人之一种；法兰克人为西日耳曼族的一支。作者意在强调西欧各国如法兰西，均通过征服其他民族才能建国，而俄罗斯不是经过征服途径而建国的。法国七月王朝的法律规定，每年缴纳直接税二百法郎的人才有选举权。

那种不成功的复制品与移植物。它展现了新一代身上新生成的道德品质，严于律己。它显示了高尚的自责精神，绝不违背良心，而这象征着伟大的力量，表示着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它每天都在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理想。它知道自己还刚起步，然而开始正是最重要的，因为一切事情都取决于第一步，取决于开头。它知道与你们的欧洲文明已经了结，现在开始一种新的无比广阔的生活。如今，当它转向人民，想与人民融为一体时，它给人民带来的礼物是科学。这是它虔敬地从你们手里得来的，为此它也会永远感激你们。它带给所有俄国人的，不是你们的文明，而是从你们文明中汲取的科学。它把这作为自己从故乡到德国漫游的成果介绍给人民，是对人民的一个交代。它把科学交给人民，期待着人民自己会用这科学做些什么。科学就其基本法则来说，当然对所有的人都是永恒不变的。但科学的嫁接，科学的成果，却取决于民族特点，亦即取决于土壤和人民的性格。

有人会对我们说："不过请问，你们的民族是指什么？你们的俄国人是怎样的人？你们炫耀说我们不了解你们，但你们了解自己吗？你们不是打算转到人民的根基上，并在报纸上宣布，在海报上传播吗？这说明你们承认至今不懂得你们所说的人民根基是什么；如果说懂得，那也是虚假的，是不会接受的，就因为至今都没站到这个根基上。现在你们心血来潮，喊得整个欧洲都听得见。请问，母鸡下蛋时会干什么呢？"

我们对读者重申，所有这些话都是外国人说的（比方说是个法国人），不是实有的而是想象中的外国人，是无形的幻想出来的外国人。我们写这文章的时候，眼前可没有任何法国人。

他接下去说："你们在声明里加入了如下内容：你们希望

俄国思想将逐渐成为欧洲各民族长期顽强努力形成的一切思想的综合。这可真新鲜！你们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回答说：“也就是说你们想让我们不拐弯抹角，直接对你们说出我们信仰什么，是这样吗，先生们?”

“不，我完全不想这样，”我们的法国人有些害怕地说，他预感到又得听长篇大论了，“我完全不想这样。我只是想……”

“不，尊敬的先生，”我们打断他说，“您是想得到回答，那就听我们说吧。”

“他该挨树条抽，他就得挨抽!”伊凡·卡尔雷奇接着说，显然想起了他给布耶拉金老爷当管家的日子。可如今他预感到农民生活很快将发生变化，就退了职赋闲。不过他希望能再被任用！此刻他站在我们旁边（也是作为一个外国人），抽着自己的烟斗。他过去叼着它常巡视农活儿。他默不作声却非常严肃地倾听我们的谈话，完全确信自己脸上透露着非常多的微妙的讥讽。

我们重复说：“我们是信仰……”

这里再次请读者原谅，我们要离开正题只说几句话，倒不是说这话在这里十分必要，只不过……憋不住想说。请原谅我们的真诚吧。

总是有一些流行一时的见解和信念，当代人似乎害怕承认，在大庭广众面前极力否认，可是暗地里却同意它们。在某些时候情况尤其是这样，因此甚至连完全局外的旁观者也从外面看得很清楚。我们知道，这可能出于很多好的动机：可能是为真理担心，为真理能否取胜担心；怕说话场合不当会损害真理，也可能是出于好意的多疑或是不很相信。这些都是可能的。我们往往甚至更多是喜欢沉默寡言，原因在于内心隐藏的诡谲，而这又来自我们接近虚荣的自爱。一个怀疑主义者说，

我们的世纪是热衷虚荣的世纪。要责怪全世界未免太过分了，但不能不同意的是，有的现代人对世上任何不体面的事都是能忍受的，甚至连浑蛋、骗子、小偷的名称，只要说得不太明显，在社会上表现得比较委婉……但是他唯独不能容忍和原谅别人嘲笑他的智力不行，永远不会忘记，有机会还要暗自得意地进行报复。这里要赶紧声明：我说的是有的现代人，而不是说所有的现代人。这种事发生的原因可能正在于，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人都日益强烈深切地感受到，甚至是觉悟到：任何人首先都有自己的价值，其次作为人也有与他人同样的价值，因为他人也是人，都有人的尊严。而因此人们便开始向教授们与他们领导的社会要求人道，要求尊重自己。由于一个人对他人能具有的唯一不变和无可争议的优越性是智力，所以谁也不想在这个优越性上低头认输，除非天赋高的学生不再为自己的聪明骄傲，也不再认为蠢笨是什么耻辱而可以恶意地嘲笑。因此谁也不想当傻子，因此也不会不由自主地陷入错误，损害起自己的尊严来。傻子倒是不应该为自己的笨拙而脸红，因为天生就傻不是他自己的什么错……但看来应该是特别的聪明人采取主动，傻人如果不比聪明人精明，本是可以原谅的。比如我认识一个人……就说个工业家吧（因为现在工业时髦，甚至在文学中也是这样。而且工业家是个很笼统的不伤人的字眼，几乎是个抽象名词）……如果有人问他什么称呼更顺耳一些，是骗子还是傻子？我相信他马上会同意叫他骗子。虽说他实际上是个骗子，但更多的还是个傻子，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也知道别人同样明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时代的人们有时太胆怯，不敢说出不同的见解，甚至是最心悦诚服的见解。他们正是怕被人骂作落后愚笨。智力，智力，智力低下是最叫人不安的，问题就在于此！人们缄口不谈自己的见解，却情愿发狠地去附和自

己根本不相信的东西，只是暗地里讥笑，而所以如此的原因，全在于它时髦、流行，是泰斗和权威们肯定了的。怎么能反对权威呢！然而，一个人如果真诚相信自己的见解，就应该尊重自己的见解；既然尊重自己的见解，就应为这种见解做点儿什么。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有义务……如此等等。

“哎呀，您说的这些都属老生常谈了。”读者会这么说，大概也就不再读下去。

是的，刚想依据自己的见解讲个什么道理，马上就好像又开始老生常谈。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许多现代的道理，说得稍微激昂一点儿立即就变得像迂腐之论呢？为什么在我们的时代为了说出真理，越来越需要借助幽默、讽刺和嘲讽呢？为什么需要这个来使真理这个苦药丸变得甜一些？为什么把自己的见解介绍给公众时要对这见解摆出一副高傲，甚至有些不敬的样子？一句话，就是假装有所保留。我们的看法是，诚实的人不该为自己的见解脸红，即便它们是老生常谈，特别是如果他们坚信不移的话。我们说“特别”，是因为有些人并不坚信自己的见解，当说服别人相信时，总向自己提出问题：老兄，你不是胡扯吧？但同时却会为支持这些见解大发雷霆，倒完全不是想欺骗别人。我认识一位先生，有见解的人，他自己承认了这一点。他属于那类无可怀疑的“聪明”人，他们一生尽做蠢事。顺便说一句：闭塞愚钝之人比聪明人干的傻事要少得多，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向这位认账的先生问起，为什么他自己不信却劝人相信，他哪来的这股热诚，如果自己都有所怀疑。他回答说，热诚说服是因为试图说服自己。这就是从外表上喜爱上一种思想，完全出于爱好，没有给自己证明（甚至害怕去证明）它是否正确。谁知道呢，也许真有这样的人，一生都满嘴唾沫地说服别人，目的只为了说服自己，但到死也没

能把自己说服……不过说得够多了……我们已经彻底说服了自己。现在让别人去猜测我们吧，认为我们也是迷恋于自己的思想，其实它是不对的、没有根据的；我们是在夸张，我们身上太多年轻人的急躁，或者说是太多老年人的才思枯竭，我们太没有分寸，如此等等。让别人去这样想吧！要知道我们可明白，我们照直说出自己相信的东西，不会对任何人有害，那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一定要沉默呢？

Ⅲ

是的，我们深信，俄罗斯民族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同寻常的现象。俄国人民论性格与现代欧洲其他所有民族都相去甚远，以至于迄今为止欧洲人不理解他，把他身上的一切全看反了。所有的欧洲人奔向一个目的，有一个共同的理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们由于本土利益不同而分开，互不相容，互相排斥，离开了共同的道路而越来越分道扬镳。看来他们之中每个民族都想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国内找到人类共同的理想，而大家在一起倒会损害自己与自己的事业。我们现在严肃地重复一遍前面当笑话说的话：英国人至今不能理解法国人的合理性，反过来法国人对英国人也是一样，而且这不仅是他们不约而同的看法，不仅是整个民族的本能感觉，这甚至还见于最早的人们身上，见于两个民族的祖先身上。英国人一有机会就嘲笑自己的邻居①，并且不可调和地仇视法国的民族特点。对抗最终使他们失去了公正。他们不再相互理解，他们以各自的眼光看待生活，他们有各自的信仰，并认为这是自己很大的

① 英国人性格傲慢这一民族特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1876年的《作家日记》（3月号，第2章）再次谈到。

光荣。他们由于各自的规范不同，道德不同，看世界的方式不同，相互间的差别变得越来越大。双方在整个世界里都只能看到自己，所有其他民族都是自己的绊脚石。这两个民族中每一个都想单独完成只有各民族齐心协力才能完成的事情。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只是过去对抗的残余吗？难道分裂的原因要到贞德[1]或十字军东征[2]的时代去寻找吗？难道文明是如此无力，至今不能克服这些夙怨？这原因是不是不该到偶然性中，而应该到根基中、到血液中、到两国人民的整体精神中去寻找呢？所有的欧洲人大多是这样。全人类的概念在他们中间越来越淡薄了。这个概念在每个民族那里都变了形，黯然失色，在意识中成了别的东西。迄今还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基督教纽带，影响也日渐薄弱。甚至连科学也无力团结越来越分裂的人们。即便假定他们也还有些道理，比如这些独特性、这种相互抗衡、这种离群索居和这种只靠自己的骄傲态度能够给予每个民族巨大的力量来扫清道路上的障碍。但是因此这些障碍也会越来越多。由于这个缘故，欧洲人完全不理解俄国人，把俄国人性格中的一个重要特点称为缺乏个性。我们承认，现在说这些话并没提出根据。不过我们认为这种论证不属于我们这篇文章的任务。但人们至少会同意，俄国人性格中有与欧洲人截然不同的突出特点，俄国人性格中突出的是善于高度综合，

---

① 贞德（1412—1431），法国女民族英雄。被誉为“奥尔良姑娘”。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1337—1453），她领导法国人民抵抗英国侵略军。1429年为奥尔良解围。1430年为勃艮第人俘获，被送交教会法庭，在鲁昂被处以火刑。1920年天主教会尊她为“圣女”。

② 是西欧封建主和天主教会发动的对近东（叙利亚、巴勒斯坦、北非）的远征，时间为1096—1270年，在一百多年间，这一侵略性的远征共发动过八次。

兼收并蓄，包容全人类的东西。俄国人没有欧洲人那种呆板僵硬、不肯让步。俄国人同所有的人都能相处，一切都可接纳。他不计较民族、血缘和土地的不同而能同情整个人类。他能发现哪怕是微小的人类共同利益，并迅速看清他的合理性。他有一种普遍人性的本能。依靠本能他能在不同民族的截然不同之中看出人类的普遍特点，并且立即将其与自己的思想协调起来，在自己头脑中为其找到位置，常常还会为两个不同欧洲民族间相互矛盾对抗的思想找到结合点和妥协点。而这些思想迄今可能很遗憾还没找到和解的方法，也许自己永远也不会和解。与此同时，在俄国人身上能够看到实行理智的自我批评的充分能力，以最清醒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充分能力，没有任何会损害行动自由的自命不凡心理。当然，我们说的是泛指的俄国人，也就是整个这个民族。俄国人甚至在体能上也不同于欧洲人。每个俄国人都可以说各种语言，并且学到每种外语的细微精神，如同掌握自己的俄语一样，欧洲人就没有这种能力，我指的是整个民族的能力。难道这不能说明些问题吗？难道这只是偶然的、无目的的现象吗？难道不能根据这些现象来理解和部分地推测我国人民未来发展的某些情况、人民的愿望与目标吗？正是这样一个民族，受条件的制约，很多世纪以来一直怀着敌意地看着欧洲，并顽固地不想与之共同生活，也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彼得以自己的某种本能感到了一种新的力量，意识到需要开阔所有俄国人的眼界和活动天地。这种需要隐藏在他们身上却不自觉，又不自觉地迸发出来。这种需要早自斯拉夫时期就存在于他们的血液中。有人说彼得只想把俄国变为荷兰

而已[①]。我们不知道。关于彼得这个人物尽管历史上有很多阐释，近年也有很多研究，可至今对我们来说还是个谜。我们只明白一点，他必定是极独特的人物，作为莫斯科沙皇他不仅是喜欢上荷兰，而且甚至想到荷兰去。难道这一切的原因真是由于一个日内瓦人列福尔特吗？不管怎么说，在彼得身上我们看到：一个俄国人一旦有了完全的信念，感到时机到来，他自身有新的力量成熟涌现，他会干出多大的事业。令人惊骇的是，俄罗斯人的精神是何等自由，意志又是何等坚强！任何时候也未曾有人像他那样有时不得已而脱离根基，急剧地转换自己的信念。异邦的先生们，谁知道呢，可能俄罗斯命中注定要等到你们干完的时候，用这段时间吃透你们的思想，理解你们的理想、目的和愿望；再梳理你们的思想，将其提高到全人类的意义，而最终作为精神独立的人，排除一切其他的阶层与本土的利益，投入到新的、更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活动中，以你们的终点为起点，引领你们所有的人追随我们。我们的诗人莱蒙托夫曾认为俄罗斯好比伊里亚·穆罗梅茨[②]，坐在原地三十年不动，只有在感觉到自己非凡的力气后才出动。俄罗斯为什么被赋予如此丰富而独特的能力？难道是为了无所事事吗？可能人们会这样问我们：你们身上怎么有如此多的高傲，如此爱夸耀？你们引以为荣的自我批评精神与清醒的目光到哪里去了？我们的回答是，既然我们开始时长时间地承受了自我谴责，那么也能承受与这些谴责完全相反的真实。我们记得，我们曾为不能变为现在的欧洲人而责骂自己是斯拉夫人。难道现

① 俄国文艺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曾谈到彼得大帝急于欧化，“想把俄国变成荷兰”。

② 俄国 12—16 世纪的壮士歌中的一个主人公，他的形象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理想中的英雄人物。

在还不能认识到，当时我们是一派胡言吗？我们不反对自我谴责的能力，喜爱它并认为这是俄罗斯人天性中最好的一面，为其独特性，而这是你们所干脆不具有的。我们知道在自我批评方面还有许多可做的，甚至会越来越多。可是，您试着碰碰法国人，比方说在勇敢或是他的 légion d'honneur'e① 方面。碰碰英国人，哪怕是居家生活中最小的习惯，那就会发现，他们会怎么回答。为何不可以自夸一下，说俄罗斯人没有那么吹毛求疵与心胸狭窄呢，可能只有我们的文学大师例外。我们对俄罗斯精神的信心不比任何人少。难道他会受不住夸奖吗？不，欧洲的先生们！暂且先别要求我们来证明对你们与我们自己的看法吧，如果你们有时间，还是先尽量争取对我们了解得透彻些吧。你们认为，我们曾在你们失败时喝过倒彩，毫不掩饰地幸灾乐祸，而在你们英勇而大度地打算走上新的进步道路时我们却大不以为然。不，我们亲切可爱的兄长们，我们既没有喝倒彩，也没有幸灾乐祸。我们甚至还与你们一起哭泣过。你们可能马上会吃惊地问：你们怎么会哭呢？这关你们什么事？这完全多余。啊，先生们，我们对你们的回答是，问题就在于是多余的操心，但还是同情你们！这就是要点所在。比方说你们不知从何处得来的结论，说我们是狂热分子，也就是说我们的士兵们受到狂热主义的煽动。上帝呀！先生们，这简直是太可笑了！如果说世界上还存在着不受任何狂热思想影响的人，那就是俄罗斯士兵。我们当中接触过俄罗斯士兵、并且与他们一起生活过的人，对这一点了解得非常准确。你们知道吗，这是些多么可爱、讨人喜欢而亲切的人哪！你们哪怕读过托尔斯泰

① 法文：荣誉兵团勋章。参阅上文注。

的短篇小说[1]就知道了；那里有些东西写得多么可信而可爱！你们说什么呀，难道俄罗斯士兵保卫塞瓦斯托波尔是出于宗教狂热吗？我想，你们勇敢的朱阿夫兵[2] 很熟悉我们俄罗斯的士兵。他们难道在我们的士兵身上看出了很多仇恨吗？你们对我们的军官也了解得多么不够哇！你们认为，我们只有两个阶层：les boyards 和 les serfs，而且抱定了这个想法不变。哪有什么贵族啊！就算是我们的阶层划分很清晰，但问题就在于，在我们所有的阶层中共性比区别要大得多。这是我们和谐、安宁、友爱与繁荣的前提。任何一个俄罗斯人首先是俄罗斯人，而后才属于某个阶层。而你们那里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对此我们深表遗憾。你们的情况有时甚至完全相反。你们有时为了阶层的利益可以牺牲整个民族，这一点甚至就在不久前，甚至现在也时有发生，甚至这样的事还可能会发生许多次[3]。也就是说，你们那里阶层和各种集团的力量还是很强的。你们吃惊地问："你们备受夸奖的发展体现在何处，你们的进步到底在哪里？现实中仿佛看不到这些？"我们的回答是："不，可以看见，但你们是看不见的；你们关注的方向不对。它们表现在全体人民的精神与需求中，这就足够了；我们中的最少数也开始在大处、整体上寻找共同点，这也足够了。别把我们称为傲慢与短视的早熟者。不，我们早已开始仔细考虑和分析所有的事，给自己提出疑问，为得出答案而冥思苦想。我们不久前才开始分析，但对于我们来说算是很久了，甚至我们自己对此都感到了厌烦。因为我们也生活过，而且有着丰富的阅历。顺便

---

① 指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哥萨克》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

② 19—20 世纪法国殖民地军队的一种轻骑兵，建于北非，由法国人和阿拉伯人组成。

③ 当指此前的欧洲各国的革命，各阶级之间的斗争。

提一句，要不要给你们讲一下我们自己的故事，自己发展与成长的故事呢？我们当然不会从彼得一世讲起。我们从不久前开始，就从我们的整个受教育阶层开始分析时讲起。想想看，曾有过这样的时刻，我们这些文明人对自己也没有自信。当时我们还在读保尔·德·科克[①]的作品，却以蔑视的态度排斥亚历山大·仲马及同类的一些作家。我们认准了乔治·桑一个人，而且，天哪，当时我们读她读得是多么着迷呀！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与在别林斯基之后到《祖国纪事》杂志工作的杜德什金先生两个人[②]，到现在还念念不忘乔治·桑。请你不妨读一下1861年他们杂志的征订启事。当时我们服帖地听取了你们对我们的评判，而且还努力地随声附和。是的，我们是随声附和，而且不知道该怎么做。出于无所事事，我们创立了自然派[③]。我们这里可真不少才华出众的人物！不是说天才的作家，他们是单独的一类，而是说各个方面都才华横溢的人。七品文官谢德林先生[④]明白，这个词指的是什么。这些才子在我们面前极力装腔作势，我们则仔细端详，评头品足，当面嘲笑他们，还让他们自我嘲笑。他们确也自嘲了，但好像是出于

① 保尔·德·科克（1793—1871），法国作家。写有小说、戏剧、歌谣、诗歌等，总共四百多部作品。

②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是克拉耶夫斯基的名字和父称。斯·谢·杜德什金（1821—1866），俄国批评家。他两人当时一起主编《祖国纪事》杂志。

③ 19世纪40—50年代，俄国评论家视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自然派的代表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是反驳斯拉夫派对自然派的否定。他们说：自然派中最有才华的人也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自然派应该从此迅速地出人意料地消失。

④ 在谢德林姓氏之前加上“七品文官”字样，是因为他在《外省散记》（1857）的封面和扉页上曾写有作者的官衔。这里可能含有讽刺。

什么原则，而且隐隐带着某种反感和气恼。当时干一切事都出于原则，我们的生活也是依照原则，生怕有什么做得不符合新思想。那时，我们这儿产生了一种做法：强烈的自我谴责与自我揭露，同时所有的人又争先恐后地互相谴责，互相揭露。天哪，当时他们可真能胡说八道哇！而且大多是真心诚意的。其中当然也有些工业家，确有最真诚的人，糊里糊涂地发出真情，有一次，一位真诚的先生晚上与另一位真诚的先生在一起，掏出心窝儿讲了自己的坏事，说："你看我是个多大的浑蛋哪！"另一位也极其感动，讲出了自己干的坏事。于是两人说到兴头上，争先恐后地编造自己的谣言，好像是在自夸一样。他们相互讲了许多恶心自己的话，第二天几乎都不好意思见面了，互相躲着。我们也有过拜伦式的人物，他们大多闲待着，甚至不诅咒任何东西，有时只是懒洋洋地咧嘴大笑。他们甚至讥笑拜伦爱生气和大哭，而这对绅士来说是不体面的。他们说不值得生气与诅咒，一切都那么糟糕，手指头也不想动一下，一顿好午餐是最要紧的。他们说这话的时候，我们用心地听着，想在他们关于好饭的意见中看出某种神秘隐微的辛辣讽刺。而那些人在饭店里大吃大喝，不是每天而是每小时都在长胖。其中真有不少满面红光的！一些人讽刺了好饭还不够，走得更远。他们想方设法装满自己的口袋，却让别人的口袋空空如也。许多人后来变成了赌棍。这一切我们看得很起劲，张大嘴，惊讶万分。有什么好说呢？我们相互讲，他们这也是从原则出发，应该享受生活能给予的一切。而当他们在我们眼皮底下偷别人口袋里的手绢时，我们甚至从中发现了某种隐微的拜伦气质，是拜伦主义的继续发展，而这连拜伦还不知道。我们叹着气，遗憾地摇头。我们说："看，绝望会使人变成这样。人是那么善良，满腔正当的愤怒，渴望做事，但却不允许他

做，捆住了他的手脚，他就只好像魔鬼一样大笑，甩着纸牌，从别人口袋里偷手帕。”我们中有许多人从这可耻的状态中走出来，变得那么真诚，那么纯洁！不是许多人，几乎是所有的人，当然除了拜伦式的人物。我们中也有心肠极好的人，说出了热烈而坚定的见解。噢，他们可没抱怨说不让他们说话，不给他们活动的空间，而老板吸干了他们的血汗。其实他们也有抱怨，只是没撒手不管，而是尽力而为。他们还是做了事，多少干成了些事……干得还真不少！他们曾像孩子一样天真善良，一辈子也没理解自己属下的拜伦式人物，直到死时还是天真的受难者。愿他们的灵魂安息！我们这儿又有过魔鬼，真正的魔鬼，是两个。我们至今还是多么喜欢他们哪，多么珍视他们哪！其中一个总是笑着①，他一生都在取笑自己，也取笑我们，我们便跟着他笑，笑得厉害，最后就大哭起来。他领到陆军中尉皮罗戈夫的使命，把小官吏丢失大衣为我们写成了一部可怕的悲剧②。他三言两语就为我们描绘出从梁赞来的中尉的整个人，惟妙惟肖③。他给我们画出了攫取者、富农、掠夺者和各种官员。他只需用手指点他们一下，他们额头上就会落下永久的烙印，让我们再也忘不了他们是什么人，主要是忘不了他们的头衔④。噢，这可是个魔鬼巨人，你们欧洲从来没有过，你们可能也容不下他。另一个魔鬼嘛，这另一个可能是我

---

① 这里是指果戈理。下文的皮罗戈夫是他的小说《涅瓦大街》（1835）中的主人公。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他是永恒的典型之一。

② 指果戈理的小说《外套》（1842）。

③ 指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第7章中对从梁赞来的中尉的简要描绘。

④ 指果戈理的小说《魏》（1835）。

们更喜欢的。他为我们写了多少绝妙的诗篇哪①。他也给纪念册写诗，甚至——波夫先生② 自己也不好开口叫他做留念诗人。他诅咒，他苦闷，是真心地痛苦。他报复，他也原谅。他创作，他也放声大笑，是个大度而可笑的人。他喜欢对睡着的年轻姑娘讲些奇怪的故事，引起她少女的羞涩，给她描画些她不该梦到的奇景，因为她受的是情操高尚的教育③。他给我们讲自己的生活和恋爱经历，仿佛在故弄玄虚地哄骗我们，有时严肃，有时又在取笑我们④。我们的官员们能够背诵他的作品，有时刚从办公厅出来，忽然间所有的人全扮出梅菲斯特⑤的样子。我们有时也不同意他的看法，心情变得沉重，懊恼忧郁，我们好像为什么人惋惜，心里一股无名火。最后他厌倦了我们，他在那里同谁都处不来。他诅咒我们，他讥笑我们就像“被愚弄的儿子朝着败家的父亲苦笑”⑥。于是他离开了我们：

在高加索的峰峦上，
飞过了天堂的被逐者。⑦

我们一直盯着他，但最后他在某个地方死去了，死得毫无目的，任性而为，甚至有些可笑。⑧ 但我们没有笑。那时我们

① 这里指莱蒙托夫。
② 指杜勃罗留波夫，他一向看不起留言式的诗，甚至包括普希金的作品。
③ 指莱蒙托夫的《写给孩子们的童话》(1840)。
④ 指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
⑤ 歌德的《浮士德》中的魔鬼。
⑥ 引自莱蒙托夫《咏怀》(1838) 一诗。
⑦ 引自莱蒙托夫的诗作《恶魔》。
⑧ 指莱蒙托夫 1841 年于决斗中身亡。此事直至 1858 年一直被禁止公开发布。

根本顾不上笑。现在又当别论。现在上帝赐给我们有益的公开性，我们突然快活起来。我们不知怎的突然明白，这一切都是魔法，我们早早地给自己身上着了魔力，我们犯不上诅咒自己，犯不上绝望，尽管不久前拉曼斯基先生在商场中间告诉我们说：我们还不成熟。天哪，当时我们多么生气呀![①] 波戈金先生从莫斯科坐邮车马上赶来，气喘吁吁，当众马上就开始安慰我们，说我们完全成熟了。这当然立刻使我们信服了（甚至没费多大力气）[②]。从那时起我们就都非常自豪。我们有谢德林，罗森海姆[③] ……我们还记得谢德林在《俄国导报》上出现的情形。噢，当时人们是多么高兴，多么充满希望![④] 谢德林先生可是选了个好时机，听说杂志一下子增加了许多订户，数都数不清，尽管这可敬的杂志在当时已经开始议论意大利当权者加富尔[⑤]、英国地主和农场等问题。我们多么如饥似渴地读了日沃戈洛特、日弗诺夫斯基上尉、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

---

① 拉曼斯基是金融专家。1859 年 12 月 13 日，在彼得堡涅瓦大街的商场大厅就股份公司工作发表意见说：“要进行公开争论，我们还不成熟。”这话后来广泛传播开来，引起报章的许多讥笑。

② 米·彼·波戈金（1800—1875），俄国历史学家、作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他于 1860 年 3 月在讨论会结束时说：“不管今天的讨论有何学术成果，它至少证明，我们已经成熟，可以进行公开辩论。”

③ 米·帕·罗森海姆（1820—1887），俄国诗人。写过许多讽刺和揭露性的诗歌，故此处将他与谢德林并列。但他的揭露是温和的、自由主义的，因此受到杜勃罗留波夫的讥笑。

④ 指谢德林在《俄国导报》（1856，第 8～12 期）上发表他的作品《外省散记》，该杂志因此大大增加了订户。这个作品得到很高评价，但在艺术方面却没有得到一致的好评。

⑤ 加富尔（1810—1861），意大利复兴运动中温和自由派领袖。曾任撒丁王国首相，意大利统一后（1861），任意大利王国首相。

恶作剧者和天才等等的故事①，他们的出现令我们惊讶。我们要问，他们原来躲在哪里呢？当然，真正的那些日沃戈洛特只是笑笑而已。但最让我们惊讶的是，谢德林先生刚刚离开这北方的巴尔米拉②（按照布尔加林先生的一贯说法：愿他安息!），他笔下马上便出现了阿里努什卡、不幸的人们与他们的来自高山的奶娘、隐居的修道士、老妈妈马夫拉·库兹莫芙娜③，而且他们出现得很特别，很奇怪。好像事情必然如此，你只要一出巴尔米拉，马上就会发现所有这些阿里努什卡，会立即唱起新的调调来，忘却了乔治·桑和《祖国纪事》、帕纳耶夫先生④和其他所有的人。于是有益的公开性就像大海一样漫延开来。罗森海姆的琴声大作，响起格罗梅卡⑤先生浑厚、高昂的嗓音。闪现了米列安特兄弟⑥，冒出了无数的“X”、“Z”⑦，在

① 这里列举的是谢德林的小说《外省散记》（1856）中的各种社会典型。

② 叙利亚东北地区的古城，是沙漠绿洲上的城市，以美丽富饶著称。考古发现它有许多古代文物。法·韦·布尔加林（1780—1859），俄国作家、新闻工作者。从1831年起和尼·伊·格列奇合编《北方蜜蜂》报（1825—1859），该报于19世纪50年代后成为反动报纸。布尔加林还曾写过告发文学家的告密信。他称彼得堡是北方的巴尔米拉。陀思妥耶夫斯基写本文时，他已去世。

③ 这里列举的还是谢德林的《外省散记》中的人物。谢德林是在流放维亚特卡后写出《外省散记》的。

④ 伊·伊·帕纳耶夫（1812—1862），俄国作家、新闻工作者。

⑤ C. C. 格罗梅卡（1823—1877），自由派时评家。曾任宪兵，后揭露警方内幕。晚年再次从政。

⑥ 米列安特兄弟是19世纪60年代的三流政论家。因签名抗议反犹言论而名声大噪。杜勃罗留波夫撰文提及此事，并说兄弟俩是为沽名钓誉才签名。

⑦ 杜勃罗留波夫在一篇文章中说到：有些作品通常署名为“X”或“Z”，还经常不署名，地点也不标出。他说，这些淘气鬼是想愚弄编辑。

报纸和杂志上互相抱怨；出现了诗人、小说家，而且全是揭露性的……有一些诗人、小说家如果没有暴露文学就干脆不会出现。不过，欧洲的先生们，您别以为我们忘了奥斯特洛夫斯基。没有忘，但他的位置不在暴露文学中。我们知道他应在的位置。我们已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相信他的新作品，并知道他作为艺术家已经揣测到了我们早在魅力时代和自我揭露时期梦想的东西，那时我们还在读乞乞科夫[①] 不朽的奇异经历。我们想实现这些梦想和愿望，好像大旱之望云霓。我们甚至害怕说出我们想要什么。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却不怕……不过我们以后再谈奥斯特洛夫斯基。现在不打算谈他，只想说说有益的公开性。不过，尊贵的外国人哪，你们别以为我们害怕有益的公开性，别以为我们刚一实行就害怕了，想躲着它。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别相信《祖国纪事》的话，他们是把公开性与丑闻文学混为一谈了[②]。这只证明我们有很多先生刮破了皮肤，稍一吹风就疼得不行。我们还有许多先生爱读别人的故事，却害怕别人也读他的故事。不，我们喜欢公开性，像呵护新生婴儿那样对待它。我们喜欢这小魔怪，他刚刚长出坚固而健康的小牙。他有时咬得不恰当，他还不会咬人，常常是不知道该咬谁。我们笑他的淘气，笑他孩子气的过失，又笑他又爱他。难怪嘛，是个孩子，可以原谅！真是罪过呀，我们甚至跟着他，不怕“以嘲笑得罪了”米列安特兄弟，这两位可敬而无辜的先生在全俄可是声名突然大振……不，我们不怕公开性，我们没有为此手足无措。这是健康的产物，是青春的乳汁，是年轻却经验不足的力量。但它健康茁壮，如泉喷涌……眼前一

① 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主人公。

② 这里指杜勃罗留波夫在其《恶魔》（1859）一诗中说的话。

片好兆头！……

Ⅳ

不过，我们谈什么公开性呢！历来在任何社会里都有所谓明智的平庸者，争着名列前茅。这些明智者非常自爱，他们以极端鄙视的目光和蛮横粗野的态度对待一切没有名气的普通人。首先是他们向每位革新者扔石头。他们反对还没有为全社会认识的新思想，表现得非常狠毒，非常愚钝。革新思想得到社会多数的承认之后，他们虽然原来反对过，这会儿却又大喊大叫，狂热而笨拙地追随这一思想。当然，他们最终会理解新思想，但总比别人慢，而且理解也嫌粗糙，多受局限，又很迟钝。他们无论如何想不到，既然这思想是正确的，它就一定会发展，既然发展，逐渐便得为另一个思想让路，后者来源于它，又补充它，已经是符合新一代人的新要求了。但明智的平庸者却不理解新需要，而对于新一代人，那他们总是敌视而且看不起的。这是他们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些明智的平庸者中总有很多工业家，一向爱用时髦的话炫耀。他们会把任何的新思想都庸俗化，变成一种时髦的词句。他们无论接触到什么，都把它弄得庸俗不堪。在他们嘴里任何生动的思想都会变得死气沉沉，等提出这一新思想并受到他们攻击的天才过世，他们会在第二天就因这新思想而首先获奖。他们中有的愚笨之极，竟然以为天才什么都没做，一切都是他们做的。他们自爱达到了可怕的程度。我们已经说过，他们非常迟钝笨拙，尽管在人们看来很聪明，他们靠的就是说些尖刻激昂的话，好走极端，不理解一种思想包含什么意思，反映什么精神，因此即使真诚相信一种思想时也是在帮倒忙。比如思想家和慈善家之间出现争论，是妇女问题，如改善她们在社会中的处境，使妇女的权利

与男人平等，关于丈夫的专制，等等。明智派一定会这样理解：应该立刻解除婚姻；关键是立刻。这还不够，任何女人不仅能够，而且应该背叛自己的丈夫，认为这才是整个思想的真正道德含义。当社会处在某种匆促忙乱的过渡时期，分裂为两种意见，那时看看这些先生，就确实可笑了。他们不知道该站到哪一边，却往往被视为泰斗、权威，必须说出自己的见解。他们怎么办呢？经过长时间的摇摆才做出决定，但又总不得要领。这已成了规律。这也是明智的平庸者的一个主要特点。他们不知怎地认准了某一点，便鲁莽从事，十分荒唐，有时在后代眼里成了愚钝的典型。但我们离题了。不只是公开性在我们这个时代遭到攻击，处于同样境遇的，还有识字学文化。而且攻击学文化的人，正是那些我们认为即使不算先进至少也不落后的人，最重要的是他们惊人的理智。我们说惊人，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看没文化的粗人是那么武断而傲慢，自诩最富理智，遇事最讲实际，弄得人们在他们面前连坐都不敢，只想逃到另一个房间去。这样的先生有时一连二十年混在善于思考的先进人群里，也被认为是先进的一员，最后连自己也确信是先进分子。忽然会冒出些非常意外的话，只有女地主科罗博奇卡[①] 在某种场合才说得出来，比如要有人请她解决欧洲的金融危机问题。不过我们扯到了别的问题，现在回到正题上来。我们谈的是文化。

人所共知的事实是，监狱里关的满是识字的普通人。由此马上就得出结论说，不该学识字，这合乎逻辑吗？刀可以割破人，那么不该有刀子，是吗？有人会对我们说：不，不是说

① 果戈理的《死魂灵》中的人物。

"不该有刀子"，只是要把它给那些会用而不致割破的人。[1] 好吧。结果照你们的说法，识字应该变成一种特权。但最好是不是注意一下普通百姓学文化碰到的那些情况，看看能否设法扫清这些阻碍，而不是剥夺整个老百姓的精神食粮。我们承认你们说得对，监狱里确实都是些有文化的普通百姓。但请仔细看看，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基于对监狱生活的多年观察，对此有自己的理解，现在讲给你们听[2]。第一，我们的普通人极少有识字的，所以有文化有时真给人某种强于别人的优越感，使他多些尊严和体面，优于众人，高出周围的人群。普通百姓也并非认为识字的人就比自己在某方面强，不是这样，他只不过承认识字的人比自己有才能，有专长，在众多日常琐事中比自己情况好些，总之认为有文化对生活有些好处。有文化的人，很难用一纸空文就骗得了，有些事也不易使他上当。而另一方面，有文化的人容易不由自主地认为自己超出周围没文化、没受教育的人。当然，或多或少总要好些。若是自认为高人一等，那他已经是不完全冷静地看待周围一起生活的人了。这样他自然产生一种想法，觉得他已不应当像其他没文化的人一样受人蔑视了。"他们没文化，而我们是有文化的人。"他老是想一有机会就显出与众不同。别人几乎总是对他存有某种敬意，有时不易察觉，而有时是非常强烈的，尤其如果他举止得当，也就是非常体面，善于言辞，又能夸张，带些学究气，别人都在说话时他会轻蔑地沉默，等所有的人停下来不知说什么时，他才开口。总之，举止要像我们那些聪明人与思想家、先

---

① 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同人争论。后者认为普通老百姓识字是有害处的，并以"刀与斧头"作比喻。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是直接以自己在监狱的观察和体验来反驳对方。在他的《死屋手记》中也谈到此事。

进分子、实干家以及一些文坛健将。也就是要像你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些人。这里同样是那么幼稚，同样是急不可待的装腔作势。简言之，一切社会阶层莫不如此，只是每个阶层各有特色罢了。要表现自己，突出自己，在人群中冒尖，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自然规律。这是个人的权利，个人的本质和生存法则。在不发达的粗野社会中个人的这种本质表现得相当粗鲁甚至野蛮，而在发达的社会里表现得符合道德和人道，每个人都自觉地、完全自主地服从于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另一方面，社会本身也不断关注尽可能少地损害每一个人的利益。也就是说，基础是同一个，差别只在于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利。看一看分裂教派中那些所谓饱读经书者，他们对同派信徒有多么强大的专制力量啊！① 甚至社会本身也有一种本能的需要：从大众中推出某个特殊人物，树立他为超越传统与通则的特例，承认这个人有某种非凡的东西，对他顶礼膜拜。这样就出现了伊万·雅科夫列维奇、马尔富沙之类的人②。现在举个完全不同的例子。一个地主家的仆人，虽然比起种庄稼的农民来说社会地位要低得多，但他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有燕尾服，扎着白色的侍者领带，戴着仆人手套，因此便可以鄙视农夫了。而且不能以为只是粗俗的人民才有这低级可恶的特点，也就是说命运有些变化就疏远自己的人，藐视他们。这确实是一个可恶的特点，但在这种事上没有人可以责备。仆人如果由于无知，认为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讲分裂派是基于他亲自的观感（见《死屋手记》），所谓能读“经书”，当然是指宗教的经书。在他看来，教会分裂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表明民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

② 两人都是当时在莫斯科广为人知的善于预卜的先知者，报章上经常提及。

穿上德式衣服就有了特权，并不算什么错误。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他能直接与老爷、与上层人接触；他像猴子一样学他们的举止、派头，衣着使他脱离了原来的环境……这样一来，识字有文化因为在人民中罕见，也就认为是与众不同的一种特权，有文化的人往往看不起没文化的。他想炫耀自己。他变得自视甚高，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成了某种专制者。他有时会觉得，不能像对待别的没文化的人那样对待他。他变得不耐烦，说话粗暴无礼。别人都能忍受的东西他羞于忍受，尤其当有旁人在场时。他很傲慢。傲慢引发了轻浮，轻浮又带来夜郎自大。有时他对自己期望过高，不肯量力而行，因而便突然垮掉，有时甚至完全是不小心造成的。在这种危急时刻，被他傲视的自己人看着他，等着他如何表现。有时他果真一显身手……于是就进了监狱。当然，我们说的不是所有的有文化的人。我们只是抽象地讲。若以为百姓一学了文化就会进监狱，也太可笑了。我们只是想说明：有点文化就像有了种特权，由此是如何产生了傲慢自大，不再尊重自己的阶层和自己的地位，尤其当处境并不很好的时候。我们是从理论上说的，可惜文章的篇幅不允许我们举更多的例子来说明，事实上这是怎样发生的，怎样发展，结局又如何。再重复一遍，我们不是指所有的有文化的人；关进监狱的只是那些本性决定了在某种情况下会走上这条路的人，也就是天生固执、火暴、神经质、易冲动的人。正是因为我们这里有文化近似于特权，而特权的弊端对他们起了作用。

有人会问我们："这说明什么？按照你们的说法，文化是有害的，我们的普通百姓还没成熟到可以学文化？"

"正好相反，"我们回答说，"别把知识当做一种特权，一种特例。消除这种特殊性吧。把文化尽可能地变成所有的人的财富，那它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使任何人变得傲慢自大。对谁

也骄傲不起来，大家都有文化。因此，要想消除识字的不良后果，就要尽快地普及文化，这就是良药。再说，反对教育的先生们，你们的那套办法（即排斥学文化）不仅达不到目的，甚至是适得其反。请想想看：你们排斥学文化却永远不能消灭文化。政府会首先反对你们的狂热努力，会保护人民不受你们的慈善之害。因而人民中总还会有识字的人，而既然有便会塞满监狱。所以你们不能治好任何人，什么目的都达不到。这还不够，进监狱的会更多，因为有文化的人越少，文化就越显得像是特权。还有一点，你们不得不同意：识字是受教育的第一步，没有这第一步，怎么实现教育呢？我们总不能当真以为你们故意让人民愚昧无知一身罪恶吧。总之一句话，不能以为你们是毁灭和腐蚀人民的灵魂。莫非这也包括在你们的设想之中吗？是的，的确如此！没有比办公室里的慈善家更固执、更任性、更坏事的人了！不过够了。我们自己则完全相信，念书识字会从精神上使人民变好，给他尊严感，而这会消除许多劣根性与坏习惯，甚至使之再不发生。一切取决于条件，世上一切都随条件而变。只要社会上看得见直接而迫切的需要，只要这被人初步认识到,它便立即会找到满足自己的办法。与此相反，如果群众丝毫没意识到某种改善的需要,那么任何真正的改善都不会为群众接受,却会被看做是一种压迫。识字也是如此。人民已经成熟了,人民希望有文化,在寻找文化,因此文化应当普及,不管慈善家怎样努力,它一定会普及。看看周日学校① 吧。孩子们争着来上学，有时甚至是背着自己的主人。家长们自己

① 指俄国自1859年起在各地出现的文化学校。在这些学校听课的主要是士兵和工人，免收学费。任课也是无偿的，任教者有大学生、军官、官吏、作家等。

领孩子到老师这儿来。是啊，尽管在我国，人们早就开始研究人民，我们许多文学家也把自己的时间与才智都花在这上面，可迄今我们对人民了解得还是不够好。我们相信，十年、十二年前，当时的许多先进分子不会想到，人民会自发建立戒酒协会，争着上周日学校。我们说这些是认真的，因为有些人可能把我们的意见当做笑谈。但我们的文明社会最终会理解人民的，也就是理解这个不久前我们一位诗人称之为猜不透的斯芬克斯[①]。文明社会会理解人民的根基，并深入其中。文明社会已认识到，这对我们未来的发展和进步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文明社会认识到，它自己要迈出第一步，它最终会明白应如何迈出这第一步。"

V

因此，现在一切都决定于第一步，决定于想好怎样走这第一步，怎样说出这第一番话，让人民听见我们的声音，朝我们转过来耳朵和流露着不信任的脸。当然也会有非常多的先生听了我们的话哈哈大笑。

怎么回答他们呢？我们自己知道，这样的先生比比皆是，不过他们同我们毫无瓜葛。倒是有人称我们，也就是我们的杂志，准备主动承担责任，使文明与人民的根基结合起来。我们认为这说法最多不过是个可爱的玩笑。不是哪一个人能讲得出这尚未为人知的话，能猜得透整个这个谜。我们在杂志的宗旨中只说出了将指导我们的主要思想。我们将和所有的人一起来寻找谜底。我们不过是不倦地重复和证明一点：应该去解谜，

---

① 指亚·伊·赫尔岑。这是他在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第4部，第30章《不是我们的人》——中译本译为《对立面》）中说到的。

我们会关注、分析、讨论、争辩，把我们的结果告诉读者。这就是我们未来要做的全部工作。说话也是工作，在我们这里尤其如此。合乎时宜的话是有用处的，因此我们也希望自己的话是有用的。我们的杂志是给受过教育的人读的，因为迄今为止总得靠他们说出第一句话，靠他们在任何事中迈出第一步。我们知道，迄今还没有做到让人民也能读懂。如果能有点可读的东西就好了，但现有的都是人民无法读的。我们真诚欢迎扫除这一障碍的一切尝试。但重说一遍，我们根本没有考虑使杂志直接供人民阅读。但解释已经够了，回到我们的正题上来。我们之所以认为教育阶层应该迈出新事业的第一步，是因为教育阶层首先离开了人民性。接近人民需要付出很多努力，这一点我们能感觉到，虽然还不太清楚到底需做哪些努力。关键在于消除误解。任何误解要消除，都得靠直爽、坦率、爱心。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这个阶层的利益在于人民的利益，而人民的利益也在于我们的利益。这样的认识如果能成为共识，就会保证事业的稳固发展。即使没有这种认识，那也有事业开始的迹象，目前有这也足够了。人可能犯错误。我们懂得错误不等于欺诈。问题不在于错误，接近人民的人哪怕犯上千个错误也不妨。主要在于使人民看到、意识到这种愿望，让他们理解它、重视它，这就是应该做的事。正确的事业不会因为犯几个错误就失败。至少，作为事业基础的那个思想是牢固不变的。一步不成功，还有第二步。一切在于动机的真实和坦率，在于爱心。爱心是愿望的基础，是它稳固的前提。爱可夺城。除了靠爱心，谁也做不成什么，除非是用暴力。爱心比一切都更好理解，胜似任何技巧和外交辞令。爱心能马上被人看出、分辨出来。人民是善解人意的，是知恩图报的。他知道谁爱他。在人民的记忆中，只留下那些他喜爱的人。君主亲自给我们做出了

接近人民的榜样，是他消除了最后的实际障碍，在整个俄国一千年的历史中，没有比他的事业更崇高、更神圣的了。尽管接连一个半世纪[1] 我们弄得人民不太信任我们，但想一想一则寓言故事，行路人身上的衣服不是被风雨吹掉，而是被太阳掀掉的[2]。世上的许多不幸，都是因为误解和言未尽意引起的。言不尽意是有害的，向来如此。难道一个阶层用得着害怕与另一阶层坦诚相待吗？有什么可怕的呢？人民一定会珍爱教育阶层里自己的老师，一定会视我们为真正的朋友，不是把我们看做雇工，而是当成牧师来尊敬。我们则应该争取到他们的尊重。那时会爆发出多么伟大的力量啊！一切都会成长、成熟、更新！我们的观点与所谓的定论都要发生多大的变化呀！到那时，我们那些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处的“天才人物”，我们那些慵懒的拜伦们，该到哪里去呢？拜伦们现在占了太多的位置，多半因为闲暇无事又发福了许多！当然你们没有白活，拜伦先生们也没有白白长胖。你们生活而且反抗过，你们表示过自己的愿望……我们看到你们悲伤的样子问道：“他们为什么悲伤呢？他们想要什么？在寻找什么？”所以，你们唤起了我们的好奇心，好奇心驱使我们寻找答案，也找到了答案。因此，你们起到了反面作用，能生活在我们中间就有了作用。但现在你们用不着悲伤了，你们做点儿什么事吧。你们总是说无事可做。你们试试看，现在该能找到了吧？教会一个孩子识字，这不就是你们能做的吗。但不，你们背过身去不愿做……“这对我们算是什么事业！”你们冷笑着说，“我们胸中聚积着巨人的力量。我们想要而且能够搬动大山；我们心中涌动着对整个人

---

① 指彼得大帝改革后至当时。

② 指伊索寓言《北风和太阳》，题旨是：说服往往比压服更有效。

类纯洁的爱。我们想一下子拥抱全人类。我们想干与我们力量相称的事情。我们想做的是这个，因此才闲得要死。总不能把大步换成小碎步吧，巨人怎么该教小孩儿识字呢?”先生们，这不错。但如果你们什么都不做，至死也将一事无成，而这不管怎么说是为第一步做出了点滴的努力。即使只是一个原子，但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你们知道吗?你们想做大事，如果想要，我们可以给你们一个超出你们期望的大事。跟这事比起来，甚至移山都更轻松些。这就是：为了公众的利益牺牲一下自己的伟大精神，一步别走一俄里，而是走一俄寸。你们要想透一点：如果不能走得更远，那么一俄寸也比一点儿不走要好。请牺牲一切吧,牺牲你们那伟大的天性、伟大的思想,要记住这一切都是为了共同的利益,屈尊去教一个孩子吧。这是了不起的牺牲。不仅如此,你们是聪明人、有才华的人,如果能牺牲自己,屈尊干点儿普通小事,很可能从第一步开始找到别的事情做,更大些的事,然后会越来越大。凡事关键在开头,开始干吧。好吗?……不过我们也许说错了，你们无力干这个事。你们大概可以牺牲性命，却完不成这样的事。

当然，我们尽的力只不过占十分之一，人民自己会补足其余的十分之九。有人要问：你们搞这个教育做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你们是想转向人民的根基，给他们送去教育，也就是送去连你们自己都承认不适合我们的欧洲文明?你们是想让人民欧化吗?我们的回答是：怎么可能让欧洲思想在完全陌生的土壤上产生与欧洲一样的结果呢?我们这里一切都十分特别，一切方面都不同于欧洲，无论是内政、外交以及其他。所以在我们的土壤上不可能结出欧洲的果实。重说一遍：适合我们的东西会保留下来，不适合的会自然消失。难道可能把我们的人民变成德国人吗?与人民相比，我们是微不足道的少数。比起

广大的人民，我们自己有的力量与手段少得多。我们也去过德国人那里，整整一个半世纪里我们并没屈从欧洲的影响，没有变成德国人。这就说明，我们尽管人数不多，力量有限，尽管对人民来说我们的地位相当特殊，但我们身上还是保留了俄国人的伟大精神基础——人类共有的人道思想和宽容一切的精神，没有失去它们。这些在我们身上发挥了作用，我们明白了：我们不能变成德国人，我们自己想回到民族的根基上。与欧洲各国人民的巨大作为相比，我们为自己的无所事事、不善进取而羞愧，我们懂得了，在欧洲我们无事可做。你们别担心，科学不会成为我们人民的包袱，科学只会扩充人民的力量，而且人民也将对科学做出自己的贡献。科学迄今在我们这里没能生根，只不过是尊贵的温室花朵。我们的社会没有做出任何的科学工作，无论是理论的还是实际的工作，因为这个社会与祖国的根基分了家，而自己本身又很薄弱。只有国家出钱修桥筑路，而且大半也是靠外来的工程师们。

但科学最终也是要生根的。这一切的实现，可能要在我们都离开这世上之后。我们甚至猜不出那时会是怎样的情况，但我们知道情况将会不错。我们这一代则有幸要迈出第一步，说出第一句话。新思想已经不止一次以俄语表述出来。我们开始研究这新思想在过去的种种表达，并到过去的文学现象中寻找至今我们还没注意、但完全能证实这一思想的事实。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普希金的巨大意义，尽管最近有两本杂志发表了关于普希金的奇怪的文学见解①。我们正是在普希金身上看见了能

① 指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尼基京的诗》(1860) 和斯·谢·杜德什金的文章《普希金——人民的诗人》(1860)。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意他们关于普希金创作的意义的见解。

证实我们全部思想的东西。他在俄国发展史上，意义是深远巨大的。对所有的俄国人，他都以充分的艺术力量生动地说明：什么是俄国精神，这种精神以全部力量在追求什么，俄国人的理想是怎样的。普希金的出现是个证明：文明之树已经开花结果，它的果实不是腐烂的，而是金黄硕大的。必须靠结识欧洲人才能了解到的有关我们自己的事实，我们都已知道了。文明能够给我们讲清楚的东西，我们也已弄清楚了。而这种了解最充分最和谐地体现在普希金身上。通过他我们懂得了：俄国人的理想是完整、宽容、普遍人性。透过普希金现象，我们甚至明确了我们自己将来的事业。俄国精神、俄国思想也还不只体现在普希金一个人身上，但在他那里表现得最充分，呈现为一个完整的终结了的事实。

关于普希金，我们想在以后的文章中讲得更详细些，也更有说服力地发挥一下我们的思想。在未来的文章里，我们终于要转向俄国文学，讲讲文学的现状，它对当今社会的意义，还要谈到文学中的某些误会、争论、问题。我们尤其还想谈一个十分奇特的问题，它已经多年使我们的文坛分裂成派别，从而削弱了文学的力量。具体地说就是为艺术而艺术这个著名问题，大家都是知道的。标题都用不着一一列举了。[①] 首先我们得承认，令我们最感惊奇的，是这个问题至今还没让公众彻底厌倦，公众还不反对阅读有关它的长篇大论。不过我们尽量不采用论文的形式来讲自己的意见。

① 这里指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杜勃罗留波夫的《黑暗王国》、《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以及“为艺术而艺术”的拥护者亚·瓦·德鲁日宁、阿·阿·费特、巴·瓦·安宁科夫。

二 ——波夫[①] 先生与艺术问题

我们在本刊的启事中说过，当今我们俄国的评论变得越来越庸俗烦琐。那时我们讲这个话是很难过的。但现在也不想收回。这句话我们深信不疑。俄国最畅销的诸刊物在秋季征订启事中，即在开始征订今年——1861 年杂志的时候，大多表述了相似的意思。起码许多刊物都保证要在新的一年里，给予评论栏以特别的关注，这无疑意味着这一栏目至今不尽如人意。如果他们真能实践许诺，那是做了件好事。我们以为人们不至于因为我们指出评论变得烦琐而责怪我们傲慢自大，不至于责备我们时常以新真理、新思想的先知自居。我们并不想担当这样的角色。我们只知道一点：我们热爱自己的事业，对它满怀热情和虔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评论界许久以来就表现出了某种普遍的冷清。也许只有一个例外，例如《祖国纪事》就不这么认为。它竟然宣称（似乎毫不犹豫，绝无惭愧之感）：别林斯基全部的出色活动（确实可称出色吧），怎么说呢，多少失之表面化（entre nous soit dit[②]）。而俄国评论界真正的作为，重大而具转机性的作为，是从别林斯基离开该刊之日开始的。我们记得，那时（即别林斯基离开该刊时）恰好在《祖国

① 指革命民主主义者、文艺评论家尼·亚·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者的。但他同时又反对强调文学社会功能的革命民主派批评家。其实杜勃罗留波夫并没有忽视文学的艺术。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当时的一些论文中还是肯定杜勃罗留波夫的。

② 法文：这是咱们之间说说。

纪事》上出现了杜德什金先生论冯维辛的文章[1]。请问《祖国纪事》是不是从这篇论文起开创了俄国评论的新纪元呢？不错，在别林斯基之后主持《祖国纪事》评论栏的是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他是大家都熟知都喜爱的诗人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的弟弟[2]。瓦列里安·迈科夫做事热心干练，信心十足，有青年人的朝气。但他未及施展，接手不到一年就去世了。这个优秀的人才，本会大有作为，我们恐怕由此也蒙受了重大损失。可是，瓦·迈科夫一死，在《祖国纪事》称雄的就是杜德什金先生了，所以我们有根据认为这本黄皮杂志是从他开始创立了自己光辉的新纪元。《祖国纪事》自认为有一个特殊的功绩，即在别林斯基之后刊物的评论主要具有了一种历史批评的性质；而别林斯基推倒了权威之后，就去研究乔治·桑（《祖国纪事》的启事里关于乔治·桑的话，可说是绝顶精彩，出现得恰到好处），而对俄国文学的历史方面则只是稍稍触及。但第一，这话是不公道的。倘若真的说公道话，那么别林斯基两页书（他的文集出版现已近结束）上讲出的关于俄国文学历史的内容，要比《祖国纪事》自1848年至今所说的总和还要多。既然论冯维辛一文在《祖国纪事》中被视为这一著名历史研究活动的源头，那么这一研究活动恐怕就该从杜

---

① 斯·谢·杜德什金（1821—1866），文学批评家，是当时纯艺术论者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别林斯基和瓦·尼·迈科夫之后成为《祖国纪事》的主要评论家。他写的论作家丹·伊·冯维辛的著作，在当时得到普遍的好评，别林斯基对它也极为欣赏。

② 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1823—1847），文学评论家、社会学家。自1846年起在《祖国纪事》任编辑，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化身》等做出深刻的分析。许多人认为他可继承别林斯基的事业，但他却过早地于1847年逝世。其兄阿波隆·迈科夫（1821—1897）是著名诗人，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年好友。

德什金先生算起了。诚然，论冯维辛的文章虽然十分枯燥，但还是相当有见地。可继它之后，《祖国纪事》竟是那样索然乏味，至今回忆起那个时期来令人不寒而栗；即使与论冯维辛一文相比，困窘之状也是如此。可是《祖国纪事》自己却称这个时期是自家刊物的光辉时期，甚至是整个俄国文学的光辉时期。它断言此时杂志获得了人民性。我们记起了《祖国纪事》曾经登过一篇文章，讲到扫帚、炉叉、铁锹，讲到它们在俄国古代神话里的作用。作者在文章中提供的材料当然有用，但《祖国纪事》是不是以为有了类似文章就是获得了人民性呢？要是这样，那它的观点和对人民性的理解，可就相当独特了。《祖国纪事》在启事里异常坦率地表现出来的另一个观点，同样是很独特的。那就是：当今社会上一切正确的思想，一切向前的运动，一切有目标的追求，在其所能达到的认识和意义上，全都是《祖国纪事》促成的，都是它的劳动成果。既然它自己开始有些傲视别林斯基，不妨认为它是把这一切辉煌的成绩全归功于自己的近期活动，也就是肇始于论冯维辛和论铁锹的文章，而以去年（1860）4月号一篇论普希金的奇文收尾。应该说《祖国纪事》去年的征订启事，已经属于俄国文学的历史事实①。这则启事是不朽的，它会流芳百世，雄踞史册。我们则把它归于俄国洋相文学和俄国文学中的洋相。

我们扯得离题了。动笔属文时，我们根本没想讲《祖国纪事》和它的启事，不期而然地想到了它，虽然关于去年俄国刊物的评论活动我们是打算发表一些意见的。我们只是说“一些”，因为不准备就全年的评论写出一个全面的总结，那样的

① 对斯·谢·杜德什金论普希金的文章《普希金——人民的诗人》的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读书与识字》一文中与之争论。

著述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个功勋。自然，在那样的总结里，我们也会指出去年评论中某些可喜的现象……尽管我们不拟建树这个功勋，还是感到在此文中不能不就一个问题谈到当代评论界一位最重要的代表。需要坦率地说，几乎在我国的所有评论家中，现在他是人们唯一爱读的人。的确，去年一年各刊物上除三四篇评论文章多少引起些公众的注意外，其余的文字都没留下什么印象。人们只看——波夫一个人的东西，他能够迫使人们读他的文章，单凭这一点就值得特别注意……现在该说说到底是什么事促使我们如今要谈一谈——波夫先生。

在本刊 1 月号里，结束《俄国文学论丛》的引言时，我们曾许诺要论及当代的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我们认为现在最重要的一个文学问题，就是艺术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当代作家分成两个敌对的集团，力量于是便分散了。用不着多费唇舌去论证：任何的歧见相互敌对，都会带来损失。如今事情差不多就发展到了敌视的程度。

分析这一敌视态度及其成因，阐释整个这场争论并发表自己对此的见解，既符合本刊的宗旨，也符合我们向公众承担的责任。不过有言在先：即使我们卷入这场论争，也不想扮演这一争论的终审法官。再说我们没有见过先例，在我们的文学论争中，从来没听说哪一派完全服从了另一派，自愿地口服心服地同意了另一派。在我们这里，任何一场文学争论的结果，或是因为自身失去意义，令大家感到厌烦，于是自己收场；或是一派压倒了另一派，而另一派缄默不语，完全是因为精力耗尽无法支撑，它沉默但并不同意。我们不记得有赞同的情形。如果有也极少见，不值一提。

因之，我们不打算去说和和调解争论各方。这个角色也很

令人不快。不久前，沃斯科博伊尼科夫[1] 认为俄国文学家们相互间争斗太多（当然是文学上的争论），于是他发表了一篇相当可笑的小文《文学家先生们，停止争斗吧!》，结果凡是想关注这篇文章的人，无不责骂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别的看法并不一致，但在这一点上大家是相同的。事情很简单，我们认为当今的艺术问题是个异常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作为一个新刊物，愿意把我们的看法也表述一下：我们如何理解这一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坚持何种立场。所以，我们要直截了当地摆出自己的见解，表明自己的派别，何况已经有人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不过为了说明自己的见解，不能不先解释清楚文学中这场争论的起因何在。要弄清这场争论的现代性质，我们先要分析一下两派的道理。本文的任务正在于此，代表这些观点之一的主要人物，无疑就是——波夫先生，他不断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文章。正因此我们这篇文章题名为《——波夫先生与艺术问题》。

还要说明一点。

有人对我们说，我们自己最近在我国一份公众最喜爱的刊物上也读到，认为俄国文学中不存在派别之争。我们觉得这个杂志是把“派别”一词用在了个人恩怨的含义上，而这与文学本身不应有任何的关系。不言而喻，我们愿尽一切力量相信这个刊物的话，没有派别岂不更好。但派别作为不同的观点，在我们的文学中确实存在。我们这里有阿斯科琴斯基派[2]、切尔

① H. H. 沃斯科博伊尼科夫（1838—1882），政论家，曾在《圣彼得堡新闻》上发表下述文章，引起报刊上的强烈反响。

② 维·伊·阿斯科琴斯基（1813—1879），俄国新闻工作者、作家、历史学家。他深为时人诟病，称之为蒙昧主义者。

诺克尼日尼科夫派①、——波夫派。就连大手笔库兹马·普鲁特科夫本人，严格地说，也得算一个完整独特派别的代表②。一般说，我们这里任何一个刊物总都坚持某种看法。毫无特色的杂志在我们这儿维持不住，都要无声无息地悄然消失。当然，我们这些文学派别的面目总的说并不很清晰，似乎模模糊糊。有的派别，实在无法期望听到它的明确观点；有的派别则只满足于某种暗示；还有的派别发表观点仿佛应人之请，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更有的派别则流于晦涩，艰深费解，一种不知所云的风格，由你怎样理解都行。凭这个当然不好责备人家。不过就艺术问题而言，我们有些杂志的立场是相当突出的，特别在最近一个时期。其中首要的便是在去年刊登出——波夫文章的《现代人》。

开场白之后，我们要进入正题了。

首先我们要声明，我们不坚持现有的任何一种见解，而且要坦率地说，据我们的意见，整个问题至今提法就不正确，原因正是热衷于争论，几乎誓不两立。我们将努力证明这一点。

我们要弄清问题的本质所在：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它的内容是什么？

有些人教导说，艺术自身便是目的，这从它的本质上便可得到解释。因此，艺术是否有益的问题，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根

---

① И. А. 切尔诺克尼日尼科夫，是俄国小说家与批评家亚·瓦·德鲁日宁（1824—1864）的笔名。他是当时俄国纯艺术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② 库兹马·普鲁特科夫，是三位作家合用的文学笔名。这三位作家是A. K. 托尔斯泰（1817—1875），A. M. 热姆丘日尼科夫（1821—1908），B. M. 热姆丘日尼科夫（1830—1884）。陀思妥耶夫斯基很重视、甚至有时模仿库兹马·普鲁特科夫，在自己的作品中常引用他的诗文。

本就不成立。创造作为一切艺术的根本，是人的天性的一种有机的完整的特征；创造是人类精神所不可缺少的东西，单凭这一条它就有权存在和发展。它在人身上合法合理，犹如智力，犹如一切道德品行，恐怕还可说犹如双手双脚，犹如肠胃。它与人不可分割，而同人合成一个整体。当然，智力是有益的，可以讲：缺乏智力很糟糕。从这个意义上说，手和脚对人也是有益的。这样说来，创造于人同样是有益的。

不过，创造作为完整的有机的东西，是由自身发展起来的，不受制于外力，而且要求充分地发挥。因此，任何压迫、控制，任何外来的任务，任何加给它的特殊目的，都是没有道理的，不明智的。倘若限制创造，禁止人的创作要求和艺术需求，比方说不让他抒发某种感受，倘若日出、海涛之类自然现象唤起人的创造活动时却加以禁止，那么这一切确是对人的精神、对其活动和发展施加了荒唐可笑、毫无道理的强制。

这是一派人的观点，他们是艺术自由与完全独立的捍卫者。

功利主义者（这是另一派，主张艺术须以直接而实际的用途，甚至环境所要求的具体益处，来服务于人们）说：“自然，这一切都是荒唐的压迫。自然，任何这类的压迫，没有合理的目的而完全出于随心所欲，都是野蛮可恨的愚蠢行为。不过，您也不能不承认（他们会补充说），假设突然打起仗来，而您正好是交战者之一，但您不去帮助自己人去战斗，却以演员的天赋突发奇想，欣赏起战斗的场面。您扔下武器，取出纸笔，开始画一幅战场图。您的行为对头吗？当然，您完全有权利听从您的灵感，但此时此刻您的艺术活动是否理智呢？

“（他们总结说）总之一句话，我们不否定您关于创造须有自由发展的理论，不过这个自由至少应是合乎理性的。”

帕纳耶夫[1] 在他那饶有兴味的文学回忆录中，一开头（《现代人》，1861 年，第 1 期）就讲到他年轻时，有一群彼得堡文学家坚信：文学家、诗人、画家、演员不应该干日常现实的事，比如政治，比如所在社会的内在生活，甚至还包括什么最重要的全民问题。他们唯一该干的，就是崇高的艺术。从事艺术之外的任何事，无异于侮辱他的人格，贬低他，取笑他。按照这种理论，应该心甘情愿地脱离人们赖以自立和生存的土壤，追随自然远遁云霄，在那里化作轻风，因为已经别无作为。这一理论能够直接引出这样的结果：1812 年，当整个俄罗斯全力拯救祖国的时候[2]，唯有文学家和诗人最好是去研究希腊的本体论。帕纳耶夫讲的那一群文学家、艺术家，当时果真如此，不过问各种社会问题；一个最重要的成员那时只知埋头于意大利艺术家的生活，撰写剧本[3]。

再举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回到了 18 世纪，正是里斯本地震的那一天[4]。城市里半数居民遇难，房屋倒塌下陷，幸存者或失去了财产，或失去了家人。人们挤在街道上，处于惊愕绝望之中。那时在

---

① 伊·伊·帕纳耶夫（1812—1862），俄国作家。

② 指俄国抗击拿破仑军队的入侵。

③ 这里指的是俄国作家、剧作家涅·瓦·库科利尼克（1809—1868）的一些剧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穷人》、《涅托奇卡·涅兹瓦诺瓦》等作品中都曾讥笑过这位作家。

④ 里斯本地震发生在 1755 年 11 月 1 日。法国作家伏尔泰曾把这悲剧性事件写成长诗《关于里斯本的毁灭，或“一切都好”的定理的考验》（1756），用以反驳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莱布尼茨所谓现有世界是由形成先定和谐的无数个精神活动实体——单子组成的，现有的世界是作为“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最完美的世界”而由神创造的这些理论。伏尔泰这首长诗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产生强烈影响，这最明显地表现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卡拉马佐夫的叛逆上。

里斯本住着一位著名的葡萄牙诗人[1]。翌日清晨出刊了一期里斯本的《墨丘利》（那时一直在出版《墨丘利》[2]）。此时此刻面世的一期杂志，在不幸的里斯本居民中甚至引起了某种好奇心，虽说那时他们根本顾不上什么杂志。他们以为这期杂志是专为报道一些消息才出的，要讲一点儿死亡和失踪的情况。可是出乎意料，在显著位置大家看到了类似下面的一首诗：

悄悄的耳语，怯怯的呼吸
　　夜莺的啭啼，
银色的涟漪和轻轻的摇曳，
　　入梦的小溪，

夜的清光，夜的幽暗，
　　夜色漫无边，
可爱的脸庞，一个接一个
　　神奇的幻变，

笼烟的云中，玫瑰的绯红，
　　琥珀的反光，

① 这里所谓的葡萄牙诗人，当是一种假设，因为下文引用的是俄国诗人阿·阿·费特的诗《悄悄的耳语，怯怯的呼吸……》(1850)。顾蕴璞先生译。

② 罗马神话中的商业神，旅行者的保护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赫耳墨斯。在现代诗歌中，赫耳墨斯-墨丘利，往往成为"报信者"、"信使"的同义词。有许多刊物以它命名。最著名的报纸是《法国墨丘利》，创刊于1672年，出版直至19世纪初。在俄国出版过《圣彼得堡墨丘利》（1793）以及《莫斯科墨丘利》，后者为杂志，是1803年由П. И. 马卡罗夫等创办的。

莹莹的泪珠，频频的亲吻，
　　霞光哟霞光！……[1]

不仅如此，诗后还好像写后记似的用散文体附上一条人所共知的诗人成规：谁若不敢从四层上跳楼自杀，谁就不是个诗人。（为了什么理由要这么做，我至今没弄明白，就算当诗人必须如此吧，我不想辩论。）我不能准确地断定里斯本人会如何看待这期《墨丘利》。可我觉得他们会立刻在广场上当众绞死自己的这位著名诗人。倒不因为他这首诗连一个动词都没有用，而是因为昨天夜里他们听到的不是夜莺的啼啭，却是地下的震撼，是全城的晃动。这一切使可怜的里斯本人已无观赏"玫瑰红"或"琥珀"的兴致，所以诗人在此刻歌唱这类可笑的东西，简直是侮辱，是毫无人性。自然，他们在绞死自己的诗人（这也是无人性的行为）之后，一定会跑去求教老师邦葛罗斯[2]。邦葛罗斯马上不费吹灰之力使人们相信，他们遭遇了地陷是件很好的事，既然已经受了震，那一切定会好起来。而面对这个邦葛罗斯，谁也不会因此去把他撕个粉碎，相反却要给他养老金，宣布他为人类的朋友。世上的事不是一直就如此吗！

再有一点，即使里斯本人把自己喜爱的诗人处死，而令他们所有的人生气的那首诗（尽管只写了玫瑰红和琥珀），在艺

---

① 这是俄国诗人阿·阿·费特（1820—1892）的一首名诗，作于1850年，时人视为"纯艺术派"的自白。

② 法国作家伏尔泰（1694—1778）的哲理小说《老实人》（1759）中的人物，是主人公老实人的老师，哲学家。他是乐观主义者，认为人世一切皆善。听从他的教训的老实人到处碰壁，最后他勉强过了一种普通人的平和生活。伏尔泰以此反驳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盲目的乐观主义以及天意论者所宣扬的"一切皆善"的说教。

术的完美上可说是上乘之作。而且就是处死了诗人，过三十年五十年还会在广场上给他竖纪念碑，为了他的全部精彩的诗作，也为了他这里的“玫瑰红”。原来，在里斯本地震的日子里，艺术是没有罪过的。人们责难诗人的那些作品，作为诗歌和语言的完美典范，倒可能给里斯本人带来很大益处，之后唤起他们的欢悦和美感，并在年轻一代的心中洒下善良的露珠。所以说，错不在艺术，而是诗人在不恰当的时刻滥用了艺术。他是在死者棺木旁边高歌曼舞……他这样做当然十分糟糕而且极其愚蠢，这里罪过还在他而不在艺术。

总之，功利主义者要求艺术能直接地迅速地适应环境而带来利益，要服从于环境的需求。如果此时社会在解决一个什么问题，那么艺术（照某些功利主义者的理论）必须以解决这一问题为己任，不能设定别的目标。这种关于利益的考虑，如果不作为要求而只作为愿望，我们觉得甚至是可嘉的，尽管我们清楚类似的考虑并非全然正确。如果整个社会忙于解决某一重要的内部问题，自然也希望社会上一切力量能同心协力去达到共同的目标，因之也希望艺术接受这种看法，同样服务于共同的利益。又比如某一社会处于毁灭的边缘，凡有头脑、良心、意志的人都意识到自己负有人和公民的责任，都关注这个问题，关注这个共同事业。在这种时刻，难道唯独诗人和文学家不需要有头脑、有良心、有爱国心，不需要同情公共事业吗？难道真像人们说的，诗神行事“受不了毛毛躁躁”① 吗？

即或如此，如果诗人们能不高踞云霄俯视常人，岂不更好

① 这是普希金的小诗《十月十九日》(1825) 中的一句诗，常被人引用来替“为艺术而艺术”辩护。杜勃罗留波夫在《伊凡·尼基丁的诗》一文中就引用过这句诗以批评纯艺术论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与他辩论。

吗？因为希腊本体论虽是绝妙的事物，有时简直用得不是地方，倒不如来点儿有用的、于事有所裨益的东西。而艺术却可于事有很大的协助，因为它自身蕴涵很多手段和巨大力量。我们再重复一遍，这些当然只是可希望而不可强求，原因至少有一条：强求时往往就会强迫别人，可是艺术的第一个规律便是要有灵感和创作自由。从古至今，凡是强求的勉强做出的作品无一成功，有百害而无一利。“为艺术而艺术”的卫道士所以不满功利主义者，实际上正是因为功利主义给艺术规定特定的目标，从而破坏了艺术本身，危及它的自由。而且既然如此轻而易举地破坏了艺术，说明并不看重艺术，甚至也就不理解艺术的效用何在。他们关心的首先就是效益。因此艺术的卫道士说，倘若功利主义者懂得艺术对整个人类具有多么伟大的效益，他们就会对艺术更为重视而不至于如此不尊重了。艺术的捍卫者继续说，就算单从功利主义的观点看艺术，即从有无益处的观点看艺术吧，可是至今人们还不够详尽地了解艺术对人类发生效益的正常的历史过程是怎样的。比如说《伊利亚特》或望楼上的阿波罗①，这些看起来在我们今天毫无需要的东西，在历史上直到如今给全人类带来的全部益处，是很难加以衡量的。设想有那么个人，还在少年时代，当“生活万象一派新奇”② 的时候，望了一眼望楼上的阿波罗，于是天神无限美好的形象便深深刻在他心中。这事看来很普通，欣赏一尊美的雕像，只有两分钟便走开了。可这不同于欣赏女人华丽的服

① 雕像，原为古希腊雕塑家列奥哈尼斯（公元前 4 世纪中叶）的创作，现在梵蒂冈保存的是大理石摹制品。原作已毁。

② 引自普希金《恶魔》（1823）一诗。

饰。“啊，这石雕可是一尊天神哪!”[1] 您无论如何对此不屑一顾[2]，却任何时候也不能抹杀他这神圣的形象。人们曾尝试过要抹去他，可是做不到。所以说少年的印象可能是很强烈的，令人震惊战栗。有可能（谁说得准呢）由于这高度的美感，由于这震撼，人的内心会发生某种变化；会出现分子的移动，产生一种电流，瞬间便改变了物质的原貌，把一块普通的铁块变为磁石。自然，世上的印象千千万万，可这个印象绝非寻常，这是天神的印象，所以才终生难忘。可谁又知道呢，说不定过二三十年，这少年在某一伟大社会事件里成为一个进步人物，崭露头角，而促使他如此行动的诸多原因之一，也许他自己没意识到，正是二十年前望楼上的阿波罗像留给他的印象。读者会不以为然地笑了。的确，这很像是梦呓。但第一，您虽然有些道理，但对这类事却毫无了解；或许今后您会了解（我们相信科学），目前还不行。第二，存在历史的见证，有某些历史事实，说明我们的理想并非全是无稽之谈。请问，谁能想到高乃依[3] 和拉辛[4]在全民族如此奇特而关键的历史时刻会产生如此影响呢？起初似乎难以想象，这两位头脑简单的老人在这个时代能干得了什么。原来，心灵是可以不朽的。因此，如果事先给艺术规定了目的，明确它应该具有什么具体的效益，那就会大错特错，结果不能带来任何益处而只会有害，是直接反对自己，因为功利主义者正要求有益而无害。又由于艺术首先要

---

① 引自普希金《诗人与群氓》(1828) 一诗。

② 这是依据普希金的《致诗人》一诗 (1830) 表示同样的反感。

③④ 高乃依 (1606—1684)，拉辛 (1639—1699)，均为法国剧作家，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代表人物。在当时法国正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而古典主义正好服从于国家政权，服务于建立专制的政治路线，对这政治路线起了很大的作用。

求完全的自由，而自由离不开安宁（任何的彷徨不安都已不是自由），因此艺术活动应该是宁静而泰然自若，不慌不忙，不左顾右盼，有着自己的目标，而且相信自己的一切活动将来都会对人类有所裨益。

这便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拥护者，对自己的论敌功利主义者所说的话。

这一切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争论由来已久，但有一点是新的：两派的魁首们说的是一套，事实上做的却完全相反。人们吵昏了脑袋。这里不必多说，只举一个例子。

暴露文学引起纯艺术论拥护者的愤怒。从一方面说，这有些道理，大部分暴露文学的作品写得很糟，于事有害而无补。如果说对这类作品的抨击部分地颇有见地，那就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可糟糕的是那些抨击不是指这个方面和这个意思。愤怒之极，连谢德林先生本人也受到怪罪[1]，他可是暴露文学的鼻祖，尽管七等文官谢德林先生在自己许多的暴露作品中表现出是位真正的艺术家。不仅如此，整个暴露性艺术受到攻击，似乎暴露性作家中根本不可能出现真正的艺术家、天才的作家和诗人。他们的专业只是揭露。这样一来，纯艺术论拥护者从仇视论敌出发，却走上了反对自己的道路，反对自己的原则，即取消了选择灵感的自由。他们本来应该是捍卫这种自由的。

从另一方面说，功利主义者虽然没有明显地攻击艺术性，却完全不承认它的必要性。"只要看得见思想，只要看得见写书的目的，也就足够了。至于艺术性，那是空的，很次要的，几乎是无用的。"功利主义者如是想。可是没有艺术性的东西不管以何种面目出现，从来都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不仅如此，

---

① 此处可能指斯拉夫派一些人对谢德林创作的批评。

它弊大于利。所以，功利主义者既不承认艺术性，就比任何什么都更有害，从而也就是自己直接反对自己，因为他们寻找的不是害处而是效益。

有人要对我们说，这些全是我们的杜撰，功利主义者从不反对艺术性。恰好相反，他们不仅反对艺术性，我们发现，他们对主要以艺术性取胜的文学作品甚至特别地痛骂为快。例如，他们讨厌普希金，把他的灵感全称之为猎奇、做作、花腔、游戏；把他的诗作贬之为纪念册上的小玩意儿。他们甚至认为普希金在我国文学中的出现都不大合法。我们绝非夸张。所有这些在——波夫先生去年的几篇评论文章中表现得几乎明明白白。还可以看出——波夫先生讲到当代俄国作家中艺术性最高的屠格涅夫先生，也开始流露出某种特别的不合心意[1]。在《俄国平民的特征》一文(《现代人》，1860 年，第 9 期)中，他在分析马尔科·沃夫乔克[2] 的作品时几乎是直截了当地说，他视艺术性为零，分文不值，表现出不能理解艺术性的功效何在。——波夫先生分析马尔科·沃夫乔克的一部中篇小说时，干脆明说：作者写得没有艺术性，紧接着又说：作者通过这部小说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即完全证明了这一事实存在于俄国的平民之中。而实际上这一事实（它十分重要）在小说中不仅没得到证实，甚至完全令人怀疑，原因正在于作者缺乏艺术性，他用来证实主题思想的小说人物，在他笔下失去了任

① 这里是指杜勃罗留波夫的《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1860)一文。“真正的白天”是相对于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夜》而言的。文章对屠格涅夫略有微词。

② 马尔科·沃夫乔克是笔名，真名为玛·亚·维林斯卡娅-玛尔科维奇（1833—1907)，乌克兰革命民主派女作家。1859 年后居住彼得堡，因此也是俄国作家。

何俄罗斯的味道。读者很可以叫他们是苏格兰人、意大利人、北美人，而不是俄国的平民，因为这些人物不像俄国的平民。可是——波夫先生对此全然不加理会，只要表现出思想、目的就行，即使漏洞百出也无妨。有了这个还要艺术性做什么呢！说到底，有什么必要写小说呢？不如干脆讲清俄国平民中存在怎样怎样的事实，由于某种某种原因，岂不明了痛快！“偏要讲什么故事，人们真是无事可做了。”

顺便还想指出一点，艺术作品的艺术性怎样才能判断呢？就是我们要能看到艺术构思与艺术形式的和谐，尽可能完全的和谐。说得再明白些：小说家的艺术性，就是通过小说人物和形象鲜明表现自己思想的能力，要让读者完全像作者写作品时那样理解这个主题。所以简单地说，作家的艺术性就是写得好的能力。所以对艺术性不屑一顾的人，就是允许写得不好。而如果允许，那就近乎说应该写得不好啦！这话不是几乎就在他们嘴边上吗！

本文打算研究一下——波夫先生对马尔科·沃夫乔克作品的评析（刊于去年《现代人》杂志 9 月号上）。我们这样做，特别是因为这篇评析相当鲜明地反映出——波夫先生文学观的性质，同时也表现了他对艺术的看法。而他如我们上文所说，是功利主义的一位代表。因此，局部地把——波夫研究透彻，我们便会理解当前在我国文坛上艺术问题处于怎样的状况。

俄国的读者都知道，马尔科·沃夫乔克写过两本短篇小说集，取材自小俄罗斯和大俄罗斯的民间生活。——波夫先生专门分析了译成俄语的大俄罗斯故事。他把所有的故事都作了十分详尽的剖析，用了五个多印张的印刷小字。特别有意思的是，从这个分析中一方面可以看出——波夫先生如何理解文学的使命和目的，对文学有什么要求，文学的哪些特点、手段、

力量能够影响社会。不过我们只谈一谈对第一篇故事的分析，据此就足以弄清——波夫的观点了。至于关于马尔科·沃夫乔克本人，本文不拟详说。只是要指出，我们承认这位作者很聪明，有其极好的动机，但是否具有很高的文学才赋我们有些怀疑。我们非常抱歉，在没有证实之前就发表了这样的意见。我们尤其遗憾的是，似乎是被迫选取了第一篇小说《玛莎》来作分析。大概可以说，这是作者小说中最差的一篇。但——波夫先生分析它时着眼于另一方面，这正是我们想提醒读者注意的。

当然，我们不打算分析——波夫先生所有的见解，尽管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做的。我们在许多方面同他完全不和，是明显的论敌。不过仅就一点来看，他争取到了读者，从他参加《现代人》后，在杂志的评论文章中他独占鳌头，而一般的评论家几乎是没有人要读的，仅此便可证明——波夫先生的文学才华。他的才华蕴涵着来自见解的力量。——波夫先生与其说是评论家，不如说是政论家。他的见解的基本出发点，是很有道理的，也博得了大众的认同。然而表现这一基本出发点的那些思想，却常常有悖情理，并且带有一个重要的缺点，就是闭门造车。——波夫先生是位理论家，有时甚至是幻想家，经常是不很了解实际情况。有时他对现实是过分地不客气，随心所欲地弯过来弯过去，直到能证明他的思想为止。——波夫先生的语言简洁明快，虽然有人说他是先把句子嚼烂再送到读者的口中。似乎他老是担心别人不理解，不过还不算什么大缺点。他的语言的明快和简洁，值得特别注意和赞扬，因为我们今天在其他杂志上看到有人以模糊、冗赘、花哨的文风为荣，大概以为如此能显得思想深沉。有人告诉我们说，如今一个评论家要想喝水，他不会直接简单地说“拿杯水来”，而大半会说成这

个样子：

“拿些湿润的基本原素来，让它把我腹中坚硬的成分软化一下。”

这则笑话倒有点像是真事。

回到正题上来。几乎就在分析的开头处，——波夫先生说：

在小俄罗斯故事中我们看到了地主滥用权力的情形，而且有时相当严重。据说这曾使得一位著名的俄国评论家把马尔科·沃夫乔克的作品斥为“丑恶可憎的图画”，将其归之于揭露文学，并据此否定作者具有任何文学才华。我们没有读这位严厉的评论家[①]的文章，因为对他的文学评判早失去兴趣，但我们仍可理解他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他是“为艺术而艺术”理论的信奉者。马尔科·沃夫乔克的小说在这一派理论的拥护者中同样得到了赞扬。不难想象，是小说里的什么东西，合了这些赞赏者的心意。我们亲耳听到两位艺术鉴赏家夸奖有一处写得极美极富诗意。那好像写的是：“极目，极目，远处田野上他那坟头的十字架隐约可见。”这位指摘马尔科·沃夫乔克的严厉批评家，多少总比上述鉴赏家还是理智一些，明白“极目，极目，远处田野上”云云尚不是无可比拟的艺术极致。至于说除此之外他在“民间故事”里再不会有任何的发现，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事；谁要是期望他能有新的理解，才是太叫人奇怪了。那样他就必须背弃“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然而他怎么能放弃呢？放弃了，他在世上还有什么事可做呢？他还有什么用处呢？

---

① “著名的评论家”、“严厉的评论家”，是指俄国纯艺术论的三巨头之一，作家、评论家亚·瓦·德鲁日宁（1824—1864）。杜勃罗留波夫早在1859年的一篇文章中就对他有所讽刺。

先引到这里。——波夫先生文章中的这一段，最好地证明了我们在上文中讲的看法，即功利主义者与为艺术而艺术的信奉者两个文学派别之间，有着相互的一种亲密关系。敌视、有意的误解、极端的指摘——这就是我们在引文中所感觉到的东西。首先，——波夫先生怪罪那位艺术批评家单凭马尔科·沃夫乔克小说属于实用流派就称为丑恶可憎的图画，在划入揭露文学一类之后又因此而否定作者具有任何文学才赋。虽说这种责难已相当尖锐，我们这一回倒准备相信——波夫先生的话了，因为我们没有读到艺术批评家的文章。自然，这位批评家否认小说作者有文学才华，可能并不只因为他的这些故事是揭露性的。我们认为，他这一次如此说，可能还有其他材料作根据。——波夫先生直接地证实了我们说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信徒出于对功利主义派的敌视，不仅全盘否定了暴露文学，还否定了暴露文学产生天才的可能。再说一遍，我们可以相信这番话。可是——波夫先生本人却过分露骨地走了极端，他说这位艺术批评家假如真能理解马尔科·沃夫乔克小说的内容，就是背叛了自己，因为马上要背弃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

我们还可以责备某些为艺术而艺术的信奉者，说他们迷误、尖刻，因而也欠公正；可是要说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本身，天然地会把自己的信徒变成低能儿，把聪明人变成糊涂狭隘的人，那可是不公平的。理论、流派、学说在一定的时候会把人引上这样或那样的道路，不是常有的事吗？不能把每一个例外都说成是通则吧！

现在继续来看引文。

问题倒不在于艺术批评家的判决，随他怎么说吧！谁也不认真对待他的话了，所以他的艺术偏爱也就完全无碍于人。我们要说的

是关于马尔科·沃夫乔克小说的另一种议论，另一种意见，现在该来谈一谈了。这种意见在社会上一部分自称受过教育的人中间相当流行，其实他们是无知而且肤浅。我们所说的意见，涉及农民的特征和他对农奴制的态度。农奴制正走向它的末日，然而存在了数百年的事实却不会消逝得毫无痕迹。有的官阶等级制度在法律规定取消之后二百年，依然靠着习俗维持着。难道可以指望农奴制遗留的各种关系会突然改变吗？不会的，这些在很长时间里仍能让我们感觉到，如在书本里，在客厅谈话中，在我们整个生活方式里。不论行将过去的一代，或正当年的一代，还有准备进入社会活动的一代，他们脑子里的概念如果说不是直接在农奴制基础上形成的，至少也是受到了农奴制的巨大影响。农奴制的原则是法定的，国家推行的。如今这个原则被放弃了，它所产生和培育出来的概念和要求在过去受到保护的地方现在受到了谴责。今天文学要做的事，便是追踪农奴制在社会生活中的残余，扫清它所产生的思想。马尔科·沃夫乔克通过她那简单而真实的小说，几乎成了这一领域里第一位相当高超的斗士。在最后几篇小说中，她甚至不像以前那样给我们主要展示所谓的滥用地主权力的现象。滥用原本就是糟糕的东西，又何必要什么阐释呢？有什么必要去讲农奴制引发出的、本来也可不发生的现象呢？这些都不须说了，作者如今只取农民在不滥用权力的地主庄园里的正常状况。而且她讲得很温和，没有怒气，没有痛苦，只给我们刻画出境况。从她的这些记述中，凡是稍许了解俄国人民的人都能认出熟悉的特征，我们眼前于是浮现出俄国老百姓的性格来。这种性格虽经数百年间旧关系的消磨和压迫却保留下来自己基本的特点。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其中的某几点。

我们摘出这一段，是因为它是——波夫先生分析马尔科·沃夫乔克的开场白和引子。这里也讲了一些自己对马尔科·沃

夫乔克的见解。请注意我们加重强调的话。——波夫先生承认，马尔科·沃夫乔克的小说简单真实，作者在其中是这一领域相当高超的斗士，多少了解俄国人民的人都能在这种描写中发现熟悉的特征，我们面前浮现了俄国老百姓的性格。请注意——波夫先生讲的这些话。从中可以看出，他承认马尔科·沃夫乔克除了聪明和内行之外，还善于表述自己的知识和观察，一句话，承认她具有文学才赋。

在——波夫先生的文章里，接下去有几页很精彩，叙述了当前某些先生之间对俄国老百姓的不同理论与观点①。这段精到的文字（还不是文中最好的）可使我们一些不了解——波夫先生才华的读者，弄明白为什么这位作家能吸引读者，怎样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所以没有引出这段话（非常想全部引用），因为现在我们要分析的不是整个——波夫，而只是他对艺术的看法，过多摘录会破坏本文的统一。不过我们请读者特别注意下一段引文。这里——波夫先生把马尔科·沃夫乔克也作为艺术家来看，虽不认为她有过人的艺术天分，但又说她对描绘的生活明显有着广泛的体会，这一点也才使——波夫先生喜爱她的小说。不仅如此，——波夫先生甚至乐此不疲，他这个聪明人能够洞悉作者的动机，把握作者的暗示和意图，可以根据某些模糊而零散的标志判断出作者在说什么或想说什么；由于喜欢作品里讲到了这个或那个，就不胜感激作者，居然在作者的小说里找到了俄罗斯精神、熟悉的形象（老百姓形象）等等，等等；而这已经属于艺术性的标志了，是他原本不承认存在于

① 1858—1859年间，几位作家曾分别撰文，主张保存对农民的体罚，受到杜勃罗留波夫激烈抨击。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赞同他的观点。

作者身上的。主要的是，不具备艺术性也可以让——波夫先生感到满意，只要讲了正经事就好。这最后的一个愿望，自然是可嘉的，不过如果能讲正事讲得好，不是马马虎虎，岂不是更好吗？①

原文是这样写的。

> 首先应该指出，这些个性在艺术上尚未得到充分完满的表现，只是在马尔科·沃夫乔克的短小故事里勾画出来。我们不会在她那里寻找我国人民生活的史诗，这种要求太过分了。这样的史诗，我们只好待诸来日，目前还谈不上。在我国人民的意识尚未达到要以诗的形式表现整个自我的阶段。来自知识层的作家至今只把人民视为新奇的玩物，根本不想严肃地对待他们。我们这里对人民意义的认识还只刚刚开始。而与这种朦胧意识的同时，却出现了严肃的观察，对人民生活和性格的真诚挚爱的观察。这其间最值得称道的，恐怕就是马尔科·沃夫乔克的描述了。其中不乏零碎疏漏的地方，有时写了偶然的个别的事实，没有交代内在或外在的原因，与通常的生活状况缺乏必要的联系。不过我们再强调一下，对我国写农民生活的小说还不可能要求严整的完成性和全面性，因为这个生活尚未充分地向我们展开，而敞开的部分我们并不总是能够很好地表达出来。在马尔科·沃夫乔克的小说里，我们看到了倾听人民生活的愿望与本领，我们在其中感受到了俄罗斯精神的存在，遇到了熟悉

① 我们要即刻声明，我们这样讲马尔科·沃夫乔克的作品，指的仅是大俄罗斯生活小说集里的第一个中篇《玛莎》。我们不能不认同，在她的其他作品中有不少十分精彩的段落。不过每一篇小说从整体上看都经不起推敲。现实常被理想化，表现得不真实。同时您又知道，这种不符合现实的生活，实际上又可能存在，遗憾的是在作品里没得到证实。不过我们说的都是指她的大俄罗斯小说，不涉及她描写小俄罗斯生活的作品。——作者注

的形象，认出了我们自己曾经感受过却未加留意的那种逻辑，那种感情。这就是小说值得我们珍贵之处，这也就是我们如此推崇作者的原因。我们在其中发现了深刻的关注和真切的同情，我们感到了对人民生活的广泛理解，而对此，许多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家、斯拉夫学家、法学家、小说家等等却看得那么轻率，理解得那么狭隘，那么肤浅。

引述这段文字之后，现在我们来看看——波夫先生对马尔科·沃夫乔克第一篇小说《玛莎》的具体分析吧。我们决定把这个分析全文照录。我们希望读者自己读一下这篇作品，尽管支持、喜爱、维护马尔科·沃夫乔克才华的——波夫先生亲口转述了这个故事，并且引述了原作。

我们还记得小说首次刊出的情形，——波夫先生写道——那些仍然坚信农奴制不可侵犯的人们读了大吃一惊。小说揭示了一个农家女孩儿热爱自由、厌恶奴隶制度的无法遏制的自然发展过程。大家看得出，这是无可指摘的。可是对那些信守农奴制关系的人，这类小说的确要起到震惊的作用。作品直捣他们以为坚不可摧的最后避难所。这些人懂得人道，受过教育，也承认农奴制基本上已不适应现代教育所取得的成就。可紧接着他们又说，农民还没有成熟到可以享有真正的自由，他也不想自由，不希望有自由，而且完全不视自己的地位为负担，除非有的地方老爷派头太大，管家太凶……“再说农夫的头脑中哪来的自由思想呢？他什么书也不读，不认得文学家，自己的事够多了，哪有工夫去幻想什么……他只知过自己的日子，——像父亲、爷爷生活过的那样。现在如果要解放他，那纯是出于恩赐，出于慈悲……您看吧，农民一下子还转不过弯来，一下子还理解不了，为什么要给他这东西，许许多多的人还要为想

念旧日子而哭泣。”聪明的有知识的人们这样说别人，觉得这话是无可辩驳的。可是突然间有人对他们所据事实的可靠性直接提出了挑战。有人讲了一个故事，证明农民身上也天生有对自由劳动和独立生活的热爱，证明这种向往的产生甚至不需要文学的帮助。这故事正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情况。

一个老农妇收养了两个孤儿，一个侄女玛莎，一个侄子费佳。费佳就是个男孩儿脾气，乐呵呵的，文静听话。玛莎可从小就个性倔强。她不满足于只是听从别人的命令，一定要人家告诉她是为什么这样。她对什么都愿意听，愿意看，很早便表现出要有自己的见解。要是跟着严厉的父母，小姑娘这种癖好一下子就给打掉了。成百上千的孩子小时候过分好奇，不适当地盼着早熟，父母就是这样办的。不过不管玛莎是幸运或是不幸，她姑妈是个善良质朴的女人，不但不责怪玛莎鬼机灵，反倒顺着她，有时答不上来或辩不过玛莎，甚至很是不安。这样一来，玛莎坚信她有权思考、提问、反驳。这也就足够了。七岁那年她出了件事，说明了她想法不同寻常。姑妈和费佳进城去了，留她一个人看房子。她坐在土台上和孩子们玩耍。忽然有位太太路过，停下来望了一眼，对玛莎说：“你这是吵什么呀？认得自己的女主人吗？啊？你是谁家的？”玛莎许是害怕了，闭口不答。太太就骂了她一句：“长傻了，不会说话呀！”玛莎落了泪，太太可怜起来：“来，到我这儿来，小傻瓜！”玛莎不动。太太让孩子们把她拽过来，玛莎拔腿就跑，一直不见她回家。姑妈和费佳从城里回来，玛莎不见了，就出去找人，找了一通没有，在回家的路上，玛莎自己从谁的大麻地里钻出来。姑妈要带她回去，她不肯。她说：“太太要带走我，我可不去。”姑妈安慰了她一通，接着教训她得听女主人的话：“即使她很严厉地命令你，也得听从。”

玛莎说：“要是不听呢？”

我说[①]："那就要倒霉了，孩子。你愿意受罚吗？"

费佳都气坏了，朝妹妹瞪大眼睛。

玛莎说："能跑哇，跑得远远的……有人不是跑了吗？"

"可是抓回来了呀，玛莎！他们中几个人还死在路上。"

费佳说："抓住的几个人又送进大牢，受尽各种折磨。"

我说："他们可饱尝了羞辱和痛苦哇，孩子！"可玛莎还是自己那一套："为什么大家都护着太太？"

我解释说："她是太太呀！她就有这个权力，她有钱财……世道就是这样。"

玛莎说："是这样！那谁护着咱们哪？"

我和费佳相视愕然：她中了什么邪？

我说："孩子哟，你脑子怎么不开窍哇！"

她还是问："有谁护着咱们呢？"

我回答说："咱们自己护自己，还有上帝护着咱们。"（原书第29页）

从那时起玛莎一说话就是讲太太。"谁把咱们交给了她？怎么回事？为什么？什么时候？太太就一个人，咱们人这么多。谁愿去哪儿离开她就是了，她又能怎么样？"老姑妈的回答自然满足不了玛莎，她得自己设法解答。不久，她实际上照自己的想法办了。太太想起了玛莎，让村长派玛莎到老爷的果园里干活儿。玛莎很固执："我不去！就是不去！"姑妈心疼孩子，对村长说玛莎有病。这回玛莎可找到借口了，——有老爷家派的活儿，她就生病。太太把她叫了去盘问："你生的什么病？"玛莎回答道："浑身都疼。"太太骂两句，吓唬一下就赶她走了。下一次她又是故技重演。

哥哥不知劝了多少回，姑妈也一个劲儿央求她，全没有用。玛

① 小说是以姑妈的口气转述的。——作者注

莎不仅不想去干活儿，还摆出样子好像她完全有这个权利，好像理应如此。她不想去求太太免除她的劳役。姑妈议论说："只要玛莎去行个礼求求情，太太自己就会放她走的，可我们的玛莎不肯。她有时对太太头也不抬一抬，答话声音很低……地主的脾气就是这样：你尽可骗他，却得对他行大礼；你尽可是个恶人，却得尊敬他，向他求情，向他跪拜，说任凭发落，但求宽恕。你要是心里恼怒，脱口说出难听的话，就算你诚实正直，也别想得到宽恕，因为你粗暴！我们的地主太太是有名的富有慈善、怜悯心，可对玛莎才不客气呢！有时她威吓我们说：'你们等着吧，我要好好教训你们所有的人！'虽说还没惩治，可有了这个话，日子也不好过呀！"

玛莎厌恶老爷派活儿，达到了誓不两立的程度，促使她**下意识地干了发狂的勇敢行为**。有一回哥哥责备她，说她托病不去干活儿，却在全村人面前又跳舞又玩耍。哥哥说："你是不是以为这传不到太太耳朵里去？你要惹得太太对我们大家都发脾气，可是不太好哇！"从那儿以后玛莎再也不上街去了。她很寂寞，闷闷不乐地望着窗外女孩子们在玩耍，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可就是足不出户。姑妈催她去同女友们玩，哥哥求她别再因为责备的话生气。她说："费佳，我不是生气，你别白费心了，我不去！"果真就是不出门，夜里睡不着便去菜园里独自游荡，却谁也不告诉。有一回姑妈偶然碰见说："我的天哪，玛莎，你该学别人一样地过活嘛！等服完地主的劳役就没什么好怕了……可你倒夜夜闲逛，白天连大门都不敢出。"玛莎悄悄说："我做不到哇！做不到！就是杀了我，我也不愿那样。"人们只好随她去了。

说话间玛莎就长大成人了，闺中待嫁，一个美人！老姑妈开始给她讲出嫁的生活，断定嫁了人会有幸福。这也不合玛莎的心思。她说："嫁人又怎样？还不是一个样！有什么幸福！"姑妈说人生不光是痛苦，也有幸福。玛莎回答说："是有哇，可不是给我们的。"

费佳听了这话也开始琢磨起来。可是费佳不能只顾寻思，他得去服满劳役。玛莎仍然拗着不肯干任何的事。村里的人们都感到奇怪，抱怨玛莎闲着不干活儿。太太有一次大动肝火，命令立刻硬把玛莎带来。来了以后太太奔过去，一边骂一边把镰刀塞到她手中说："你去把花圃里的草锄掉。"说完站到她面前喊"锄哇！"玛莎举起镰刀，一下砍到自己手上，鲜血四溅。太太吓坏了："快送她回家！给你们这头巾，快把伤口扎上！"事情便不了了之。玛莎连太太的好意也不领情，一到家就把太太的头巾扯下来，远远扔到一边……

玛莎倔强地拒绝任何派活儿，郁郁寡欢，满脑子怪问题，这对哥哥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他同样变得郁郁不欢，同样扔下活儿不干了。老姑妈觉得他这是该成亲了，有回就讲起找未婚妻的事："当地的姑娘不合适，那就去趟杰尔诺夫卡，那里的姑娘都不错。"玛莎接过去说："杰尔诺夫卡全是自由人了！"姑妈开导说："是自由人又怎样？自由人就不能嫁给地主的农户了？只要咱们的小伙子能中意就行了。"玛莎浑身一阵战栗，说道："我要是自由人，宁愿上断头台也不嫁！"费佳听了十分懊丧："你太看不起农奴了！"说着脸色全变了。"农奴也是一样的人嘛，只是不由自主呗。"说完就走了。姑妈像平时一样又来劝玛莎，说伤心流泪改变不了命运，只会少活几年。玛莎回答说那还不如早点儿死呢。她说："我活在世上干什么呀！"

可怜的一家由于姑娘不合时宜的、有悖国法的问题和要求，闹得痛苦不堪。如果遇上邪恶的地主婆，凶狠的管家，如此乖僻当然绝没有好结果。可小说写了一个善良和气的地主太太，而且带有自由主义倾向。她决定允许自己的农奴赎买自由。不难想象，这个消息对玛莎和费佳该有多大的影响。我们忍不住在这里再引两小段文字，这是马尔科·沃夫乔克这篇故事的结尾。

"费佳越发愁眉苦脸，玛莎眼看着渐渐精神委靡不振。有一天

我坐在她旁边，她正冥思苦想，忽然费佳走了进来，精神十足，很快活的样子。他问：‘你们好哇！’我很高兴，忙说：‘你好哇，孩子！’玛莎只是瞟了他一眼，意思是：有什么好高兴的！

“费佳说：‘玛莎，你不是不想活了吗？你现在死还太早了点儿啊！’

“他自顾自己取笑，玛莎不吱声。

“‘你听着，妹妹！我带来个好消息。’

“她回答道：‘你和你的消息都见鬼去吧！自己高兴好了，别来打扰我！’

“我问道：‘费佳，什么消息？告诉我！’

“‘你会听到的，好姑妈！’说着他用力抱住我亲吻了一下，又抓住玛莎的胳膊把她拽了起来，‘玛莎，你听着，太太对咱们宣布了，谁要愿意可以赎身得到自由……’

“玛莎大叫一声，扑倒在哥哥脚下，流着泪吻他，浑身抖动着，说话上气不接下气。‘亲爱的，给我赎了身吧！上帝保佑你，亲爱的，赎了我吧！上帝呀，帮帮我们吧……’

“费佳自己已经泪流满面。我的心快跳出来了，站在那儿望着他们两人。

“费佳说：‘等等，玛莎，让我想一想。需要仔细琢磨，好好计算一下。’

“‘不用了，费佳！快点儿赎身吧，快点儿！亲爱的！’

“我插嘴说：‘玛莎，还有些麻烦呢！你算算，得把东西全卖掉才够。我们可怎么活呢？’

“‘我能干活儿！哥哥，我一定要干活儿。我可以去要饭，去乞讨！我可以当牛做马，到哪儿都成，只求赎出我来。亲爱的，给我赎身吧！我忍受不了啦！我白天愁眉不展，夜里睡不安宁！可怜可怜我的青春吧！我的日子就是受罪呀！赎了我吧，赎了我吧！去，

快去找她……'

"玛莎给哥哥穿上衣服，催促着，自己不断地边哭边求……转眼的工夫，她把哥哥催走了，自己在屋里来回走动，一个劲儿地搓手……我的心也剧烈跳着，像回到了年轻时，事情真难想象！我简直难以理解，更难以平静……

"我们等着费佳，心急如焚。玛莎远远地望见了费佳，失声痛哭。费佳老远地就喊叫：'感谢上帝！'玛莎一下子倒在长凳上，哭了好大工夫。我们劝她，她说：'别管我，叫我痛痛快快地哭个够！我好高兴啊，好像再世为人！现在给我活儿干吧！我身体很好……我有力气，你们大概还不知道！'

"就这样我们都赎了身。房子什么的全卖掉了。我有些舍不得，费佳也难受：自己种的自己培育的，这下全没有了。只有玛莎兴高采烈，一滴泪没流。那样子，真像从起死回生的神水里浮出，眼里明亮有神，两颊红晕。似乎她的每一滴血都渗透着欢乐……从此她干起活儿来精神百倍。'歇一会儿吧，玛莎。''歇一会儿？我想干嘛！'说着朗声大笑。我是头一回听到她笑得这么爽朗。从前人家叫玛莎游手好闲，如今说她是第一个巧手，活计最出色。成群的小伙子追求她……地主太太可大为光火。邻居们笑着说：您让一个愚笨的女奴给戏弄了，她的病全是故意装的。您几乎是白白地把她放走了！'的确太太没向玛莎索很多赎金。

"我们搬进一间破屋住，是在城里，开始干活儿谋生。上帝帮助了我们。后来我们盖起新房，费佳成了亲。玛莎也嫁了人，婆婆十分喜欢她：'她像亲闺女一样疼我。整天高高兴兴，又特别能干活儿，后来一直没生过病。'"

——波夫先生对这头一篇小说作了简短的说明。我们已经引述过了。他断言小说一问世，那些还相信农奴制不可侵犯的

人们会大惊猛醒，说“小说揭示了一个农家女孩儿热爱独立自主精神、厌恶奴隶制度的无法遏制的自然发展过程。”当我们听到一些仍然相信农奴制不可侵犯的人会大吃一惊云云，不由地觉得奇怪。我们不知道——波夫先生指的是什么人，这种人他是不是看见了很多。虽然我们这个意见与本文讨论的文学问题没有直接关系，还是忍不住要讲出来。稍许了解俄国现实的人马上会同意：我们所有的人，有文化的与无文化的，受过教育的与没受过教育的，除了少数例外，都早已达到了作者听说的那个认识程度。再说作者讲一篇短故事竟震撼了那么多的人，而且令其大吃一惊，这种设想也未免有点可笑。——波夫先生说：“有人讲了一个故事，证明农民身上也天然地有着对自由劳动和独立生活的热爱，证明这种向往的产生甚至不需要文学的帮助。这故事正是这样一个普通的事实。”

讲述类似的故事，而且讲得精彩、有趣、头头是道，总是有益的，尽管这种事早已尽人皆知。作家的天赋，正在于打动人心。您可能知道某个事实，亲眼看见了上百次，但却无法获得深刻的印象。而如果另一个人，一个特殊的人，站到您旁边指出这个事实，用自己的方式指出，用自己的话给您讲解，迫使您以他的眼光看这一事实，那可就另当别论了。凭这种影响，就可看出谁是有真正天赋的人。然而，如果此时此刻要讲述对自由劳动的热爱，讲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这种事实确实存在，那么这无异于要证明人必须喝水吃饭。现在请读者来看这篇小说——波夫先生所称的一个普通的事实。试问，您可曾见过比这更失真、更蹩脚、更差劲的小说吗？写的是什么人呢？写的可是人吗？事情发生在哪里呢？在瑞典？在印度？在桑德维岛？在苏格兰？在月球上？在开头，人物好像是在俄国讲话行动，主人公是个农家姑娘，有姑妈，有地主太太，有费佳哥

哥。可写的是些啥呀？拿主人公玛莎来说，这好像是个不被允许去发现美洲的哥伦布。整个土壤，整个现实全抽空了。一个农村姑娘当然能对农奴地位产生厌恶，可她会这样地表现自己吗？简直是个滑稽可笑的人物，是书斋里的虚构而不像个女人。这一切都太不自然，太离谱，太做作，有的地方（特别如玛莎扑向哥哥大喊：赎了我吧）我们读了实在是忍俊不禁。可小说中这一处的描写难道该引起这样的效果吗？您会说，有些情景还不错，凭着主题思想也应该原谅在主题表达上的某些不足。我们同意而且向您保证，我们绝不去取笑神圣的东西。可您也会同意：没有任何主题思想，任何的事实不会被庸俗化而弄得滑稽可笑的。您可以使劲忍住不笑，最后忍不住还是要哈哈起来。现在我们假设维护现有农民状况的人们，确如——波夫先生所说，不相信农民愿意获得自由。然而小说会令这些人相信自己是错误的吗？他们会大叫："这不符合事实。"我们来听一听——波夫先生自己怎么说。

"这是想入非非，田园诗，黄金时代的幻想！"那些讲究实际、虽有人道观点却暗地里喜欢农奴制关系的人，读了这篇小说会如此大叫起来："一个普通农夫的心里，竟会有这么强烈的个性意识，你在哪儿见过呀！假如真有过这类事，那也是奇怪的例外，是由特殊的环境促成的……玛莎的故事绝非来自俄国生活的画卷，这纯粹是异想天开的杜撰。作者选取的不是普通俄国妇女的典型，而是一种特殊现象，所以这篇小说是虚假的，没有艺术价值。艺术性的要求，是必须体现出什么……"等等。

于是这些可敬的论者大谈起艺术性，那感觉真是如鱼得水。

然而，与此没有利害关系的人们，却根本不会去想《玛莎》里讲的故事有什么不自然之处。相反，任何熟悉农民生活的人，都觉

> 得这事很正常。事实上难道可以认为，我们觉得人人必有的人生的意义，在农民身上唯独不存在吗？这样认为也太过分了吧……
>
> 不过，随你们怎样看吧！而事实会向你们证明：像玛莎和费佳这样的人，在俄国人民中间可远远不是什么例外。

让可敬的作者去议论去证明吧！让他去论证农民的确会感受到自主的需要，会意识到自由地位优于奴隶地位（这一点谁也不会怀疑）；让他为论证而去施展那非同寻常的雄辩术吧，似乎真有人需要由他来证明农民会思考；让他兴奋之余去论证玛莎现象确实正常吧，而且论证时让他以玛莎能观察、能思索、能幻想、能感受，还能意识到自己地位等等作为论据吧！这一切，——波夫先生，并没有错。您用不着施展雄辩的本事，我们也相信这些话，相信这一切并没有错，因为我们自己早就知道这没有错：农家姑娘确实会思考，也会理解，也会意识，也会感到厌恶，等等等等。不过，这些难道应该像小说里那样地加以表现吗？小说不是把可能有的事弄得难以置信吗？不是把故事弄到了桑德维岛上而不像在俄国吗？您说：

> 是的，我们发现：小说《玛莎》讲的并非是特别的例外，如地主和艺术评论家所想的那样。相反，玛莎这一个性身上，倒体现了俄国人民共有的一种愿望。既然恢复个性的独立性这一需求确乎存在，那么它至少要在人民生活的事实中有所表现。

且慢，——波夫先生！我们引述了您的大段评论，可绝不是想讨论马尔科·沃夫乔克和她在作品中涉及的那些问题。在本文开头我们就指出，作为艺术中功利主义的代表，您的艺术见解在这篇书评中表现得再鲜明不过了。在摘抄之后，现在我

们便接近了引述的目的。我们想证明，功利主义者在漠视艺术和艺术性而不把它们摆在文学的首位时，其实恰恰是在反对自己。不仅如此，功利主义者还在败坏他们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这一点我们要给您证明一番。

请看，您断言为艺术而艺术甚至会导致人们无法理解一种有用的流派对文学是多么必须。这一点您亲自对艺术评论家说过。您把所有的（注意：所有的）艺术家都同残酷的种植园主等量齐观，您大叫着挖苦他们，那话就仿佛是他们读完小说《玛莎》的反应："这是杜撰、空想、黄金时代的幻想！一个普通农夫的心里，竟会有这么强烈的个性意识，您在哪儿见过呀！"我们却要回答说：在普通农夫的心里，能产生的意识还不仅如此！而且并非个别的例外，是普遍有之。我们了解这一点，并且相信这一点！我们其实很清楚，您自己也感觉到沃夫乔克的小说写得太不伦不类，不然何须那么激烈地为小说辩护呢，何须挖苦您斥之为残酷剥削者的艺术家们呢？如今请听我们说一说，不是听我们的劝告、评判，而只是听听我们在这件事上的想法。我们没有参与艺术问题的古老论争，至今也不属于任何的文学派别，我们是新来乍到，起码不怀什么成见。请容我们陈述自己的意见。

第一，我们首先要向您表明：尽管我们喜爱艺术性和纯艺术，我们自己就渴望有优秀的流派，并且高度赞赏它。因此，请您了解我们的主要之点：我们抨击马尔科·沃夫乔克绝非因为她的写作代表了一定流派。相反，我们极为赞赏她这一点，愿意为她的事业而庆幸。我们所以要批评这位民众小说的作者，正由于她没有做好工作，写得不好败坏了事业，而不能对其有所裨益。请正确理解我们的意思，我们不想被人误解或歪曲。您自己在这些小说里看中了什么呢？是其中有精彩的思

想，有智慧，有对事物的出色的、正确的观点？是这样吗？好吧，我们假设说您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真正农民生活的维护者，如您所说，不相信农民希望自由，我们再问一次，您真能靠这篇小说来使人相信这一点吗？您干脆说这篇小说“攻入了他们最后的避难所”，故此您相信这小说的用处。可您的论敌却直率地回答您：“您断言这种事是普遍存在的，并不遗余力地力求证明这一点。问题恰在于小说写得不好，让我们读来明显地觉得是个别的例外，而且个别到难以理解。如果说您想证实自己的见解却找不到符合俄国精神的方式和俄国式人物来表达，那么您不能不承认，结论就是俄国精神中不会有这种事出现，于俄国现实中不可能有这种事。”这便是人们要给您的回答，正因此小说不给人以强烈的深刻的印象，只是引人发笑，令人想起《熊与隐士》的寓言①。您的论敌还要补充说：“您也想象不出哪个俄国人会带有您的见解。当需要说明您的见解如何在实际上、在生活中实现的时候，俄国人就显得不适合而退走了。您于是不得不给芭蕾舞里的瑞士人穿上俄国长袍。这是理想化的农民，而不是真实的农民。您想证实自己那荒诞的看法，可刚迈出一步，脚下的土壤便滑走了。在这之后您还想让我们相信您的话，然而连您这事业捍卫者本人都无法设想这种事会发生在俄国人身上。好吧，办公室的幻想家，您可以欺骗自己，却不要来欺骗我们。”这就是人们要对您说的话，他们也自有他们的道理。其实，小说作者的主题思想是正确的。试想要不是写成可笑的故事，不是现在作品的样子，不是玛莎这个形象，那很可能出现一个鲜明确切的人物，它让您一眼看透现实中人们所热烈争论的那些事实。如果这

① 是克雷洛夫 1808 年的一则寓言，它讥笑帮了倒忙的大熊。

样，您会只因为作品富于艺术性而不接受这样的小说吗？要知道这样的作品，其用途要超过千百倍。从本质上说，您是轻视诗意和艺术性的。您首先要的是事实，您是务实家。可艺术性正是最好的、最富说服力的、最无争议的、群众最易理解的形象表现方法，而这形象指的正是您所关注的事实。艺术性正意味着您所爱讲的那种最务实的人。所以，正是从您的观点来看，艺术性具有最高意义上的用处。正当必须把艺术性摆在首位、列于任何要求之前的时候，您为何偏轻视它攻击它呢?!您说："先于任何要求是不成的，因为首先需要的是事情。"但即使讲事情也得讲得好讲得巧哇！就是务实的人，如果不善于讲话，也不会有大用处。好比您指挥一群士兵，都是很可靠很好的人。突然发生警报，全体迅速起身，背上背包用具，拿起武器。这时您发出命令："快点儿，快点儿！扔下背包、子弹，不需要！带多了只能迟到。武器也不用带。不管谁拿上了什么，就这样出发，齐步走！"你们确实准时到达了目的地，占据了地点，可士兵们没有武器没有子弹，有什么用呢？事情倒是办了，可办得不好！再譬如您面对一个堡垒，要向它进攻。而您命令士兵进攻时必须全像瘸子一样行进。写作而无才能，犹如瘸腿的士兵。难道您认为只有结巴才能最好地表达您的思想吗？

您会露出微笑，您觉得滑稽，居然有人来教训您，讲些您早已熟知且已讲过的东西。您的一篇文章说："作品不妨是有艺术性的，但它又应是现代的。"另一篇文章又说："如果您想生动地感染我，想使我喜欢上美，您就得在美中找到这一普遍的意义，这一生活的气息，要能向我指出它阐明它。只有那时

您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① 简洁明了。您不否定艺术性，但您要求艺术家要言之有物，要有益于公众，要忠于今日的现实和它的需求、它的理想。这愿望好极了！但愿望如果变成了要求，在我们看来，就已属于不理解艺术的基本规律和艺术的最重要本质——灵感的自由。这意味着根本不承认艺术是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混乱不堪的问题上，全部的错误尽在于此，它使我们走向了误解、分歧，更糟的是引向了极端。您好像认为艺术没有任何自己的规范、自己的规律，对它可以随心所欲地呵斥；灵感就在每个人的衣兜里，伸手可得；灵感能服务于此也能服务于彼，随您指向何方。可是我们确信：艺术有其自己完整有机的生命，因之又有基本而不可更易的生活规律。艺术于人，是同吃饭饮水一样的需求。对美的需求，对创造美的需求，同人是不可分离的。人离开这一需求，也许就不愿活在世上了。人渴求美，寻找美，接受美，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只因为这是美；人对美虔敬膜拜，却不问它有何用处，变卖它能买回什么。也许这正是艺术创作的最大秘密所在，说明为什么艺术创造的美的形象会无条件地立即变成崇拜的偶像。那么为什么会成为偶像呢？因为对美的需求最为强烈的时候，往往是人与现实不相和睦之时，处于失调、斗争之中。也就是生活欲望强烈之时，因为生活欲望强烈时便要有所寻求。此时人会表现出最自然的愿望，追求和谐与宁静。而美既体现着和谐，也体现着宁静。当人找到他所追寻的东西时，生活一时似乎放慢了脚步。我们看到过这样的例子，人达到了自己追求的理想，不知再朝哪里努力，心满意足之后便陷入苦闷，甚而自寻烦恼，于是在生活中开始寻求另一个理想。由于过度满足，他不仅不

① 引文摘自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

再珍惜昔日的欢乐，竟然有意地离开正路，寻找旁门左道的嗜好，不健康不和谐的强烈刺激，有时是可怕的怪癖，对健康之美失去了审美的感觉，失去了分寸感，追求极端的例外。所以说美是一切健康的东西所固有的，亦即生活欲望所固有的，是人的肌体所不可或缺的需求。美是和谐，美是宁静的保证。美为人和人类实现其理想。有人要对我们说："等等，您说的是什么理想？我们想要现实、生活、生活的气息。比如我们整个社会正在解决某个当代的问题，社会力求达到自己设定的结果、理想。诗人同样应该力求实现这个理想。可您不去实现它，不去向社会解释它，反倒突然歌颂起狩猎的狄安娜[1]或者抚琴的劳拉[2]。"这话不错，很有道理。在回答这个反驳之前，让我们先补充一点儿不相关的意见，然后再回到正题，回答您这条精彩而且十分公正的见解。

在本文开头我们已经说到，通向有益之途，正常而且自然的途径，我们尚不清楚，至少不能确切指明。的确，如何能够清楚而无争议地说明需要怎样做才可达到我们盼望的一切理想境地呢？怎样才可达到整个人类所期望所追求的目标呢？人们可以猜测、可以发明、可以假设、可以研究、可以幻想和推算，但不可能算出人类未来发展的每一步，像看日历那样。所以，怎么能够完全准确地认定什么是有害的，什么是有益的呢？不仅未来是如此，就是讲我们的过去，我们同样也不掌握准确可靠的材料，说明达到有益目的的所有途径和歧路，亦即达到有益目标的整个正常的进程。我们在研究这个途径，在猜

① 原是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女神，但后来在传说中，与希腊女神阿耳忒弥斯混为一体，成为狩猎女神。

② 这里引用席勒（1759—1805）《抚琴的劳拉》（1781）一诗中的形象。

测它，我们建立种种体系，寻找因果，不过仍达不到日历般确切。历史学至今还不能算精密科学，尽管历史事实纷呈于我们面前①。因此，举例说，您怎么计算、确定、权衡《伊利亚特》给人类带来了许多益处？它在何处、何时、何种场合是有益的？最后，它对某一民族在其某种发展阶段上产生了什么影响，这影响又有多少（比如多少磅、普特、尺、公里、度等等）？如果这些我们都说不清楚，要是现在必得果断严格地给人们确定该干什么，指出艺术达到有用并实现自己真正使命的正常途径，那也可能要犯错误。您只要一承认可能犯错误，有些事可就很难说了，说不定抚琴的劳拉还是有些用处的。当然，美总归是有用的，这个我们姑且不说。我们要说（声明在先：可能我们的话是闻所未闻、肆无忌惮的谬论，请别见怪，我们只是假设而已），《伊利亚特》其实比马尔科·沃夫乔克更有用，不仅过去如此，现在涉及一些当代的问题，同样如此。所谓用处，是作为一种手段可达到某种目的，可解决这些问题，可完成一些经常性任务。要知道直到今天人们读《伊利亚特》也还为之怦然心动。因为这部史诗反映了十分充实有力的生活，反映了人民生活的高涨时刻，而且又是那样伟大的一个民族，因此在我们这个充满追求、斗争、动摇和信仰（因为我们的时代是个信仰的时代）的时代，亦即生机勃发的时代，此书体现出来的永恒的和谐，会对我们的心灵发挥极其重大的作用。如今我们的心灵极易感受，美、和谐、力量能给心灵以强大的感染，有益的感染，充实我们的精力，巩固我们的力量。有力量的东西喜欢力量，谁有信仰谁就有力量，而我们是有信

① 这一段话与《地下室手记》一书主人公的议论（开头部分）是一致的。

仰的，更主要的是我们希望有信仰。试看，钻研《伊利亚特》并在艺术上模仿它，在反对纯艺术的人们眼里，为什么会是大逆不道呢？那是因为我们宛如死人，犹如终了世事的人，或者害怕未来生活的懦夫，或者我们中那些本来还富有生命力和进取心却漠然加以背弃的人，或者精神衰弱到了不理解我们也有生活的人，出于绝望而投向《伊利亚特》时代，借此为自己臆想人为的现实，人为的生活，既非我们创造也非我们经历的生活，臆想虚无但却诱人的理想。又因为我们仿佛是卑微的小人，从古老的时代借用、窃取生活，好像无能的模仿者在艺术鉴赏中销蚀自己！从类似责难的观点看，不能不说功利主义者是极其高尚的。也正因此，我们对他们无限同情，因此我们才愿意尊敬他们。可惜的是，这个派别和这些责难并不正确。且不说我们已讲到的对美的需求，且不说人类部分地已确定了永恒的理想（这已成了世界的历史，并通过人类共性而同现在与将来联结到一起，永远不可分离），且不说（这点我们要向功利主义者指出）对过去的生活和过去的理想可以不持幼稚的态度而持历史的态度。人在探索美的过程中，经历了痛苦的折磨。如果我们理解了他过去的理想，知道他为理想付出了怎样的代价，首先我们就会对整个人类表现出无比的敬重，用对他的同情心来纯洁我们自己。我们也就会明白：这种对过去的同情和理解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保证，保证在我们的身上存在有人道精神、生命力、进步和发展的能力。此外，对过去也可以采取（所谓的）拜伦态度。在生活与创作的煎熬里，时而不仅感到悲观失望，而且是极度愁苦，产生不可名状的不安、动摇、怀疑，但同时又对人类过去一些壮丽终了的人类命运无限感慨。面对过去创造而留给我们的作为永恒遗产的美之理想，我们激动万分（即我们所说的拜伦式的态度），在这激动之中，

我们常常流露出对今日的忧郁。这不是因为我们面对自己的生活的无能为力，相反是出于对生活的强烈渴望，出于追求理想的苦闷，这是我们在煎熬中所要达到的理想。我们知道一首诗，可说是这种激动心情的体现，是热烈的呼号，是对往昔完美的膜拜，是在内心深处渴求同样的完美，这正是我们的心灵在寻找的完美，而为此尚须长时间的探索，尚须经受诞生的痛苦。这首诗题名《狄安娜》，是这样写的：

狄安娜①

贞洁女神的丰盈体态，
晶莹裸露，一片灿然，
丛绿之间，下临清流，
我望见她那无色的细眼……
宽大的额头高高仰起，
凝滞的神情向谁寄念？
仿佛体贴的石女在聆听，
有众女祈祷于痛苦的心田。
一阵晨风穿树袭来，
拂动了水面明晰的脸庞。
我等着，她或许提起箭袋，
乳白一团透过林子闪动飘扬，
去俯瞰睡梦的罗马——永恒的荣光，
探看黄涛滚滚的台伯河，成群的柱廊，
还有高耸的草垛……可大理石纹丝不动，

① 此处指作为狩猎女神狄安娜的雕塑像。

只对我炫示美玉的绝响。

最后两行诗充满强烈的生命力，充满惆怅和意蕴，它如此出色，如此富有生气，我们在全部俄国诗歌中找不到堪与比拟的。这个逝去的往昔，两千年后在诗人心中强有力地复活，使得诗人在祈祷和激动之中期待并相信女神立刻会从碑座上走下，来到他面前：

乳白一团透过林子闪动飘扬……

然而女神没有复活，她也无须复活，她无须再度生活，她已经攀到了生命的顶峰，获得永生。时间对她来说已然止步。生活达到了这个顶峰便停止了，继之而来的是庄严的宁静①。只有未来是无穷无尽的，它永远召唤着，永远新鲜，那里也有自己的顶峰，需要去探求，永恒地探求。这种永恒的探求便是生活。在诗人的激情里隐含着多少痛苦忧伤啊！在他这追怀过去的激情里，有着无尽的对今天的呼唤，对今天的忧伤。

当然，我们承认，也可能存在令人厌恶的迷恋古典诗文的蠹虫，它的确丧失了现实感，不理解它自己也有生活，钻到过去的古典诗文中做窝，不知有自己，不知有问题，不知有生活的痛苦，不知回到这里来。不过，第一，蠹虫也得生活；第二，比起它来，那一群难以计数的分文不值的进步派也好不到哪儿去。这些进步派盗窃人的信仰，盗窃人的良心，讥笑远胜

① 这里可能也暗指费特的著名诗篇《米洛斯的维纳斯》，特别是最后四句：一脸爱神的激情，凝伫于大海涛中，浑身是无坚不摧的魅力，你放眼面前的永恒。

过他们的先人，却又个个是笨伯，听人呵斥却又傲气十足。有什么办法呢?! 这两种人都要过活嘛! 现实中真是无奇不有! 又有什么办法呢!

现在我们提出自己主要的也是最后的答案，解释您那个很有道理的问题：为什么艺术的理想并不总是同普遍理想、当代理想完全一致? 说得更明确些，为什么艺术并不总是忠于现实?

我们对此的回答已经胸有成竹。

我们指出过，关于艺术问题，据我们的观点，现在的提法就不正确，又由于两派的激烈斗争变得混乱而走向极端。现在我们要重申这一看法。的确，问题提法已经不对，也就没什么好争论的了，因为：

艺术总是现代的和现实的，从来没有别的存在形式，而且主要是不可能以别的形式存在。

我们逐一来回答所有的反驳意见。

第一，如果说有时我们觉得艺术在回避现实，不是服务于有益的目的，那么这仅仅是因为我们不能准确地把握艺术达到有益的途径（上文已经讲过)，此外又由于我们过于热切地希望能直接地立即地得到益处。换言之，本质上是由于热烈期望普遍地获益。这种愿望当然是值得赞许的，只是有时显得不尽合理，好像孩子看到了太阳，非得大人从天上摘下来给他。

第二，有时我们感觉艺术回避现实，是因为真的有发了疯的诗人和小说家，他们同现实断绝了一切关系，对当今来说确乎已在死去，变成为某种古希腊人或中世纪的骑士，落得在古典文选中或中世纪传说中苟延残喘。

这样的蜕变是可能的。但如此作为的诗人、艺术家，完全是疯子。他们为数不多。

第三，我们的诗人和艺术家确实可能离开当今的道路，原因或是不理解自己的公民义务，或是缺乏社会嗅觉，或是对社会的关注力过于分散，或是不够成熟，或是不懂得现实，或是由于某些历史原因，或是因为社会尚未完全定型，由于许多人都各有所好。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波夫先生的号召、责备、开导，都十分可敬。不过他走得太远了。他称为小玩意儿和画册小装饰的东西，我们从另一方面看，却认为是正常而有益的。因此，诗文选里的诗人并非个个全是疯子（——波夫作如是观），疯子只是那些完全背离当今现实的人，像我们一些终年居住在巴黎的太太们，俄语完全弃而不用（不过，这全听她们自便）。“小装饰”的用处依我们看，就在于把我们的历史和内心精神生活同过去的历史，同人类共性联系起来。势所必然，有什么办法呢？要知这是自然的规律。我们甚至觉得，人越善于回应历史和人类共性，他的胸襟就越开阔，生活就越丰富，这样的人越易进步和发展。不可把人束缚死了，说这才是你需要的东西，那个不是，我想你不该有；你得这样活着，不能那样活着！不论你这么约束有什么理由，谁也不会听你的！还有一点，我们相信在俄国社会里，如此号召走向人类共性，社会的创造力也回应历史和人类共性，以至回应所有这些不同的主题——这甚至乃是这一社会最正常的状态。至少迄今为止是这样，还有可能在这一社会中永远延续下去。不仅如此，我们觉得这种人类共性的回声，在俄国人民中间要比所有其他民族更强烈，构成俄国人民一个最崇高最美好的特征。由于彼得大帝改革的结果，由于我们突然强烈地感受到多种不同生活的结果，由于追求生机的本能起了作用，我们的创作也应该独具特色而不同于任何民族。您这几乎是在反对我们的正常状态。要知道，欧洲诸国的文学过去对我们来说几乎就是自己

的文学，如同己出，在俄国生活当中都得到了反映，犹如在自家的生活中。——波夫先生，请您回忆一下，您岂不也是这样教育出来的吗！您怎么认为，茹科夫斯基① 现象不可能出现在法国呢，普希金现象就更不用说了。欧洲最伟大的诗人中，对一切人类共性的东西，可有谁能像我国诗歌的代表普希金那样做出那么亲切那么全面的回应呢？部分地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才称普希金是伟大的民族诗人（将来还要称为直接意义上的人民诗人），所以这么赞誉是由于他充分地体现了这一历史时刻里俄罗斯精神的走向、本能和需求。要知道这可说是整个俄罗斯人的现代典型，至少体现着他的历史意向和人类共同的追求。总不能说（因为在书斋里有过此论）所有这些反映整个俄罗斯精神的意向，全是无益的、愚蠢的、毫无道理的。难道您真的认为波沙侯爵②、浮士德等等对我们俄国社会及其发展，过去和将来都没有用处？要知道我们同他们一起不是远上云天，而是接近了当代的各种问题，也许他们对此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正由于这个缘故，所有这类文选作品如《伊利亚特》、狩猎女神狄安娜、维纳斯和丘比特③、圣母和但丁、莎士比亚、威尼斯、巴黎和伦敦，全都在我们这里合法地存在，而且也理应如此。因为第一，这是人类共同生活的规律，我们与这共同生活密不可分；第二，这是俄国生活的独特规律。

“干吗要您来教训我们哪！”功利主义者会对我们这样说。“您不讲我们也清楚，自从我们进入了人类整体，这一切与欧洲的联系，都对我们十分有益。我们之所以清楚，因为我们全

---

① 瓦·安·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诗人。他在普希金之前，为俄国诗歌发展做过重大贡献。

② 席勒剧作《堂卡洛斯》（1787）中的主人公。

③ 罗马神话中的爱神，司情欲。

是从这里走过来的。只是现在我们暂不需要什么人类整体，也不需要什么历史规律。现在我们在做家居清扫，在洗涮脏衣服。现在我们家里到处摆的木盆，到处是水响，是肥皂气味，泡沫四溅，木地板全已打湿。现在该写的不是波沙侯爵，而是自家的事，是众人关注的问题，是消息公开，是益处问题，是克鲁托戈尔斯克，是黑暗的王国①。”

我们对此回答如下：首先，什么需要而什么不需要，要精确或用数字来确定是很困难的。可以猜测，可以估计；应该允许也理应在实践中去尝试，看是否符合预想；还可以希望、说服、劝告别人参与共同的活动，所有这些全都合乎情理而且极其有益。但是要在《现代人》上发命令，提要求，作指示，规定你一定写这个，不准写那个，那就错了，而且徒劳无益（起码人家不听你的。当然，我们中间胆小的人也不在少数，有人对评论怕得厉害，加之自尊心很强，不愿落在先进者后边。于是便追随潮流写作，可又不是发自灵感，写出的东西几乎都不值一提。不过我们评论界的专制态度会过去的，人们将要按心愿写作，会多些自己的特色，也许在揭露方面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上帝保佑吧!)，再说也容易搞错。要知道很有可能，被我们的进步人士认定为不够现代因而无用的东西，却恰好是现代的、有益的。病人不可能同时又是病人又是大夫。可能意识到自己患病，意识到我需要服药，甚至通常知道该用什么药，

① 克鲁托戈尔斯克是谢德林《外省散记》中的省城，黑暗的王国是杜勃罗留波夫对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艺术世界的概括。这里均指杜勃罗留波夫对这两位作家的评论文章：《外省散记》(1857)，《黑暗王国》(1859)，《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1860)。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外省散记》的分析，接近杜勃罗留波夫。他很赞同杜勃罗留波夫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的评论。

但无法给自己开一个确切的处方。而如果说诗、语言、文学也是药物，那么这里也有一个衡量的问题：什么药好用，什么药不合适。衡量的办法是，诗人在群众中赢得的好感越多，他便越加名副其实。当然，这里可能出现大错，发生重大偏差。有过类似的例子：人群此刻不懂得自己需要什么，不知道自己该爱什么，喜欢什么。不过这种偏差很快会自行纠正，社会总能自己找回失去的途径。关键在于艺术总是要高度地忠实于现实，而偏差是短暂的，转瞬即逝。艺术不仅总是忠于现实，而且它也不可能不忠于当代现实。否则它就不是真正的艺术。真正艺术的标志，正在于它是现代的、迫切而有益的。如果艺术为文选而创作，那就是说还需要文选，偏差失误可能有，但再重复一遍：这是一时的。不属于现代的艺术，不符合现代需求的艺术，根本就不会有。如果有那就不是艺术，它变得浅薄，退化，丧失力量和一切艺术性。在这一点上我们比——波夫先生走得更远。在他的思想里，他还承认存在有无益的艺术，纯艺术，不属于现代也非迫切所需的艺术，然后对此大加讨伐。而我们根本不承认这种艺术，因而也就平心静气，用不着兴师问罪。即使出现了偏差，也无须为此不安，那会自己纠正过来，而且很快。

有人问我们："且慢，您根据什么，凭什么作结论说，真正的艺术绝不可能是非现代的，是不忠于实际现实的？"

我们回答说：

第一，从全部的历史事实来看，自世界伊始直至今天，艺术从未脱离开人，总在符合人的需求和人的理想，总在帮助人寻找这个理想。艺术同人一起诞生，同人的历史生活一起发展，同人的历史生活一起消亡。

第二，（也是主要的。）创作、任何艺术的根底，在人身上

都是他部分肌体的表现，是同人生活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其结果，艺术除了整个人所追求的志向之外，不可能再有其他的意向。如果艺术另择道路而行，那它就要与人分道扬镳，由此也就要背离自然的法则。不过人类现在还很健康，没有死亡也没有背离自然法则（总的说来）。所以也无须为艺术担心，它也不会背离自己的使命。艺术将永远同人一道经历人的真实生活，此外别无可为。因此，艺术将永远忠于现实。

当然，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可能脱离正常的现实，脱离自然的法则，那么艺术也伴随他脱离现实。但这正好说明了艺术与人的密不可分的联系，说明了艺术永远忠于人和人的志趣。

尽管如此，唯有当人们不限制艺术的发展自由时，艺术才能忠于人。

所以，首要的事就是不用种种目的去束缚艺术，不给它规定各种戒律，不给它增添麻烦，因为它本来就遇有许多暗礁，许多同人的历史生活密不可分的诱惑和偏差。艺术越是自由地发展，越能发展得正常，越能迅速地找到自己真正的有益之路。由于艺术的兴趣和目的，同它所服务的、与它连成一体的人是一致的，因而艺术的发展越自由，它给人类带来的利益就越大。

但愿能理解我们，我们所希望的恰是让艺术永远符合人的目的，不要同人的利益脱节，如果说我们希望艺术有最大的自由，那正因为我们相信艺术的发展越自由，它就越能符合人的利益。对艺术不能硬给它规定什么目的和好恶。艺术如果得到正常发展，不用您规定，按照自然的法则也不会背离人的需求，又何用您去规定，又何用您去怀疑呢！艺术不会走失，不会迷路。它总是忠于现实，总是与人的发展进步并行不悖。追求美，追求正常，这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是不会消亡的。所以

让艺术走它自己的路吧！要信任它不会偏离正道。即使偏离了，也能立即回头，重新适应人的需求。美就是正常，就是健康。美是有益的，因为它是美，因为人类无时无刻都需要美，需要美的最高理想。如果说人民中间保留了美的理想、美的需要，那就意味着也存在对健康的需求，对正常的需求，由此也便保证了这个人民的高度发展。个人无力完全地把握永恒的普遍的理想，哪怕他是莎士比亚，因此个人也不能给艺术规定出道路和目的。猜测吧，希望吧，论证吧，呼唤吧，这些都是可以的。但硬作规定是不行的，搞专制是不行的。可是，——波夫先生，就拿对尼基京[①] 先生来说，您的态度也近乎专制了："写您自己的需要吧！描写您自己那个阶层的需求吧！不要讲普希金！不要赞美什么普希金，去赞美那个吧！去描写那个吧！"尼基京先生大发感慨（或是我们替他说）："可普希金是我的旗帜！是我的灯塔！是我发展的方向！我出身市民，是普希金向我伸出了手，他那里有光明，有文化，没有令人屈辱的成见，至少不像在我的周围。普希金是我的精神食粮！""这全是胡扯，没有必要！还是写自己的需要吧！"尼基京先生接下去说："要知道我是一个穷汉！物质的食粮我是有的，可我需要精神的食粮。您既然希望人们都富有，不要剥夺我的这种食粮啊！您祝愿人人富有，可事情一来，您先就夺走了我的食粮！您想让我写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需要。也许我会去描写的。不过现在先让我品尝品尝上等的生活。对您来说这不是上等的生活，您已经看不上眼了，可对我来说，您知道吗？它是很有诱惑力的呀！……"我们则从自己的角度要补充说："我们愿为尼基京先生担保，让他先照自己的心愿生活一段时间。普希金

① 伊·萨·尼基京（1824—1861），俄国诗人。

今天对他就是一切。要知道我们接近现代问题，也是经过了普希金的。要知道对我们来说，普希金也曾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的源头。而对尼基京先生来说，普希金不仅是亲切而已。普希金是旗帜，是一切渴求学识与发展的人们相互交会之处；因为普希金在我们所有的诗人中是最富艺术性的，因此也最平易，最诱人，最好懂。正因为人人都懂，他才是人民的诗人。尼基京先生先通过普希金这一段，而后如果他真有才华，请——波夫先生相信，他会像我们一样接触到现代的问题，将会带有倾向而写作。可现在要求他这样，真是……真是……怎么说呢?！真是不会走就学跳了……”

说得够多了！我们无缘认识尼基京先生，不知道他的社会状况。我们只晓得他是位平民,这是他出版作品时自己宣布的。假如尼基京先生的状况完全不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样子,我们请他原谅。如果那样,我们就当假设一个抽象的人,是某先生。

摘录与批语

1①. “人的精神在追求教养时，总是在相互对立的倾向中间热衷于某一个，或是因循的妙处，或是求新的妙处……这一差别确曾存在，而且任何时候都理应存在……不仅在政治中，甚至在文学中，在一切艺术中，在任何科学中，在外科手术中，在机械学中，在航海中，在种植业中，甚至在数学中……我们都看到这两种对立的倾向……到处都有一种人，对古老的一切事物趋之若鹜……到处有另一种人，善于迅速发现现有一切事物的缺陷……而将任何新颖的事物视为改善。在一定程度上，两种倾向都值得赞许。两派里的优秀分子都距离中线不远。一派里的极端人物，是假道学和老朽的空谈家；另一派的极端人物，则是浅薄的夸夸其谈者和粗疏的半瓶醋。”（以上摘自 Macaulay，The History of England②，vol. I,p.96,97.转引自

---

① 这里的摘录与批语，据原来手稿。所以此篇标 1，但下一篇（关于谢梅夫斯基的）没有标 2，却另立标题，体例上显得有点凌乱。

② 英文：麦考莱:《英国史》。按：托·麦考莱（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堡科学院国外通讯院士（1858），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曾任陆军大臣（1839—1841）。在其《英国史》著作中，赞扬 1688—1689 年的“光荣革命”。

奥普图欣〔帕夫洛夫〕的文章《俄国文学中的东方与西方》，载《莫斯科导报》，1859 年。文中关于斯拉夫主义、共产主义、彼得大帝、农民村社的土地所有等，都有精彩的论述。)

又：关于麦考莱。根据上面转引的麦考莱的话，可得出结论：一方面是假道学和老朽的空谈家，另一方面是浅薄的夸夸其谈者和粗疏的半瓶醋，两者根据自然法则都是不可避免的，不仅不能不存在，甚至是不应该不存在。

谢梅夫斯基[①] 评乌斯特里亚洛夫[②]著《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皇子[③]》一文(《俄国言论》，1860 年，第 1 期) 的批语

第 8 页。梁赞总主教斯特凡·亚沃尔斯基[④] 的讲话。其思想极为自由、大胆，如果想一想牧师们在伊丽莎白[⑤] 在位期间的布道词（奉承、献媚、昧着良心)，不能不感到惊讶，这些人怎么能面对“残暴的嗜血者”（如彼得）讲这种话？而据

① 米·伊·谢梅夫斯基（1837—1892)，俄国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著有 18—19 世纪初的俄国历史著作。

② Н. Г. 乌斯特里亚洛夫（1805—1870)，院士、彼得堡大学教授。

③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1690—1718)，彼得大帝之子。他优柔寡断，缺乏意志力，反对他父亲彼得的改革，逃亡国外，回国后被判死刑，死于监狱。

④ 斯特凡·亚沃尔斯基，俗家名谢苗·伊凡诺维奇·亚沃尔斯基(1658—1722)，俄国宗教活动家、作家。他曾是彼得大帝的亲信，后来反对彼得，特别是反对彼得企图将教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

⑤ 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1709—1761/62)，彼得大帝之女，1741 年依靠近卫军拥立，登上皇位。

这同一位谢梅夫斯基的说法，较之这残暴者，伊万雷帝简直是个浪漫主义者。这就是说，在彼得时代，人们是能够公开大胆议论彼得的。为什么能够呢？该有原因吧！是什么原因呢？是彼得允许人们讲实话，还是斯特凡·亚沃尔斯基有恃无恐？所恃为何呢？是靠阿列克谢皇子的力量，靠他的党羽？可谢梅夫斯基明确讲，他并没有自己的党羽（第 23 页）。

在斯特凡的这次讲道中，说到上帝要把太平赐予热爱上帝的人，因此俄国不会有太平，混乱的俄国正动荡不安（俄国就是彼得。径直讲明彼得不喜欢上帝和上帝的律条）。更挖苦说：我们这里是什么律条呢？设立了行政监事，它为所欲为……此后又蛮横、大胆并不安分地对阿列克谢圣徒说，让他别忘了自己的同名者（皇子）、上帝律条的保护者、“我们唯一的希望”。

如果真是讲了这类布道的话，那么一定是由于某些原因人们才敢讲话。彼得动怒了，险些（谢梅夫斯基语）把斯特凡罢黜。是险些！这似乎与彼得的嗜血性格不大协调（第 9 页）。

(2)① 谢梅夫斯基到处偏袒阿列克谢。阿列克谢写了封恶劣的骂人信（第 27 页），谢梅夫斯基马上说，这是当时的风气使然；他喝酒（第 21、23 页），也是那时的风气；他打人（第 3、16 页），还是当时的风气。而对彼得节制色欲，却挖苦地说这种情形在彼得身上极其少见（第 21 页）……

(3) 阿列克谢与凯撒②。皇子对凯撒说：“我可请上帝作证，我从没干任何不利于父亲和他的统治的事，从没想挑起人民的愤怒，其实这不难做到，因为人民爱我而恨我父亲，恨他

① 原文如此，上面第 1 部分没有标出 (1)。

② 凯撒为古罗马皇帝称号。此处指奥地利皇帝卡尔六世（1685—1740），他拥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尊号。彼得大帝之子阿列克谢皇子曾投奔他。

那不得体的皇后，恨他用些险恶的宠臣，恨他灭绝了淳朴的古风旧习，却引进了许多恶习；还有就是父亲不惜流血和挥霍财富，是暴君，是自己人民的敌人。”（第20页）这话很明确，看得出皇子是如何理解和仇视彼得及其改革的。显然，他如果即位，一切定会走上老路。

（4）谢梅夫斯基在其《阿夫多季娅·费奥多罗芙娜·洛普希娜》一文（载《俄国导报》）中，引用了一些材料（多西费娅与叶夫多基娅的通信），从中清楚地看到当时他们希望彼得去世由阿列克谢登位，废除改革；他们甚至寻找机会制造阴谋（王子与婶母玛莉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的谈话）。

（5）叶夫罗西尼娅的证词。“信是皇子自愿写的，用俄语写于那不勒斯堡。他还亲自写信给凯撒抱怨父皇。他盼着有机会可以兴高采烈地回俄国去。当从国内获得不实消息说俄国军队中出现种种骚动时，他曾经这么说过。他期望继承皇位，把希望寄托在枢密院的支持上。他想登基后把老人赶走，全换上新人。他想放弃彼得堡而迁居莫斯科。他想不再造军舰，不想战争；夏天到雅罗斯拉夫尔去住，满足于旧的领地。他说如果出现自己继母登基的情况，那就成女人国了。”（第38页）

这个供词是叶夫罗西尼娅亲笔写的。可是谢梅夫斯基说这是在威胁之下写的，不足为证（第37～38页）。为什么呢？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我们对阿列克谢性格的了解，看得出这的确是阿列克谢的思想。为什么所说的凡不利于阿列克谢的话——甚至极可能是真的——也全是不实之词，而不利于彼得的话，却全是公正的呢？

（6）谢梅夫斯基为说明彼得没有人性，举例说在将儿子囚禁到普列奥布拉任监狱那一天，他发布了禁伐橡树的命令，而此后刑讯的一天又颁发了关于采购怪兽的命令（第36～37

页）。这也许正说明彼得的伟大。

御座上是个永远工作的人。①

没有他别人什么也不干，于是他就得做事。这是个钢铁般的人。说他残酷，就算如此吧！

要知道这是亲生的儿子在反对他。彼得作为一个天才人物，只有一个目标：改革和建立新秩序。他不断遇到障碍，障碍使他愤怒……

（7）谢梅夫斯基说，没有任何一个事实证明皇子企图以武力夺取父亲的皇冠（第23～24、65页）。

姑且只当如此吧！然而，同母亲的关系，多西费，格列博夫，梦境，预言，投奔凯撒，寄希望于未来和凯撒，这些都说明，他倘如有一点儿机会，一定会起来反对父皇。问题还不在这里，主要是彼得处死阿列克谢不是因为武装叛乱，而是因为他担心，如果把国家传给这位皇子，会使自己的事业毁于一旦。对彼得来说，改革比儿子更宝贵，所以他处死了儿子。他认为皇子会葬送改革，这一点没有想错。谁也不会把新酒装到旧瓶里去② [有趣的是：谢梅夫斯基怀着憎恨，抨击彼得宫廷的腐败和粗暴（第6～7页），（其实在这一点上与当时各国一切宫廷并无二致）。但同时却只字不提阿夫多季娅·费奥多罗娜宫廷的腐败和伪善、龌龊。多西费，格列博夫，这一切是阿列克谢所同情的，看来也是谢梅夫斯基所同情的]。

① 此处引自普希金的《斯坦司》一诗（1826），在诗中普希金把当时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比作彼得大帝，为之歌功颂德，颇受进步人士的非议。

② 引自圣经的话。

（8）巴谢维奇说，叶卡捷琳娜曾为皇子求情（第40页）。

（9）谢梅夫斯基说：乌斯特里亚洛夫认为皇子死于刑讯，是三次吊打后过了十小时毙命的（根据某人在国家档案中看到的一份记录）。

谢梅夫斯基说：乌斯特里亚洛夫可以相信此人的话，可我们凭什么也得跟着他相信呢？（第49～50页）

原因在于谢梅夫斯基很想进一步嫁祸于彼得，说是彼得下令把儿子勒死的。他视彼得为自己的敌人。这已令人不可容忍了，历史学家是不能这样写的。

对谢梅夫斯基的话可以这么回答：谢梅夫斯基亲笔写的，说皇子受尽折磨，第二次吊起时已经胡说了，第三次吊过几乎就不能说话了（第39～40页）。很可能就是受了这样的折磨，十小时后精力衰竭而死。所以是可以相信这个说法的。

（10）在第39页上，谢梅夫斯基详尽而清楚地讲到对皇子的所有三次吊打，说他说胡话，发了疯，无法再开口等等（讲起来如目击者）。可在第57页上他又说："可以认为，围绕这个问题（指鲁缅采夫的信）的种种情况都是细枝末节。因为阿列克谢是在第三次吊打时被皮鞭抽死（请注意，对此只有一个神秘人物的口头证明），还是被人用枕头窒息而死，对后代人来说显然是无关紧要的。可是一个历史学家能够忽视这些细节吗？"

这话是谢梅夫斯基针对乌斯特里亚洛夫讲的。我们则要针对谢梅夫斯基说：一个历史学家难道可以这样明显地自相矛盾吗？

三　读书与识字

第一篇

读呀读，可后来突然一变。

（《智慧的痛苦》中法穆索夫① 语）

去年和今年我们这里的文学界与社会上纷纷议论，说需要有供民众看的读本。也有过出版这种书的尝试，提出了一些计划，就差没有设立奖金了。《祖国纪事》第 2 期刊登了一份读本计划，即大众读物计划，并且几乎是责备地对我们的文学家说：你们看，我们刊登出了读本计划，可有谁会响应呢？哪怕有谁能对此发表点儿见解也好！现在我们正是要作一番分析。

---

① 俄国剧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反面人物。

不过在分析之前先谈一谈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这就是上层社会普遍地张罗起社会底层的教育问题来。我们所以说是“普遍地”，因为真正的俄国上层亦即先进的阶层，总能够带动起俄国社会所有进步的阶层。因此即使现在还有不主张民众教育的人，不久便不存在了。所有的人都会跟着先进的多数走，如果还剩有极端的顽固派，也将毫无力量而缄口不语了。

我们把这一点讲得如此肯定，是因为社会上终于认识到全民教育的完全必要。这是靠社会自身取得了这种必要性的认识，看到这是自己生活的一个部分，是自己未来得以存在的一个条件。我们对此感到高兴。我们在杂志的启事中就说过：“识字是第一位的，加强识字和教育工作，是如今所剩的也是可行的唯一救国方法，唯一进步的途径。进一步说，即使还有其他可能的步骤，识字和教育也仍是应该而且要走的第一步。我们曾许诺要特别支持普及识字，因为这是我们同我们自己的根基、同人民生活相结合的唯一可能的途径。我们已经意识到这种结合的必要性，否则我们将无法生存。我们感到在脱离人民的生活中已经耗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用尽了也恶化了我们呼吸的空气，因而窒息得像由水里拖到沙土中的鱼一样。这些我们将在下文细讲。首先需要关注一个事实，这事实十分惊人又十分重要，甚至对俄国生活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它早已让我们吃惊，但如今表现得十分突出。从前我们也讲到过这一事实，但今天我们得到了鲜明的证据，说明我们没有讲错，它的确存在。

这个事实就是：我们这个“模仿欧洲方式”的文明社会，同人民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你们看，当真正行动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拿什么和用怎样的方法去接近人民。产生了全民

教育的想法，由此又产生了对民众读物的需要，可我们这时却完全陷入了窘境。我们的任务在于如何编写出这种读本？给人民读些什么？且不说我们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立即意识到，我们所写的一切，今天的和过去的文学，全都不适于给人民阅读。这一认识对不对是另一个问题。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大家似乎都毫无争议地赞同：人民对这种文学是完全无法理解的。既然赞同了这一点，我们就全都默认了这个事实：我们脱离人民。

人们会回答我们说："这个事实毫无特别惊人之处。问题明摆着，一个阶层有文化，另一个阶层没有文化。没文化的阶层不能一下子就理解有文化的阶层。这在过去和现在，不论什么地方，概莫能外，这里并不存在什么特别的意义。"

就算是这样吧，我们现在不辩论这个问题。然而我们至今仍未想出来该给人民读些什么。你们怎样看这一点呢？要知道不能不承认，我们在这里的失误是极其可笑的，是令人吃惊的。请你们看看这些民众"读本"的计划吧！（单只为此编写计划这一点，就够说明问题了。）计划都是由一些聪明人、认真的人拟就的，可是失误却一个接着一个，有些错误达到了可笑的程度。

我们再重复一遍：这些读本，这些计划，全是我们一些富有经验和才华的文学家编写出来的，其中有的还获得了洞悉人民生活的美誉。可是他们迄今为止做了些什么呢？

问题还不仅如此。从自己这方面说，我们十分确信，就连我们最好的人民生活"通"，也没有充分理解我们同人民之间的鸿沟是多么宽而又深。原因十分简单：他们从没有同人民生活在一起，他们过的是另一种独特的生活。人们会说，举出这种原因未免贻笑大方，因为这是尽人皆知的。我们说：对，是

尽人皆知，不过只是抽象地知道。比如他们知道自己过的是一种特殊的生活，可如果他们了解到这种生活不同一般到了何种程度，就连自己也不敢相信。时至今日他们也不相信这一点。有人确实研究过人民生活，甚至与他们一起住过。不是说在地主庄园里同他们一起住，而是在人民之中，在他们的农舍里，看到了他们的贫困，察觉到他们的一切特征，感受到了他们的愿望，知道了他们的看法，甚至了解到他们思想的特点，等等等等。这些人也同人民一起吃过饭，吃他们的饭，有的还同他们一起喝过酒。更有人甚至同他们一起干过活儿，干平民百姓的活儿，虽说为数不多，但的确有。结果呢？这些人自信了解人民。如果我们反驳他们说："先生们，你们只知道些表面的情况。你们很聪明，你们多有发现，但是真正的生活，生活的本质，生活的核心，你们却并不知道！"平民百姓听了会哑然失笑。他们能同你们说话，能对你们讲自己的事，能同你们一起欢笑，也还能当着你们的面哭泣（虽说不是同你们一起哭泣），然而他们永远也不把你们看做自己人。人民绝不会认真地视你们为亲人，为自己的弟兄，为自己真正的乡亲。他们什么时候也不可能同你们相互信赖。哪怕你们自己（或受命运驱使）穿上了粗布衣服，甚至同他们一道干活儿，什么劳作都担当，他们仍然不会信赖你们。是一种无意识的不信赖，也就是说即或想信赖也做不到，因为不信任感已经深入骨髓了。

显而易见，原因首先在于我们过去的整部历史，其次是基于利益不同而多年长久地相互隔绝。如今想获得人民的信任，必须经过争取；应该热爱人民，应该经受些痛苦，应该完全变成人民。我们会这样做吗？我们做得到吗？我们达到了这个地步吗？

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在努力，一定能达到这个地步。我们

是乐观主义者，我们有信心。俄国社会必须与人民根基相结合，吸收人民的成分。这是俄国社会能够存在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而当一件事成了一种迫切的需要时，它自然一定会做到。

确实如此。然而怎样做到呢？

今年政府通过崇高的宣言①，赐给人民以新的权利，以此号召人民表现出最大的自主性和主动性，一言以蔽之，是呼吁人民获得发展。不仅如此，政府把我们与人民之间的鸿沟填上了一半，余下的事要由生活来完成，要使许多因素从此成为人民未来生活的本质特点。与此同时，上层社会在经历了接近欧洲的时代之后，在度过自己的文明时代之后，如今亲自感到了接近自己根基的必要性。这一必要性在很久以前就已为人预感到了，而今刚一有了机会便表现了出来。上述两个历史现象同时出现，并将相伴而行。

说来凑巧，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各家刊物以相当多的篇幅讨论民族性问题。态度特别激烈的是《祖国纪事》。《俄国导报》顺利地走上了自己崭新的布尔加林的道路②，据《祖国纪事》的证明，结果它甚至怀疑是否存在俄罗斯民族性。

是谁对《俄国导报》愤懑不已呢？是谁在《俄国导报》面前认真地维护起俄罗斯民族性存在的真实性了呢？也就是要向它证明俄罗斯民族的存在呢？却正好是《祖国纪事》本身，是不承认普希金创作中有任何民族因素的《祖国纪事》，这岂不可笑吗！

---

① 当指当时实行的农民改革。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 1861 年 3 月 3 日（俄历 2 月 19 日）宣布废除农奴制。

② 法·韦·布尔加林（1789—1859），俄国作家、新闻工作者。在当时是反动文人。走布尔加林的路，在此处当是指否定俄罗斯民族性的存在。

而《祖国纪事》却说：

> 一年前我们讲过的一个思想（即普希金创作中毫无民族的因素），并非是刊物极其愤慨时的产物；这种愤慨常常令许多人发出奇谈怪论，目的只在吸引别人的注意。谢天谢地，我们还没有必要出此下策①。

我的天哪！我们相信，我们完全相信！你们那么善意地攻击了普希金，一年来又那么善意地抱怨文学家们没能认真对待你们这篇大作，使得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把你们当成愤怒的赫洛斯特拉特之流②。你们并不需要那种名声！你们都是“有学问”的人，你们最珍视的是“真理”。而照我们的看法，你们简直就是德国式的书呆子，却染上了彼得堡的习惯，手里打着灯笼到处寻找俄罗斯民族性，而它总躲着你们；可鼻子底下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却视而不见。

不妨假设一下，把这可笑的事情说到底。假设你们要同《俄国导报》辩论，向它证明确实存在俄罗斯民族性，而它则论证没有这个民族性。倘若此时俄罗斯民族性亲自找到你们头上来，那又如何是好呢？那时，那些不符合《俄国导报》的一大堆英吉利理论和英吉利标准的俄罗斯民族性③，该如何处置

---

① 引自斯·谢·杜德什金（1821—1866）述评文章《俄国文学》。他当时（1860—1866）是《祖国纪事》的主编和发行人之一，负责该刊评论栏。上面引文中括号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点出此文基本思想的话。

② 赫洛斯特拉特，出生于以弗所的希腊人。他为了扬名后世，于公元前356年纵火烧毁阿尔忒弥斯神庙，以弗所人因此曾禁止人们提他的名字，但他的名字仍在一作家的著作里保留下来。

③ 《俄国导报》主编米·卡特科夫是英国迷，所以他如此讽刺他。

呢？我也能想象出《祖国纪事》中维护俄罗斯民族性的人会怎样。他会大为惊讶。

“可这并不是俄罗斯民族性啊！”他直望着俄罗斯人民性说。

“不，这是俄罗斯民族性。”有人回答他说。

“哼！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反正我认不出它来。”

“这非常有可能。只不过这的确是它！”

“哼！真是吗？”

“真是！”

“有点难以相信……第一，这个现象有根据吗？它是否符合公认的科学原则？好像布斯拉耶夫[①] 在自己书中说过……”

如此等等，如此等等。一句话，重演了“玄学家”的故事。

是的，他们是一些形而上学者。他们对我们说（我们不止一次听到过），《祖国纪事》羞于回答。为什么呢？这真是贵族派头！他们对我们说，没法同连最简单的东西都不懂的人、连俄语都不懂的人谈话，就好比不能同瞎子谈颜色，同聋子谈音乐一样。

就算是难以同瞎子谈颜色吧，不过我们根本没打算改变这份学究杂志的观点。我们是同公众说话。我们承认甚至想专门发篇文章来回答杜德什金先生的所有见解。当然，要回答杜德什金先生是十分困难的，不过图省事是什么也办不成的呀……

① 费·伊·布斯拉耶夫（1818—1897），俄国语文学家和艺术理论家、莫斯科大学教授（1847 年起），后来（1881 年起）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他经常在《祖国纪事》上发表文章。这里谈到的是他的论著《俄国文学和艺术的民族性史纲》（第 1～2 卷，1861）中的见解。

比方说，不妨设想一下《鲍利斯·戈都诺夫》[①] 中俄国编年史家的形象。突然有人对您说，这个形象身上没有任何俄国的味道，没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民族精神，因为此人是虚构的，是编出来的；因为在莫斯科王朝里从来没有过那种遗世独立的僧人兼编年史家，他们为尘世而死，而他们以平和睿智悟得的真理对他们来说高过了一切。人们又对我们说，编年史家几乎都是宫廷人物，喜欢耍阴谋，偏向某一边。您听了会惊呼起来：即或是这样，难道普希金笔下的编年史家因属虚构而不再是可信的古俄罗斯人吗？难道因为不符合历史事实他身上便没有俄国生活和俄罗斯的民族因素吗？那么诗的真实性呢？能说诗仅仅是游戏吗？能说阿喀琉斯[②] 不算真正的希腊典型，仅仅因为他可能从来都没存在过？难道能说《伊利亚特》不是古希腊的民间史诗，因为其中所有的人物显然取自民间传说，甚至可能纯粹是虚构出来的？

要知道《祖国纪事》恰是到处炫耀诸如此类的论据。

在这种情况下，同它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它对事情的关键、事情的核心是一窍不通的呀！

例如奥涅金[③] 在它看来不是民族的典型，此人身上毫无民族的因素。这只是 20 年代上流社会一个二流子的肖像而已。

谁敢与之争论试试看！

我们可以这么说："怎么不是民族的典型呢？请问除了奥涅金这个典型，哪里又在什么时候如此充分地表现出了那个时代的俄国生活呢？要知道这是一个历史的典型呢！要知道这个

---

① 普希金创作的历史剧（1825）。

②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人物。

③ 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夫盖尼·奥涅金》（1825—1833）中的主人公。

典型异常鲜明地表现出只有俄罗斯人在特定的生活阶段上才能够表现的那些特点。正是在这个阶段上，文明第一次让我们感觉到是生活本身，而不是随意的附加物。也就在同时，一切疑惑不解，一切当时不可解决的奇怪的问题，第一次从各个方面包围了俄国社会，闯入社会的意识中。那时我们莫名其妙地面对着我们所走的欧洲道路，感到无法离开这条道路，犹如无法离开我们坚定接受的真理。然而就在同时，我们又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俄国人，亲身体验到难以割断同祖国土壤的联系而去呼吸别国的空气……”

“可您凭什么说这一切都能在奥涅金身上找到呢？”学者们会打断我们说，“他身上果真有这一切吗？”

“这还用说吗？当然有啦！……奥涅金恰好属于我国历史上的那个时代，那时我们几乎是首次开始了痛苦的觉醒，而环顾四周之后又产生痛苦的疑问。普希金现象同样属于这个时代，因此他才第一个独立而自觉地运用俄语从事写作。那时我们都豁然醒悟，在周围的俄国生活中发现了奇怪的现象，不符合所谓我们欧洲式的东西；可同时又不晓得这是好还是坏，是丑陋还是美好。正是从这时开始，我国的进步人士截然分成两派，后来展开了激烈的内战。要知道，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一种深刻的民族现象。他们的出现所表现的实质内容，绝不是从书本里来的。您想想是不是这样呢？不过在奥涅金的时代，对这一切还只有初步的感觉。那时我们既惊奇虔敬，又稍带讽刺味道开始明白：做俄罗斯人意味着什么。尤为奇怪的是，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刚刚真正意识到自己是欧洲人，明白了我们同样应该融入人类的生活。文明结下了果实，我们逐渐懂得什么是人，他的尊严和意义。这些当然是借自欧洲创立的概念。我们懂得了要成为欧洲人不光得穿长

袍，抹胭脂。可明白了这些之后，又不知该做点儿什么。渐渐地认识到我们确也无事可做。没有留下什么事让我们自己来做。苦恼之中，我们便用怀疑的眼光审视起自身来。这已经不是康捷米尔式或冯维辛[①] 式的那种冷漠的表面的怀疑主义。奥涅金的怀疑主义从根本上就带有悲剧性，有时也招来愤怒的讥讽。在奥涅金身上，俄罗斯人第一次痛苦地意识到，至少是开始感觉到，自己在世上不能有所作为。他是欧洲人，可是他能给欧洲带来什么呢？欧洲是否还需要他呢？他是俄罗斯人，可是他能为俄罗斯做点儿什么呢？再说他是否理解俄罗斯呢？奥涅金这个典型，正应该首先出现在我们所谓的上流社会中，这个社会远远脱离了根基，外表的文明达到了高度的发展。在普希金的作品中，这是捕捉得十分准确的历史特征。在这个上流社会里，我们讲着所有的各种语言，去欧洲各地漫游，在俄国寂寞度日子。可与此同时又意识到我们完全不像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他们有事做，我们什么事都没有；他们是在自己家里，我们总是没有着落。

奥涅金便是这个文明社会的一员，但他已经失去对这个社会的尊敬。他已在怀疑，他已在动摇。同时他面对着生活中的新现象踌躇不前，不知是该崇拜还是该嘲笑。他的整个生活都在表现这个思想、这种斗争。

另一方面从实质上看，他的心灵在渴求新的真理。谁知道呢，他也许准备对一种新观念五体投地，热烈并虔诚地接受和信奉。这个人是摇摆不定的。他再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不会那么轻浮天真，缺乏自我意识。可他又什么事都委决不下，不

① 安·德·康捷米尔（1708—1744），俄国诗人。丹·伊·冯维辛（1745—1792），俄国剧作家。

能确定自己的信仰。他只能承受痛苦。这是俄罗斯自觉生活的第一个受难者。

俄罗斯的生活，俄罗斯的自然，向他展示出自己全部的魅力。在他面前出现过一位俄罗斯姑娘。这是我国诗歌中迄今为止唯一令普希金无限倾心的典型，他把这视为可亲的俄罗斯产儿①。可奥涅金没有了解她，他照例在她面前扭捏作态一番，有时确也像个好人，可不明白自己所作所为是好是坏。但打死连斯基② 之后，他非常清楚是干了件坏事……痛苦开始折磨他，经年累月。青春正在流逝。他很健康，力量要求向外释放。做什么呢？从何入手呢？意识提醒他，说他是个空虚的人。愤怒和揶揄在他心头蠕动。可同时他又清醒，知道自己并非是个空虚的人。难道空虚的人会有心灵的痛苦吗？空虚的人会去打牌、弄钱、妄自尊大、追逐女人。他为了什么而痛苦呢？是因为什么事都不能做吗？不，那是另一个时代的痛苦。奥涅金所苦恼的，还只是不知道做什么，甚至不知道该尊重什么，虽然坚信存在着应该尊重和热爱的事。但他发起狠来，不尊重自己，不尊重思想，不尊重自己的见解，甚至不尊重自己对生活和真理的渴求之心。他感觉到虽然这种渴望十分强烈，可他为此没做出任何的牺牲。于是他自嘲地问：能为此牺牲什么东西呢？况且又何必去牺牲呢？他变为一个利己主义者，同时却又讥笑自己连当个利己主义者都不会。是啊，如果他真是个利己主义者，他也会心安理得了！

① 指《叶夫盖尼·奥涅金》中的女主人公塔季扬娜。

② 《叶夫盖尼·奥涅金》中的一个人物，死于与奥涅金的决斗中。

我在期待什么呢？苦闷啊苦闷！[1]

这个自己时代的产儿，如此感叹着。他陷入无法解脱的疑惑、古怪的犹豫、模糊不清的理想、对旧偶像破灭的信仰、童稚的成见之中。同时又强烈相信某种未知的新事物，一定存在着而不会被任何怀疑和讥讽所击败的新事物。是的！这是一个时代的产儿，这是第一次自觉审视自我的整个一个时代！这里写的一切，正是我们俄罗斯的，自己特有的，绝不同于欧洲的，全然是民族的东西！不消说这里写得多么充分，多么艺术，多么优美动人！这个典型终于深入到我们整个社会的意识之中，在每个新的一代人身上得到重生和发展。到了毕巧林[2]身上，这个典型达到了不可遏止的极度怨恨，实现了两个不同特征的奇异结合，是极具俄罗斯特色的相反相成：一方面是发展到自我崇拜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是出于怨怒的自我轻蔑。依然是那种对真理与事业的渴求，依然是那种难以摆脱的“不能有所作为”！由于怨怒，又像是故意招人讥笑，毕巧林投入一种野蛮奇特的活动，终于导致愚蠢可笑而又无谓的死亡。

而所有这一切的确是实实在在的真实，在我们的生活中真的重复出现过。继之而来的是戴笑面具的果戈理。他的笑有种可怕的威力，是开天辟地以来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文学都未曾有过的。在这之后果戈理在我们面前消失了，其实他先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因为无力创造一个他可以不嘲笑的理想，一个他能明确地给自己说出的理想[3]。但时间不断前进，我们

① 引自普希金《叶夫盖尼·奥涅金》。
② 俄国诗人米·尤·莱蒙托夫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
③ 指果戈理晚期陷入心灵悲剧。在《死魂灵》第2部里，他要写一个模范的贵族形象，没有成功，终至焚毁了手稿。

的意识也走过了一个终点。罗亭和希戈罗夫县的哈姆雷特①，已经不再嘲笑自己的活动和自己的思想了，因为他们有了信仰，这个信仰挽救了他们。他们只是有时会嘲笑自己，他们还不会尊重自己，但几乎已不是利己主义者了。他们无私地承受了许多痛苦……到了我们的时代，罗亭们也已成为过去的了……

“不过请问，”学究杂志会叫起来，“这又哪有什么民族性啊？”

“什么民族性？”我们张大了嘴，觉得莫名其妙。

“是说俄罗斯的民族性！”克拉耶夫斯基先生说，他是要帮助杜德什金先生，“比如童话、民歌、传说、神话之类……”

“倒不全是这个，”杜德什金先生急忙打断了评论栏自己可敬的同事②，“问题在于是不是整个俄罗斯都信奉普希金诗作里的东西，还是说只有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要知道民族诗人应反映人民的政治观、社会观、宗教观、家庭观。如果诗作中没有任何东西流传到人民中间，流传到真正的人民中间，那又算什么民族诗人呢？”

这下您可说的露馅儿了！照这么说，您不认为上流社会，所谓“受过教育的人”是人民啦。那您说他们也不能算俄罗斯人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里的人民在一次国家大变革中被截然分成了两半。区别只在于一半是受过教育的，另一半是没受过教育的。其实，有文化的一半已经证明他们也是俄罗斯人，

① 二人分别是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同名长篇小说《罗亭》（1856）和短篇小说《希戈罗夫县的哈姆雷特》（1849，收入《猎人日记》）中的主人公。

② 安·亚·克拉耶夫斯基（1810—1889）也是《祖国纪事》主编和发行人。

他们也是人民。要知道他们已达到这样的认识，要同人民的本原相结合。正因为受教育的这一半人比没文化的一半发展程度较高，自觉意识较强，他们之中才出现了民族诗人。可你们想要的民族诗人，在人民没获得发展和自觉的时候，非得直接讲人民的语言不可。什么时候，哪里有过这种事呢？很难设想有这样的诗人。如果说法国人有个贝朗瑞①，难道他是全体人民的诗人吗？他只是巴黎人的诗人，因为多数法国人不知道他，也不理解他，原因是没文化而不能理解。再说他宣扬关注的也是另一套东西。如果说贝朗瑞距离不理解他的多数人的思想还不是很远，不像我们的普希金远离平民百姓，那是因为法国不同于我们，历史上人民没有分裂为两半。最后还有一点，你们好像把民族性干脆定义为平民性。这样就不足为奇，为什么谁也不能理解你们，为什么民族性只能属于平民百姓呢？难道人民随着文化的提高就失去了民族性吗？难道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就不是俄罗斯人民了吗？我们觉得恰恰相反，随着人民的发展，他的天赋、才能和潜力也会发展和巩固，人民的精神会更鲜明地表现出来。难道说在伯里克利② 时代，希腊人已经不是希腊人，如三百年前那样？你们以为我们论证必须返回到人民的本原上是自相矛盾吗？这不等于我们自己承认我们是德国人而不是俄罗斯人吗？根本不是！我们恰恰是证明了我们是俄罗斯人，因为我们承认必须返回到自己的根基上去。我们

---

① 贝朗瑞（1780—1857），法国诗人。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并曾赞同过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他的歌谣充满革命的激情、贫民的幽默和乐观主义。

② 伯里克利（约公元前 495—前 429），古雅典战略家、统帅，民主派领袖。他的立法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的繁荣。在他执政期间，推动了雅典的民主、文学、艺术的高度发展。

只是意识到我们分离出来纯然由于外在的因素。这些外在因素使得其他人民大众不能追随我们，也因此不能在我们的活动中注入俄罗斯人民精神的全部力量。我们只是认识到：我们仅仅是离群的一小伙人，如果人民不随着我们也走这条路，那我们也不可能充分地表现自己，我们就会把自己表现得十分片面、软弱无力。而且不妨大胆地说，假如整个俄罗斯人民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展示自己将会有不凡的表现。不过由此还不能做结论，说我们丧失了人民的精神，说我们变了质。凭什么讲我们不算人民？你们凭什么剥夺了我们这个光荣的称号？

不，你们没有道理。你们只说对了一点：我们不是全体人民，只是其中一部分。不过，从这一部分人中产生的诗人普希金，同时又是民族的诗人，这是没有疑问的。你们不能理解这一点吗？我们再问一次，你们在何处看到过你们所想象的那种民族诗人？他在什么时候曾经有过呢？他可能像你们理想的那样吗？你们想一想，如果出现你们设想的那样的诗人，他要说些什么呢？你们说，他要表现“人民的一切政治观、社会观、宗教观和家庭观”。好吧，贝朗瑞正是表现了这一切，不过表现的对象仅仅是全部法国居民中不大一部分人，具体地说是参与和关注这一民族的政治、社会、宗教、家庭等各种活动的人。其余的法国人甚至可能没听说过贝朗瑞，因为从未参加过任何的运动。等他们参加进来后，虽然他们会有自己的新的贝朗瑞（一定会有），他也会表现出某些新东西，某些老贝朗瑞做梦也想不到的新东西，尽管如此，连老贝朗瑞也还会得到他们的理解。他们不能绕过他去不问，因为第一，他对他们将具有历史意义；第二，他是民族诗人，因此终归还是反映了法国人民的意见、信仰和观点，这同普希金一样。俄罗斯人民的一

部分（而且是最大的一部分），几乎完全没有参与另一部分的事业，因之这种分裂延续极久。普希金是一部分人的民族诗人。但这一部分人，第一，本身就是俄罗斯人；第二，感觉到了普希金是第一个自觉地用俄语、俄罗斯形象、俄罗斯眼光和见地同他们说话，他们在普希金身上感受到了俄罗斯精神。

这部分人非常理解，无论是编年史家，无论是奥特列比耶夫[①]，还是普加乔夫、大主教、道士、别尔金、奥涅金、塔季扬娜[②]，都意味着罗斯，都意味着俄国特色。社会在普希金创作中看到的，不单是现代的略带法国色彩而脱离民族精神的生活。社会明白，只有布尔加林才会这样写。显而易见，要回答下列的问题是很可笑的：普希金想描写的那个俄罗斯家族在哪里呀？他的俄罗斯精神何在？他想描写出俄罗斯的什么东西呢？答案很清楚：应该多少懂得一点诗啊。普希金做出的最巨大的贡献且不说，仅以他的《西斯拉夫人之歌》为例，您读一读《国王的梦幻》[③]，如果您是俄罗斯人，就会感到这是最深刻的俄罗斯的东西；不是模仿民间神话，而正是一切民间神话的艺术形式；它经过了诗人的思索，主要是诗人第一次把它展示给我们。第一次，这可非同小可！是的，几乎是头一回，我国广大社会看到了民间故事的全部优美，全部神秘性，全部深刻的含义。你们说普希金在平民百姓中没有得到反映，不错，这是因为老百姓没有得到提高，而没提高是因为不可能提高，他们连字都不识。但只要人民一有了提高，普希金对他们便立

① 格里戈里·波格达诺维奇·奥特列比耶夫，据说是莫斯科丘多夫修道院的逃亡教士，冒充伊凡四世的儿子德米特里，1605年后成为俄国沙皇，即德米特里一世。后为贵族阴谋家所杀。

② 以上均指普希金笔下的人物。

③ 这是普希金《西斯拉夫人之歌》（1834）中的第一首。

刻会具有民族的意义。这还不够，对他们还会具有历史的意义，并且成为人类普遍原则的最主要的传播者之一。这种普遍原则在普希金身上得到了人道的广泛的发挥，而这一点恰恰是最需要的。因为我们这里的一分两半，全是由于社会的一部分人走向欧洲，而另一部分留在了家里。俄罗斯人民是渴望知道人类普遍因素的，我们相信他们通过普希金能得到最好的了解。

不仅如此，我们还准备承认，平民百姓中间也能产生民族诗人。倒不是说柯尔卓夫①，他的发展程度远远高出自己周围的人。我们说的是真正的、平民百姓的诗人。这样的诗人首先能反映自己周围的人群，却绝不高踞于他们头上，视整个周围现实为标准，为理想。那样他的诗就几乎会同民歌一样，是在咏唱时直观地编出来的。这样的诗人也可能稍有不同，即不把整个周围现实都视为标准，而能对其中一部分持否定态度。他能表现出人民生活的某个方面，人民的某种活动，他们的某种愿望。这样的诗人可能富有表现力，能完全真实地表现人民。但不管怎么说，他不会深刻，他的眼界会狭窄。无论如何，比起这种诗人，普希金高得无法衡量。如果说人民在今天的发展水平上还不能理解整个普希金，那又何妨呢？人民以后会理解，能从他的诗中学会认识自己。为什么民族诗人在发展水平上必得低于人民中的上层呢？根据你们的看法，事情必定是这样：普希金在他当时达到的那个发展水平上，永远无法被平民百姓所理解。难道他为了得到平民百姓的理解，非得去靠近他

---

① 阿·瓦·柯尔卓夫（1809—1842），俄国诗人。他出身牲畜商家庭，一生从事贩卖牲畜行业。擅长写人民的小小的欢乐和深沉的悲哀。风格独特，朴实、真诚，接近民间创作。

们，用他们的语言来讲话（他会愉快胜任的），向人民掩盖自己的发展水平吗？人民的情感、愿望、追求，就其基本出发点来说，几乎总是正确的。但他的道路在许多地方有时却不正确，是错误的。最糟糕的是，人民理想的表现形式，时常与人民追求的目标相矛盾，当然这矛盾是一时的。在这种情况下，那普希金便不得不默认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他不能不掩饰自己，不能不信奉成见，不能不产生虚假不实的感受。你们所设想的民族诗人，该是多么滑头哇，甚至像瓷碗上画的农夫！

最后，还可以这样假设：根本不需要掩饰自己的发展，不需要戴什么面具；可以直截了当地对人民讲出真相，不说谎言和假话，正直而大胆；人民都可以理解，都会喜爱，都要感激讲出了真理；问题只在于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把这个真理说出来。

对此，我们不拟争论。但真要有这样的诗人，他终归不能比普希金更强，远不能表现出普希金那么多的东西。如果当这样的诗人，普希金便得放弃自己真正的事业，自己伟大的使命。有一部分精力要被闲置，得有意缩小自己的视野，得自觉地牺牲自己伟大事业的一半。

那么，他的伟大事业是什么呢？我们再重复一遍：为了评价他的事业，首先需要多少懂得些诗。

《俄国导报》不推崇普希金，是因为普希金在欧洲没有名气，是因为莎士比亚、席勒、歌德渗透到整个欧洲文学中，对欧洲的人类普遍发展做出众多贡献，而普希金则没有。多么幼稚的要求哇！

我们且不说事实本身便多有不确之处。实际上，席勒和歌德在法国真的那么出名吗？在法国知道他们的是一些学者，一些严肃的诗人和文学家，而且大多是根据翻译作品，读原著的

就更少。莎士比亚也是如此。只有在德国，也只是在受过教育的人中，莎士比亚才为人所知，但在法国知者甚少。这自然不是由于他们的过错。当然，他们对欧洲的人类普遍发展，迄今所做有限，倒是在自己家里多有助益。① 看来，《俄国导报》无意识地犯了一个错误。看来它判断上述伟大诗人的人类普遍意义的影响，是根据俄国社会的情况。的确，席勒真的融入了俄国社会，特别是在上个世纪和上上个世纪。我们都受到他的熏陶，他成了我们自己人，在许多方面影响到我们的成长。莎士比亚亦然。甚至歌德的知名度，在我国远高于法国，也可能高于英国。而英国文学在我国的传播，毫无疑问要比在法国好得多，也许还好于德国。但《俄国导报》对这类事实全都嗤之以鼻。对它来说这些都够不上事实，因为不适合它的判断标准。人们给它指出事实：俄罗斯民族异常渴求人类共同的东西，指给它这种渴望的表达者之一便是普希金，指给它这一现象在各国人民之间是闻所未闻、史无前例的，恰可证明俄罗斯性格中一个非常独特之点，这也可能是俄罗斯民族性的主要实质。可是，《俄国导报》充耳不闻，反说根本没有民族性这个东西……

主要的是，对于欧洲暂时还不知道普希金，普希金本人犯有什么过错呢？问题在于欧洲暂时还不了解俄罗斯。欧洲到目前为止对俄国的了解，仅仅是出于一种令人感到难堪的必要

---

① 我听人讲，巴黎确有文学家不知道巴比埃，不仅没读过他的书，甚至连姓名都不知道。如此还谈得上什么了解席勒呢?！——作者注。按：巴比埃（1805—1882），法国诗人。他的讽刺性长诗集《抑扬格诗集》（1831），鞭挞资产阶级。还著有十四行诗集《雄浑的和弦》（1843）等。巴比埃于19世纪40年代在俄国颇受重视，特别是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圈子里。

性。当俄罗斯因素有朝一日作为有益成分融入人类的共同发展时，情况就不一样了。那时欧洲也将了解普希金，多半会在他身上发现许多价值，远远超过《俄国导报》迄今的发现。到那时在外国人面前可要不好意思呢！……

俄罗斯还年轻，刚刚开始生活，但这一点绝非什么过错。

《祖国纪事》在《俄国导报》面前维护俄罗斯民族性时，作为民族性确实存在的证据，指出国家的基础在俄国十分发达。

我们认为，不单是靠这一点，也根本不是靠这一点，足以证明俄罗斯民族性的真实性和独特性。这个独特性就是：人民在自己的思想方面，具有不自觉的但却是异乎寻常的坚定性；对一切同他的思想相矛盾的东西，都给予有力的敏锐的反击；世代相传、无可动摇地信仰正义与真理。

俄国生活中有过一个伟大的时刻，那就是彼得以伟大的、地道的俄罗斯意志力，决心打碎死死束缚我们发展的桎梏。彼得的事业（对此我们如今总算没有争论了）包含着许多真理。无论他是自觉地想到了俄罗斯民族肩负的人类普遍使命，还是不自觉地向前迈进，单凭推动他的一种感觉，反正他走的方向是正确的。然而他的活动的形式因过分激烈而可能是错误的。至于他把俄国改造后所取的形式，则毫无疑问是错误的。改革这一事实本身是对的，但他的形式不是俄国的，不是民族的，有时是直接地从根本上与民族精神相矛盾的。

人民看不到改革的最终目的，而且就连追随彼得的人也未必理解这个目的，即使是所谓“彼得巢中的雏鸟”[①] 也不例

① 普希金长诗《波尔塔瓦》（1828）第3段中的诗句。

外。他们跟着改革家走是盲目的，协助政权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纵使不是人人如此，那么可说几乎如此。人民又哪里想得到自己被引向哪里呢？即使到了今天，文明能注入人民中间的，也只是一股浊流。当然，总会有些生动有益的东西传播到人民中，哪怕是不自觉的，哪怕是潜在的。但是，改革中那些非俄罗斯的、虚假的、错误的东西，人民却一下子、一眼、光凭感觉就发现了。由于如前面所说，人民不可能看出改革好的一面、健康的一面，所以马上便转身拒绝了。啊，人民真会坚定而从容地维护自己，真肯为自己认为的真理去死！

而彼得的思想已经实现，并在我们的时代达到了最终的发展。其结果是我们接受了人类普遍的基础，甚至认为我们命运注定的使命，便是完成全世界人类的联合。如果不是所有的人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么许多人是正在认识到。至少所有的人都承认，文明将我们重又带回到自己的根基上来。文明没有把我们完全变成欧洲人，没有把我们铸成某种现成的欧洲模型，没有取消民族性。《俄国导报》说："哪里争论民族性，哪里其实就不存在民族性。"它这是大错特错了。《祖国纪事》回答它说了下面的话，则是完全正确的：

> 能够回答你们这些话的，是19世纪初的德国文学史，还有法国文学史。在那里这场争论构成了整个一个文学阶段，只是不叫民族性的争论，而称为浪漫主义的争论。这个争论也被带到了我国，不过为时过早。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争论并理解它的全部深刻意义。这场争论在西方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欧洲各国文学急剧转向了独立自主，转向了民族性……

文明也没能在我国发展起不同阶层来。相反，它在努力冲

淡阶层，把它们统一起来。也许《俄国导报》会对此感到十分遗憾，我们这里没有英国的勋爵，也没有法国的资本家，无产阶级也不会出现，我们相信这一点。在我国，阶层间的相互仇恨同样不会发展起来；正好相反，在我国，各阶层正在融合。目前一切还都在酝酿之中，没有任何完全确定的东西，然而却已开始预感到我们的未来。各阶层融合统一的理想，到全民教育程度空前提高的时代，将会表现得更为明显。

教育程度今天在我国就已居于社会的第一位，一切都给它让路。可以说，一切的阶层优势全在于教育程度……努力和迅速发展教育，便是我们的全部希望、全部独立性、全部力量，是唯一的自觉的前进之路。而最为重要的，这是一条和平之路、团结之路、通向真正力量之路。

今天在我们这里，真正的高等阶层，就是受教育的阶层。如果没有真正的认真的正确的教育，社会马上会出现一种现象，极其有害和致命的现象，这就是不科学的科学。由于对知识和科学的渴望，在社会上无论如何也消灭不了，在今天我们的社会里尤其如此。因此，当真正的正确的教育发展不足时，希望学习者便开始自学，没有系统，没有规则，时常选不好老师，或者更糟的是师从一些学识片面的人。这样一来，错误观念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年轻没有经验的人们中，习以为常甚至根深蒂固，到后来或者很快地就产生不愉快的恶果。而如果教育有了正确的广泛的发展，情况便会完全不同。真正的科学有它自己的方法、传统、体系。真正维护这种科学的人，不会让年轻人误入歧途。他能够防止学生走入误区，因为是调动学术的全部力量，用人类头脑迄今通过正确而坚定的探索得来的一切，去影响学生。

我们只有用教育才能填平我们今天与我们自己根基之间相

隔离的鸿沟。识字和普及文化，是任何教育的第一步。

过去,《祖国纪事》曾不客气地讥笑我们，说我们尽管宣称社会必须与人民的本原相结合，实则带给社会的仍是我们自己所拒绝的那个欧洲文明。

我们的回答是：

我们现在要返回到我们的根基上去，是自觉地认识到并接受了的思想，这就是我们承担的人类共同使命。是文明本身使我们认识到这个思想，但我们拒绝这一思想的纯欧洲形式。我们的回归证明了：文明并没能把俄国人变成德国人，俄国人仍然是俄国人。但我们也意识到，今后我们再不能单独行动了，为了我们今后的发展，我们还必须依靠俄罗斯精神的全部力量。我们把教育移到我们自己的根基上，直接而坦率地表明：我们获得教育后会得到什么结果，教育会使我们发生什么变化。然后我们将等着看整个民族从我们这儿接受了科学以后会怎么说；我们将等着参加我们今后的发展，是人民的发展，是真正俄国的发展，并从自己的根基获得新的力量，从而踏上正确的道路。

知识不会使人退化，它只是改变人，但不是改变成一种共同公式的样子，而是变得适合这个人的秉性。它也不会把俄国人变得不再是俄国人。它甚至连我们也没改变得了，只是迫使我们回归到自己人中去。整个民族当然要在科学和生活中做出自己的贡献，远胜于我们社会圈子里的这一小群人。我们仅仅是拒绝纯粹欧洲形式的文明，我们只是说它不适合我们。

下面谈谈人民的读物，主要是《读本》。

四　读书与识字

第二篇

如果把所有给大众编写的书都列出名来，恐怕会有长长的一串。虽然我们在上篇文章中许诺要专门谈谈所有这类读物，但因为这样做很不值得，我们就想直接来分析一下《读本》，这是唯一一本比较认真给民众编出来的东西。我们有关“人民读物”的想法，读者从这个分析中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读者只是失去了现有“人民读物”的空洞无物之书的冗长名单。但在一些售书广告里能找到所有这些书名，在书摊儿上更是全可看到，还摆到单独的书台上，其中也包括格里戈罗维奇① 先生的一些败笔之作和波戈金② 先生的《红蛋》。

我们还有一位“人民”作家，是波戈斯基先生。的确，他主要为士兵写作，不过我们想特别说几句。波戈斯基先生在我们的“人民文学”中是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其他的“人民”读物可说数量不少，只是不值一提。它们只说明了一点：供人民阅读的书异常需要。《读本》同样说明这一点，所以我们就直接讲讲《读本》。

---

① 德·瓦·格里戈罗维奇（1822—1900），俄国作家。早年以小说《苦命人安东》（1847）著名。此处不明所指。

② 米·彼·波戈金（1800—1875），俄国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作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1841）。他原是农奴出身，1806 年获得自由。早期作品揭露农奴悲惨生活。19 世纪 30 年代后期成为斯拉夫主义者，思想转向保守。

《读本》还不是书，而只是人民读物的一个方案，由谢尔比纳编就，刊登在今年即1861年2月的《祖国纪事》上。此文标题是《人民用书试编》。

作者的观点，他的方案的价值，甚至他这篇文章的语调，我们觉得都是很出色的。这首先是因为比他更好的这类方案，据我们所知迄今没有。《祖国纪事》表示，谢尔比纳先生的《试编》以及对它的讨论，会有助于人民用书的编者。这也很有道理。

谢尔比纳先生在文章开头对一本供人民阅读的小册子大发脾气。这书是去年底出版的，题名《文选》，售价五个银戈比。他先赞扬此书只售五戈比，而后说他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书一开篇就选了普希金的童话《库兹马·奥斯托洛普》[1] 和克雷洛夫的寓言《杰米扬的鱼汤》。

由于我们打算详尽分析谢尔比纳先生的整个方案（自然是量力而为），下面全文照录文章开头对《文选》有好心而无远见的出版者发出的一番愤怒的指摘。

我们简直不可思议，为什么开篇用了普希金的童话《库兹马·奥斯托洛普》，接着又是克雷洛夫的寓言《杰米扬的鱼汤》，更不用说书名使用了人民不懂的“文选”一词，这可能是由于一些与出版者无关的其他原因。但为什么选登普希金这篇童话呢？它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人民读来会觉得冒傻气，而且这在他们眼里要贬低学识字的作用。这本小书要落到周日学校的学生手

① 普希金的这篇童话原名《牧师和其工人巴尔达的故事》（1830），后来瓦·安·茹科夫斯基于1840年将其发表，改名《商人库兹马·奥斯托洛普》。

里，它的主人比如规矩的马具匠、铜匠或是钳工，可能叹口气说："学校里尽教些什么呀！……全是瞎胡闹……"

这类故事，农夫在小酒馆里、在广场上都能听到；小孩子在作坊里，从扫院子的人嘴里也听得到。这样徒劳无益地编出的书，既不会教人敬重认字识字，也不给学文化以任何的地位。再比如人民有什么必要知道《杰米扬的鱼汤》这则寓言呢？它的内容只有在文学和演艺生活中才好理解，而人民还根本不知道存在有这种生活……况且这寓言里又有什么东西对人民本身有吸引力或有教育意义呢？……杰米扬出于好心地烦人不已，算什么了不起的罪过呢？人民需要的是这个吗？这是他们身上的令人发指的消极面吗？必须通过形象加以讽刺和讥笑吗？……你会以为这样的《文选》不是在彼得堡出版的，是阿卡狄亚[①]什么地方出的，因为书里对生活的理解很幼稚，一派天真的看法，田园诗般的淳朴。你想着在卷首一定看得到梅纳尔克或季尔西斯出版物[②]的字样……显然，就此书再发挥下去已没什么道理了。但它的出现却使人们想到了人民的读物问题，这种书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格外需要。

经验说明，专为人民而写的书都不成功，也未能在人民中传播开来。可以说这部分是由于没有采取具体办法加以推广，主要却是因为俄国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还是 terra incognita[③]。我们论起人民读物，还只是 a priori[④]。直接的观察，同人民一起生活，深入人民中去，这些我们还远远没有做到……

① 古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一高原地区。在古希腊和罗马以及16—18世纪的田园诗作品中把它描写成古道可风的天堂，人间的福地。

② 《梅纳尔克与季尔西斯》是俄国作家 В. И. 帕纳耶夫（1792—1859）的田园诗，出版于1815年。

③ 拉丁文：未知之地。

④ 拉丁文：推理。

用诗人的话说，"我们喜欢"：
在装饰豪华的大厅里
议论一阵我们的穷哥们儿
为善恶争得面红耳赤……

事后诗人会不由自主地叹息：
一位诗人有句旧话——
说呀，说呀，只是空谈！①

这番话很高尚也很有力量。这里的愤怒同样也是高尚的。上述论点中有些恐怕还很有道理。如说童话《库兹马·奥斯托洛普》是写给老爷们看的，人民对它不以为然，这话很对，因此作为旁观者也不由得为心地高尚却目光短浅的《文选》编者感到遗憾。不过，说到对《杰米扬的鱼汤》的看法，我们已经不太敢苟同了。其实呢，这同《杰米扬的鱼汤》本身无关，问题是谢尔比纳先生的某些观点，可说他的某些基本见解，如他说："杰米扬出于好心地烦人不已，算什么了不起的罪过呢？人民需要的是这个吗？这是他们身上的令人发指的消极面吗？必须通过形象加以讽刺和讥笑吗？"

问题就在这里。《杰米扬的鱼汤》在克雷洛夫的作品中当然仅具有局部的意义。这意义同人民没什么关系。可是要没有这个意义，这作品对克雷洛夫也便失去了价值，甚至可用上千个别的寓言来取代它。这一点我们完全同意。但主要的问题不

① 这里引用的是俄国政论家、诗人伊·谢·阿克萨科夫（1823—1886）的诗句，最后一行出自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第2场第2幕。

在这里，问题在于如谢尔比纳先生所鼓吹的，每本人民读物，最好是其中的每一篇文章，都应该针砭“人民的各种消极面”，“通过形象加以讽刺和讥笑”。而《杰米扬的鱼汤》对人民毫无“针砭”，因此收入它的《文选》也便十分天真，对生活简直是“幼稚的理解”，“一派天真的看法”，“田园诗般的淳朴”，你就等着在卷首看“梅纳尔克与季尔西斯”出版物的字样吧。

在这里我们绝不想维护《杰米扬的鱼汤》，也不想维护《梅纳尔克与季尔西斯》，尽管这两个形象过去曾经有益而且可爱。我们觉得重要的是，说我们必须予以讽刺，一定要用讥笑加以针砭，推翻成见。说需要所谓的惩罚……需要施以教育，主要是得教育人们……

我们再次重申，这目的无论如何是崇高而美好的，并且完全符合我们的高尚精神。有文化的理应教育没有文化的，这是责任，难道不对吗？不过有一点很奇怪，甚至可说很糟糕，就是我们接近人民，非得予以讽刺讥笑，更主要的是非得教育他们不可。我们就想象不出来，怎么能不以掌权者的身份出现在衣衫简朴的人民大众面前，而像普通人一样。当然，我们加以讽刺和讥笑，首先是为了有益于人民（虽然有时连自己也不很清楚我们要在人民身上讥笑什么东西，不过这只能是私下说说）。我们只是想顺便指出，在要求人民读物立刻见效之前，除了讽刺、根除、训诫等等之外，最好就是在人民中间推广读书，努力以有趣的书吸引人民阅读。所以，即便这书没什么讽刺，只要较为有趣，而且绝对无害（我相信人们会明白我们说的这无害指的是什么），那就谢天谢地了……

“这是吹毛求疵！而且挑剔得可笑！”启蒙家们会对我们说，“好像我们反对趣味性，更主要的是反对普及阅读爱好。可我们恰恰是关注这一点的！只不过不用《杰米扬的鱼汤》，

总可以换一篇最可笑、最有趣，同时也最有益、最挖苦的东西，要‘抨击消极面’……如此一来，一切目的都将达到。作品有益有何不好呢？要么也许你们反对有益？反对根除成见，反对消灭愚昧无知？”

“绝非如此，”我们回答说，“愿上帝保佑！”谁会喜欢愚昧和成见呢？况且还不只是愚昧，而是愚昧无知吗？不过呢，单单强调愚昧和成见，单单关注尽快在人民中根除愚昧和成见，依我们看来，这本身（自然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愚昧和成见。不知道我们怎样能讲得更清楚些。比如说，我们知道人民对我们这些老爷们早有提防，甚至我们讲的好话，他们听起来也不信任。可我们却还以掌权者的姿态去接触他们，同那些老爷们一样。总之，在了解是怎么回事之后，我们对人民依然不会采取较为平易较为缓和的态度。“人民是愚蠢的，所以得教育他们！”我们先记住了这句话，如果无法以老爷的面貌出现在人民面前，那么至少要摆出智者的样子……不过这里我们得暂停议论，我们忍不住还想引述一下谢尔比纳先生本人的见解，看他怎样评论我们的某些进步人士和智者，怎样评论一切所谓深悉我国人民生活并立意当人民领袖的“专家”们。这是千金不换的良言！

有的书看看编得相当聪明，在人民中间却流行不起来，因为颇像是德国人或法国人穿上了农夫的衣服。倒是翻译过来的《失乐园》[①] 或者《弗兰齐里·韦涅齐扬》[②]，比起国人为了人民、使用人

① 英国诗人、政治活动家约翰·弥尔顿（1608—1674）写的长诗（1667）。

② 又名《勇敢的骑士弗兰齐里·韦涅齐扬和美丽的伦齐韦娜王后的故事》，18—19世纪流传的骑士小说。

民语言、根据人民的历史和生活写出来的书，更能打动普通百姓。这一点很值得注意。我们不能够本能地、率直地又是很实际地、坚定地站到人民的土壤上，不能够设身处地，不体会他们的发展程度，不能心领神会他们的观念、爱好、习性。在这点上什么也帮不了我们，无论是才能、知识，还是我们受的欧洲教育。这是因为我们对俄罗斯所知最差，**民族因素在我们的教育中几乎不加考虑**。由此我们便缺乏务实精神，没有自己的面貌，缺少独立的思考。不论是看自身，看我们生活中的现象、事实和材料，我们总得透过**有色的眼镜**，不是在帕莱罗亚尔[①]买的，就是在莱比锡集市或国内拥挤的市场上找到的。

不仅如此，我们虽然不自知，却主要全是些守旧的人，而且任何一个不长的阶段都有它墨守的成规。不管是谁，若是摆脱成见、毫不客气地去分析某种普遍使用的时髦思想，或者分析某个我们此刻赖以支撑的偶像人物，那他就会惹得一身腥……可一旦冲破禁忌，我们连巨人也不放在眼里。我们一方面奴颜婢膝，是某些思想和偶像的奴隶，另一方面又偏执专横，谁不同意我们的见解，谁就是智能低下或者心怀叵测。不用说，我们有许多受欧洲科学启示的高尚理想，但我们不了解自己民族和地方生活的诸多条件，基本的材料、精神和环境。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是有脑子的，其部分原因在于不想费吹灰之力。我们不是完整地有机地汲取知识，我们不是从研究 ab ovo[②] 做起；只要有思想的最终结果，有表面上的知识，就心满意足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过是书呆子而已。在我们这里很容易成为聪明人和先进分子，成为文学家或其他社会活动家。我们这里只存在两个极端，要么是用自己的“目测”的土办法，要

① 巴黎的一座宫殿。
② 拉丁文：它的根源。

么是无条件地绝对盲从，教条地接受某种外来的学说。还有，我们这里谁如果获得了某些知识而将其**绝对化**，视为**事物的绝对的方面和本质**，谁如果只凭日常的一点儿聪明把知识借机表述出来，讲些时髦话和欧洲的老生常谈，这种人也就会被看做是有文化的高尚的现代的人，更主要的是被视为聪明人。而且在我们这个时代，类似的美德还会给个人带来好处。我们还远远没有认识到，具有真正**理智**的只有那样的人，他能够在任何情形下把握自己，并能理解**事物的相对的一面和相对的意义**，这是不断循环、变化、产生的知识旋涡，能够捕捉到事物同理想的隐秘联系以及事物之间的联系……是的，这里可就需要独立的思想、主动的思想以及扎实牢固的知识。这些是不能从谁的书里读来的……可有什么办法呢?! 这是我们教育的一个普遍缺点，也可能是不完全由于我们教育的缺点……

真是金不换的良言，是高尚而珍贵的议论！这里每个字都闪耀着真理。引文中的着重号，都出自谢尔比纳先生之手。本来我们打算从自己的方面也强调一下某些最为精辟和正确的话，但没有做，因为每句话都可入选。讲得那么中肯而真实，很难读到比这更好的文字了。只可惜说得稍微抽象了些。连这样的实情我们都不能表达得比较贴近实际，倒不是不会，而是我们这里不时兴这样写。我们这里一切都弄得像理论，用谢尔比纳先生本人的话说，弄得像“绝对”意义上、“绝对方面”的知识。接着，谢尔比纳在继续自己的分析时，甚至过于义愤填膺了。他的愤怒自然是高尚的，但不完全公正，因为火气太大了。谢尔比纳这样说：

类似的看似不值一提的现象，不由令人感到必须从根本上改造我们的培养、教育工作。这里的不合理、空洞、无效是显而易见

的，这里没有本民族的根底，没有自我了解，也缺少坚实严格的科学。我们还太幼稚，以致把夸夸其谈的现代时髦语言当成有教养；我们太一厢情愿了，以致“进步”一词从不离口，其实它在我们这里毫无意义。为了行动，必须热爱，而为了热爱，必须了解所爱之物……我们却不熟悉这东西……结果是，我们一切高尚的追求，可谓转眼间全成了时髦，成为舶来的教条而屈从于普遍的权威，我们随之做出热爱自己事业的样子。

“不是热血上冲，就是有力无处排遣！”① 因为不了解便不可能热爱。

谢尔比纳先生在这里是过于苛刻了。不可能仅仅由于“不是热血上冲，就是有力无处排遣”，即由于一时冲动，便做出一副热爱自己事业的假象。我们不相信这样的结论很准确。思想要得到真正的发展，会逐渐地有其严格的冷静的过程。那时也许能看得更深些，更乐观些。如果不是那么抽象地看问题，而是依据某些事实看得实际些，则除了与我们见解相悖的事实之外，我们也定会发现些有利于我们的事实。干吗要“只看到坏的方面②”呢？可以不偏不倚地看待事物而不成为着魔的乐观主义者，可笑的乐观主义者，因为我们这里表示任何的见解，都异常害怕被人耻笑。正由于这个缘故，许多人都持比较普遍的见解，最能为人赞同的观点。做到同所有的人一样，这是彻底避免耻笑的最好方法。我们这里绝不是说谢尔比纳先生同样倾向于持有普遍的见解，同样想混同于所有的人。谢尔比

① 此句引自莱蒙托夫的抒情诗《别太自信，年轻的幻想家……》(1839)。

② 引自克雷洛夫的寓言《猪》(1811)。

纳先生的见解，的确得到我们那些最高尚最先进的人们多数的赞同。而我们的先进分子在对我们时代的看法上，自然不会与莱蒙托夫的想法相差太远，尽管后者的想法比我们早说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当然，在先进的人们中，现在一般还不认为二十五年间我们已经有了某种进步，但也不是一点儿进步都没有。我们相信谢尔比纳先生不会要求我们列举事实来证明我们的见解。我们倒至少可以给他举出一个事例。谢尔比纳先生在我们引述的分析中，自己说道：我们不了解，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热爱，我们做出热爱的样子，我们热血沸腾，我们有力无从排遣……这个“我们”看来是谢尔比纳先生出于礼貌用出来的，要知道他实际上不会以为自己属于这个范围，就是说不会认为自己是不热爱的，不会热爱的，不了解的，做样子的等等。不然的话，他就不至于那么气愤，那么怪罪，那么轻蔑，提出那些劝告。既然如此，则还是有一个人懂得热爱，会珍视，会行动的……

“不过您好像言不由衷，”有人会对我们这样说，“您说话像在讽刺，您在批评……刚刚您好像还说，无须教训人家，说单单强调愚昧和成见，单单关注尽快在人民中根除愚昧和成见，这也是一种愚昧和成见。这不是怪事吗。”

我们要回答说：“当时斗胆说了这个话，如今倒有些后悔讲了这些。‘不管是谁，若是摆脱成见地毫不客气地去分析某种普遍采用的时髦思想，或者分析某个我们此刻赖以支撑的偶像人物，那他就要惹得一身腥。’这就是谢尔比纳先生的原话，我们现在恰恰觉得自己落到了这种境地。”

“什么？”人们对我们喊了起来，“不教育人民？也就是说散播成见、愚昧、无知无识……这是蒙昧，这是犯罪！”

有时实在是说不清楚！

上帝保佑，我们绝不是说不要教育人民。我们自己呼吁的宣称的正是这一条：要识字！识字！所以教育是需要的。只是据我们的看法，不可太过自信，以为人民能张大嘴巴乐意听我们的教育。要知道人民并非是畜群。我们相信人民自己也已想到，如果没想到则是感觉到，我们这些老爷虽做他们的老师但有些事也不懂，所以我们首先得向人民学些东西，也因此人民才的确不尊重我们的全部学问，至少是不喜欢这些学问。

凡与人民有过交往的，对此都会有切身的体验。要想人民张大嘴巴真听我们的教育，首先必须取得人民的认可，亦即获得他们的信任和尊敬。我们轻率地以为，只要我们一开口便能大获全胜，这样是不会得到信任的，更不会得到尊敬。人民是懂得这个的。一个人最易理解的，就是您同他说话的语气，是您对他的感情。我们天真地以为自己比人民聪明有学问，人民看在眼里只觉得好笑，许多时候甚至觉得是受了侮辱。谢尔比纳先生，您大概完全相信人民不会察觉这一点，即我们在按照您的计划为人民编辑读物时怀着不同一般的优越感。谢尔比纳先生，您热爱人民，我们相信这一点，您由于热爱才做这个工作。不过，光是热爱还不够，须要会表现自己的爱。您正是想通过教育人民，夸赞他的善，讥笑他的恶，特别是针砭他的“消极面”等等来表现自己的爱。唉！不知有多少人过去教育了，现在还在教育，过去讥笑过，现在还在讥笑！但这样子证明不了您的爱心，至少是不妥当，再说冒出这么多老师也令人厌烦。万一人民知道（起码能感觉到），他反过来也可以教我们许多东西呢？可我们对此全不理睬，全不知道，甚至笑话这种想法，对人民总是居高临下，指手画脚。其实人民确能教给我们许多东西。比如可以教会我们如何教育人民。要知道我们中间有时遇到这样一些令人惊异的老师，有的早就脱离了根

基，曾祖父已当上官吏，同人民没有任何共同的兴趣，也耻于有这种兴趣。孙子的成长也主要是朝上走，讲求人类普遍特性，学科学，学理论，要求理想的真理。总之，人变得极高尚，但也酷似磨光了的15戈比硬币，看着是块银板，却没有标记，没有年代，没有国家。是法国钱，荷兰钱，还是俄国钱，无从知道。其中有的能拦路一站，声言要根除陋习。这些先生们特别热衷于根除陋习，如迷信、虐待妇女、崇拜偶像之类。许多人已经写出这方面的大作；有的则在大学里，甚至在国外大学里，跟着学者教授研究这些问题，利用很精彩的图书。忽然间这种“活动家”接触到现实生活，发现了某种偏见，于是火冒三丈，大加挞伐，又是冷笑，又是吹口哨，极力讥讽。由于义愤填膺，当着所有这些诚实的人民的面又咯又吐，表示对这偏见的轻蔑。此时他忘记了，甚至没考虑过，这种偏见暂时还为人民所珍惜，不仅如此，如果人民十分轻易地、十分学究气地、十分突然地就把自己珍贵的崇敬的东西抛弃掉，那他们也太卑劣而丝毫不值得尊敬了。农夫们会对启蒙者说:“老爷，你别笑也别吐，要知道这是我们从父亲爷爷那里继承来的，我们喜欢这个，尊重这个。”而启蒙者大叫：“那你们就更应该尽快根除身上这陋习了，因为你们中毒太深。我唾弃你们的偏见，是因为第一它激怒了我高尚的感情，第二想让你们这些愚人看看我是如何不赞同它；你们看看我也就是受到了教育。”试问这种人你又有什么办法？须知这位先生不仅不会历史地看待事物，不从根基和生活出发，而且也没有仁爱的心，他所谓的爱全是理论上的，书本上的。至于对人民必须持尊重的态度，更是谈不上了。他根本不理会，这一事物只是在他个人眼里无足轻重，在别人眼里却是过去生活的一种见证，一个标志。而在今天，这个事物很可能意味着全部生活，是生

活的一面旗帜。其实无须多说，我们完全相信，谢尔比纳先生了解这一点比我们更清楚更透彻。他那么聪明怎会不懂得呢！只是光懂得还不行，最好还要谨慎些。要知道，认为首先得"教育"，得"讥讽"，得"针砭消极面"，——这种过于片面、过于急躁的愿望，实则也是一种不够慎重啊！对待人民如能态度平等一些不是更好吗？他们要看到您不光是想教育人，就容易信任您。教育是件好事，但不是所有的老师都受欢迎。如果只有教育而别无其他，那不如干脆开宗明义地说："人民呀，你们看，我有学问，你们却都愚笨。我来就是教育你们的，要听我说，照我的办！"这么说岂不更痛快吗！可您在这儿也使心眼儿，甚至掩饰自己只想教育人而别无其他。您太用心计，把人民看得太蠢了，这对他们无异于是种侮辱。我们这些话，您可能不理解，甚而视为吹毛求疵。我们自己也感到，没必要这么空洞地议论，还是直接来分析您的方案吧。为此我们不能不较多地引述你的文章内容①。

读本

此书应能在人民中得到传播，如从前库尔干诺夫② 编的著名的《尺牍》那样，所以编者在本书内容和文章编排上部分地参照了该书。面向人民的宗旨，还决定了本书的外观、篇幅和便宜的价格。

说到此书的题名《读本》，极而言之是体现了俄语精神和人民精神，犹如祈祷有祷文读本（Молитвенник），记事有记事本（Поминальниuа），歌有歌本（Песенник），写信有尺牍

① 以下是摘录谢尔比纳的文章。

② Н. Г. 库尔干诺夫（1725—1796），俄国的教育家、出版家。

（Письмовник），等等①。

此外，我们觉得这个名字从形式到内在含义上都便于人民记忆……总不能称为《文选》或直接叫《大众阅读和周日学校用书》吧。这样既不方便，也表明不够了解人民，因为不宜对他们讲这本书就是他们该读的。

首先，需要说一说此书的内容和书中文章的安排。

出版者编此《读本》时的考虑如下：

（1）从心理因素出发组织全书的各部分和入选文章，使第一部分在展开某些概念并激发读者兴趣的同时，不知不觉间为阅读第二部分做好准备；读第二部分时又为第三部分做了准备，如此等等，实现心理上的渐进。开始是讲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通过一系列寓言、传说、谣谚表现出来（这些最接近普通人的性格），继而转向周围可睹的自然景物（大地、空气、天空），在这些和其他文章的基础上循序渐进，最后归结到有关精神道德的问题上。比如说可由克雷洛夫的寓言《农夫遇难》开始，以霍米亚科夫的诗歌《赞美诗读后》结束。

（2）从实际考虑出发，根据人民中存在的具体缺点，或是普遍的缺点，或是我国人民特有的缺点，来决定收入本书的文章内容。此外出版者还须考虑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什么知识，人民对什么东西有兴趣。在这方面对出版者颇有启发作用的，是民间诗歌、民谣、神话、古罗斯民间文献等涉及的事物，从中可以看出人民喜欢在书中读到什么。这里出版者还必须研究像下面的一些书何以会得到人民的青睐：《俄国人同卡巴尔达人的战争》、《乔治大人》、《巴拉基廖夫笑话》、《愉快老人》、《最新天文与星相望远镜》、《一场恶

① 指用同一后缀构成的口语体词汇。

战》[1] 等。

旨在提高精神道德的选文中，内容应能表现人道主义，或是针砭游手好闲、冷酷自私、胡作非为、不关注社会、不尊重人格、不尊重他人权利，如此等等在我国人民身上特有的毛病，这些都是人民不能左右的种种历史条件造成的结果。而这一切在书中大多尽可能地体现为形象，却不是教训和解说，因为我国人民几乎还处于史诗的阶段[2]。

显而易见，整部书都应追求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在发展概念思维的同时为人民提供必须的知识，即包括俄国人在内的任何人如空气般不可或缺的知识。二是促使人民极大地提高人类共有的道德情操，同时要严格遵循俄国普通百姓的精神、权利、习俗、历史、环境和生活方式。此外对人民来说，书要编得“有求于你的，正是你想做的”。

您认为同人民讲话需要用简单、明白、清晰的语言，不要故意模仿人民的语气，不要想着学点儿农夫腔。就此您说：

书中如有任何效仿人民的语气、嬉皮笑脸、扭捏作态的表现，都会损害此书的名声，也会损害识字读书的声誉。我们的人民很聪明，一下子就认得出这人在捣鬼，来者不善。在他们眼里这很像是老爷打扮成农夫去采集民歌，或是去教训愚笨的农民，而任何的教训向来人们是当做耳旁风的。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您看，您自己也反对玩弄心计，这讲

① 这些都是18世纪至当时俄国民间流行的作品。
② 当指处于原始时代的状况。

得很好，特别是提到了装扮成农夫模样的老爷和只当耳旁风的教训。您讲的理论有时的确极精彩，可在实践中又立刻自相矛盾。您自己似乎不玩弄心计，好像我们上文引述的一切，从给书题名开始，都不算使心眼儿。书叫 Читальник（读本），为什么这样叫呢？据说因为在彼得大帝之前书名都是这一类的，如 Травник、Мнсленник、Громник、Волховник、Колядник 等等。可那是彼得大帝之前哪！当时这样起名是幼稚的，所有的书（包括给上等人看的）全是如此叫法。如今书名都变了，唯有给人民的读物仍依旧例称为 Читальник（读本）。这一点会使人民感到奇怪："给我们嘛单编一本书，别的书就不是给我们看的"……类似的议论一起，不会抬高《读本》的声誉。人民中喜欢读书的人定想去读老爷们看的书，去尝禁果，而且将加倍敬重它们，而不是奴仆日常念的破书。您会说"人民不会发觉的"。恐怕不见得，人民的眼睛尖得很呢！就算不会发觉，您不能不承认，千方百计地一味要把书弄得人民味十足，甚至在书名上做文章，定会影响对全书的看法。我们已经预感到下文了，果然没错。您接着说："总不能称为《文选》或直接叫《大众阅读和周日学校用书》吧。这样既不方便，也表明不够了解人民，因为不宜对他们讲这本书就是他们该读的。"您这不已在欺骗人民了吗，就算是出于高尚的目的吧。不消说，您如此费心地掩饰欺骗，反倒令人民猜测是不是在骗人（《Читальник》这书名太不一般而且带点儿庄稼汉味，人民马上会明白其中奥妙，因为他们比您想象的远为聪明和机灵）。这姑且不说，您一味想对人民掩盖真相骗取信任，就够令人们感到不快了，虽说全为着高尚的目的。例如后面有一处您讲到，虽然需要从儿童读物里选些有关自然物理的文章，但要编得让人民感觉不出原本是写给儿童看的。您说："从某个方面

说，人民也是儿童。”

再往下看。您写道：

> 从心理因素出发组织全书的各部分和入选文章，使第一部分在展开某些概念并激发读者兴趣的同时，不知不觉间为阅读第二部分做好准备；读第二部分时又为第三部分做了准备，如此等等，实现心理上的渐进。

您又写道：

> 从实际考虑出发，根据人民中存在的具体缺点，或是普遍的缺点，或是我国人民特有的缺点，来决定收入本书的文章内容。

(实际正是这样选的，非常完美!)

接下去又说：

> 此外出版者还须考虑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什么知识，人民对什么东西有兴趣……

这一点到编书时才考虑已经太晚了，其实早该弄清楚。这且不说。老百姓会想：怎么？我们是什么特别的人吗？我们需要什么特别的知识吗？我们其实就想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

“胡说！你们了解这个还早了点儿，”头脑清醒的监护人如是说，“你们是农民嘛，该知道的是自己的事、农夫的事。这就是我们给你们挑选出来的……”

这回答当然是理智的、公正的，农夫自该同意才是。不过这么明显地讲出来，叫人不舒服。大家都清楚为什么人有时会

觉得屈辱。果戈理写的一个人物，呼另一个人是牧师儿子，那人确是牧师的儿子，却不知怎么生了气[①]。照理说算什么屈辱呢!

确实，农民想不到这些，您不是正指望这样吗(我什么都记不得)?可是，何必如此谨小慎微呢?何必如此防范呢?恐怕过于显眼了。针对性的考虑太多。您如果不那么特别关照，少一些疑神疑鬼，或许要好些。那样您能随便些，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对待您要教育的人民。人民可能会想：您是为了钱，为了投机才编这本书的。那时这书中有针对性的编法即使保留不变，多少也能带来些益处。人民要说：“嘀，真狡猾!一切都说得那么好，是吸引我们抢购这书呢。”即使他们这样想，结果会很好，因为书还是卖出去了。自然，那么一来人民就不会了解到我们这一切善良的愿望，我们的无私精神；不知道我们甘愿赔钱也要教育人民。不过，有什么必要让他们了解这些呢?第一，当然还是准备上了天堂再领赏为好；第二，人民要是全明白了恐怕便不买这书了。要知道人民是愚钝的，对我们的辛勤劳动可能一甩手不予理睬，还说：“又来监护了!”因为人民也是疑虑重重啊!还是投机为好，如果明显地表现出赚他们钱的愿望，反能同他们不拘礼节，平等相待。此刻很需要这种态度，因为人民喜欢这个，自然容易信任自己的兄弟而不是监护人。然而您的《读本》纯粹像一种手腕。至少我打赌照您这计划编出的书，不会得到人民的欢迎，也许靠监护者的财力能散发出去，只是人民自己不可能评价很高，我觉得他们甚至对它有点胆怯，特别是因为品行好和勤奋而赠送此书时。据您

① 在果戈理的《死魂灵》(第11章)中，主人公乞乞科夫称一个官吏为牧师的儿子，虽然后者确实是牧师的儿子，却十分生气。

的计划里说，赠书时还得提醒人民，不要把书弄丢或者弄脏，如此等等……不过，这到下面再说。

于是我想象一位保姆。她同别的保姆一起坐到花园的长凳上，扯开自己的闲话。为了放心孩子们，就吓唬说："听着，别嘉，你在这儿玩，千万别到林子里去，那儿有坏蛋，把你装到布袋里就带走了。"男孩儿听着，虽说才五岁，大概猜到保姆是瞎说，那里没什么坏蛋，倒是很好玩，小小的人已经暗笑起保姆了。假如我是农民，要有人把我当成这样的小孩子，要有个什么秘密的委员会琢磨着牵着我的鼻子走，我可要无比懊丧了。那我（处在农夫的位置上）一定会这么想的。当然，实际上并非如此。相反，人们是真心地爱我，希望我幸福，可是我却会这么想。这自然是我个人的感觉，也许我这人就差劲，不知好歹，所以才如此想。我自己（即在农夫的地位上）明知道需要学习，什么都不懂，可这种监护叫人受不了。你们看，还都针对我的恶习和弱点选材，甚至规定我需要什么样的知识，考虑我关心什么事情。就是说，这个你该知道，那个你不该知道，因为还早点儿，知道了要受害的。我补充一句，除了那些坏毛病以外，我又疑心很重，处在农夫的地位上这时不能不起疑，于是琢磨来琢磨去，心想："受害又怎么样？是我受害又不是你，我自己操心好了！"一句话，我准会表现得忘恩负义。

监护我的恩人要大叫：

"这全是为你好嘛，笨蛋！"

不用说，我是无法同这么有学问的人讲话的，那就只好完全同意。甚至还主动地策略地说："老爷，你抽我一顿吧！庄稼汉调皮就该抽鞭子！"可这书我还是不买。打心眼儿里不喜欢它。

我心里接着想："我的老爷是个好人，可又太能胡闹。一下子喜欢上我了，不知为的什么，我对他没做什么呀……他莫名其妙地一高兴，我倒有些害怕了。看，还给我编了本书……这得花多少力气呀……好像说：'拿去学习吧，以后就能同你聊聊，一起办点儿事。用这本书可学到不少学科，完了再给你一本，也是有许多学问的。'书的名字叫《读本》，明摆着的意思就是必须读它。奥妙就在这里，老爷们看的是书，可我看的刚刚是《读本》。就是说，你老兄还没那本事，还读不了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书。《读本》也是背着你由整个一个委员会编辑出来的，目的是不让你知道这是专门给你编的；还有，为让你更喜欢《读本》，他们还调查、了解、议论：为什么你喜欢《乔治大人》，喜欢《俄国人与卡巴尔达人的战争》。试想对你这普通的庄稼汉，操了多少心哪！你感觉到了没有？我心里继续想：谢谢老爷们了！幸好我这个笨农民没能想到这些，因为我又没有大学文化，上哪儿去懂得这个呀！要是我受过大学教育，多半会对监护人说出这种混话来：'你们这些监护者们真的以为若是我不知道加富尔伯爵[1]是谁，不知道沼泽里有纤毛虫，那我就十足地是个笨伯，什么也不能理解吗？你们当真认为人民不懂得你们虽然极想教育人民，同时也极想对他们隐瞒一些东西，因为他们还不够格。'谢天谢地，我没受过大学教育（这仍是我的心中所想），所以这一切我现在都还不明白。不然的话，我要是念了大学，现在会给你们提醒塔列兰公爵[2]

① 加富尔（1810—1861），意大利复兴运动中温和自由派领袖，撒丁王国首相；意大利统一（1861）后，任意大利政府首脑。

② 塔列兰（1754—1838），法国外交家，曾先后任外交大臣（1797—1807，1814—1815），是一个权诈多变、毫无原则的政客。

的一句话：'Pas de zèle，messieurs，surtout pas de zèle!'[1] 这个故事你们比我这农夫一定更熟悉。"

上面写了这么多，如今自己也害怕起来。如果读者们生了我们的气，那如何是好。他们要对我们大叫："莫非您把这一切'计算'都记在谢尔比纳先生的账上？莫非他不在为人民得到真正的教育而劳累操心？莫非您把他的必要的谨慎真当做是不怀好意的隐瞒？是啊！在你们的文学当中向来如此！只要善良的好心人动手做件有益的事，评论家立刻像警犬一般朝他大叫起来，开始找缺点，挑毛病，好骂上几句，却完全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只是因为手痒，想写几句挖苦话，表现一下自己的机智，没事找事地炫耀自己的才能。La critique est aisée，mais l'art est difficile.[2] 最好您自己写出个方案来，用事实来说服我们，而不是靠空洞的评论。那时人们也许会注意到您……

我们怕的正是这种叫嚷。主要是怕人们说我们想骂谢尔比纳先生的方案。事情恰恰不是这样。我们说真心话，在谢尔比纳先生面前我们没有任何过错。当我们看到他的出色的工作时，他从我们身上除了衷心的谢意不会感觉到任何别的东西。我们只是不由自主地站到愚昧多疑的人民的地位上，感觉他们偶尔也可能产生上面这些想法，那样他们对谢尔比纳先生的书（在它出版后）就会缺乏应有的好感，甚至可能出现疑虑。再重说一遍：这只是我们的感觉，而我们的感觉自然也会有错（此时此地我们希望是错的）。对读者交代这么几句之后，我们继续来详尽地介绍谢尔比纳先生的整个方案。《读本》的整个

---

① 法文：不要费心了，先生们，少费点儿心吧！
② 法文：批评易作，艺术难为。

方案，是一个极其有趣的材料，就其目的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对此不感兴趣，还有什么更重要更吸引人的事呢？我们首先要说，这方案编得十分聪明而且巧妙，十分详尽，缜密精确，考虑到所有细节，实在无法不承认谢尔比纳先生在方案中呕心沥血，无法不感谢他的劳作，甚至无法不欣赏他的利落清晰，始终一贯。所以要再说一次，如果说方案有什么地方我们不太喜欢，有什么令我们不安，那便是过于挖空心思，也就是过于精明，过于周到和严密。换句话说，我们不喜欢的，是这一切过于美好了。这种印象当然有点荒唐，不过在自然界常有这种情形。就连方案的心理基础本身，也仿佛是用圆规画出来的，好像是从农夫的心灵里算出来个平方根。而且是那么从容，那么充满自信地求出这平方根来……好了，言归正传。

方案分两部分，一是方案本身，一是预先的说明。作为方案基础的预先说明、基本看法，我们前面已介绍了开头几条，也讲了这开头留给我们的印象。接着谢尔比纳先生继续讲自己的看法，说人民最不喜欢书里扭捏作态，滑稽轻佻，例如绕弯弯、俏皮话、民间的插科打诨等等；还说，书对人民来说是圣洁之物，不是集市上的滑稽剧；人民向往的是所谓崇高动情的格调，所以《俄国人与卡巴尔达人的战争》才在人民中行销数千册。讲完这条精彩的甚至还相当中肯的意见（尽管不总是如此，因为真正机智的笑话人民也能理解，也很会鉴赏），谢尔比纳先生提议在《读本》中收入严肃而重要的文章，诸如卡拉姆津《历史》① 中的“征服喀山”。读起来很重要，还可给民众留下关于俄国史上一个重大事件的知识。可是对奇幻的和超

① 尼·米·卡拉姆津（1766—1826），俄国作家、历史学家，所著《俄罗斯国家史》共十二卷。

越常人的作品，谢尔比纳先生却怒气冲冲，《读本》坚决排斥一切幻想作品，因为人民本来就有许多迷信了（尽管我们知道，人民十分喜欢奇幻作品，自己爱读，也爱听人读）。我们认为，这一切很好，不过，仍然是烦人的操心，烦人的管束，这个应该，那个不应该，疑虑和担心近乎病态。奥勃洛摩夫[①]就喊叫过："别走过来，别走过来，你带风进来了！"当然，对人民来说，书是一种权威，如谢尔比纳先生所说。只是人民并非是皮谢姆斯基写的那种多疑症[②]，什么都怕，风一吹就要死人。自然，奇幻作品绝非必要。但谢尔比纳先生对自己编的人民《读本》自视过高，似乎觉得人民的未来、人民的教育，他们的大学，他们今后千年的幸福，从头到尾全系于一书。他以为人民只要读了或听了一两行糟糕的东西，马上便会翘辫子。谢尔比纳先生多疑到这种程度，连克雷洛夫写的寓言也不敢称为寓言，而是直接单用作品篇名，如《农夫与工人》、《两个农民》，然后署名克雷洛夫。这么做的理由，也是说人民不看重寓言，说"这一点从谚语里也看得出：如夜莺不能靠寓言来充饥，或者说这纯是婆娘们的寓言"。这确实太过分了，再说人民也并不那么讨厌寓言。人民中间流传很多，有的非常机智，意蕴无穷。要知道老百姓懂得什么是寓言。不然的话，尽管您隐瞒不说这是篇寓言，光是诗体的叙述就会把人们搞糊涂了。这样反倒更危险。的确，如果人民像您所想象得那么笨拙，一读到诗句自然便会停下来，说这是开玩笑，不是人写出来的，押什么韵哪！您甚至主张选用只讲人的而非讲动物的寓言。

① 俄国作家伊·亚·冈察洛夫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② 俄国作家阿·费·皮谢姆斯基（1821—1881）的喜剧《多疑症》（1852）中的主人公杜尔诺佩琴认为自己得了不治之症。

“动物和树木一说话，人民就觉得是骗人，是胡闹，有损书的威信。”——您会这么说。是这样吗？难道寓言不是来自民间吗？你放心，人民懂得这是一种艺术形式。事实上人民不是您想得那么愚笨，那么闭塞。

接着谢尔比纳先生认为应介绍必要的、人们普遍感兴趣的事物，特别是自然界的事物。不过出版者虽可从大孩子的儿童读物里选材，所选片段不该暴露出这是专给儿童写的。因为“从某一方面讲人民也是孩子”，正如谢尔比纳先生所说。

人民在您看来竟是这样器量狭小，而对此您又何等胆战心惊！看您谨小慎微到了何种程度！

接下去该是历史部分。“从民间历史歌谣和语言通俗的编年史，应逐渐地循序地过渡到选自国内历史学家著作的片段。”

首先，干吗要如此小心翼翼地“逐渐”和“循序”呢？是培养人民准备上大学吗？要是他们随便翻到哪里，先读了“国内历史学家”的作品，而后才念编年史和民间歌谣呢？他们就会因此立时完蛋了不成？您也全白操心了！除非在卷首扉页写上：此书不可随意翻阅。最好是通过地方长官，下令必须连贯地阅读，严格做到逐渐和循序，从民间历史歌谣开始，到国内历史学家的著作结束，如此等等。

当然，人民不喜欢不连贯的片段的东西，但又何必在《读本》中加进罗曼诺夫家族登基诏书的原文①？为什么用原文？如果您想给人民说这个故事，可以用现代的语言以自己的话讲述，不必“因诏书是用民间语言（什么民间语言？）掺和人民敬重的教堂斯拉夫语写成的”就引用诏书。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① 指米哈伊尔·费道罗维奇·罗曼诺夫于1613年登基的诏书。他是延续了三百多年的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开国皇帝。

呢？而且人民何以更喜欢教堂斯拉夫语呢？是因为它更不好懂吗？可谢尔比纳先生却说：

> 这样安排书的内容，能够以本民族的特性和历史为根本来教育人民，健康、自然地培养和指导人民。很遗憾，我们这些沐浴着西方阳光的人，连这方面也同样很欠缺。

问题恰恰在于您想借助您的《读本》一下子达到所有目的：提高教养，学习文化，发扬民族性。一切全靠您的一本书。您编书的目的，不单纯是给人民提供有趣且又有益的阅读。不是的，您是想一下子给他们近似大学的教育。我们不是冤枉您，事情明摆着嘛。否则您不会有那么多清规戒律，想出那种按部就班的循序办法，也不会担心人民先读什么，后读什么。其实，要达到那样的目的，就不该编《读本》。而强要达到这目的，则会不由地使《读本》带有学究气，内部不相协调，更主要的是枯燥得叫人难以忍受。

我们绝非反对您的种种追求。我们发自内心地赞赏您的智慧和努力。例如您接着提出要求，《读本》应收入法律文章，为使人民明白事理，甚至也为的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还必须收入包含“卫生内容”的医学文章，理由是“由于完全不懂最简单、最一般和最必需的卫生常识，我们太多的人民将会轻易死亡或致残”（照这么说，人民读了《读本》马上就不再‘死亡或致残’了，因为有了卫生常识。我们不是挖苦人，我们明白您自己也不指望自己的《读本》能如此迅速地影响人民，不过您好像还是期待产生这种影响。《读本》的确给人这样的印象）。下面您准备编入日历材料、通用的外来语词汇（尚有知识阶层使用的许多俄语词汇，不为人民所了解呢！），最后您还

计划给人民解释“有哪些学科？”亦即一下子说清楚世上所有的科学的本质所在。您说：

> 此书的最后一部分是道德内容。为能循序地在心理上接受这个内容，在它之前安排了一个文艺部分，类似于给人民写的故事梗概，其目的是根据一定的实际考虑审美的追求。在这部分的戏剧、作品片段中，透过不同程式的艺术外表，总要反映某种历史事件和其他的材料、事实，或者是人道的思想、道义的精神，都是我国人民所特别需要的。

这一切很好也很有用，很高明也很精彩；一个铺垫另一个，一个引出另一个，“人民心灵”的部分酝酿着后来的部分，如此等等。还能更好吗？以下便开始形成您的编书方案了。您说：

>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此书的内容、编排、结构，有必要在这里确定全书的几个组成部分，这有助于弄清出版者编辑《读本》所依据的逻辑特点、实际考虑和心理因素。当然，这里要列出所有的部分，每部分中先定一些文章。

第一部分：“现代生活。以文艺形式描绘的人生智慧，日常实际。”

在这个响亮的标题下，编入了克雷洛夫、赫姆尼采尔、德米特里耶夫、伊斯梅洛夫的寓言[①]，《真相与谎言》之类的童

---

① 伊·伊·赫姆尼采尔（1745—1784），诗人，寓言作者；作品多讥讽社会弊端。伊·伊·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诗人，感伤主义的代表之一；作品多模仿民间创作风格。阿·叶·伊斯梅洛夫（1779—1831），作家；著有小说、抒情诗、寓言。

话（可以选得有趣些、现代些）；还有选自 H. 科斯托马罗夫《古代俄国文学经典》[①] 中的作品，茹科夫斯基的《智者克里姆》[②]，达里的短篇故事如《轴和销》[③]，笑谈（最简单的）《醉酒的故事》之类的故事。科斯托马罗夫书中的故事，最为熟套的是民间谚语（大概指人民在《读本》前已经知道的谚语），锻炼智力的谜语、格言等。

> 这一部分作为全书的开篇，目的在于一开始便能吸引读者，以通俗易懂的富有教益的思想作为艺术诱饵，通过直率朴实的形式，通过引人的趣味性，通过思想与事实的凝练表述；同时在淳朴的心灵里树立实际生活的道德准则，并使其体现在日常的生活现象中。

这个内容看起来很不错嘛。吸引人民，不成问题。不过，一开始何必那么多古代俄国文学的“经典作品”呢？选择新鲜的东西岂不更有趣？但一想到非如此则“便不能以民族的特性和历史为根本来教育民众”，也就觉着这“经典作品”是决不可少的了。

这些都极好，但最妙的是谢尔比纳先生的上述想法：人民只要读了这第一部分，他们淳朴的心灵里便会树立起实际生活的道德准则，体现在日常的生活现象中。与此同时，这为阅读第二部分做了精神准备。谢尔比纳先生表示，正是出于这种考

---

① 尼·伊·科斯托马罗夫（1817—1885），俄罗斯和乌克兰历史学家、作家。编有《古代俄国文学经典作品》。

② 瓦·安·茹科夫斯基（1783—1852），著名诗人，俄国浪漫主义的代表。

③ 弗·伊·达里（1801—1872），作家、语言学家。编有著名的俄语词典，民俗学家。

虑才设置了这一部分。怎能不感谢这番努力，不期望成功呢！

话说到这里，我们想就人民的“淳朴心灵”讲几句。人民的心灵似乎很久以来公认是天真未凿的“淳朴”的东西。我们倒相反觉得（我们相信），人民的心灵时刻面对太多的诱惑，命运把心灵折磨得够苦了，而某些境况又使它陷入污泥之中，所以现在该是可怜这心灵，以基督的思想关注这心灵，而不是根据卡拉姆辛的小说和瓷器上的农夫画来判断它了。

所有这些部分，完完全全出于种种“心计”。一环扣一环。为简便计，我们用自己的话作一介绍。

第二部分是过去的生活，亦即历史知识、画面、故事、地理文章。开始是俄国历史歌谣，接下去是编年史、年代纪等的片段，再次是文书和公文（您不信吗？真不假是念大学呀！），还有……您猜是什么？是杜边斯基译的《伊戈尔远征记》[①]！这可太糟了。试问《伊戈尔远征记》今天对民众有什么吸引力呢？它能引起兴趣的只是学者，或者说是诗人，即使说对诗人有吸引力，也主要是此诗的古代形式。人民没有丝毫的历史概念，能在远征记里读出什么来呢？他们只会感到枯燥得要死，且处处是不懂不解的东西。人民为得到学问和教育，竟要做出如此巨大的牺牲！不然他们怎能受到“以本民族的特性和历史为根本”的教育呢？好像为此目的再找不到比这更有趣味却少些荒唐的东西了。

接着是俄罗斯诗人的咏史诗篇，如贝内迪克托夫的《大帝

---

① 古代基辅罗斯史诗，成书于12世纪末，作者不详。该书写的是诺夫哥罗德-塞维尔大公（1185）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对波洛伏奇人的远征（1185）。它是一部抒情叙事作品，它以其艺术性成为俄罗斯古代文学史上的纪念碑。Д. Н. 杜边斯基为莫斯科大学硕士，将此书由古斯拉夫文译成俄文。

(彼得一世)小咏》[1] 等。我们觉得最好先向人民介绍一下彼得大帝，然后再歌颂他。

由此转到历史故事和本国史论家作品的片段（这倒不错），而后是一些传记，有叶尔马克[2]、米宁[3]、罗蒙诺索夫、库利宾[4]。随之是讲俄国地理的文章：彼得堡、莫斯科、基辅、西伯利亚等。最后则是取自普通史地的故事（数量很少），如马其顿王亚历山大[5]、拿破仑、哥伦布、皇都[6]。

第二部分到此结束，开始了第三部分："景观"，即生活环境，人周围的自然界。

这一部分讲的是土地、空气、天空，一直到细毛虫！干吗毫无必要地拿细毛虫去惊动人民呢？干吗迫不及待地搬出这些德国科学的奥秘呢？干吗恨不得很快把一切都教会人民呢？人民不喜欢这样的老师，这些老师径直以教导者的面目出现，是主人，是启蒙者。问题不在于讲到细毛虫，而是总想匆忙地教育好人民。人民历史地形成一种倾向：疑虑重重，不肯轻信。他们不相信您的这种愿望出于善意，也不会喜欢您。要知道，首先应该争取人民喜欢您。枯燥，清规戒律，学究气，系统

① В. Г. 贝内迪克托夫（1807—1873），诗人。此诗当时在艺术上评价不高。

② 季·叶尔马克（？—1585），哥萨克首领，曾远征西伯利亚，民歌中的英雄。

③ 库·米宁（？—1616），俄国民族解放斗争的组织者，民兵首领之一，被誉为民间英雄。

④ 伊·彼·库利宾（1735—1818），俄国的机械发明家，自学成才，在建桥、玻璃加工、通讯等多方面均有创造。

⑤ 古代马其顿国（公元前5—3世纪）位于巴尔干半岛。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为国王腓力二世之子，拓展疆土，建立了庞大的帝国。

⑥ 古代俄国对君斯坦丁堡市的称谓，它原为拜占庭帝国首都，1453年为土耳其人占领，改名伊斯坦布尔。

性，细毛虫；这个得知道，那个不必知道；这一切便构成了您的《读本》！

第四部分是百科性和备忘性的。这里讲的是：共有哪些科学？进入俄语的外来词汇（据谢尔比纳先生说，这些是读报和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词汇……但这说法适用于人民吗？适用于今天吗？）。接着安排了农民必需的法律知识，下面是卫生知识，再下面是日历材料。总之是利用了一切可能的材料，人民由此会立即提出问题：为什么别的书都不是这种编法，唯独这本书如此？于是他们对这个问题就开始特别的寻思了。

第四部分之后，开始了全书的下册。这里是培养精神道德的材料。下册计划能够容量较大，用较密的字体排印。

第五部分是“人民用文选”，恐怕可说是全书中最好的一部分，原因至少有一条：比所有的部分都更吸引人。在这一部分里，需要系统地（非得系统地不可）安排整本的剧作以及选自民间文学和俄国作家创作的片段，但应能从人道方面①培养和指导民众。总之，这个安排却有些矫揉造作，而且这一部分并不具独立意义，是为读下面的最后部分做准备。这里收入歌谣和诗篇，而主要的是小说。为了说明内容的性质，还列举出某些选段和诗作的名称。又指出入选民歌应能“表现人道感情，或者痛苦地谴责民风民俗中的某种根本缺陷”。竟是如此的标准！连快活的民歌也犯禁！

在这之后便是柯尔卓夫② 的作品。您想，选了些什么？自然是《为什么你还睡着，农民》，或是《啊，为什么要逼得

① 在谢尔比纳原文中人道一词有着重号。——作者注

② 阿·瓦·柯尔卓夫（1809—1842），俄国诗人，参阅上文注。《啊，为什么要逼得我出嫁？》原题为《啊，为什么把我……》(1838)。

我出嫁?》

这些诗歌当然极好，充满新颖的诗意，是柯尔卓夫不朽的名作。我们在这里难道会对这诗表示不满吗?

接着自然又选了尼基京[①]、A. 托尔斯泰伯爵[②]、齐加诺夫、舍夫佐夫[③] 和涅克拉索夫的诗作，但全是上述基调的。还有普希金、亚济科夫[④]、迈科夫[⑤]、梅伊[⑥]、贝格[⑦] 等人的这一类诗作，同时又认为必须收进莱蒙托夫的《商人卡拉什尼科夫之歌》，你猜不到为什么吗? 因为“诗中表现了对妻子的忠诚，而这是平民百姓中大多缺乏的”。

往下则是译成诗体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国的民歌。接着是散文作品，有斯拉夫民间故事和传说，选自博里切夫斯基[⑧] 的书中，选自科斯托马罗夫的《古代俄国文学经典》。有彼得大帝、苏沃罗夫[⑨]、拿破仑的生活逸事。有扎戈斯金[⑩]、

---

① 伊·萨·尼基京（1824—1861），诗人。擅写风景抒情诗，关注农民疾苦。

② 阿·康·托尔斯泰（1817—1875），俄国剧作家、诗人。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

③ 舍夫佐夫，此人不详。在九卷本的《俄罗斯简明文学百科全书》中也仅在索引中提到 U. 舍夫佐夫和 K. 舍夫佐夫两人的姓氏，没有说明他们的生平。

④ 尼·米·亚济科夫（1803—1846/47），诗人。普希金之友。后来倾向斯拉夫派。

⑤ 阿·尼·迈科夫（1821—1897），俄国诗人。

⑥ 列·阿·梅伊（1822—1862），诗人，出身贵族。

⑦ 尼·瓦·贝格（1823—1884），俄国诗人、翻译家。

⑧ И. П. 博里切夫斯基（1810—1887），历史学家、民志学家。编有《斯拉夫民族的故事和传说》一书。

⑨ 阿·瓦·苏沃罗夫（1729—1800），俄国著名军事家，俄军统帅。在俄国与土尔其战争及其他战争中功勋卓著。

⑩ 米·尼·扎戈斯金（1789—1852），历史小说家。

拉热奇尼科夫[1] 的小说片段。有达里的短篇故事。有列·托尔斯泰的军事故事。

这些当然极好。

下面转入第六也是最后一部分，是为满足“必须的精神需求和高度的发展（人民所理解的）”而安排的读物。分为“信条”、“历史”、“实用道德”、“精神道德”几类，所收内容如：信仰的象征、上帝祷文、十大戒条（须以教会斯拉夫语文字排印。这可使人民认识教会斯拉夫语文字，亦“可增加读本的分量和权威性”）。

接下去是短篇故事，选自祭神史、《西拉霍夫之子约书亚智书》、译成俄文的圣经、英肯诺提乙书中耶稣的最后日子、日祷释文、果戈理等人作品、科切托夫《基督教义概要》、伊罗季翁·普佳京的教导、吉洪·扎顿斯基酗酒故事。后面是“教堂史和祭圣地”方面的文章，如康斯坦丁大帝接受基督教，俄国弗拉基米尔接受基督教[2]，某些受难者的生平，圣徒奥利加、基里尔和梅福季，编年史家涅斯托尔的传记[3]。圣地的描绘包括耶路撒冷、伯利恒、雅典，选自巴尔斯基、僧人帕尔费尼、穆拉维约夫等人的游记。此后是精神道德内容的诗歌，甚至还有杰尔查文[4] 的颂诗《上帝》。

---

① 伊·伊·拉热奇尼科夫（1792—1869），俄国作家。

② 弗拉基米尔一世（？—1015），基辅大公，于988—989年间引进基督教作为俄国国教。

③ 奥利加（？—969），基辅大公伊戈尔之妻，大公夫人。死后按遗嘱以基督教方式治丧。基里尔（826—869）、梅福季（820—885）兄弟二人为斯拉夫最早的信徒，同时是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的圣徒。涅斯托尔（1056—1114），僧人、作家。

④ 加·罗·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诗人。他从古典主义起步，逐渐转向现实生活，为此后的俄国现实主义铺平道路。

我们仍要说：这一切当然很好，选得不错。编者在结尾处说：

> 为人民和周日学校编写的《读本》，其内容与结构据笔者看就是这样。这里写的一切，来自在人民中间的直接观察与经验，也根据现实实际生活的间接材料和现象，并形成了一定的想法。也许这里的想法离应有的要求相距尚远，但至少是我们所理解并坚信的。谁也无法完全摆脱自己的环境、自己所受的教育，因此这篇文章很可能有它自己的弱点。

对此说些什么呢？我们似乎都已说尽了。在我们杂志的5月号上，一篇论及《读本》的小品文讲过一些话，在这里我们想重温一下。我们觉得这也可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把两种旧生活混合起来，可能得出一种新生活。您把自己的生活完全暴露给农民，再研究一番农民的生活，结果自然会更接近我们所期望的和解，更接近消除我们之间的等级差异。不过您要把我们生活的秘密向人和盘托出，任由他们去选择优劣，那时他们才会同您和解，因为他们信任您。不然的话，他们会感到您对他们存在着有意识的优越感，那就更糟。应该满足人民的口味和兴趣，应该提供他们要求的、想得到的东西；不可拿些大讲农业组合、劳动、家务等经济内容的文章去烦他们。如果我们都无法说服自己的妻子喜欢这类文章，那农民凭什么非得去读它呢？对于劳动，说不定由于某些历史的回忆，他还很反感呢。读书首先应该成为他的一种娱乐，一种享受，而后他才能从其中得到益处。要自由！自由应摆在首位！干吗去强加于人呢？”

不过，您猜怎么着？我这文章还没结束呢。忽然间仿佛我

自己在给人民编《读本》时，脑海里涌现了许多设想，迫不及待地要讲给所有今后编《读本》的人们听。当然这也不过是某些想法，我绝不期望能如谢尔比纳先生《试编》那样严整明晰。

我想到的编法是这样。

首先，我要给自己提出下述的思想（我以此作为一个基本的考虑，并坚持始终）：

一、把立即开展人民的教育和学习定为关注的首要问题，第一步就该实实在在地在人民中迅速普及识字，培养读书的兴趣。

二、因为好书特别能培养阅读的兴致，应优先考虑给人民提供尽可能使人喜爱的、吸引人的读物。

三、只是在人民喜欢上念书以后，那时再着手办人民的教育和学习的事。在最初编写的人民《读本》中，谁也不会阻挠我选择会给人民带来各种好处的作品。尽管如此，我仍然把趣味性放在首位，因为应该先争取达到一个目标，而后再争取达到另一个目标，也就是说先得在人民中普及阅读的爱好，然后再进而教育人民。想一箭双雕是不成的，那样要两头落空。

一点说明。如果坚定而强烈地期望首先是教人民文化，教育他们，那么，毫无疑问，必定会损害《读本》对人民的吸引力和喜爱。因为这样一来，《读本》会变得太做作，太苛刻，枯燥得有学究气，收入的作品在人民看来索然无味（例如《伊戈尔远征记》，谢尔比纳收入《读本》是为了“以本民族的特征和历史为根本”教育人民……换言之，是为了使人民变成民族的）；有的部分则为的“一开头便能吸引读者，以富有教益的思想做艺术诱饵”，并且要由一部分引出另一部分，一环扣一环……所有这些无疑会使书沉闷难读，暴露出深藏的意图，

从一开始就不给人好印象。总之，这些我们都已经说过了。因此，在开始时为趣味性而牺牲一些教育性，大概不是什么罪过吧？

聪明的人们可能对我说，我编的这书中有用的有益的东西不多，会有些童话、中篇小说、各种惊险故事，没有系统，没有明确的目的，一句话，是乱七八糟一大堆。人民一下子会把我的书同《漂亮的穆斯林信徒》混在一起。

我的回答是：开始时让他们混在一起好了。甚至最好引起他们的琢磨，两本书哪个更好些。这意味着他们喜欢这书，因为拿来同自己心爱的读物相比较嘛。要求人民立即做出准确的评价是不可能的。然而他们喜欢上了我的书，注意到了出版者（因为我一定会在封面标出这一点）；等我出第二本同类书时，印上"出版者某某，第二册"，他们想起第一册多么有趣，便会毫不犹豫地痛痛快快买下第二册。由于我选的材料虽说十分有趣，十分吸引人，同时又确是好作品，我逐渐地便可达到如下的目的：

（1）人民看了我的书就忘了《漂亮的穆斯林信徒》。

（2）不仅忘了，还会以为我的书胜似那本书，因为好文章的一个特性，就是提高品位和智力。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特性，所以我才那么寄予厚望。

（3）最后，由于我的书让人民得到愉悦（主要是愉悦感），在人民中也就逐步地普及了阅读兴趣。

您以为如何，我这样取得的结果重要抑或不重要呢？激发阅读兴趣，我认为是首要的步骤，是真正的目的。而任何有益的活动家，其干练务实之处我以为就在于有能力有办法迈出第一步。我们是不求吃得好，但求吃得饱。关键是第一步走好，慢慢再吃得好。可要是不设法使人民打消我们在忙于老爷式的

监护这种想法，又怎能做到这一点呢？您说得对，读书对农民来说是件重要的事，他们要求书里有严肃的有教益的内容。的确如此。可老爷式的教学，他们却不喜欢。他们不喜欢居高临下地对待他们，不喜欢在完全有权按自己愿望行事的时候还有人来监护他们。“喂，庄稼汉，你学我的书吧！读什么《穆斯林信徒》哇，那是扯蛋！看我这儿，有给你消遣的，末尾选了拉热奇尼科夫的小说《冰屋》，《穆斯林信徒》哪儿比得了！你听说过这种奇事吗？屋子是用冰造的！文笔也好极了。听说你爱读神灵的故事，那我这里有讲阿丰的，讲僧人们如何生活，如何祈祷。等前面几部分严肃的东西学完，你可以娱乐一下，看看这些小作品。不然你看，你的那些娱乐多没劲哪。我听说你迄今还在玩羊拐子[①] 呢！我给你带来了《教师》[②] 杂志，这里的游戏全都很正经很有教育意义。这里画了些小鸭子，正在游水，看到了吧？那是个猎人朝它们放了一枪。下面出了个谜语：水上游着五只小鸭，猎人放了一枪，打死了三只，五只里还剩几只呢？你来猜猜看哪，孩子，噢，不对，是庄稼汉。这总比玩羊拐子好吧。”编自己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不以为庄稼人就不会明白我的意图，猜不出我关心什么。我知道他有这种嗅觉，能看出所有我们的目的，看不出也会感觉到。我也不会去求官员们推广我这本书。要是这么干，那差不多就是通过官方排挤人民过去读的别的不顶用的书啦。其实呢，那些书读个什么劲哪！收起来一烧了事！不过，笑话归笑话，像谢尔比纳这样聪明的人，是能够采取以下手段推广自己的《读本》的：

---

① 一种玩具。

② 出版于19世纪60年代，是著名教育家伊·伊·保尔森等主办的。对这杂志，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时代》杂志曾数次加以嘲笑。

作为推广《读本》的办法，可以通过报纸呼吁热心人民精神道德教育的善人们、地主和工厂主、一切有人民聚会的机关，请他们购买《读本》赠送给识字的大众。

另一处又写道：

应该做出规定，周日学校或农村学校（凡属国家财产土地上的各部门学校以及军队中士兵学校）每个新生和在校生均须获得一册《读本》归个人所有。这可作为确实入学的“证明”或法律手续。同样也可给国民教育部所属的教堂学校做出这种规定。《读本》可由学生随意交换、转卖、赠送，辗转流传，但仍在人民手中。

天哪！这准定要给书涂上官方的色彩，可人们正躲避这个东西。这么一来书就俗气就贬值了。最后您说“但仍在人民手中”，表明您以为最好的推广办法便是硬性规定，强制或至少是极力劝说，然而这才是最坏的办法。这么弄会一事无成。人们已经试过了嘛！几乎在二十年前就由官方推广过读物，难道人民读了吗？书普及了吗？或许对此您还不同意，您还要争辩。可是您文章中下面这段话，却表明对现实情况简直是一无所知。您看：

还有一个办法：通过行政当局在人民中间广泛传播《读本》，这就是建议村长和乡长通过村和乡公所以（节省下来的钱）购买《读本》，赠送给认字的农民，作为识字奖励。赠书可在村社大会上以最传统的方式进行，不要官长和官方机构的任何监督。事情自有章法。

可以假定，要是这里说的推广《读本》一事交给乡村警察直接

> 来办，有些农民就不会承认自己识字。村长应该在聚会上说明：“书是送给你的，奖励你学会了认字，由你支配，不管是弄丢、卖掉、交换、送人，反正是你的啦，长官再也不问这事。”无论怎么样，书总不会没有了，总留在民间，传阅起来影响就会更大……到那时，这书需要便更多了，城里要买，街头书贩和串乡货郎也要买。

这真像在月球上，或是在卡拉姆津写的《市政官夫人马尔法》[①] 里那样。哪有这样的现实。这里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全是弗罗尔·西林，是慈善家[②]！说什么“建议村长和乡长通过村和乡公所以节省下来的钱（真妙！）购买读本，赠送给认字的农民，作为识字奖励”。就是说在普及教育之前设想农民那么喜欢教育，那么明白教育的必须，以至自愿地花钱买书。其次，在推广《读本》之前，还不知它是做什么用的，就设想对《读本》推崇备至，要拿它来奖励人们（赠送总得自愿，您不能强迫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如此闻所未闻的举动，完全不合人民的习俗，倒像是德国人的怪毛病。要奖励识字，拿粉布条编成花朵钉到农夫右肩上岂不更好！您要是把《读本》送给农民，而且是用节省下来的钱买的，他们会在聚会上站三十三年，百思不得其解：这是怎么回事啊？如果是命令，他们会照办，要说自愿，那他们不懂这个。再说，谢尔比纳先生是何等精细地了解人民哪，他的分析简直幽默极了：如果托付乡村警察直接去推广《读本》，那么农民有的就不会说自己识字。可是您那么有信心，在村社集会上赠书而不要警察直接参与，

---

①② 又名《诺夫哥罗德的征服》（1803）与《慈善家弗罗尔·西林》（1791）均为他的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前者是伪历史主义文学的范例，后者是伪人民性文学的范例。

便一定会很能保持古风、很高尚吗?

据您说，村长应该在集会上讲清楚:“书是送给你的，奖励你学会认字，由你支配，不管是弄丢、卖掉、交换、送人，反正是你的啦……长官再也不问这事。”

我们有一回在一份手稿上读到了在人民中普及识字的计划。里面干脆提出了一个最好的办法:农民只要没学会识字，就禁止他结婚(有的自由派竟然专制到这种程度)。不用说，这种事实上完全行不通的办法，只会令人更仇视和厌恶识字读书。不过，这个行不通的残酷手段在我们看来，总还比谢尔比纳先生天真的办法要现实一些。我想象着有个农夫刚在村社集会上受奖，得到一册《读本》，对这种怪事大惑不解。他小心翼翼地把书带回家，轻轻地不无恐惧地摆到桌上，又把桌旁的家里人全赶开，大家都惊恐地躲到角落里。然后农夫坐到长凳上，俯在桌上双手抱头，莫名其妙地死盯着《读本》。不一会儿，好奇的邻居和亲戚全跑了来，也觉得集会上的事叫人大惑不解。

“人们说是奖品。长官给的吗?”一个人问。

“是长官给的。”

“听说这书是从彼得堡来的。”

“什么奖品哪!你这笨人!”主人也发话了，“说是奖励我能识字!我倒希望为点儿别的什么奖励我。”

“这是要让别人看到你，也努力去得到奖品。格里什卡是这么说的。”亲家说。

“《读本》。定价三十戈比。”另一个邻居读着说，“你卖卖试试，连五戈比都不给你!加夫里拉·马特维奇，还不如干脆给你三十戈比现钱呢。”

“哼!你说些啥呀!”亲家打断说，“要给你三十戈比，你

跑到酒馆就喝光了。如今给你的是个《读本》，里面什么聪明的事全写着呢！”

“不对，亲家！”主人又说，“那格里戈利·萨维奇为什么在集会上说，随你弄丢、卖掉、交换、送人，没谁管你，东西是你的啦！要是这书对我真有用，我干吗弄丢、卖掉呢？这里面有名堂！这是长官捣鬼！……”

“是长官捣鬼！”别人附和说，都更加不安了。

“要出事了！”

“找警长去，走，哥们儿！米季卡，快备上马！”一个农夫高跳着喊叫。

“咱们的加夫里拉可出名了！”

“这和得奖章一样啊！”

“大家加点儿小心哪！”

谢尔比纳先生补充说：“书籍在人民中的传播，常常得靠偶然的机会。有时适合他们口味和要求的书，根本就碰不上。我们所列举的这些办法，就可造成许多这类偶然的机会。”

我们回答谢尔比纳先生说：不是这样！您建议的办法，不会造成任何机会。只能降低书的信誉！您是离开了当局便寸步难行。甚至为了让老百姓喜欢书本，您也得依赖当局。可您想想，为什么有的书招人民的喜欢呢？要知道，人们喜爱而且争购的那本《伊斯兰女教徒》，总还是有些内容的！而您却说是因为这书的写法高雅动情，迎合了人民的心意和口味。这里面多少有些道理。的确，高雅动情的风格招人喜欢，因为它所包容的生活虽说并不现实而且毫无意义，却绝不同于普通百姓那种乏味又艰难的日常生活。但这不是一切，远非全部的原因。在我们看来，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书不是或不再是老爷们看的书了。很可能作者写的时候想得很简单，纯是给上层社会的人们

看的。但我国的文学界对这书只报以嘲笑。倒是一个小投机书商出版了它，在市场上廉价售出。被“老爷们”排斥的这本书，立刻在人民中获得声誉。也许人民看重它，正因为它不是老爷们读的书。很自然，这书最先不是在农民中流行，首先阅读的是侍女、文书、车夫、管家、市民之类的人民。这样站住脚之后，才开始流传到兵营，最后甚至到了乡下。只不过在乡间传播终归有限。我们所以讲这个看法，是因为我国给人民编书的作者们，直接把种地的农夫当做对象。这是极大的误差。种地的农夫们还远未感到读书的必要，不像城里居民、文书、管家，以至乡下大户的仆人。农夫接触到书籍，也都是通过了老百姓中的这个最高阶层，人民中这两个阶层的性质和需要是不能混淆的。可在我们这里，人们常常把他们混为一谈，所以才产生错误的念头：直接通过农村村社推广书籍。一本书如果乡下人民喜欢，自然会传到他们手上，通过城里的老百姓，通过地主家的仆人。这是我们目前实有的推广书籍的方法。首先也就应该从这一方法出发。普通民众中的最高阶层，包括仆从、市民、文书等等，甚至同一些官吏和地主也相去不远。当中不少人还出身贵族或是公职人员，他们读书不多，受教育程度不高，但也阅读并喜欢《伊斯兰女教徒》。又如《泽菲罗特》① 一书，不仅打动了下层民众，还吸引了上层社会里极多的人，也就是并不仅限于上层社会中受教育程度很低的人们。那些不再读《伊斯兰女教徒》的人们，会饶有兴味地去看《泽菲罗特》，如读有关世界末日之类的议论一样。有的人缺乏首创精神，把眼前的生活视为极其正常的、绝对必须的、已然确

① 是俄国作家、音乐评论家弗·费·奥多耶夫斯基（1803/04？—1869）写的逗笑故事。

定不变的东西（由于习惯的力量，或是没有可能采取其他看法）。这种人很自然地会有些倾向于怀疑，倾向于发议论，倾向于否定。而《泽菲罗特》等作品表述的真实的或可能有的事实，恰好与真正的现实完全相反，推翻了后者绝对必须之说，彻底打破了后者令人窒息的平静。这类书正是以这一否定的态度，博得社会中间阶层的欢迎；又由于文笔通俗，能够极其有效地促使人们动脑筋思考，发议论，享受一定程度上大胆质疑的乐趣。因此普通百姓甚至连种地的庄稼人，都最喜欢书里同他们的现实生活相反的东西，而他们的现实生活几乎总是很严酷又单调乏味；最喜欢书里能表现出另一个世界，与他们周围全然不同的世界。甚至童话这种显然虚构的东西，也会博得普通人民的欢心，原因部分地也在这里。更不用说一切神秘的东西能给人民多大的影响了。由于这类书不是来自人民的见识，也不超越人民的哲理，它们也被看做是自己的书。随着这类书的增多，老爷们的高级文学越来越明显而又深深地脱离了人民的文学。因此，当谢尔比纳先生向人民推荐《伊戈尔远征记》，甚或更糟地推荐民谚的时候，就显得十分可笑了。这意味着把来自人民的谚语，把构成他们日常现实的东西，又由我们这里重新推荐给人民。试问他们要民谚干什么？是为了变得更具人民性？你们不必费心了，没有你们的提醒，他们也忘不了民谚。倒是你们自己别把它给忘了。

在谢尔比纳先生的《读本》中，并非全部都是人民不感兴趣的。不过这书的语气，它来自贵族老爷，它对事物的态度，这些都是人民难以接受的。他们本能地要排斥它。不仅如此，上文讲到的传播此书的办法，会使它绝无成功的希望。

我们重申，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在人为的办法中）就是推销。不妨说这里人为的成分最多，施计取巧的成分也最多，

正因此它的成功也可能会部分地受到影响。为什么说人为成分最多呢？因为全部计谋就在于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计谋，初看起来书完全是给太太们出版的。的确，推销商算什么老爷呢？他根本不可能是有意地向人民普及教育的。推销商是咱们自己人，他想从人们口袋里掏钱，却不是主动做教育的善举。难在如何把有意的施教者变成推销商，比方说由某个慈善组织来出书，或是由某位高官，人类的启蒙者，也许是一个平常的学者——人类之友来出书。他们要钱干什么呢！他们宁愿自己出资。不过要做得非常巧妙，不让公众看出来。所以最好是这位人类之友真的就当推销商。这事在我们看来本无可非议。劳动者理应得到报酬嘛，这话人们早就说过了。[①] 试想一个善人虽有积善的强烈愿望，自己却很穷，他也得活下去，也得劳动养活自己呀。如果他有给人民编书的特殊才能，了解人民也了解人民需要什么，而且他热切地想尽快在人民中普及文化教育，那他就可以有事做了：出版自己的书，销售之后获得收入养家糊口。他甚至完全不必索要高价。如果书对口味，销量会很大，所以一本书的利钱再少，总算起来也是可观的。这里刚好是：书编得越好，需求就越多，获利就越大。而所谓书编得好，就是编得有趣，能吸引人。因为好书就是吸引人的书，不管它是讲什么的。所以应尽可能地避免任何计谋，不必按照事先对农民心理所作的研究来分什么章；用不着从第一章引出第二章，再引出第三章；不需安排一些文章专门吸引人，提高兴趣。总之，要让人们不易看出（而不是像谢尔比纳先生所说，

①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0章，第10节）：“……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又《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0章，第7节）：“……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让人们看得清清楚楚的）出版者遵循的“重要逻辑原则和实际的与心理的考虑”。换言之，逻辑也好，实际的和心理的考虑也好，编者现在和将来都应该有，如果他是聪明干练的人。问题是应该尽量藏而不露。因此最好是连编者也不明确知道这些原则，让它们自然地甚至下意识地发挥作用。这已属于最理想的情况了。这种理想情况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出现：为人民编书者从小就意识到这件事是自己百折不挠的志向，就感觉到自己天然地爱同人民一起生活，一生都爱同人民交流沟通。据说某些天生的教育家便是如此，酷爱同孩子们一起生活和交往。不可把这种人同学者型的矫揉造作的教育家相提并论。天生的教育家也可能成为很有学问的教育家，但如果没有内心的向往和天赋，光凭学问是不会取得那么好成果的。不过这样的编者现在还难以看到，虽然以后肯定会出现。社会上新呈现的任何活动，最后总要在自己的活动家身上达到理想境界。在我们这里，这件事还处于萌芽状态，不过有望成为一种绝对的必须。这类活动家今后更会毫不担心地出版法律、卫生以及其他方面的大众读物，印得会很精彩，都是人民所需要的知识，用不着任何的计谋，原因正在于这些书是人民所需。这类出版家要能成为真正的人民活动家，那上面说的一切便会完满地实现，最后人民将承认他们是自己人，他们编的书将大量发行，因为读物不仅有用、需要，而且会编得极有才气。首先需要有才气，才能接近人民并与之交往。需要自然的天生的才华。而这似乎是目前《读本》编者们所根本不具备的。我们现时出书却不得不勉强为之，带点儿图谋。为了设法掩饰花招，必须使人民以为这种人为的成分、这种图谋，全是为了推销，为了卖书赚钱。由于上述原因，第一，《读本》这个学究气十足的幼稚书名是可以去掉了，人民可不是你们想象的清教徒。他们不

会责怪一个惹人注目的书名，他会想到这全是为吸引人们买书，而不是像《读本》那样为的促使人民阅读，免得农民因为不识字没文化而感到羞愧，免得愧对善良的人们和慈善的老爷，使得他们不得不以行政手段通过官方来对愚昧的人民普及教育。正因如此，应该尽可能取消一切以行政办法推广书籍的做法。要让人民自己到市场上去买书，也就是让亲家马特维亲自听到并推荐：这本书"很有意思"。不论是什么书，让它自然地传播效果最好，这是最正确、最聪明、最可靠、最有益的办法。在一本书里，至少在初读的时候，一切都该服从于趣味性、吸引力。所以编书的时候绝不可排斥那些超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东西，超出他们时常厌恶的现实的东西。主要是诉诸普通百姓的想象力，完全不是什么罪过。例如大自然的奇迹、遥远国家的故事、皇帝与人民的故事、俄国沙皇的事迹、征讨诺夫戈罗德①、僭称王号者、围攻大修道院②、战争、远征、伊万王子之死③、个人的冒险趣闻，以及各种游记，如库克的游记④或各个阶层各种年龄都极感兴趣的邦捷科船长游记（亚历山大·仲马利用过去的材料天才地编写而

① 1478年诺夫戈罗德并入莫斯科公国，随后伊凡三世镇压了诺夫戈罗德人民的反抗。

② 指1608年9月23日至1610年1月12日伪德米特里二世的波兰和立陶宛军队围困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的故事。

③ 指伊凡雷帝杀死自己的儿子伊万（1554—1581），但也可能指彼得一世的哥哥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1666—1696）。

④ 指詹姆斯·库克（1728—1779）的游记，自18世纪末起在俄国多次出版。

成的)①，如此等等。

我的天哪！周围掀起一阵何等的狂笑，何等可怕的愤怒之声啊！什么？给人民阅读的书里加进亚历山大·仲马的译作?!然而，既然仲马写出了邦捷科这样的杰作（好像是给孩子们写的），是适合民众阅读的，那收进去又有何不可呢？人民并非清教徒，需要时不妨读一读仲马，这也许正是编书所不可缺乏的务实精神。人民绝不反对读书，只是还十分缺少阅读经验。干吗一股脑儿地只塞给他有益的高尚的仁慈的思想精华呢？你们会说，人民可不像小姐那么娇惯，讲究口味，非得读仲马，不然一打盹儿书就掉到地上了。我同意，不过对人民来说书总还是新东西，他们在书里找的，绝非悠闲愚钝的小姐所需要的东西，但引人入胜是于事无碍的。我自己也曾有机会在兵营里听士兵读书，是朗读（一人念大家听），讲一个男子德·舍瓦尔尼同公爵夫人利亚韦尔贡杰尔的逸事。书（一本厚杂志）是一个士官生的，兵士们读得津津有味。故事讲到公爵夫人放弃自己的全部财产，把几百万的年收入送给缝衣的穷女子罗莎，把她嫁给了德·舍瓦尔尼。自己则扮成缝衣女嫁给了一个普通士兵，他叫奥利韦耶·久赖，出身倒是名门，只因不愿折腰求人便没当上军官。读到这里，士兵们大受感动。有多次我自己给士兵，给波尔、潘非尔等尉官们读书听，效果总是很好，对此我心满意足，甚至是种享受。人们常打断我，要我讲解一些历史名人、国王、国家、统帅。我想狄更斯的作品产生的效果比

---

① 维·伊·邦捷科（1587—1647?），荷兰航海家。于1618—1625年间远航到东南亚和中国，历尽艰险。他的历险记于1646年在荷兰出版，1663年和1681年译成法文出版。作家大仲马以此书为基础创作了惊险小说，俄文译本于1852年在彼得堡杂志上刊出。

这要差得多，萨克雷更要差，斯科别列夫[1] 的战争故事就不会有反响，听得叫人发困。噢，这些听众是多么敏锐的人哪！虚伪的狡猾的东西，一下子就听出来了。可同时，他们又是那么幽默、那么有风趣。自然，有人会问我：您通过自己的朗读达到了什么有益的目的了呢？您是否教育了您的听众呢？他们从您这儿得到了什么呢？我的回答是：第一，我根本没想教育自己的听众，而只想让他们愉快，因此我自己得到了极大的愉快。当我讲解一些国王、国家，说些有用的知识时，我也同样感到十分愉快。第二，这终究是朗读，而不是别的活动；不管怎样，这些人还是学会了从书中得到乐趣。所以书终归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第三，虽然那时我根本没想过，但后来产生了一个想法，即书籍总比玩民间纸牌要好。第四，既然谈到益处问题，既然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从阅读中得来的内心感受、某些思想、某些理想，多少总有些价值吧！当然，如果他们听了读《伊戈尔远征记》之类，得益会大得多，还有如《鞭毛虫》、《民谚》、《阿丰山》，或是《编年史家涅斯托尔》（此人传记收入《读本》的原因，恐怕不只是因他的生平有趣，而是因为他是编年史家，这自然会在民众眼中引起特别的兴趣，不是这样吗?)。请不要责怪我挑剔，我不是要争论，上面举出的收入《读本》中的文章当然可能对人民很有益也很有趣。只是我觉得，光是选作品收进《读本》，想让人民立刻如饥似渴地阅读，这是很不够的。我觉得还要尽可能编得有意义，有特色，恰恰需要有大众文学的那种才华。

有人要问我：如今您到哪儿去找适合的作品，即便您编的

① 米·德·斯科别列夫（1843—1882），俄国步兵上将，曾参加征服中亚的远征和 1877—1878 年的俄土战争等。

书是推销用的，没有官方色彩也不含什么图谋，如此等等吧！我的回答是：如今我们当然也要利用现代的文学，虽说它整个地是给老爷们看的。显然这其中也有许多许多是适宜选来给人民阅读的。只要很会选。怎么选呢？我们以为在讲完上面的意见之后再解释已属多余了。我们剖析谢尔比纳先生的文章，可绝不是说我们选起来能比他更聪明更成功。我们只想说明一点：不论我们提出了怎样的推销办法，在目前这个时候我们觉得谁也编不出优秀的《读本》。不过我们完全相信，在今后，甚至就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这儿会出现一个专门的文学门类，给人民阅读的文学。这只是一种预测，但我们相信它会兑现。这一未来文学的活动家们，如我们上面所说，将以天生的才赋和激情来从事这一工作。很可能他们不需费力，自然地就找到同人民对话的语言，因为他们自己就会变成人民，真正同人民的观点、需求、哲学融为一体。他们将把我们知道的一切，转述给人民听，并且从这一活动中，从转述中自己获得享受。那时他们会在自己身上感到全新的视角，全新的见解；这是生动而积极的见解，而见解的力量和独立性恰好来源于这种新的活动，来源于这种活动的需要。这些见解正是我们与人民这个本原实现迫切必须的结合所产生的成果。这些自然还只是预测，关于未来的这种活动我们还有许多话想说，同样作为预测，只由于某些原因我们暂时不说了。这一点应该特别提一句。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完全无意否定我们一些聪明而善意的人们目前就在编写人民读物的活动。上帝作证！正是这一活动将引发出今后更加有效的工作。因此，即便我们今天不同意谢尔比纳先生的某些见解，再说一遍，我们还很少见到比他的《试编》更聪明更充满善意的《读本》。对《试编》的作者，我们不能不深表谢忱，感谢他极出色极有益的劳动；对刊登如此富有见地

的文章的杂志，我们也深表钦羡。

五 晚近的文学现象

日报①

每当无事可做，没有真正严肃的事，活动家们就如猫狗同笼，开始找碴儿斗嘴，争论种种原则和见解。某甲责备某乙，说他的信念不对头。某乙又责备某甲，说他只看到鼻尖底下一点儿小事。某丙大骂一些小书和书的装帧，某丁除了自己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第五位坚守不可动摇的世界规律，用世界标准衡量一切的一切，望着所有的人大吹口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无须一一赘述。近日出现了一份《日报》，才出版五期，已经引来一片骂声。出现了关于大学的“新问题”，于是谈大学的文章如倾盆大雨向我们浇来。因此我们也想就最近这些文学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也想讨论一些原则，也想责备一些人信念不对头……理应如此，人同此心嘛！大家都要参与到共同的发展中来，诸如此类的原因吧。

《日报》就是那个安息了却不安分的《俄罗斯座谈会》②，只是分散到了报刊上。仍是那些人名，仍是那些思想，仍是那

---

① 俄国文学和政治的日报，1861—1865年在莫斯科出版，是斯拉夫主义者的机关报。出版和主编者为伊·谢·阿克萨科夫（1823—1886）。

② 1856—1860年出版于莫斯科的斯拉夫派杂志。主编是亚·伊·科舍廖夫（1806—1883），后来伊·谢·阿克萨科夫也参与编辑。伊·谢·阿克萨科夫即下文谢·季·阿克萨科夫的次子。

些原则。主编是伊万·阿克萨科夫。第1期上是霍米亚科夫、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均已去世）[①] 的文章。这份刊物上最精彩的是“斯拉夫”和“地方”两个栏目。这在当前俄国刊物上几乎是见不到的，至少不是这样经常连续地出现。因此这刊物占着相当奇异的位置。整个地说，它是很引人注目的。

这个杂志已经惹出了些麻烦。据说阿斯科琴斯基[②] 对它赞不绝口，可有些人迫不及待地要埋葬这新出的《日报》（当然是通过笔诛）。在彼得堡的某杂志上，有些掘墓者已经猜测出这刊物是应当属于哪一厅管的了。

然而，这些掘墓先生并不正确。

这里根本谈不上属于哪一厅管的问题。[③]

我们并不是为《日报》辩护，也并非赞成它的观点。但阿克萨科夫一家三位的名声之大，绝不至于使我们不知这是何许人。再说这简直是搞思想恐怖！谁的想法稍许不同，就置他于死地，别的办法不成，就不惜散布流言飞语。这不是家长专制吗！这不是用酸奶培育起来的家长恐怖手段吗！

够了……还是说说我们对新刊物的看法吧。

这里依然是那些斯拉夫主义者，依然是纯粹而理想的斯拉夫主义，丝毫没有变化，理想与现实迄今仍奇怪地混合在一起，对它来说，既没有过任何事故也没有过任何教训。这些斯拉夫派还是顽强敌视一切异己的东西，还是不懂和解为何物，

① 这里指作家谢·季·阿克萨科夫（1791—1859）的两个儿子：长子康斯坦丁（1817—1860），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次子伊万（1823—1886），政论家。阿·斯·霍米亚科夫（1804—1860），宗教哲学家、作家。他们都是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

② 维·伊·阿斯科琴斯基（1813—1879），当时反动刊物《家庭恳谈》的主编。

③ 这里大约是指沙皇的特务机构御前办公厅直属的第三厅。

还是极端偏执又拘泥于绝非俄国人能有的吹毛求疵的形式。且举《日报》第1期的片段为例。

这种假话已然泛滥成灾，如今仍在肆虐。整个的内在发展，社会的全部生活，如同染上了麻疯病而遭到假话的腐蚀。尽是虚伪！教育里是虚伪，这纯是徒有其表的教育，没有任何主动性，没有创造。艺术中的灵感是虚伪的，死气白赖去表现别人的不着边际的理想。文学是虚伪的，它煞有介事地探索的课题，并非我国人民生活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它关心的是别人的疾苦，对自己人民的苦难却无动于衷。对民族性的责难里充满虚伪，因为不是出于热爱而愤恨，乃是由于居心要亵渎而且本能地敌视一切神圣的荣誉和责任。自我吹嘘也是虚伪，因为伴随着精神上的颓废和对自己力量的丧失信心。崇拜自由同样是虚伪的，因为其中混杂着实行最巧妙专制主义的动机。宗教精神和宗教信仰中也有虚伪，要以此掩饰渎神的粗鲁态度。一些荒诞学说的胜利，同样包含着虚伪，因为是建立在寡廉鲜耻的愚昧无知之上，毫无顾忌地践踏社会良心，完全无视民族生活中那些显然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盲目追求标新立异，照搬外国的进步与文明形式，更是一种虚伪。我们社会所炫示的远非常见的讲人道、有文化等等，都是虚伪，因为是不加分析地接受截然相反的原理，闭眼无视不同的结论，故意回避一切根本的问题，膜拜现代一切时髦偶像，把廉价的粉饰当成高尚与宽容的义举，连最尖锐的矛盾也不加以解决。这里是孩童的幼稚同所有暮年的病态两者空前的奇特结合，然而却又是可能治愈甚至一定会治愈的。我们大家都感觉到这一点，我们甚至无法当真地怀疑这一点，我们的救星已在闪烁发光了。

不过，我们并不认为在斯拉夫派眼里这颗星在闪烁发光。

斯拉夫主义者有一种难得的本领，就是认不出自己人，对当代现实一窍不通。只看到坏的一面，这比什么都看不到还坏。如果说有什么好的方面引起他们的注意，那这好的方面一定得多少不同于莫斯科的人们一次认定的那种理想模式。不过此时这个好的方面就要被永远拒绝，要受到更严厉的责难，原因恰恰在于它竟然成为好的方面却背拗了莫斯科的规定。其实呢，他们对自己的理想也还根本没有弄清楚。他们有时能强烈地感觉到，透彻而准确地感觉到俄罗斯民族特点的某些基本因素（但绝不是全部因素）。没有哪一个西欧主义者对世界对俄国村社的理解和论说，能超过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在他最后一篇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可惜这篇文章没有写完。难以想象还有更准确、更清晰、更广泛有效的理解了。不过，也是这位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还写了一篇论俄国文学的文章，如今刊载在《日报》第 1 期上……这我们以后再谈，先回答一下前面摘引的文字。

我们要直截了当地说，斯拉夫派的领袖们公认是正直的人。既然如此，怎么可以说整个文学“对自己人民的苦难无动于衷”呢？怎么能说“对民族性的责难”“不是出于热爱而愤恨，是由于内心本能地亵渎一切神圣的人格和责任”呢？何苦这么狂热地敌视！何苦这么武断地看待论敌最隐秘的思想，看待他们的心灵和良知呢！难道只有斯拉夫主义者独揽爱国与正直的特权吗？除了精神极度狂乱之人，谁会这么说这么写呢？……说真的，这里有些火刑和拷打的味道……我们不是夸张。本文最后还将引述《日报》上一段激愤之词，它颇能说明问题……

的确，我们这里的虚伪不实之处很多，这是事实。有人时常把别人的需要当成自己的需要，只不过这全是由于误认为是

自己切身的利益，却绝非因为西欧主义者“居心要亵渎而且本能地敌视一切神圣的荣誉和责任”（你们怎么忍心说出这种话来？提出如此可怕的责难，先得弄清楚许多情况啊！)。可为什么对实情视而不见呢？为什么闭眼不看各方正在复苏的生机，对现实、对根基的追求呢？如果说现在有虚伪，如果说过去也有虚伪，那么我们的文学数十年来对这些虚伪几乎总是采取否定的而不是肯定的态度。在斯拉夫派看来，似乎不存在下述的事实：在追随西欧几乎近于极端的时代，整个我国的文学，果戈理（患病之前）及其追随者，对模仿西欧的结果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对他们来说，同样也不曾有过这样的事实：正是这个文学，激烈否定的文学，以任何文学都未曾有过的力量施行讽刺和主动自我谴责的文学，高尚的文学，怀着激情径直奔向勇敢与正直的文学，正是这个文学，得到了最极端的西欧派的热情支持。然而迄今为止，斯拉夫主义者顽固地要把西欧派视为自己的敌人，一讲到他们就满怀鄙视和诅咒，忘记了或最好说是不想明白：追随西欧以至其最极端的表现，都起因于强烈希望自我考验、自我认识，是在行将死亡的彼得改革中最后一线生机，是谴责彼得的第一声。换言之，这是生活进程本身所决定的。似乎西欧派就不具备斯拉夫派对俄国精神与民族性的那种敏感。而这其实是具备的，不过西欧主义者们不想像魔术那样捂上眼睛和耳朵，不理睬某些他们所不理解的现象。他们不愿丢下这些现象而不加以解决，却如斯拉夫主义者一样无论如何也要采取敌视态度。他们面对世界没有闭上眼睛，而是期望利用智慧、分析、概念来求得真理。西欧主义者应该超越自我，怀着惭愧摆脱自己的失误。它最后的确是超越了自己，走向了现实主义。可是斯拉夫主义者至今仍抱着自己那模糊不清的理想，这理想其实是来自对我国古代生活的某些成功的研

究，来自对祖国热烈的却有点书卷气的抽象的爱，来自对人民和人民真理的神圣信仰。但同时（何必讳言呢？为什么不说出来呢！）又来自从沃罗比约夫山[①] 上俯视莫斯科的全景，来自对17世纪中期莫斯科阔佬的理想描绘，来自卡拉姆辛用法国格调表现的围攻喀山和大修道院之类的画卷，来自幼时读卡拉姆辛《市政官夫人马尔法》所得的印象，最后还来自幻想中完全战胜日耳曼人的画面，甚至是指体力上的超越，对他们绝不宽恕，甚至战胜后还要责难。我们说这些不是为了讥笑，而且也没什么可讥笑的。我们只是想说斯拉夫主义包含某种幻想的成分，有时发展到完全不认得自己的人，完全脱离了现实。所以说西欧派不管怎样总比斯拉夫派现实些，尽管有错误还是在向前走，前进运动还是在它这一方面。而斯拉夫派却一直裹足不前，甚至以此为荣。西欧派勇敢地给自己提出了决定性的问题，并怀着痛苦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认识自我还是回到了人民的本原上，承认需要与人民相结合，在根基上解救自己。从自己这方面，我们要指出一个事实，并坚信它确凿无疑：在当今几乎普遍（除了某些极端和可笑的例外）回归到根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的过程中，斯拉夫主义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或许甚至毫无作用。前进的一派人走的是自己的路，是经过自己的分析认识了自己的道路。它虽然承认根基的必要性，但根据以往的生活、过去的发展，又深信解决问题不是靠诅咒，而是靠和解和联合，深信已经实行的改革，终归是给我们带来了伟大的普遍人性的因素，促使我们理解普遍人性，并在今后以此为我们的主要使命，为我们的本质规律，为俄罗斯力量与精神的一切努力所追求的最主要目标。请大家注意：在我国，社

① 在莫斯科，1924年后改名为列宁山。

会公众向来是同情西欧主义者的。不要忽视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公众。不要像某些人说的，以为我们社会的公众太不值一顾，太愚昧，受欧洲影响太深，还未及形成便已经腐败。不要以此安慰自己，不要低估社会的本能力量，而不管它是什么性质的。我们必须记住：社会热情地支持过西欧主义，分享过他们的失误和追求，而把斯拉夫主义一向视为是化装的假面。那么公众同情的奥秘何在呢？奥秘就在于：生活（不管它怎么样）、现实、更新、未来的保证，甚至还有回归民族土壤，为此所迈出的第一步——所有这一切全掌握在现实主义者手中。因为欧洲主义、西欧主义、现实主义——这都意味着生活的复苏，意味着觉悟的开始、愿望的开端、新型生活的开端。西欧主义的道路，是无情分析的道路，随之才有我们社会所能发生的一切。现实主义者不害怕自己分析所得的结果，即使公众身上存在有虚假不实之处，即使他们身上有你们所津津乐道的那些虚假的坏的东西。我们不怕有人幸灾乐祸地历数我们的痼疾。所有这些虚假的东西，如果确实存在，都注定要成为殚精竭虑和分析解剖的对象。虽然有这些虚假的东西，但推动我们前进的却是真理。对此我们深信不疑。前进的过程不会停止，社会至少能达到今天所努力追求的最终结果，这一点你们可以相信。

但你们以一份报刊的面貌出现了。你们不愿置身于普遍的进程之外。你们想以生动的孜孜不倦的语言，对现代生活现象做出回应；想用比以往更积极的行动，去关注你们不感兴趣的（这是你们自己说的）需要。我们欢迎同心协力，不过你们并不会成为同志。你们还将迫不及待地、居高临下地教训我们，没完没了地教训我们，讥笑我们的失误，不承认我们的痛苦，用狂热的理想主义严厉谴责我们的痛苦，如此等等。你们其实已经开始了。请看，那位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在《日报》

第1期的文章中就冲着整个俄国文学来了。他对这个文学采取敌视和怀疑的态度，用严重心脏病患者那种冷漠的口气完全否定了这个文学中的所有自己的东西，投以傲慢鄙夷的一笑。即使他的见解完全正确，文章的冷漠和怀疑态度，超然傲视周围而自我欣赏，对一切都不屑一顾的鄙夷目光——这些已是过于冷酷和轻率了。在他看来，整个我们的文学全是模仿和追求外国的理想。他否定我国文学中有任何社会意识的表现，不相信文学所作的分析，不相信文学中反映的自我谴责、痛苦和欢笑。不，先生们！你们没有同我们一起生活过，你们没有同我们分享过欢乐和悲哀！你们是海外的来客！

是的，欧洲理想、欧洲观点，总之是欧洲影响，当然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有强烈的反映，至今仍然如此。难道我们对这些是奴颜婢膝地接受下来的？难道我们不是通过生活的进程加以消化的吗？难道我们没有对这些外国现象形成自己的俄国的看法吗？难道我们不是通过生活本身才深信并感受到：普遍人性可能是我们民族性中最重要最神圣的属性。最后，难道我们没有去认识民族性吗？难道没有意识到需要根基吗，需要回归到根基上来吗？阿克萨科夫说，我国文学中表现民族性的一切尝试均不成功。他说："奥斯特洛夫斯基[①] 笔下商人的样子就像，语言也相似，不说 должен 而说 должон[②]。"莫非阿克萨科夫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中只看到了这么一个 должон 吗？从文章的意思和语气看，正是这样。但我们不相信阿克萨科夫真是这样。他在装腔作势。要知道，一个严肃的人偶尔也

---

① 实际上，康·阿克萨科夫的文章中没有提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姓名。

② должен，俄文意为"应该"。这里是指俄国人读词时模仿外国人的发音。

要顽皮一下，需要歪头叉腰，拿块玻璃罩在眼上观望宇宙，就好像下午三四点钟我们有人在涅瓦大街上眺望宇宙一样……你们知道阿克萨科夫要求什么吗？他问：真正的商人在哪里呢？他的心灵在哪里呢？他内心的精神呢？换言之，他要求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描写俄国人的正面特点和振奋人心的方面。也就是对浮现在我们眼前、诱惑着我们的理想，写出我们最终的领会和它的最深刻的美质。这事不值一提！我们不打算责备阿克萨科夫没能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中看出俄罗斯之美的踪迹，这在剧作家整个的“黑暗王国”[1] 里已有所表现。我们也不怪罪他只会责难和讥笑别人，却不感到惊讶：这美质这新意在剧作中何以能发现得如此之早，表露得如此之早？人总难免有察觉不到的东西嘛！特别是处于某种理想观念的影响之下时。可我们无法忍受一个老爷派头十足的人，戴着黄手套，举着皮鞭，吆喝正在干活儿的苦力：“为什么活计没干完？一个人八普特[2] 也搬不了吗？懒鬼！”请问您干了什么呢，阿克萨科夫？如果不是您，那您的那些斯拉夫主义者呢？有时读一读你们的意见，最后不由自主地得出一个结论：你们全然置身事外，看我们就像看异族的人，仿佛是从月球上来到我们这里，不是生活在我们的国家，不是生活在我们的时代，过的不是我们的生活。你们好像在拿谁做实验，在显微镜下看人。要知道这也是你们的文学呀！是你们的俄罗斯文学呀！干吗要居高临下地看它，像小甲虫似的解剖它？你们不也是文学家吗？斯拉夫派先生们！你们不是夸耀自己了解人民吗？那么给我们展现

① 是杜勃罗留波夫评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文章，这里是借用此词。

② 一普特等于十六点三八千克。

一下你们的理想、你们的形象吧！可据我们所知，你们的水平还没有能超过卢波维茨基[①]。你们要说：您这么讲太无理太粗鲁了。对不起，我们可以同意你们的说法，但条件是你们不再倨傲地对待你们的俄国同胞，不把他们看做是小甲虫，是一群蝼蚁，不再取笑我们的努力、痛苦和失误。抛开你们那居高临下的语调吧，要记住你们自己也是俄国人，也属于这个社会；命运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你们不能居高临下地以旁观的态度来判断，而把自己保护起来。你们似乎自夸有自己特别的东西，不同于我们。你们不能不承认，在“不说 должен 而说 должон”这个话里包含了太刻薄的讥讽，狡黠的讥讽，意思是说“看，多可悲，连这个都不懂，基本的东西也不明白！胡来嘛，太蠢了！”那好，你们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不要隐藏自己的财宝，不过别在训话当中，别在纪念我们的悼词中，而是现在，比方在艺术当中，因为这样最单纯最方便。要不然从旁看来有点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有人掌握了俄国使命、俄国精神的奥秘，独能识别俄罗斯人的俄国命运，知道他应该怎么做，可是一看实际情况，这些人却什么都拿不出来。如此说来，他们还不如没有文学家呢。

文学家是有的，可没有生活。

是的，没有生活！没有对现实的感觉！理想主义使人沉醉，使人着迷，也就导致心死。所以你们向我们自夸是了解的东西，其实你们自己也不懂。因此我们才说，你们感觉得到俄国生活的某些基本方面，却不是全部。为什么没感觉到呢？你

---

① 指康·阿克萨科夫的喜剧《卢波维茨基公爵，又名来到农村》（1851）中的主人公，他从巴黎回来，要让自己庄园的农民接受欧洲教育的成果，结果失败。

们是俄罗斯人嘛，是正直的人嘛，是热爱祖国的嘛！但理想主义毁了你们，有时你们出现一些可怕的失误，甚至涉及对这些基本方面的理解。例如《日报》第2期里有这么一段话，请诸位欣赏。

我们看到些什么呢……就说在我国的文学中吧。有怎样的……理论呢？……一方面是空洞无物的否定，激动而既无内容又无目的；只见到生活和运动的某种幻影，实则既无生活也无运动；一切全都半死半活，正在腐败；只知从敌对力量中借用力量。另一方面则是蛮横愚钝且又浅薄的力量，仅能求救于强制和冷酷无情的机械行动。一方面是虚伪的要破坏，另一方面是虚伪的要建设。一方面是没有信仰，把昙花一现的偶像人物当做上帝来膜拜，另一方面是假信仰，尊崇上帝偶像却借上帝之名捞取个人私利！这边是对任何的科学新说都卑躬屈膝，那边是粗暴地藐视科学、思想以及理智与精神的成就。这边是滥用和歪曲一切文字，那边是迫害言论，喜爱沉默和黑暗，暗暗赞赏缄口不言者。两者都同样是窒息精神，这边通过外部的强制，那边通过精神自己的委靡和贫乏。两者都同样是对外国的东西逢迎献媚，俯首帖耳地模仿，背离民族的精神，表面上却伪装是俄罗斯的民族性。这敌对的双方全陷入无望的黑暗之中，又在黑暗中互相折磨，互相残杀。如果人民终于从沉睡中睁开眼睛，看一看我们的文学家和各种艺术家（除某些例外），看一看这些不速之客，这些在人民眼皮底下大摆酒筵的人们，听一听他们震耳欲聋的叫喊，他们高声的命令和高论，这时人民会说什么呢？“我国富饶的土地托付给你们的才能，你们都用到哪里去了？它的精神财富浪费在什么地方了？我的习俗、信仰、传说、我经历的生活、我多年的痛苦经验都怎样了？你们闲暇时都干了些什么？生活与精神的完整统一性在哪里？你们培育的科学在哪里？我的富有表

现力而又自由流畅的语言在哪里？你们把一堆什么烂污货带到了我的土壤上？……不，你们不属于我，你们是外族人民的蹩脚仿造，如果他们肯接受，你们去找他们好了。我不认得你们，我不需要你们，你们与我格格不入……”这就是人民觉悟时会说的话，复苏的民族精神如一股清风，将把他们当做垃圾一扫而光。

但现在时候还未到。尽管我们几乎确信自己的声音不会有用，但既然谈到了这个话题，我们同样要说：“旷野呼声① ——你们准备好见上帝之路吧，忏悔吧！”

很好，只是人民会这么说吗？他们会这么看吗（这是最重要的）？你们这不是把自己的结论、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人民吗？你们谈到了我国的艺术家和文学家。关于艺术家现在我们不想说什么，不想猜测我们的美术学院命运如何。但对你们讲到的另一些人，我们想，人民会说：“你们尽可放心，你们也是一样的俄国人。之所以认你们是俄国人，是因为你们最终承认了我，并且明白了离开我你们就生活不好，离开我你们就一事无成。你们是好样的，因为你们的思想刚刚苏醒，你们刚刚成熟起来，立刻便想到了我。你们是好样的，因为你们以我的痛苦为痛苦，也教育别人承受痛苦；因为你们为我辩护，并一起决定回归到我这里，回归到乡土。现在你们教教我吧，你们在海外学到了什么，确切地描写一下你们所有的旅行和痛苦。我则要教你们知道你们已然忘记的自己民族的东西。你们在许多方面有失误，但不能把失误视为虚伪。你们相互间是不能容忍故意的失误的，而且也不想容忍这些失误。对此，我是极其珍视的。我们大家都来自同一良好的土壤，同为俄国人，我们大家

① 意为无人响应的号召。

彼此是相同的……”至于说到引经据典，那么人民不会引用预言者那种严厉的话语，而是选用充满无限爱意的仁慈的语言……我们是这样认为的。我们觉得我们在他们的意识中会有位置的，他们不可能有意地把我们当垃圾扔掉。他们在你们文章里的讲话，也是有意识地讲话嘛，正如你们有意识地把这些话塞到他们嘴里一样。不，先生们，你们不要诬蔑俄国大众，不要把自己的判断说成是他们的！

你们还有一些话，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讨论了（自然是为节省篇幅）。奇怪的是，你们明知人家不会去讨论、反驳，却还起劲地说，而且一说到底。可你们说了些什么呢？你们是怎么议论的呢？你们一开始便自己承认，你们的评判只准备听一面之词，只准备听被告讲话。你们不仅听了，还做出判决，也就是判处了一方。你们这样做合适吗？这请你们扪心自问吧。这里讲的当然还是俄国文学，还不是那么重要。可要是讲更重要的事呢？那你们的这种方法可就太糟了。看你们的意思，往后的《日报》只会带给我们晦气了。我们本是怀着好感接受你们的杂志的，可你们却把好感全赶跑了。再比如，第4期上出现一位记者Н. Б，他讲起了农民。他那观点的闭塞局限和沾沾自喜，真是无以复加。《日报》编者始终追着作者，不断地反驳他。在记者只见到农民的野蛮、愚笨、无知的地方，编者告诉他这里不仅没有野蛮和愚笨，相反倒是十分聪明。对Н. Б先生某些令人恶心的说法，编者反驳时极力迁就而且客气，甚至有一处迫不及待地声称：Н. Б先生绝不是一个蒙昧主义者。他说：“我们非常了解作者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所以绝无可能对他下这种评语。”就算如此吧。也就是说，Н. Б先生不是蒙昧主义者，我们不能这么想，即使编者有这些反映。可以设想，每人都有自己的想象力，而编辑部喜欢刊登这类它不

得不在同期加以批评的文章。那么下面这件事你们怎么看呢？编者针对 H. Б 先生的一个见解，自己也说了一段话来表述过去农奴的状况：

我们甚至以为，总的来说地主和农民的私人关系是相当人道的。地主拥有看来是不可动摇的农奴制权力，天真地坚信农奴制完全是人道的上帝的法律，因此就没有必要借诽谤农民来为农奴制辩护，从而对农民相当友好和善意。能证明这一点的，还有地主允许建立和发展农民村社和米尔①，而这样做既不是强迫农民接受，也不仅为防止地主的横行霸道。在我国，从来没有过类似封建主与奴隶的那种关系。农民对地主来说不是英、法那种“维兰”②，而是某种“上帝的奴仆”、“基督的奴隶”，虽然有时也“带有农民的愚钝”。偶尔发生过可怕的滥施淫威，但没像西方那样形成法规。那里的一些赋税，那里的一些主子“权利”，如所谓的 Jus p〈rimae〉 n〈octis〉③，在我国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而当社会意识起来批评揭露农奴制的整个内在的荒谬性，打破了建立在无意识的专横而淳朴的关系上的快乐世界时，许多地主则真的开始诽谤农民，整个地攻击农民的权利，不过这并没影响实行农民的解放。

对俄国人民的诽谤要远远甚于农奴主的诽谤。而对人民的诽谤出自那些疯狂崇拜西方教育的人，他们否认人民没有任何权利能自由而独立地获得发展。

好一个“拥有看来不可动摇的农奴制权力，天真地坚信农

① 农村公社的音译。
② 法文的音译。意译为“农民”。
③ 拉丁文：初夜权。

奴制完全是人道的上帝的法律，从而对农民相当友好和心地忠厚”!

首先，人必须糊涂到何等地步才会坚信农奴制是上帝的法律。果真如此，怎么能保证这种人会对自己的农民很友好呢?你们说我国没有过类似西方的那种封建关系。不，不是这样，两者肯定是半斤对八两。去问问农夫们吧。

你们说：农民对地主来说不是那种维兰，而是“上帝的奴仆”、“基督的奴隶”。可是，奴才、下流痞、家奴、走狗——这些称呼你们以为要比维兰高尚些吗?请问你们所说的友好的地主指的是什么人?其实，握有那么多权力的地主，即使最善良的、最最善良的，有时也不可能对自己的农民“友好和忠厚”。这还要说吗?……这一点已经说得够多了，人人都明白，时至今日，对此很难会不理解。

最后，你们说西欧派对俄国人民的诽谤甚过地主对农民的诽谤，后者指国家的强化监督打破了“淳朴关系”的“快乐世界”时地主的反应。可这不对，这只是你们的感觉而已。

说到这儿足够了。因为我们很可能还要不止一次地同《日报》途中邂逅。

彼得堡的诗与散文之梦

“啊，让我这小品文作家的角色永远遭人诅咒吧！……”

不要不安，先生们！这不是我的叹息！我得承认，对我的小品文来说这样的开头是太古怪了。不，我不会发出这种慨叹。不过，我在来彼得堡之前是绝对相信每位彼得堡的小品文作家刚坐到书案旁操笔写作每周或每月的例行小品文时，一定要发出这种感叹。的确，诸君想一想，写什么东西呢？比方说里斯托丽① 来了，于是所有的小品文作家一拥而上，一切小品文，一切报纸杂志，不管有没有倾向性，全都讲里斯托丽：里斯托丽来了，里斯托丽演出了。她演《卡门》，就全写《卡门》，打开什么报看都是《卡门》。她演《玛利娅·斯图亚特》，又尽是《斯图亚特》，《斯图亚特》。你争我夺地去抢新闻。最令人懊恼的是他们真以为这是新闻。人家拿到报纸就不想看了，内容雷同，叫人扫兴，您不得不承认要费很大气力和心思，想方设法找出不同的词儿说同一件事。那些倒霉的人苦索枯肠，自叹命运不济。试想在五层楼上阴湿的角落里，会发生

---

① 指意大利著名演员里斯托丽（1823—1906）。她于 1860 年冬到圣彼得堡演出，轰动一时，报刊有广泛的报道。

多少不幸甚至悲剧，一间屋里挤上全家人，饥寒交迫，而在另一间里坐着一位小品文作者，穿着破衫发着抖，正写什么小品文，讲新诗人歌唱茶花、牡蛎、朋友，手揪着头发，嘴咬着笔管，可周围完全没有小品文里的那种气氛①。我扯远了。也许在彼得堡没有一个这样的小品文作者。也许他们全驾着四轮马车，天天吃鹅肝大馅儿饼……那又怎样？难道小品文就只是罗列城里的热点新闻吗？看来对一切都应以自己的眼光去观察，应以自己的思想去分析，讲出自己的话，新的见解。哎呀，我的天哪！您在说什么呀！难道每天都能说出个新见解吗？实际上一辈子也不见得有什么新见解，即或听到了也辨认不出来。您说应有自己的思想。是什么思想呢？从哪儿弄来呢？只要您稍许脱离了老板② 的思想，他马上就拒绝并给您退稿。即使说有了自己的思想，可它新颖吗？到哪去找新颖呢？这思想还不是您本人的呀。这就得有头脑，能钻研，要有才华！您对我们小品文作者要求也太高了吧！可您知道小品文作者有时（当然是有时而不总是）是怎样的吗？是羽毛未丰的孩子，刚读完书，还常有没读过书的，但觉着小品文很容易写。他想：“小品文不需构思，这不是写小说。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开个

① 这里作者讽刺19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文坛小品文创作陈陈相因。小品文作者之一伊·伊·帕纳耶夫在《现代人》杂志的“新诗人短评”中也有同样的针砭，尽管他自己就缺乏新意。按：伊·伊·帕纳耶夫（1812—1862），俄国作家，他经常以“新诗人”为笔名发表讽刺性模拟的文字。1847年起与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一起编《现代人》杂志。《现代人》在当时以其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杂志时有思想交锋，因此本文对帕纳耶夫与杜勃罗留波夫颇有微词。例如上文提到的帕纳耶夫“唱茶花……”，“茶花”一词有另一含义，即风流女人（参阅下文注），所以它在这里是双关语。

② 指出版家。

玩笑哇，客气地回答个什么呀，讲一讲里斯托丽，讲一讲善行和道德，再骂骂堕落，一定要抨击一下营私舞弊，这样一篇小品文就出来了。要知道如今小货摊儿上就卖现成的思想，如同卖小面包一样。只消凑够一个印张，便万事大吉了！”今天的小品文作者，有的连想都不想：如果没有激情、没有意义、没有思想、没有愿望，那就全是炒冷饭，老一套。他也不想想，在现今的时代，小品文可说是……几乎是最重要的事！伏尔泰一辈子尽是写小品文啦①……还有我，我的天哪！我自己也在写小品文啊……看扯到哪里去了！新闻哪新闻！

先生们！新闻令我厌烦透了，我不懂你们怎么也不觉得恶心！比方说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②出了点儿事。天哪！小品文就一群群地从四面蜂拥而上，犹如猛禽扑向死牛。每人都撕下一块肉，不停地啄食，唧唧喳喳叫唤、厮打，好似成群麻雀突然从一片栅栏飞向另一片。叫唤什么倒不重要，因为讲起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总也可以说出点儿什么有分量的话，甚至是有意思的话。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啊，先生们，原谅我这半截话吧，关于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我也不想多说什么，换个别的话题吧。

我想，倘若我不是偶一为之而是经常好写小品文，我觉得

---

① 伏尔泰（1694—1778），法国作家、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他以哲理小说和戏剧著名，但他的作品包括史诗、悲剧、喜剧、短诗、小说、故事、题词、随笔、词典、政论、史著、书信等，几乎囊括了18世纪所有的文类。他的全集多达五十二卷，这里说他“一辈子尽写小品文”，可能是戏谑之词。

② 亚历山大罗维奇（1839—1868），是安·亚·克拉耶夫斯基的名字。他是《祖国纪事》的发行人和主编，在初期，这一杂志确实办得很好，发表了许多优秀作品，并得到作家与学者的合作。但后来他改变了作风，把杂志当做一种商业手段。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60—70年代的书信及政论中时常加以讥笑。

我会希望变成欧仁·苏，描写彼得堡的种种奥秘。我是最爱探求秘密的。① 我生性好幻想，喜欢神秘，我得承认不知为什么彼得堡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从小时起，我几乎被抛弃在彼得堡②，对这城市就怀着恐惧。记得有一件事，本来没什么特别之处，但却令我大为吃惊。我给诸君细说一番，其实这算不上什么事件，只是一种印象而已。要知道我是喜欢幻想、喜欢神秘的呀！

记得有一次，在冬天，一月里的一个傍晚，我从维博区③急着往家走。我那时还很年轻。走近涅瓦河边，我停步极目一望，河湾远处寒气迷蒙，忽然间出现一道深红的霞光，横亘在昏暗的天穹里。夜幕罩在城市上空。沿河广袤的原野因冻雪而膨胀起来，染着最后一线阳光，整个闪烁在不计其数的银色霜针中。气温降到了零下二十摄氏度……疲惫的马、奔走的人，全散发着热气。微小的声响也能使凝滞的空气震颤起来。两岸房屋冒出无数烟柱，像巨人般冲上寒空，一路上互相缠绕着，仿佛旧房上又出现了新房，半空展现出一个新的城市。后来又觉得这个世界连同他的居民，强弱不等的居民，连同他的住房、贫民窟和金碧辉煌的宫殿，在这黄昏时刻好似幻想的神秘梦境，马上就会消失，化作轻烟直上阴森的苍穹。我的脑海里突然萌生一个奇怪的想法。我浑身一颤，一股强大而从未有过的感觉涌来，立刻热血沸腾。在这瞬间，我仿佛突然领悟了蠕

① 欧仁·苏（1804—1857），法国作家。他写过小说《巴黎的秘密》，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谈自己也想写彼得堡的秘密。

② 此处的叙述有作家的自传性质。他于1837年就到彼得堡进工程学校，感到孤独。而且与他一起来的、他的大哥米哈伊尔很快就离开他而去列维里求学。

③ 在当时彼得堡的郊区。

动在我心中却未得到理解的东西。我仿佛一下子看清了一种新东西，一个全新的世界，过去我不知道它，只凭某些道听途说，凭某些神秘的迹象才略有所闻。我认为，正是从这一瞬间才开始了我的存在……请问先生们，我从小不就是个幻想家、神秘主义者吗？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件吗？出了什么事吗？没有，根本没有，只是一种感觉而已，其他一切都很正常。如果我不怕损害——波夫先生的温和思想①，我准会给自己开个药方：冲着我这离奇的想法，用树枝抽打一顿……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眼前浮现出故去的法杰伊·韦涅季克托维奇② 那胖乎乎的形象。

他在周六的小品文中，该会何等兴奋地抓住我关于用树枝抽打的话茬儿啊！

他会一连四个周六惊呼："男性读者和亲爱的女性读者们，你们看，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应该用树枝抽打。我至少还写了《维日金》③，可他们呢……"等等诸如此类的话。不过我希望，从事艺术十四年，继承了法杰伊·韦涅季克托维奇名声的新诗人，不至于罚我挨树枝抽打。

从那儿以后，从我有了那种眼光（我称自己在涅瓦河上的感觉是一种眼光）以后，便每每发生那种奇怪的事。早先在青年时代的幻想中，我有时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伯里克利，有时又

---

① 指的是杜勃罗留波夫此前不久发表的一篇反对对中学生施行体罚的文章（1860）。

②③ 法杰伊·韦涅季克托维奇是布尔加林的名字和父称。布尔加林（1789—1859），第三厅密探，官方刊物《北方蜜蜂》报的主编之一。这里暗指布尔加林迫害文学家。他在该报发表周六的小品文中，常常把矛头针对揭露文学。《伊凡·维日金》（1829）和《彼得·伊凡诺维奇·维日金》（1831）是他写的政治上无碍的风习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此文时，他已去世。

是马略，有时是尼禄年代的基督徒[1]，有时是比武场上的骑士，有时是瓦尔特·司各特小说《修道院》里的爱德华·格良杰宁，如此等等。我在青年时代什么没有幻想过呀，什么没有用整个心灵体验过呀，整个心灵沉浸在幸福和激昂的幻想之中，好似吸了鸦片。我的一生中再没有比这更充实、更神圣、更纯洁的时刻了。整个青春我全用在想入非非之中，等命运把我推上仕途，我……我模范地恪尽职守，但只要一下班，我就跑回到小阁楼上，穿上磨出洞的长衫，打开席勒读，又是幻想，又是陶醉，也经历痛苦，但这痛苦甜过世上一切欢乐，于是萌生爱意、爱心……于是起意去瑞士，去意大利，想象在眼前有伊丽莎白、路易莎、阿马利娅。而真正的阿马利娅我也给错过了。她住得离我很近，一墙之隔。我们那时都租个角落栖身，都靠大麦咖啡度日。隔壁住了个外号叫奶罐子的人，一辈子在找工作，一辈子全家挨饿，妻子有肺病，五个干瘦的孩子，他自己也穿一双瘦靴。阿马利娅是最大的孩子，当然她不叫阿马利娅而是叫娜佳。不过就让她在我心中永远是阿马利娅吧。我们一起读了许许多多的小说，我借给她司各特和席勒的书看。我入了斯米尔金的图书馆[2]，却没给自己买双靴子，旧的破了洞就用墨水涂抹。我和她一起读了克拉拉·毛伯雷[3] 的故事，大为感动，以致现在回忆起那些傍晚还免不了神经上的震动。

---

① 伯里克利（约公元前 495—前 429），古雅典政治家。发展了雅典的民主制。马略（公元前 157—前 86），古罗马政治家、统帅，七度当选执政官。尼禄，古罗马皇帝（在位年间为 54—68）。在公元 64 年曾迫害基督教徒，对其进行血腥镇压。

② 是著名的书商 A. Ф. 斯米尔金（1795—1857）设立的图书馆，坐落于彼得堡涅瓦大街。普希金、果戈理等大作家都来过这里。

③ 是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圣罗南之泉》（1823）中的女主人公，是这个冷酷无情的社会的牺牲品。

我给她读书讲书，她为此给我补过旧袜子，浆过我的两件胸衣。后来在我们那撒满鸡蛋壳的脏楼梯上看到我，她突然很奇怪地脸红，奇怪地一下子两颊绯红。她很俊俏、善良、温顺，内心藏着幻想，也怀着抑制的激情，像我一样。我丝毫没有察觉，也许有所察觉却……我很爱读“Kabale und Liebe”[①]，或是霍夫曼[②]的小说。那时我们是多么纯真无邪呀！但阿马利娅突然嫁给了一个世上最穷的人，他大约四十五岁，鼻上有个包，曾同我们一起租床位住，后来找到个工作位子，第二天就向阿马利娅求婚，但……这也注定了她要过一生穷日子。男方的全部财产也同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③]一样，只有一件大衣：挂了猫皮领子，“不过这领子随时都可说成是貂皮的”。我甚至觉得，如果这猫皮领不能充做貂皮领的话，他未必就决定娶亲，可能还要再等一等。我记得与阿马利娅告别的情形：我亲吻了她那美丽的小手，这是生平第一次。她吻了吻我的额头，古怪地嫣然一笑，笑得那么古怪，终生都铭刻在我的心上。这时我仿佛若有所悟……啊！她干吗要那样一笑呢，不然我是丝毫不会察觉的。为什么这一切如此痛苦地铭记于我的回忆之中！如今我想到这些还很痛苦，虽然我要是娶了阿马利娅也一定不会幸福。那样，席勒、自由、大麦咖啡以及甜蜜的眼泪、幻想，还有我的月球旅行……就不知要丢到哪里去了。要知道后来我曾经到月球去过一趟，先生们。

---

① 德文：《阴谋与爱情》。按：席勒的《阴谋与爱情》及他的其他创作，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创作颇有影响。

② 霍夫曼（1776—1822），德国浪漫主义作家。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不仅见于早期的《化身》、《白夜》等作品，而且在其全部作品中都留有痕迹。

③ 是果戈理的小说《外套》中的人物。

不过，让上帝保佑阿马利娅吧！当我自己刚刚有了住宅，也谋到一份很普通的差事，世上最最普通的差事之后，我就开始做另一些梦了……从前阿马利娅在的时候，在那角落里，几乎有半年时间我同她的未婚夫一起住，就是穿大衣的那个小官吏，猫皮衣领总可充做貂皮领的，那时我几乎都不愿想什么貂皮。后来突然间剩下我一个人，便开始思考起这事了。于是我仔细观察，突然发现了某些奇怪的面孔。这都是奇特的人物，相当平庸，绝非堂卡洛斯和波沙①，倒很像九级文官，不过是有点稀奇古怪的九级文官。有人躲藏在这些稀奇古怪的人群背后，以假面目出现在我眼前，并牵动着细线和发条，这些木偶于是活动起来，他则哈哈大笑，总是哈哈大笑。这时我脑海里浮现出另一个故事，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有一颗九级文官的心，正直而纯洁、有道德且忠于上司的心，同他共处的是某个女孩子，遭受屈辱而满面愁容。他们的故事深深地撕裂了我的心。如果把我当时梦到的这群人全部会聚起来，简直就是一场上乘的化装舞会……而如今，如今是另一回事了。如今我的梦虽则依然如故，但已是另一些面孔，尽管有时也来些老相识敲我的门。不久前我做了这么个梦。有一个官吏，自然是在某个厅里当差，从不表示任何抗议或说出什么见解。面容完全是朴实而毫无恶意的，衬衣也几乎看不见，文官制服已起不到原来的作用。我们这位怪人走路弓着腰，两眼瞧地。有时下班奔彼得堡大街回家，路过涅瓦大街时，真的再找不到更顺从更寡言的人了。甚至他穿过我们那豪华的马路时，马车夫取乐朝他抽一鞭子，都奇怪他为什么头也不回，更不用说骂两句了。他家

① 堂卡洛斯与波沙侯爵，都是席勒的剧作《堂卡洛斯》的主要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章和书信里经常提到他们。

里有个老姑妈，从小牙疼，腮帮子总缠着纱布，妻子唠叨个没完，还有六个孩子。当家里人全都朝他要面包、衬衣和鞋子时，他坐在火炉旁的墙角里，一句也不回，只管写他那公文，要么眼睛垂地，默不作声，一边又在低声嘟嘟囔囔，像在祈求上天赦罪。最后孩子们和当妈的都再也忍受不了。他们住在一幢木房的顶楼上，房子一半已经塌陷，另一半也摇摇欲坠。当眼泪、责难和折磨达到顶点时，这可怜虫突然抬起头来，犹如巴兰的驴吐出了人言①，可是说得那么离奇，人们不得不把他送进了疯人院。不知怎么搞的，他竟自称是加里波第②！真的！所有官吏、所有同事都证实：他已经有两周一直这么自称，多半是偶尔在手头的报章上读到了什么所致。他从来不同任何人谈话，却突然间坐立不安，心神不定，打听加里波第的情况和意大利的局势，就像波普里辛③ 关心西班牙那样……渐渐地在他脑海里形成了牢固的自信：他本人就是加里波第，那个海盗和破坏常规秩序的人④。他意识到自己的罪过后，就

① 见《旧约全书·民数记》（第 22 章，第 20～35 节）。巴兰的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打驴，要它回到路上。驴因为看到耶和华的使者挡道，不愿上路，卧在巴兰的底下，巴兰打它。耶和华叫它开口说人的话。

②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人民英雄，民主革命之翼复兴运动领袖之一。他先后参加并组织南部各国的独立战争，意大利 1848—1849 年的革命，1859 年和 1866 年反对奥地利的解放战争，1860 年还曾率领“千人义勇军”远征，解放南意大利，从而确保了意大利 1859—1860 年革命的胜利。这里提到的还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此文之前他的革命活动。在当时俄国各报刊上都普遍地谈到他。他多次从事解放和革命的斗争，破坏了统治者心目中的社会秩序，因此被诬称为下文所说的“海盗”。

③ 果戈理《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他幻想自己就是西班牙国王。

④ 1860 年，俄国报刊不断报道意大利局势，关注加里波第的行踪和意大利政局的变化。

白天夜里不停地颤抖。无论是妻子的呻吟、孩子们的眼泪、高傲的守门人在涅瓦大街上给他下脚绊、乌鸦在大街上落到他皱巴巴的帽子上以及厅里同事的一片笑声、飞驰的马车夫甩过鞭子、自己的肚子空空如也，这一切的一切他全都不在意。整个人世掠过他眼前飘然远去，大地从他脚下滑走。他到处看到的只是自己的罪过，自己的耻辱。上司老爷会说什么？处长杰缅季·依万内奇会说什么？还有叶梅利扬·卢基奇会说什么？所有的人都要怎么说呢……真糟糕！有天早晨他忽然跪倒在上司面前，说我有罪[①]，全都承认，我就是加里波第，随您怎么处置吧！于是对他便照章办理了。做了这个梦之后，我不由得笑话起自己来，也笑话我的这些梦。但梦突然应验了。信不信由你，先生们！不久前我从报上又读到一个秘密。确实是个秘密，虽然报上登了也解释了，可还是秘密。忽然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阿尔巴贡[②]，在一堆金子上穷困而毙。这个老人也属于克鲁波夫医生[③]的优秀的诊治对象，是位退职的九级文官，姓氏是索洛维约夫，年近八十。他花三个卢布租了一张床位，用帐幔隔开，在这肮脏的角落住了快一年，不做任何事，整天抱怨缺钱用，甚至因穷而不交房费，死后还欠一年的租金。在这一年里新的泼留什金[④]一直患病，气喘，胸疼，常去马克西

① 这个人的多疑、胆怯和向上司承认有罪，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脆弱的心》中的主人公。

② 法国剧作家莫里哀（1622—1673）的剧作《悭吝人》（1669）中的主角，一个守财奴和高利贷者。

③ 赫尔岑的小说《克鲁波夫医生》（1847）中的主人公。克鲁波夫有一个重要的论断：健康正常的人的生活和行动，跟疯人院里的精神病患者一样，愚蠢、病态。

④ 果戈理的《死魂灵》中的人物，也是吝啬鬼。

米里安诊所[1] 就医求药。到临死前几天还舍不得吃新鲜食品。索洛维约夫死在破烂的衣被堆里，脏得叫人恶心，可死后在他的纸本中间发现了十六万九千零二十二银卢布的支票和现钞。报上说这笔钱已交监督管理局保存，死者的尸体将要解剖[2] ……

我一边思忖着这件事，一边走近了商场。时间是傍晚。各家店里，透过蒙着一层水汽的整块玻璃窗，可见已亮起了瓦斯灯。马队和警官们在涅瓦大街上奔跑着。精美的四轮车飞驰在雪路上，发出沉重的轧轧声，前面是高傲的大马，后面坐着傲气的车夫和仆役。时而迸发尖锐的马掌声，那是划到了积雪下面的石卵路。人行道上是一群群过客……那天正是圣诞节前夕……这时在我面前的人流中掠过一个人影儿，不是真人而是幻影。我怎么也摆脱不了幻想的心境。还在 40 年代，人们就称呼并讥笑我是幻想家[3]。那时我倒还小呢。如今，我自然头发白了，也有了生活经验等等，可依然是个幻想家。掠过一个人影儿，他穿了件棉大衣，又旧又破，夜里一定还当被子用，这一眼就看得出来。皱巴的礼帽，边檐都磨坏了，歪戴在后脑勺，底下露出一绺绺儿花白头发，搭在大衣领子上。这老人拄了根手杖。他嘴里嚼着东西，眼望着地面匆匆赶路，大概是回家去。一个看门人在人行道上铲雪，故意把一满锹雪扬到他脚上，可他竟没发觉。他赶到我身边，朝我一瞅，使了个眼色。

① 在彼得堡，是扶贫协会于 1850 年为门诊病人（非住院病人）设立的医院。

② 当时一份报刊刊登了一篇题为《新的阿尔巴贡》的文字，内容与这里谈的十分相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普罗哈尔钦先生》的主人公大约就以此为原型。

③ 指别林斯基评《化身》的缺点，说小说失于过多幻想。

可那只眼是死的，没有神也没有力气，在我面前好像把死人的眼皮朝上扒了一下。我一下子猜出这就是那个阿尔巴贡，那个去马克西米里安诊所求医、死后留下十几万的阿尔巴贡。于是（我的想象力很快）我眼前突然浮现出很接近普希金的悭吝骑士的一个形象①。我忽然觉得我的这个索洛维约夫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他离开了人世，摆脱了一切引他走出帐幔的诱惑。这空洞的浮华对他有什么用，我们全部的奢侈生活与他又何干。他要这安逸和舒适干什么？这些人，坐在车外的仆役，坐在车里的老爷太太，马队里的先生，人行道上的先生，直到这些漂亮的青年男子，他们脸上露出对风流女人和金钱的贪欲，所有这些人和他又有什么相干？……像米尼、阿尔曼丝② 这种交际花关他什么事？不，他什么都不需要，他什么都有，就在他枕下，从去年起就在他的枕套里藏着。就算从去年起吧，他只要说句话，马上所有的一切都会跑来。他如想要，许多人会投来微笑照顾他。比如来了酒，可以温暖他的血液，可以助他一把，甚至只要不很贵的酒就行……可他什么酒也不要。他超脱于一切愿望之上……不过，正当我如此耽于幻想时，我又觉得思路不对头，我在剽窃普希金的思想，事情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的确，情况并非如此。六十年前索洛维约夫确曾在某处任职，当时年轻，才二十岁。说不定他也有过爱好，驾车到处

---

① 《悭吝的骑士》（1830）是普希金的“小悲剧”之一。

② 米尼的名字曾见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可能是指宫廷大臣、B. Φ. 阿德列尔贝格伯爵的宠姬米尼娜·伊万诺娃·布尔科娃。阿尔曼丝已成为普通名词，在《白痴》中也提到过；在伊·伊·帕纳耶夫的特写《交际花》里也写到法国女人阿尔曼丝。

跑，结识过路易莎，上剧院看过《赌徒生活》[1]。可突然间出了事，像有人推了他一下肘腕，顷刻之间把整个人给改变了，他自己竟未察觉。也许有过一个时刻，他好像恍然大悟，对什么产生了畏惧之心。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是攒钱买貂皮大衣，他却是把薪水存起来防备困苦的日子，不知是为什么攒钱，只是不为貂皮大衣。他有时也发抖也害怕，走在街上用大衣领裹得严严实实，为的不被什么人吓着，两眼直勾勾地，像刚刚挨人臭骂了一通。过了些年，他开始成功地把小钱放出去收利息，放给官吏和厨师，要绝对有信用。钱越积越多，他却越来越胆怯。几十年过去了，他甚至握有了上千上万卢布的借据。他默默地积聚起来，积聚起来。心里既美滋滋的可又担惊受怕。恐惧折磨着他的心，越来越厉害，直到有一天他把巨款全都兑现成钞票，躲进一个贫穷的角落。起初他在自己那发霉的黄墙住所里雇了个女厨子，养着一只猫。女厨呆傻，因呆而可靠。可他不断地训斥她，责备她。他净吃土豆，喝菊苣水，也让顺从无语的厨娘喝这个东西。他只是给猫买些肉吃，一个月一俄磅[2]，猫见了咪咪叫得可怕。猫叫着可怜地望着他的眼睛，乞求吃点儿牛肉，在他身旁蹭来蹭去，直竖起尾巴，他就抚摸着叫它玛莎，可牛肉还是不给买。全部财产只有墙上的挂钟，绳子上拴的哑铃。闲得无事，他就打量这挂钟，像是在看时辰。后来猫死了，厨娘被乡下来的丈夫喊走，挂钟早已停摆、散了架。老人只剩孤单一个，环视周围，咬了咬嘴唇，到旧货市场把三把破椅、一张呢面牌桌卖了几个钱。这呢面他早

① 全名是《三十年间，又名赌徒生活》，法国剧作家 B. 久坎日（1783—1833）的情节剧。当时在俄国经常上演，享有盛名。

② 一俄磅约合四百余克。

想扒下来做长衫里子却没用，咬咬嘴唇包到自己的包袱里。钟他也卖了，从此开始租床过活。在租赁的角落里，他挡着帐子在里边睡觉，吃土豆，而且越来吃得越少，整天战战兢兢，欠着房钱不交，不等交足又换个角落，到那儿仍旧拖欠。有许多次，房主——一个可怜的德国女人，头上盖着卷发纸，一身脏兮兮的，追着他讨债。他一味唉声叹气，对她讲要相信上帝，要忍耐，要仁慈，不停地在自己嘴上画十字，睡觉也不安稳，怕有人知道了他的秘密，怕房东女人看破……他为什么要去马克西米里安诊所看病呢？他又何必去治病呢？他要这生命干什么？他是否预见到了他那十几万会送到监督管理局保存？人们打算解剖他的遗体，证实他是个疯人。我以为解剖并不能解释这一类奥秘。他是个什么疯人哪！

我走进市场。拱门下面人头攒动，难以通过。这都是来采办准备过节用的。拱门下主要是卖玩具的，摆着各种式样的剪修好的过节松树，有便宜的也有昂贵的。在一大堆玩具前面站着一个胖女人，戴着夹鼻眼镜儿，还跟着一名仆役，穿一身莫名其妙的制服。陪同者是位年轻人，翘鼻子，精神委顿。女人唧唧喳喳地选玩具，特别看上了一种蓝衣红裤的人俑。她用尖声尖气的法语说：

"—C'est un Zouave, c'est un Zouave, voyez, Victor, c'est un Zouave; car enfin il a...enfin c'est rouge; c'est un Zouave!"①

于是女士兴高采烈地买了朱阿夫。

不远处又摆着一大堆玩具，顾客里有位先生和女士挑个没

① 法文："这是朱阿夫，看，维克托！这是朱阿夫，看下面是红的嘛！这是朱阿夫！"按：朱阿夫是音译法语词，指法国在殖民地军队中的士兵。

完，是想买得又好又便宜。看来便宜是先生最关心的。

“你看哪，心肝！能打响！”他对妻子说着，真的把一个木制小炮拧响了，“你看，是吧，一打就响。”

这位先生一连拧响了几次，可太太却不大在意，她想买个好些的玩具，就疑惑地望了望小炮。

“能买这个娃娃也好哇。”她不抱希望地抬手指了指。

“这个娃娃？哼！”先生说，“为啥呀，心肝！你看，这个能响吗！”

他那锁眉苦思、为每一戈比心痛的认真样子，说明钱不是容易挣来的。他下不了决心，蹙额不语，一个劲儿地拧着木炮。我不知他俩买下了什么。我继续在人群里向前挤，心里惦着席勒的忌辰，又想到孩子们卖的纪念章，同维克多·艾曼努尔的庆典[①]凑到了一起。这时人群里传来孩子偷偷乞讨的微弱声音。

“尊敬的先生，请原谅打搅了您……”

我回头见身后跟着一位先生，凭他穿着制服大衣，我怀疑他是从公职中被赶出来的。这绝没错。他们后来全穿上制服大衣，特别是吃了官司的。这位先生身高二俄尺九俄寸[②]，三十五岁上下，可说是诺兹德廖夫[③]和中尉日弗诺弗斯基[④]的亲兄弟，制帽上镶着红边，脸色鲜嫩得令人讨厌，又刮得异常光滑。面庞是那么开朗而“高尚”，您望一眼就忍不住要照直唾

---

① 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1820—1878），原为撒丁王国国王（1849—1861）。于1860—1861年统一意大利，成为意大利的第一个国王。为此当时也曾发行过纪念章，与纪念席勒赶在同时。席勒于1805年逝世。1860年5月是他的五十五周年忌辰。

② 二俄尺九俄寸差不多是一百八十二厘米。

③ 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形象。

④ 谢德林《外省散记》中的人物。

口吐沫！我认得他，在街上碰到过几次了。

“我太不幸了。过去我施舍穷人，一拿就是十五个卢布。先生，我能求求您吗……”

像这种一出手就施舍穷人十五个卢布（该问一问，他从穷人身上搜刮了多少卢布）的先生，我在彼得堡大街上见过绝不止一位。也许是我倒霉，也许是我有特别的能力总碰上他们。我还记得一位先生，那灰色的制服大衣特别干净特别新。留着非常漂亮的连鬓胡子，面目优雅得难以形容。他容光焕发，一双手白净净的。看见我，他追着讲起了德语，大概为了不在“公众”面前丢脸吧。我不知如何摆脱他。这样不知羞耻的，我还从未见过……这些讨吃鬼准能当个好的水泵工或是铁路工，看他们的力气，看他们的身体！可是这活儿不高尚，就不肯去做！要在从前，他们一定是很棒的打手！……

与制服大衣和令人讨厌的高雅外表的邂逅，使我想起夏天的另一次巧遇。那是在八月里，当天我有过两次遭遇，一次给了我十分美好的印象。我在一家阔人住宅旁穿过喷水池，大门口停了一辆华丽的双座马车。突然守门人打开大门，走出一对年轻优雅的人儿。太太服饰华贵，年轻貌美，轻盈地登上马车。跟着跳上去的先生也很年轻，穿一套耀眼的军服。仆人刚关上车门，男子就贴过去热吻漂亮太太的嘴唇，女子得意地接受了爱抚。我透过马车的小玻璃窗，看清了这瞬间的情形。他俩没发现我。马车跑起来，我站在人行道上哈哈大笑。毫无疑问，这是一对“新人”来拜客。因为过了蜜月的夫妇不会在马车里接吻。

当天下午五点，我路过沃兹涅先斯基大街。忽然我听到身后有轻微胆怯的叫声。回头一看，面前站着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儿，小脸善良可爱，正用乞求和羞愧的目光望着我。他说了

句什么，可声音不连贯且在发抖。他穿着很差却非常干净，是件很薄的夏季大衣，头上戴了制帽，皮靴可很破旧。脖子上很整齐地打着一块旧丝巾。一切都说明他家境贫寒，但却是正派的有过好日子的人家。还看得出这领巾是妈妈或姐姐给他打好的。很厚实的衬衣脖领也十分干净。孩子的举止朴实，很有礼貌。在那疲惫的脸上，透露出高雅和真诚。

他说："请原谅我打搅了您。能行行好，给我点儿什么吗?"说完他微微有些脸红。

我惊异之中朝后退了一步。他的乞求令我觉得十分奇怪。

我不解地问道："你是什么人？怎么来乞讨哇？我可真想不到。"

"早晨爸爸妈妈让我到彼得堡区的亲戚家去，他们想我在那儿能吃顿午饭。可在那儿……我没法吃饭，等了好半天，现在是往家走。我累坏了，肚子很饿……"

"你住在哪儿?"

"在斯莫尔修道院旁边……请给我六戈比，这个店铺里有馅儿饼，我从窗户上看到了，六戈比一个。我买个饼吃，在铺子里歇一会儿，再往前走……"

幸亏我的口袋里有个二十五戈比的硬币，拿出来给了这可怜的孩子。

我问他："你父母是干什么的?"

"爸爸本来是上班的，"孩子回答说，"我也上学。我们姐弟四个。今年爸爸失业了，我也就不再上学。没有薪水，现在我家……很穷……"

整个故事几句话就说完了。

很穷！很穷！

当然，贫困是个……怎么说呢，是个特殊的情况，无须辩

论。可也有富人，有小康人家呀。他们都有子女，可爱的聪明的孩子，受过教育的孩子。大人给他们买朱阿夫的人偶，这朱阿夫多半不会影响孩子逐渐成长为优秀的人才……我们这里一切都非常奇怪，不知是按什么规律发展，可总该有个规律吧。要知道，自然界得有规律，人的生活也有规律呀。可就是很怪，一个农夫的家里，突然会出现诗人，而且是了不起的诗人①；从专科的学校里，能产生一个思想家②！因此我不太为遇到的这个孩子担心，他不会毁掉。当然，他父亲有些可怜，不过也会得到安置，会找到自己的工作，能顶过去。很可能他这人经过了磨炼。再说，人生在世，磕磕碰碰总是难免的。又不只他一人如此，不是吗？尽管如此，当您想到（哪怕是不由自主地想到）这孩子在童年承受这么多羞辱，留下这么多沉重的回忆，您也会觉得难以忍受。这种羞辱会不会对他的精神成长有所影响呢？如果有，那是什么呢？是对这羞辱的厌恶，还是逆来顺受以至永远戕害人的心灵。这个孩子已经上过学，已经懂得不少事，他会脸红，感到羞耻。他是诚实的，并且开始思考，因为不幸会教人思考，有时甚至是过早地思考。这偶尔一时的贫困会有什么后果？他是厌恶地颤抖地回忆这一天呢，还是要变成退职闲散的食客，穿着制服大衣，有着令人讨厌的高尚面孔？好了，我们放宽心吧。何必提出这些无益的问题呢。穷困总归是特殊情况。人们都生活得马马虎虎。一个社会不可能全都富有，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偶然的不幸，是不是这

① 这里指的是俄国诗人阿·瓦·柯尔卓夫（1809—1842），他出身于牲畜商的家庭。

② 这里指的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哲学家、文艺评论家、作家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他先是毕业于正教中学，后又从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毕业。

样呢？我可以给诸位讲一个贫穷的故事，穷得非常特别又十分动人。不过这个故事还是留到本文最后吧。只是补充说一句，如果所有的人哪怕都很富有，那也太单调乏味了。再说穷能使人成长，有时能教会他仁慈[①] ……是这样吧？如果世上到处有香水气味，我们也不会看重香水了。啊，库兹马·普鲁特科夫，请把这句话收进你那睿智的箴言吧[②]！不过我现在不想说库兹马·普鲁特科夫。我想就贫困这件事说一说我们的新诗人[③]。他在最近一篇小品文中描写了彼得堡疯狂的奢侈和彼得堡区（不是彼得堡市）斯莫尔修道院附近以及整个郊区（这显然已不是彼得堡）的贫穷情况。但讲到贫困时，他宣称：彼得堡的昂贵生活已开始惊动彼得堡人，慈善人士、彼得堡城有所作为的一切市民。例如，他说有传言要建立一个国民健康委员会，参加议事的除医生以外，还有市内各界代表、工厂主和手工业者。当然，这个委员会能发表些意见，并极有效地开展活动。这个主意是很不错的。我们欢迎各种委员会，并且对它们怀有敬意。请看文学基金委员会，它做了多少有益于文学家的事，基金增长得多快，委员们全那么能干，他们的活动是那么醒目[④]。刚过了新年，就已组织了一次公众朗读会，援助穷困

---

① 这个想法出自果戈理的《与友人书信选》。但文字上稍有出入。

② 在 19 世纪 50—60 年代，俄国报刊广泛地流行一种虚构的引文，把一些“名言”说成是库兹马·普鲁特科夫说的。谢德林、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杜勃罗留波夫都不止一次地把自己想出的讽刺性名言安到库兹马·普鲁特科夫名下。按：库兹马·普鲁特科夫是阿·托尔斯泰等三人有时共同使用的笔名。

③ “新诗人”指作家伊·伊·帕纳耶夫。参阅上文注。他关心当代迫切问题，享有公民诗人的称誉。诗作多发表于民主刊物。下文引用的诗都是他的作品。

④ 1859 年彼得堡成立“援助清贫作家学者基金会”，陀思妥耶夫斯基自 1860 年起积极参加了基金会的活动。

的文学家和学者，这事已经办成了。要知道朗读会是很重要的，这是文学基金会的最主要收入之一。去年朗读会获得许多钱哪！除国民健康委员会以外，还有一位工程师——瓦西里耶夫先生作了一次演讲。新诗人也提到了这个演说，且它已经印成小册子出版。瓦西里耶夫先生阐述了自己对改善彼得堡状况问题目前情况的见解，也提到了彼得堡的生活费用昂贵。是的，这是可以关注的，也是值得关注的。据说，如今在彼得堡的开支不能少于一千五百银卢布，而对有家室的来说低于一千卢布就算是贫困了。可上哪儿弄这一千卢布呢？当然，如果我是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冈察洛夫，我可写它一个半印张，如作品的某个片段（大天才的每一颗粒都是珍宝），那就有一千银卢布了。[①] 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冈察洛夫哇！

最后，新诗人提起拉夫罗夫先生[②] 在商场讲的一些见解……啊，对不起，这个已不是为的改善彼得堡。这不过是些哲理。不过呢，哲理不也能有助于改善状况吗？哲理使人聪明，给人种种思想，如此等等。我是特别喜欢听新诗人讲哲学，讲艺术，讲一切善行。只是他联系拉夫罗夫先生的见解讲起艺术来，多少有点那个……怎么说呢，多少有点令拉夫罗夫先生吃惊。尤其是新诗人向拉夫罗夫先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

① 伊·亚·冈察洛夫通常不轻易发表新作，而且常常只发表一部小说的片段，固然是完整性的片段。如《奥勃洛摩夫》全书出版于 1859 年，而其中《奥勃洛摩夫之梦》发表于 1849 年。《悬崖》完成于 1869 年，而其中《索菲娅·尼古拉耶娃·别洛沃多娃》发表于 1860 年。此外，在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出版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的稿酬较屠格涅夫等作家要低得多。

② 彼·拉·拉夫罗夫（1823—1900），俄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政论家。他于 1860 年 9 月为了“援助清贫作家学者基金会”在商场做过三次演讲，谈哲学的现代意义。

他对他的话有何想法？可是人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追根问底。不论议论什么，都同样是种乐趣，要知道人有时也要出错的。我再重复一遍：没有多样性就太枯燥了。为什么不许新诗人也具有多样性呢。相反，正希望他能具有某种多样性，尽管就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们读他也是极大的享受。每当拿到《现代人》——这在俄国是唯一值得阅读其中全部文章的一份杂志——我们总是首先剪下新诗人和——波夫先生的作品。

论争起来嗓门儿洪亮，
见解大胆却并不得当，
这些时评家啊，
眼见就要缄口不语。
他们将一辈子奔忙，
为着毫无意义的目的；
还是听你的歌声吧，
为我们歌唱茶花① 一曲。

我不同意！完全不能同意！我偶然碰到了这首诗，无意地记住了，可我不同意。当然每个人都可有自己的意见。可以不同意——波夫先生的见解，但我觉得倘若他哪怕稍微改变一下自己就俄国文学所发指示的性质，那么我读他的文章时定会乏味得要命。

莽莽林丛别有乐趣，

① “茶花”一词因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转义为“风流女人”。下文的“风流女人”与这“茶花”在原文中是同一词。

杜德什金文章饶有魅力。
文坛小贩欢声叫卖，
从文到诗倒全有教益；
格马莱[1] 的诡辩也令人陶醉，
报刊上的旋涡有珍珠沉底；
沃伊斯科博伊尼科夫更可爱[2]，
暗中搜遍了文人劣迹；
这些我都喜欢，可你啊，评论家——波夫，
我在内心却最为珍惜，
不假思索，我说你聪颖盖世，
仔细琢磨，我也说你盖世聪颖。
报刊世界把你引为骄傲，
你的评论能令人登天坠地，
唯有康拉德·利林什瓦格尔[3]，
当可同你势均力敌。

除——波夫先生外，我也喜欢新诗人，甚至胜过——波夫先生。人们认为新诗人是文学丑闻的始作俑者，对此看法我一向感到愤怒。我不信也不想相信，他在文学上的名声迄今无可挑剔，是正派人。还在很久前，几乎是在童年，我就开始读新诗人的作品了。那时我总是喜欢想象，以创作留给我深刻印象

① Ю. А. 沃尔科夫的化名。他是《圣彼得堡新闻》撰稿人，有长文记文坛印象。

② H. 沃伊斯科博伊尼科夫（1838—1882），政论家，《读者文库》与《莫斯科新闻》的编辑。曾在《圣彼得堡新闻》（1860年9月）上发表《文学家先生们，不要再打再闹》一文，引起各刊物强烈的反响。

③ 杜勃罗留波夫在讽刺文中使用的笔名。

的诗人们和小说家外貌是什么样子。说也奇怪，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新诗人的照片。我翻过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和斯塔尔切夫斯基先生[①]拥有的照片，还看过所有俄国语文界和思想界名人的照片，那是明斯特尔[②]出版的，迄今可能已收入达百人之多，却都没见到新诗人。不过，新诗人就说到这儿吧。要不然人家会怪我过于偏爱。其实我讲起他是因为一首颂诗的缘故，好像是彼得堡一些风流女人写的。优闲而无所事事的人们是什么都写得出来的！诗是这样写的：

彼得堡风流女人致新诗人的颂歌

黄金钻石豪华的饰物，
在我们周围琳琅满目。
我们驾车去戏院花枝招展，
一路摆阔展现给豪富，
佩戴珍珠珊瑚，稀世的艳妆，
高头大马，华车快步。
这一切归功于新诗人，
是他那“报道”给我们赐福。

我们这些夏洛特们、阿尔曼丝们、阿梅莉娅们，
从前可没这般奢侈，

① A. B. 斯塔尔切夫斯基（1816—1901），杂志工作者。在《读者文库》杂志工作多年，1856年后任该刊主编，后来又任《祖国之子》报主编（至1870年止）。

② A. 3. 明斯特尔（1824年生），石印工人。他曾出版过俄国活动家的石印肖像相册，收入二百多人的石印肖像。

风流女人的名字也招人白眼，
个个全落得举债度日。
突然幸福像钻石般朝我们微笑，
世人见我们都乐不可支，
但只有他，这位新诗人，
写出了风流女人的故事。

怀着特别的柔情，
他描绘涅瓦河畔美女的倩影；
老翁激动，血往上涌，
青年驻步，团团簇拥。
自打《现代人》里的新诗人，
把花冠戴到我们头顶，
崇拜者献来大把的黄金，
从此不知什么是贫困。

反对进步、反对妇女成长的胆大苦行僧，
让他们去诅咒我们吧。
新诗人会保护风流少女，
不遭阿斯科琴斯基[①] 的辱骂。
让时评家去关注意大利好了，
——波夫的笔锋朝着全球攻杀[②]，

① B. И. 阿斯科琴斯基（1818—1879），反动的时评家，《家庭恳谈会》杂志的主编与出版者。曾著文辱骂彼得堡烟花女子。德·德·米纳耶夫写过小品文对此加以讽刺。

② 当时在《现代人》杂志上，“新诗人”伊·伊·帕纳耶夫的小品文常发表在政治栏，内容常常是关于意大利的事。杜勃（转下页）

赞美我们的玉肩纤腰，
只有新诗人一家。

你醉心于高尚的目标，
歌颂我们的理想，
宴席上得到你的祝福，
哪一个风流女子不热情举觞。
倘若你到了风烛残年，
走完了自己的文学小巷，
新诗人啊，
我们将一起献上大理石的骨灰缸。

这是开玩笑，是可爱的戏谑！但这完全不真实。第一，风流女子中谁也不会去写诗。一般说，这类作品都失之不实，所以才听来也不伤人。例如，去年《星火周刊》刊载了针对克拉耶夫斯基的题词式的著名文章①。读者回忆一下会记起，这题词里提到了佩列拉先生、杜德什金先生和圣西门主义者们②。那是全然不符合事实的。说到克拉耶夫斯基先生③，去年一篇

（接上页）罗留波夫在《口哨》栏发表的诗与短评则不限于谈俄国，还涉及国际问题。

① 这篇发表在《星火周刊》（1860 年，第七期）上讽刺《俄国导报》和《祖国纪事》的文章是谢德林写的。

② 伊萨克·佩列拉（1806—1896），法国的银行家和政论家，在 1829—1834 年间曾是圣西门主义者。

③ 安·亚·克拉耶夫斯基(1810—1889)，俄国作家，先后主编过《〈俄国残疾军人报〉文学增刊》(1837—1839)，《文学报》、《圣彼得堡新闻》(1852—1862)，《呼声报》(1863—1884)和《祖国纪事》杂志(1839—1868)。《祖国纪事》在19世纪40年代是当时俄国的优秀杂志之一，发表过莱蒙托夫、屠格涅夫以及别林斯基等人作品。19世纪40年代末转向保守，至60年代成为《现代人》、《俄国言论》等进步刊物的反对者。但它在1868年后，转入诗人涅克拉索夫之手，倾向又转向进步。

关于61年出版《祖国纪事》的启事中，宣布自明年起评论栏将由杜德什金和克拉耶夫斯基两位先生负责。这引起了某些议论，如同《祖国纪事》上的著名文章《丑闻文学》一样。有人甚至让我告知公众，克拉耶夫斯基关于未来评论家的启事是去年内最重要最引人的文学丑闻。我觉得这么说太过分了，不是吗？为什么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写不出好评论呢？他是《百科辞典》① 的主编。他出版杂志已有二十余年，如果说迄今他还没写出好评论，还不能说他以后也写不出来。不过我觉得，关于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未来从事评论活动的消息，并不完全确切。我要声明，我可能讲错，至少我急切盼着《祖国纪事》上有这位尊敬的编者的文章。但我还是以为，克拉耶夫斯基现在顾不上俄国文学。他本就有许多事。除了严肃的工作，他还担负着未来三十卷《百科辞典》的任务。除了《百科辞典》，还得提高《祖国纪事》水平，使它更生动更现代，克服杂志的沉睡状态，不然，大概就不会有人订阅……如今他是顾不得文学了。

虽说他现在顾不上文学，为了结束关于克拉耶夫斯基的话题，我要说他对俄国文学来说，仍是位十分有益的人，这话是很认真的。如果说他在自己整个文学活动期间几乎没写出什么东西，那么却善于出版杂志。这件事如今不难做到，从前可是相当难的啊。期刊如今在我们这里具有了很重要的社会意义，克拉耶夫斯基作为一个杂志的出版者，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能以商业观点来看杂志（在他的时代也正应该这么做），这在当时已感到是实际的需要。可以肯定地说，他第一个使出版事业具备了商家那种认真的务实精神和异乎寻常的精

① 克拉耶夫斯基在他参与编写的《百科辞典》第1卷上把自己列为主编，遭到大家的讥笑，详见下文注。

密性。人们会指出《读者文库》，说它出现在《祖国纪事》之前，出得也很认真，是俄国期刊出版中前所未有的[①]。我承认，第一步是最重要的，但第二步也会具有绝不稍逊的意义。第一步的成功，有时是偶然的条件促成的，而第二步的成功才能最终说明这事情是有道理的。它给所有人证明，这事不仅可能，而且稳定，而且已臻成熟。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由于出版工作的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促使公众相信文学产业的稳定性，这种信心鼓励了公众，扩大了订阅。如果说克拉耶夫斯基做文学家的事不算多，那么社会活动家的事可做了相当不少。正因为他是最认真的出版家，现在才把《百科辞典》的出版委托给他。不过对克拉耶夫斯基先生说来，只有一项（还是异常重大的）功劳是不够的。他宣布说想写评论。老天保佑！然而，如果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打算以个人名义在各报发表一封信，信中表明自己参与《百科辞典》编纂的程度[②]，如说将对所有词条承担道义责任，将审读所有各科的词条，包括哲学、自然科学、历史、文学、数学，将视需要修改、增删词条，那么我们感到惊愕不止便是可以原谅的了。那样恐怕就太不好意思了。正是上述一点会招人讥笑，会使他丢面子！我想，即便是

① 《读者文库》是包括语文科学、科学、艺术、工业、时装等方面的月刊，主编为奥·伊·先科夫斯基（1800—1858），1834—1865年在彼得堡出版，每期三十印张，在俄国是第一种真正内容广博的杂志。但据同时代人说，它在俄国杂志界中开创了“商业的”或“营业性”的倾向。

② 这里指的是当时有二百来位俄国学者和文学家参加编成的《百科辞典》，而安·亚·克拉耶夫斯基在该书第1卷出版时，却把自己列为主编，舆论为之哗然。此后第2卷改由哲学家、社会学家彼·拉·拉夫罗夫任主编。但此书仅出至第6卷就中断了。

培根①亲自承担这样的责任来出版《百科辞典》，他也要遭到公众的讥笑。不可能全知嘛，不可能懂得世上一切学问嘛。不可能什么都会做嘛。莎士比亚是伟大的诗人，但他恐怕不敢到罗马去建彼得大教堂②。况且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甚至还不是莎士比亚……

天哪，我离题太远了。我总是忘记自己是小品文的作者。决定了就得做下去。应该写新闻，可我却讲起《百科辞典》来了。写新闻！写新闻！何况眼下又是热闹的时刻，冬季的中间，复活节，新年，连续的节日！顺便问一句，你们可记得一首诗：

路口一棵爆竹柳，
半是伫立，半是沉睡……
隔着篱笆吱呀两声，
有人轻轻把栅门一推，
是哪个溜着边儿走来，
一驾小橇掠去如飞……
忽听得清脆的问话：
叫什么名字，你是谁?

一位彼得堡的幻想家劝我相信：这首诗的委婉优雅是彼得

①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英国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的开创者。他知识渊博，著作涉及面很广，但主要在哲学和科学两大类。

② 建于1506—1626年。参加建筑者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许多著名建筑师、画家、雕塑家，其中包括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这里所以提到莎士比亚，大约因为他（1564—1616）是同时代人。

堡土生土长诗人所不能企及的[①]，在彼得堡似乎非得把这首诗改写成这个样子：

小巷里一眼喷泉，
　　冰封着呆立……
正对店铺吱吱哇哇，
　　风琴手如怨如诉；
是哪个从亭子后面走来，
　　路灯的光摇曳；
忽听得关切的问话：
　　谁在走动？——当兵的！

这是感伤型幻想家的诗。下面则是另一类幻想家的诗，是前进型幻想家，是行动型幻想家。

谁不见我们进取而精明，
在迷恋时不忘冷静，
虽有嗜好都还正经，
享受快活又不敢纵情。
为亲者我们能两肋插刀，
可是对伏尔泰、卢梭满怀崇敬，
我们却忘不了品尝牡蛎，

① 前面引的是诗人阿·阿·费特（1820—1892）的作品，而阿·费特不是彼得堡出生的人，他青年时代在莫斯科生活，只有在19世纪50年代，他与《现代人》杂志接近时，才能说他是彼得堡人。

隔三差五去赴久索[1] 之请，
内心里对肥缺和靠山，
我们不能忘情，
却也愿鼓励才子
把演讲献给公众，
在野餐时热烈争论里，
不怕担点自由主义的名声。
由于激赏休左尔的口才，
愿从野餐地径直去他那里聆听[2]，
我们关注着辉格党与托利党[3]，
还有罗马和议会的口舌喧腾，
我们一致为里斯托丽鼓掌，
看她演《美狄亚》、《斯图亚特》、《卡门》。
我们同样也很关注，
加富尔[4] 如何改变了自己的意图，
图尔在《莫斯科新闻》上，
如何化解与卡特科夫的不睦[5]，

① 彼得堡一家豪华饭店的经理，该饭店也以久索命名。
② 1860 年彼得堡流行由名人学者为公众举行讲座。其中休左尔谈雨果的小史诗《历代传说集》及该诗人的意义问题。
③ 英国的辉格党与托利党，均成立于 17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后来两党轮流执政。辉格党代表资产阶级化的宫廷贵族、大商业资本家和金融家的利益；托利党则代表地主贵族和教会上层人士的利益，至 19 世纪中期，两党分别在原来基础上改组，辉格党改建成自由党，托利党改组成保守党。
④ 加富尔（1810—1861），曾任撒丁王国（1852—1861）首相，意大利统一后（1861），任意大利政府首脑。
⑤ 叶·图尔（1815—1892），俄国女作家，曾著文回答米·卡特科夫对她的攻击。

我们的富豪伊茨卡出了什么事，
——波夫在讲坛上评论何物①，
克拉夫佐夫用归国的男高音，
怎样对付了最近的演出②。
在高尚的聚会上在舞池里，
异口同声，呼之欲出：
所有时评家里唯有别柳斯京
该遭公开的驱逐③。
我们承认，是愚昧无知
使人变坏，无能相助。
仲马也罢，库什涅罗夫也罢④，
我们之中可没有人爱读；
我们服务于生活中的崇高目标，
一边又偷偷摸摸设法
供养风流女子的阔绰日子，
倒闹得妻子寒碜得叫苦。
我们贩来尽人皆知的思想，
大喊大叫为人性擂鼓，
我们为了支持周日学校⑤，

① 伊茨卡是彼得堡的一个百万富翁。——波夫指杜勃罗留波夫。
② И. 克拉夫佐夫（1833年生），歌唱家，曾去意大利、巴黎，回国后在彼得堡演出并不成功。
③ U. C. 别柳斯京（1818/9—1880），时评作者，著文反对在民众中普及文化，认为此举有害无益，遭到许多人非议。
④ 指大仲马和当时俄国撰写日常生活特写的作家 U. H. 库什涅罗夫。
⑤ 当时俄国社会为民众、士兵举办的文化学校，每逢周日上课，任教者很多是大学生，这种学校开始创办于1850年末。1860年末当局因民主运动高涨，对其颇有戒心。1861年 （转下页）

慷慨地唱呀舞呀，加餐也无数，
我们不停地筹划，不停地扮装。
我们不断猎艳，不断建树，
一切都为的培育新人，
让进步、和谐、智慧相成相辅。

让上帝保佑他们吧，这些幻想家！里斯托丽……不过在说里斯托丽之前还是该提一提，在从前亚历山德罗夫中学所在的公园里，终于将为普希金立一纪念碑。还该说一说当前的书籍销售活动的情况，说一说迅速兴起的周日学校，至少该讲一讲为民众阅读而出版的书刊。最后还得哪怕是从地底挖出点特别有趣的新闻，是别的小品文家尚不知道或知之甚少的新闻，好在他们面前炫耀一番。不过所有这一切我还是留在下一次再谈吧。关于纪念碑，等建完我再详细说。书籍销售活动，有适当机会再讲。关于周日学校，我们打算发一篇专文。关于大众读物，也将有专文。至于尚无人知的新闻，我保证在下一篇小品文中一定设法弄到，假如不被别人捷足先登的话。现在剩下来的，只有一个里斯托丽了……

不过，先生们，我觉得你们关于里斯托丽已经读得够多、听得够多，已经厌倦再读这个题目了。自然，看里斯托丽是不会看够的。所以我们想，最后我们还是先看够她的表演，全部剧目，以及她准备在彼得堡演的一切，然后再……那时我们将提供一份关于她的详尽的最后的总结。这样一来，里斯托丽的话题也结束了。再会，先生们，下次见。那时我说不定还会梦

（接上页）初，沙皇下令加以监视，1862 年 7 月，周日学校奉命停办。

见点什么，就可以……好了，再会！

哎呀，天哪，我忘了！我原打算讲一讲我的优雅的穷困之梦呢。我不是许诺在这篇小品文的末尾讲这个梦吗。算了，这也留到下回吧。留到一起讲比较好。讲得好坏不敢说，但那故事保证会有意思。

刊出《扎克·卡扎诺瓦在威尼斯（铅顶）[1] 监狱囚禁和越狱奇迹》（回忆录片断）的前言[2]

扎克·卡扎诺瓦[3] 的《扎克·卡扎诺瓦在威尼斯监狱囚禁和越狱的奇迹》一书，从未译成俄语。而法国人对作家卡扎诺瓦的评价，甚至超过勒萨日[4]。他描绘性格、人物和自己亲历的某些时代事件，异常鲜明生动；而他的叙述是那么平易、清晰，引人入胜。如果详尽分析卡扎诺瓦的作品，我们会扯得很远。关于他这本书，只说上几句是不够的。而大块的评论文章，我们的杂志目前还无法容纳。为了向读者介绍这本精彩的书，我们选出《扎克·卡扎诺瓦在威尼斯监狱囚禁和越狱的奇迹》的一个片断。这个片断先作为单行本出版，后来又收入他

---

① 威尼斯督治官邸的监狱。

② 这是为在《时代》1861 年第 1 期刊载该回忆片断而写的前言。

③ 扎克·卡扎诺瓦（1725—1798），18 世纪意大利著名冒险家、作家、历史学家。

④ 阿兰-勒内·勒萨日（1668—1747），法国作家，著有小说《跛腿魔鬼》（1707）、《吉尔·布拉斯》（1715—1735）等。

的回忆录。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个片断并不能准确反映全书的面貌，而且对卡扎诺瓦性格的刻画也只是从一个方面入手，即最好的一面。卡扎诺瓦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以自身体现了当时特定阶层人物的全部特点，他当时的见解、偏颇、信仰、理想、道德观念，体现了对生活的全部独特眼光，后者截然不同于我们19世纪的眼光。起码我们坚信，读者会读得饶有兴味。还须补充的是，卡扎诺瓦从威尼斯铅顶监狱中逃走，当时在欧洲闹得满城风雨，他也因此名声大振。从这所牢狱中几乎是无法逃脱的。这个故事说明了人的毅力对难以置信的种种障碍的胜利。自然，由于只截取片断，故事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受到很大影响。但却不可能翻译全书。它有某些怪异的东西，如坦率表述出来会违背我们时代通行的道德观念，理所当然地将受到谴责。全书只有一段情节不含怪异成分，这正是我们译出以飨读者的部分。

刊出《爱伦·坡的三篇小说》的前言

爱伦·坡的小说已有两三篇译成俄文在我国的期刊上发表了。我们再献给读者三篇。这可真是一个十分奇怪的作家，的确是奇怪，虽然也卓有才华。他的作品不能直接归为幻想小说。如果说有幻想特点，那也只是外在的。例如，他认为在金字塔里躺了五千年的埃及木乃伊，通过电疗能起死回生[①]。他认为死人借助通电也能够讲出自己内心的状态[②]，如此等等。不过这还算不上直接的幻想。爱伦·坡只是从外在方面觉得有可能发生违反自然的事件（而且论证了这种可能性，有时还证明得十分巧妙），不过，就算这一事件如此，其余的则是完全符合真实的。可是，例如像霍夫曼的幻想性，就不是这样了。他将自然力拟人，化为形象，在自己小说中写出了女巫、鬼魂，有时甚至到人世外的某种异常的世界去寻找自己的理想，视这个世界为最高的世界，好像他自己坚信一定存在有这么个神秘的魔幻世界……爱伦·坡不好称为幻想作家，倒不如叫他是想入非非的作家。他尽是奇怪的想法，想起来异常大胆。他

---

① 指爱伦·坡的小说《与木乃伊谈话》。

② 很可能是指他的《催眠术的发明》。

几乎总是选取特殊的现实，把自己的主人公摆到最特殊的外在环境或心理状态中，而讲起这人的内心活动是那么透彻、那么准确！此外，爱伦·坡还有一点与所有作家截然不同，也构成了他的一个鲜明特色，这就是想象力极强。这倒不是说他比别的作家更多想象的成分，而是说他的想象自有特点，是别人不具备的，这就是想象的细节富于表现力。试想要想象出完全不一般的东西，甚至是现实中见不到，而仅仅是可能有的东西，那么您眼前展现的形象只可能反映整个情景的某些普遍特点，或者依赖全景的个别部分、特征。在爱伦·坡的小说里，您却能够非常清晰地总揽眼前形象或事件的全部细节，因之便相信这是可能有的真实的，实则几乎是全然不会有或在世上从未遇到过的。例如，他在一篇小说里描写了月球旅行①，描绘得极其详尽，几乎是一小时接着一小时地描述事件，令您觉得这些确实能够发生。他还同样准确地在一家美国报纸上描述了一个气球从欧洲飞越大洋到达美洲②。他写得那么翔实精确，充斥意料不到的偶然情况，那么逼近实际，让大家都相信有这次旅行，当然只是信它几个小时，因为马上了解到并未有过这种旅行，而爱伦·坡的故事纯属报刊上的杜撰。这种幻想的能力，或确切地说，是思索的能力，在讲丢失的信③、猩猩在巴黎的谋杀④、寻宝等故事时均有体现。

人家拿他同霍夫曼相比较。我们已经说过这并不确切。再说霍夫曼作为诗人，远远高出爱伦·坡。霍夫曼有理想，虽然有时表述得不够准确，而这理想中反映了人所固有的纯洁、真

---

① 指他的《汉斯·帕费尔的举世无双的冒险》。
② 指他的《气球的故事》。
③ 指他的《失窃的信》。
④ 指他的《莫格街谋杀案》。

正的美。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他那些非幻想性的小说中，如《迈斯特·马丁》或极为精巧优美的小说《萨尔瓦多·罗莎》，且不说他的杰作《雄猫穆尔》。这乃是真诚的成熟的幽默，是现实的力量所在，是无比的愤怒，是精彩的典型和肖像！而与此同时，又是对美的渴求，是美好的理想！在爱伦·坡的作品中即或有幻想因素，那也是一种物质方面的，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显而易见，他完全是个美国人，甚至在最富幻想的作品中也是如此。为了让读者了解这位怪异的作家，我们先提供三篇他的小故事。

《拉萨涅尔[1]案件》一文附识

我们想如能经常不断地报道一些著名的刑事案件，读者是会喜欢的。且不说它们比各种小说更有趣，因为展现了人的心灵那些阴暗方面，而对此艺术不喜欢触及，即便触及也一带而过，只当做一段插曲；且不说这些，读一读这类案件，依我们看对俄国读者还不无裨益。我们以为，除了我们各种期刊上经常发表的理论阐述之外，了解这些理论在西方如何实际直观地运用于各种案件上，对我们的读者同样是不无好处的。至于案件，我们将选登那些最吸引人的例子。这一点我们可以保证。这次我们选刊的案件，讲的是个奇特神秘、可怕又有趣的人物。生性卑劣加上恐惧贫困，使他堕落为罪犯，而他却大言不惭地自称为时代的牺牲品。这一切又伴随着无限的虚荣心，这虚荣心可说膨胀到了极点。案件的审理坚持了客观公正，报道也如银版照相、生理图那般精确……

---

① 彼埃尔·弗朗索瓦·拉萨涅尔（1800—1836），窃贼和杀人犯。他的刑事案件轰动一时，1835年在巴黎被判处死刑。他的姓名广为人知。他在囚禁期间写了诗和回忆录，在其中他把自己描写成一个“社会的牺牲品”，为同社会不公平作斗争的理想所鼓舞的自觉的复仇者。

尼·尼·斯特拉霍夫《席勒小议》一文附识

一般说来,西方诗人与小说家在我国评论界的评议面前,都显得有些模棱两可。席勒且不说,就是对巴尔扎克、雨果、苏里埃①、欧仁·苏等许多人,我们的评论界从40年代起,就居高傲视。对他们,别林斯基也有些过错。那时,我国的评论家们过于实际了,这些作家不符合他们的标准。如果说拜伦逃避了严厉的判决,那他首先得感谢普希金,第二是因为他的每行诗都呼喊着抗议。要不然我们也要把他拉下马,他可怎么也不会合标准的。

所有这些都异常地有趣,而且有现实性。我们想尽快奉献一篇大文章,题目是:《西方诗人与小说家在我国批评界的评议面前》②。

---

① 弗雷德里克·苏里埃(1800—1842),法国小说家、剧作家。

② 发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杂志,1861年,第3期,作者为批评家阿·亚·格里戈里维奇。他在文中提到俄国批评家论席勒的意见。他简要地分析了俄国接触与评价席勒的历史,以及别林斯基对这位诗人创作的观点及其演变。

诚恳的典范

请设想一下，某地某时在某个集会上发生了下面这样的事。

有几个人聚到一间屋里。大家都是认真做事的人，于是议论起当代的问题来。话题谈到人道，讨论该如何理解它。有一位讲了自己一些见解，相当独到。别人同他激烈争吵起来。在所有专注这位先生独到见解的人中，最优秀的一位坐得远离大家，一声不响，但从表情上看得出，在急不可耐地等着轮到自己也说点意见。最后，当见解独到的先生发表了一个最独到的看法时，这个沉默的听众陡然起身，快步走近这位答辩者，打算对他说点什么。可是还没开口讲话，竟抡起巴掌扇了他一记清脆的耳光。周围立即大乱。

“您要干什么！”挨了耳光的冲着打手尖叫起来，惊异万状地盯着看。他一时惊呆，连愤怒和还手都忘记了，形同木鸡。

“我要告诉您，您对人道的理解是完全不对的……”打手冲口而出，一脸争辩发急的样子，好像没发现自己扇了人耳光。

“您干什么？别发疯呀！”四面响起喊声。

“这人是疯了！”有人呼应说。

“现在不是讲人道的问题了。您放明白点儿。”被打的人喊起来。

“啊！你们是说打耳光呀！”成为众矢之的的那人，相当平静地回答。“请大家别太在意。我承认是有些忘乎所以了。这确是坏习惯，你们把我激怒了，我也就完全不由自主地扇了个耳光。现在谈正事。我要反驳说，照你们理解的那种人道是不可能有的……”等等，等等。

你们怎样看这位先生的举动呢？认为是不会有的？认为如果有也是荒唐的？

可是，在我国的文坛上，由于《世纪》周刊的编辑侮辱了托尔马乔娃女士，就发生了完全类似的情况。这里说的是《世纪》编辑部及其编辑对托尔马乔娃女士提出的道歉和解释。这非常像上述那位打人先生的解释和辩白。请看是不是这样呢。

本刊这一期发表了题为《卡缅·维诺戈罗夫先生的一个行为和几个意见》一文，从中您可以了解此事的起因和过程。米哈伊洛夫① 先生则在《圣彼得堡新闻》报上反驳了卡缅·维诺戈罗夫。而卡缅·维诺戈罗夫和《世纪》编辑部在10月号上对米哈伊洛夫先生做出了回答。下面就是《世纪》编辑部的答辩，全文照录，没有丝毫删节。

① 米·拉·米哈伊洛夫（1829—1865），俄国诗人、革命家。除诗作等外，他还出版过文学批评与政论文集《妇女，她们的教养及其在家庭和社会中的意义》(1860)。

评米哈伊洛夫的文章

一 《世纪》编辑部的说明

在第51期的《圣彼得堡新闻》上，出现了一篇米哈伊洛夫先生写的责难本刊的文章。此文也投给了《世纪》刊登（见《世纪》第9期328页编辑部的话），是针对卡缅·维诺戈罗夫的幽默小品（!）而发的……

这些先生把卡缅·维诺戈罗夫严重侮辱性的小文章称做是幽默的文字！而且是郑重其事地说。请想一想，编辑部成员都是些严肃的人呀！①

……卡缅·维诺戈罗夫在一篇幽默小品中谈到托尔马乔娃女士在彼尔姆一次文学晚会上朗读《埃及之夜》②（见《世纪》第8期《俄罗斯奇闻》）。对此，米哈伊洛夫先生表示了愤怒地抗议，反对卡缅·维诺戈罗夫对女士无端的攻击，反对他嘲笑女士的行为（指给公众朗读《埃及之夜》）。照米哈伊洛夫的说法，女士以此表示出

---

① 《世纪》编辑里有康·德·卡韦林（旧译卡维林）（1818—1885），俄国历史学家、法学家、政论家，亚·瓦·德鲁日宁（1824—1864），俄国作家、批评家，В. П. 别佐布拉佐夫（生卒年与生平不详），和彼·伊·魏因别格（1831—1908），俄国诗人、翻译家、文艺理论家。

② 普希金的小说（1835年，未完成，1837年出版）。故事的内容见本卷344～348页。

对愚昧成见的藐视。米哈伊洛夫先生说："可以不同意托尔马乔娃女士发表的见解，可以认为它们可笑、无理，可以认为她竟敢当众朗读普希金的《埃及之夜》实在荒唐，这些在我们今天可惜①还都能容许。然而，当然不会有哪个热肠人明知当今社会状况和女性地位却要当众羞辱女性，使之成为愚人笨伯取笑的对象。"接下来米哈伊洛夫先生谴责卡缅·维诺戈罗夫歪曲了《圣彼得堡新闻》上小品文的含意（指彼尔姆的文学晚会），并且怪罪《世纪》编辑部刊载了卡缅·维诺戈罗夫的奇文。

好一篇奇文！

我们只讲述了米哈伊洛夫先生文章的内容。由于它已在《圣彼得堡新闻》上刊出，《世纪》编辑部因此没有必要再为它拿出版面。

也不尽然。《世纪》的订户有可能不订《圣彼得堡新闻》，因而也不会全部看到米哈伊洛夫先生的回答。继续往下看，《世纪》编辑部有另一条理由：

再说，此文就其语气和文学形式而言，完全不符合本刊的基本性质。

这太妙了。由此推论，在贵刊出现的维诺戈罗夫文章，就其语气和文学形式（特别是语气）而言，是更符合贵刊的基本性质了？

---

① 可惜一词用异体字，是《世纪》编辑部标出的。——作者注

> 在第10期的说明中，《世纪》编辑部就不谨慎出现在卡缅·维诺戈罗夫幽默小品中的某些不妥语汇，表示了诚恳的歉意。《圣彼得堡新闻》编辑部在刊载米哈伊洛夫先生标题轰动的文章(《〈世纪〉的恶劣举动》) 时，理应告诉读者《世纪》的道歉行为。不过对《圣彼得堡新闻》编辑部来说，这种疏忽在我们看来很容易理解，也符合某些编辑部的习惯：专门寻找别的编辑部的劣迹①。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在做出上述说明之后，无论读者或文学界对《世纪》编辑部在卡缅·维诺戈罗夫所用的（有关托尔马乔娃女士的朗读）受到米哈伊洛夫先生责备的某些语句方面持何种观点，是不可能再有丝毫怀疑了。于是我们敢说，我们这一方已尽到一切文学上的礼貌和责任。

简直同扇耳光的故事如出一辙！不过这里我们稍停一下，先引述《世纪》编辑部为不妥语句所谓诚恳致歉的说明看一看。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说明，《世纪》编辑部还责怪《圣彼得堡新闻》不肯在自己刊物上登出来。说明是这样的：

> 编辑部说明：本期《世纪》印出后，我们才收到米·拉·米哈伊洛夫的来信，它针对我们最近刊出的关于托尔马乔娃女士的幽默小品而发（见《俄罗斯奇闻》一栏)。《世纪》编辑部不得不先推迟发表此信的全文或摘要（但应保留其实质)，但要说明一下：就米哈伊洛夫先生此文总的内容②，我们将尽快提出解释，至于维诺戈罗夫先生文中偶然出现的不慎语句，我们还在收到米哈伊洛夫先生来信之前便主动就此采取了一切措施，运用握有的一切手段，向托尔马乔娃女士表示了自己诚恳的歉意。

---

①② 异体字是《世纪》编辑部标出的。——作者注

不对，先生们，事实并非如此。这里像扇人耳光的先生那样说声对不起，我有些过火了，是不够的；不能以为这就是采取了一切措施，运用了握有的一切手段，表示了诚恳的歉意。不，先生们，这里并不诚恳！既然你们称维诺戈罗夫文章是幽默，他的用语是不慎，而且是偶然出现，那还谈得上什么诚恳呢！整篇文章全充斥着这类偶然出现的语句，算什么幽默呢？你们认为这是幽默吗？这是不慎的语句吗？这种话就是庄稼汉老粗也羞于认可，或者还不只是他，就连阿斯科琴斯基先生[①]本人也会如此。你们这些聪明人，难道会不理解这个吗？不，这里缺少的正是诚恳。你们出于某种目的，不得不通过编辑部维护维诺戈罗夫，所以就这么做了，虽然你们自己都可能对此文感到气愤。你们说："我们道歉了，还要怎样呢?"我们再说一遍：像扇人耳光那位先生说声对不起，是不够的，以这种方式道歉无法令人满意，反倒给人增加屈辱。不错，按照西方贵族的 point d'honneur'a[②]，如果一个贵族打另一贵族一记耳光后只愿意说"J'en suis faché![③]"，以此表示歉意，那么被打的人就可算得到满足了。但这种骑士规范难道可以适用于我们的时代吗？尤其在维诺戈罗夫这类骑士卷入的情况下。可你们却几乎是坚持要这样。你们点了点头，说很遗憾，在幽默小品中偶然出现了些不慎的语句，之后就觉得足够了。

凑巧，维诺戈罗夫先生在回答米哈伊洛夫先生时，便说起

① 维·伊·阿斯科琴斯基（1813—1879），俄国作家，《家庭恳谈会》杂志（1855—1877）的主编，是保守派，沙文主义者，此处提到他，大约因为他声名狼藉，遭人鄙视。
② 法文：保持体面的规矩。
③ 法文：我对此深感遗憾。

了骑士风度，并指责米哈伊洛夫先生缺少骑士的规范！没说的，对骑士风度真是了如指掌。《世纪》编辑部让维诺戈罗夫的回答上了自己的版面。如此对待维诺戈罗夫，有这个必要吗？

现在让我们听一听《世纪》编辑部往下是怎么说的。

> 我们高度评价文学界道义上的自我克制……

什么？在出了维诺戈罗夫文章之后，在公开认定他的令人厌恶的诽谤只是幽默的不慎语句之后，还讲什么道义上的自我克制呢？

> 并认为道义的回击是反对任何破坏文学上礼貌的最好武器……

好一个文学界的礼貌！

> ……但我们认为这一回《世纪》编辑部短短几行的说明对这一重要事件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其他杂志上发表任何的抗议，不管如何谨慎地选择发泄愤怒的激烈词句，像米哈伊洛夫先生在文中所做的那样。

原来如此！可为什么说，根据什么说，《世纪》编辑部的几行文字，会比其他杂志上所有的抗议都更有作用？《世纪》编辑部自以为是何许人呢？竟如此看重自己的几句话！它一面对偶然的语句表示遗憾并向托尔马乔娃女士致歉，同时却又维护维诺戈罗夫（说他只是不慎，并在自己刊物上登载他的回答）。不仅如此，它甚至为维诺戈罗夫辩解，这我们在下面可

以看到。这样一来，它便认为自己以这样的形式、在这样的场合讲几句道歉的话，便完全可使托尔马乔娃女士感到满意了，而且认为这几句话比其他刊物所能说的一切都更有分量。简直傲慢得令人捧腹！

说到卡缅·维诺戈罗夫涉及到在彼尔姆当众朗读《埃及之夜》的那篇小品的实质，《世纪》编辑部断然不能同意米哈伊洛夫先生在文中表现的观点，不能同意他的下述见解：这是女性的勇气，她通过这种朗读超越了人群的愚昧；这又是那些不肯赞同女性表现勇气的人们所遭遇的不幸①；讥笑类似的社会行为是对所有俄国妇女的侮辱，等等。

任何人都可以不同意。不能否定任何人保有自己见解的权利，但对这见解却可以不同意。这一切都该当如此。可接下去的几行文字却非常有趣。这是想为维诺戈罗夫开脱，要证明他在文中根本没有攻击托尔马乔娃女士，只是针对《圣彼得堡新闻》的彼尔姆记者。

我们无法理解，俄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从当众朗读《埃及之夜》中能得到多大的提高，所以觉得我们做出上述的说明暂时也就足够了。不过，为了消除一切误会，我们必须指出一点：卡缅·维诺戈罗夫戏谑的对象根本不是托尔马乔娃女士，不是她的行为，也不是她对自己朗读的见解。戏谑的对象，只是《圣彼得堡新闻》上小品文所描绘的那个托尔马乔娃女士，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对女性朗读《埃及之夜》的赞颂，而非托尔马乔娃女士其人；对这位女士的人

① 异体字是《世纪》编辑部标出的。——作者注

格，无论《世纪》编辑部或这位幽默作家，无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去冒犯的。还可能，成为这种戏谑对象的，是米哈伊洛夫先生本人的文章。再说，这里不得不提到托尔马乔娃女士的名字，但这应该构成《圣彼得堡新闻》小品文作者的严重责任，因为托尔马乔娃女士本人事实上可能根本不同意那些对自己的朗读所作的不恰当的阐释。

如此的辩解！这真所谓想千方百计洗刷干净。这说法何等脆弱，何等可怜！连孩子也不会这么来开脱呀！

请听我说！你们断定你们那位幽默家戏谑的对象不是真实的托尔马乔娃女士，而是《圣彼得堡新闻》上小品文所描绘的那个女士。第一，你们怎么准确知道《圣彼得堡新闻》的小品文作者描绘的女士，并非实际情况？而且歪曲了她的话和见解？假如托尔马乔娃女士真如记者描绘的那样呢？假如她的话和见解没有传达错呢？那你们有权如此讥笑她侮辱她吗？要知道你们讥笑她侮辱她是在一个假设的条件下，即她在实际上并非如此。可在这类事上怎能以假设作为基础呢？如果你们的前提就不正确呢？也就是说你们一切侮辱性的话全是针对现实中的托尔马乔娃女士而发的呢？第二，我们假设你们估计正确，假设托尔马乔娃女士从没那么说过，也没那么想过，记者是搞错了（什么事情还不能发生呢！甚至根本没有过这些见解和这些话，不仅如此，也没有朗读《埃及之夜》这件事，全属子虚乌有。而《圣彼得堡新闻》中的小品文不过是省城来的趣谈而已。这简直是百年不遇的事呀!)。但那又怎样呢？只要你们无法肯定是这样，那就还得记住：在《圣彼得堡新闻》小品文中可是写的真人名字，指名道姓的，说是一个五等文官的妻子，托尔马乔娃女士，住在彼尔姆。难道可以对一个真实的姓名讲出如此辱骂性的话吗？而辩解的理由，竟然说讥笑的对象并非

那位托尔马乔娃女士，而是记者描绘的另一位。单在你们那位幽默家的这般戏谑文章中被点了名，对这位女士来说已够无礼甚至蒙受羞辱了。难道你们真不明白这一点吗？编辑先生们，难道你们想不到这有多粗暴和屈辱，竟以为有权刊登这类粗暴无礼的东西（你们称为是戏谑），而理由仅是：记者有可能没有准确传达托尔马乔娃女士的话。倘如你们真不明白，那就处在托尔马乔娃女士的地位上体验一下吧！

不想在自己身上一试吗?①

请设想一下有人发表了赞扬您的文章，刊出后显得不很自然甚至可笑。又有人挑刺儿，把您的名字、您这个人同一些可耻的事扯到了一起，置您于屈辱的境地。他把您摆到了令人厌恶的情境中，开始作为一个例子讥笑您，骂您唾您，硬说您有可恨可怜又可笑的意图和行为，凶狠得意地点出您的名字，加以讥讽和嘲弄，却自我解释说他在开玩笑，实际上没有这回事，还没得到证实。那会怎么样呢？您能感到舒服吗？这对一位女性来说，能受得了吗？我们再说一遍，如果托尔马乔娃女士的见解和讲话，记者传达得全都准确，结果会怎样呢？对她一说这是多么大的侮辱啊！最后一点，您断定维诺戈罗夫讥笑的绝非真正的托尔马乔娃女士，而是记者的过分颂扬。然而，记者同这一侮辱行为又有何关系呢（我们从维诺戈罗夫文章中摘录一段）？

如今斯图尔特·米尔、米哈伊洛夫等人的文章看来都完全没用

① 引自亚·谢·格里鲍耶陀夫：《智慧的痛苦》，第3幕，第14场。

了。妇女解放事业已经开始。一位俄国女性，五品文官之妻，以克莉奥佩特拉[①] 面目出现在听众面前，读出了一句："用生命作代价买她的一夜"，而且读得精彩！我又忍不住要从我国一份惊人的政治报纸的记者所写的信里，再引一段绝妙的话："她的一双大眼睛一会儿闪亮，一会儿暗淡以至熄灭……（哎呀！这该是多么精彩呀！）她的表情不断在变化，一会儿是温柔而热情，一会儿是强烈的激动，一会儿是冷峻严肃，一会儿又高傲地挑战。接着克莉奥佩特拉设想以生命买她一夜的诗句之后，又有一行著名的诗句："蔑视的目光环扫了自己的崇拜者们。"读这句时的确带着轻蔑和讥讽的表情。年轻女士这时环顾沉默的人群，假如这是在剧院大厅，一定会掌声雷动，四座震惊。

我不是剧院听众，但我读了这美妙的诗句也为掌声所震惊。只是我不大明白，彼尔姆文学集会上聆听托尔马乔娃女士的人们同克莉奥佩特拉的崇拜者有何相干。但看起来是有关系的，因为不然的话，托尔马乔娃女士为何要"带着轻蔑和讥讽的表情"环顾听众呢？不过我不了解彼尔姆的秘密，因而毫不奇怪，我什么也没有懂……

这便是你们所谓的戏谑和幽默吗？编辑先生们，你们觉得这是位幽默家吗？

现在我请问所有的读者，我们在维诺戈罗夫文章摘录中打了着重号的语句，同彼尔姆记者对托尔马乔娃女士的不妥不确

① 克莉奥佩特拉（公元前69—前30），埃及末代女王（公元前51年起）。她曾为凯撒情妇，后又与安东尼相好（公元前41年。前47年又与安东尼结婚）。后因与罗马战败，于屋大维（奥古斯都）的部队进入埃及时自杀，莎士比亚写有悲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1606）。

(姑且认为如此)的描绘，有着什么关系呢？这里明白无误地讲的是托尔马乔娃女士，也就是现实存在之人，证明“看起来是有关系的”。但编辑部会说：维诺戈罗夫认为所以会有关系，纯因记者对托尔马乔娃女士的描绘造成的结果。而其实指的托尔马乔娃女士并非这一位，因此所谓有关系也不是指她而言。然而，第一，从说话不妥的记者加给托尔马乔娃女士的语句和见解中，能找出什么根据说“是有关系的”呢？不就是根据她“带着轻蔑和讥讽的表情环顾”四周吗？其实，维诺戈罗夫也只是凭这个说话的。他讲:“看起来是有关系的。不然的话，托尔马乔娃女士为何要‘带着轻蔑和讥讽的表情’环顾听众呢?”就因为一位女读者不慎想读得更动人些，一时兴奋，便惹来如此可怕的责难，而且还认定看来是有关系的，不然的话如何如何。即便说记者没有弄错，表达得很准确，那又怎样呢？就凭人家一个姿态，便写文章公开问罪，指名道姓地责难一位确有其人的女士！天哪，这难道是幽默吗？即使记者表达不准，难道可以指名这样议论，横加这样的罪名吗？再说，我们不是小孩子呀！在维诺戈罗夫这句话里，哪里讲到或暗示不是指托尔马乔娃女士其人呢？维诺戈罗夫先生慌乱间宣称自己根本不是指托尔马乔娃女士说的。请大家再读一遍这句话，看看讲的是谁呢！记者表达得准确也好，不准确也好，这话指的是谁呢？有人会对我们说：要真是托尔马乔娃女士，她不会轻蔑地讥讽地环顾听众。如果记者说的确如此环顾了，首先，那就不是真的托尔马乔娃女士；其次，那就是有关系。

这便是《世纪》编辑部的逻辑。

我们再重问一遍，你们凭什么说真的托尔马乔娃不会这样环顾四周呢？为什么单凭这一点就维护维诺戈罗夫呢？而他竟做出了如此可怕的诽谤。其次，为什么单凭以这样目光环顾听

众就得出结论说确有关系？

这可是幽默吗？你们竟称这是戏谑？

这些都仅仅是你们不慎的语句？你们又声称就这不慎的语句已经道过歉。可当你们断言这一切仅是戏谑，不得不点出托尔马乔娃女士的名字应归咎于《圣彼得堡新闻》记者的责任，因为托尔马乔娃女士实际上可能不同意对她朗读一事的不恰当解释，那么所谓道歉又值几分钱呢！

你们自己也说可能，这意味着并无把握。因此，如果托尔马乔娃女士事实上同意解释者的看法（况且记者引述她说的话，显得十分聪明有理[①]，很难设想是杜撰出来的），你们便以为有权对她做出这样的揣测？最后，为什么维诺戈罗夫在戏谑中提到托尔马乔娃女士的名字应完全归咎于《圣彼得堡新闻》小品文作者？根据什么这样说？凭什么逻辑？要是记者描绘不确切，有歪曲（假设如此），那你们就有权让维诺戈罗夫先生大讲什么彼尔姆秘密吗？讲什么“让一切廉耻见鬼去吧！让女性的温柔见鬼去吧！让上流社会的礼貌见鬼去吧！托尔马乔娃女士与她的颂赞者就是这样呼吁你们的”。这就是说，发出这种呼吁的并非颂赞者歪曲描绘出的托尔马乔娃女士，而是托尔马乔娃女士本人和她的颂赞者，这里指的正是托尔马乔娃女士其人。最后，维诺戈罗夫有权建议托尔马乔娃女士朗读普希金的另一首诗(《不，我不珍惜骚动不安的快乐……》)，并且发出下列感叹：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是指托尔马乔娃在她朗读《埃及之夜》后说的话：“……假如我们大家，无论是男人还是太太或少女，读了淫秽的、不道德的法国小说而不难为情，看了猥亵的法国轻松喜剧而不脸红，却不敢当众朗读伟大诗人的优美的艺术作品，那将是极其可笑和古怪了。”

> 读一读吧，托尔马乔娃女士！读它的时候，你会更好地表现出挑战的神情，做出更动人的姿态！既然求得解放，就来个彻底！干吗半途而废呢！

真是无耻之尤！这能不激起内心的义愤吗！请凭常理说个明白，这里可有一丁点儿暗示，证明做出动人姿态的要求不是向托尔马乔娃女士提出的，不是直接指她的，而是指一个幻想出来的并不存在的托尔马乔娃女士，指记者描绘出来的托尔马乔娃女士吗？在维诺戈罗夫整篇文章里哪怕有一处暗示，表明他讲的是另一个托尔马乔娃女士，表明他不同意记者而断言托尔马乔娃女士不是那样的人，那也好哇！不管在何处，他只要有个说明也好哇！然而，在做出这些一清二楚的呼吁和建议之后，他突然害怕了，又推脱起来，这可让我们怎样相信他呢？他说：

"不，这不是我说的，我什么也没说。这真的不是我，这怪记者，我没责任！"

可《世纪》编辑部把对女性的这种侮辱称作不慎的失言！莫非他是个梦游患者？是在梦游中写的文章？怎么能设想，这一切都是出于不慎而写出来的？这解释也太可笑了！不好想出个别的词儿吗？"不慎"可真不怎么样。

这还不够，《世纪》编辑部还在自己刊物上登出了维诺戈罗夫先生本人对米哈伊洛夫先生的答辩。

这答辩里可是无奇不有。维诺戈罗夫说，从米哈伊洛夫先生的文章里他得知了自己头脑中从未想到的东西（莫非他是在梦中写的那篇文章？）。接着他又说，米哈伊洛夫先生"责备我厚颜无耻，自己竟忘了廉耻，讲话的语气全是精神失常或头脑混乱，总之是不正常。"

好家伙！维诺戈罗夫先生高谈道德，怪罪米哈伊洛夫先生对他讲话时语气恶劣。可他对米哈伊洛夫先生讲话的口气又如何呢！够意思的！

再引述一段维诺戈罗夫给米哈伊洛夫先生的“回答”：

> 实际上是什么东西引出我的评论呢？当然不是抹黑托尔马乔娃女士的念头，即便是如米哈伊洛夫先生所说，我没有心肝，有的是一团泥。但我同米哈伊洛夫先生一样，无缘当面结识托尔马乔娃女士。如果米哈伊洛夫先生是从《世纪》的文章中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那我是从《圣彼得堡新闻》的文章中第一次才知道她的名字。

这是什么逻辑？照这么说，只是由于维诺戈罗夫先生不认得托尔马乔娃女士，他才有权侮辱她！至少他是这样为自己开脱的。倘如他认得她，那她会以为维诺戈罗夫先生的文章是对她的人身侮辱，可由于他是从《圣彼得堡新闻》上知道这个名字的，也就可以随便说什么，哪怕是说“可能有关系”，甚至讲“动人的姿态”？他不认识这人，称得上什么理由？要知道在《圣彼得堡新闻》里交代得很清楚，托尔马乔娃女士确有其人，是某某人的妻子，家住彼尔姆。这些难道还不够吗？

> “我点出了她的名字”——维诺戈罗夫先生说，“en toutes lettres[①] 因为《圣彼得堡新闻》记者写出了她的全名。”

是啊。可他是怎么点的呢？

---

① 法文：完全地。

“我并没有讥讽女性，我只是讨论已经披露的事实①。我深信这个事实同女性温良的任何表现都是相矛盾的。我深信，《圣彼得堡新闻》记者所抨击的那种古板的 pruderie②，与完全落落大方可是相去极远的。我看到《圣彼得堡新闻》上的文章得到一种奇特的印象，所以写了篇评论，指的也正是这个意思。”

在这件事上您竟如此“深信不疑”，认为它同我们大家没有任何关系。问题在于您是怎样表现您的深信不疑。如果说您不同意托尔马乔娃女士的见解，那么这还不意味着可以大讲什么彼尔姆秘密，猜测什么侮辱性的“动人姿态”。而维诺戈罗夫先生称这是讨论事实。如果他讨论时已是采取如此的方式，那后来骂起街来该是采取什么方式呢！您看，他还没有拿女性来嘲弄呢。单凭您的文章粗野的口吻，您就不止侮辱了一位女性，因为您要证明在俄国可以用类似语言公开在报刊上议论（实际存在的）俄国妇女，并且会得到一些人的保护和支持。随后，《世纪》编辑部对人家的反驳大为光火。

维诺戈罗夫接着说：

再说一遍，我面对的不是托尔马乔娃女士，我面对的是《圣彼得堡新闻》的记者，是他描绘了女士在公众场合朗读《埃及之夜》，用的是最可笑最无耻的语言。

那您应该去嘲笑记者的描写呀！可您对托尔马乔娃女士干了些什么？况且据您自己说您深信记者讲她的话并不可靠。

① 异体字是维诺戈罗夫先生标出的。——作者注
② 法文：装腔作势。

> 是的，是用了可耻的语言，我呼吁大家都读读那篇文章，特别是记者描写托尔马乔娃女士朗读姿态的地方，然后判断一下，我们中是谁把托尔马乔娃女士当成嘲弄的对象，是我还是不知名的她的颂赞者……

不对，维诺戈罗夫先生，不能这样比较。即或不知名的颂赞者是在嘲笑，那也是无意之间天真地流露出来的，他出于单纯的激赏而无恶意。可您不仅是嘲弄，您还在羞辱。

这里我倒想讲几句关于托尔马乔娃女士颂赞者的话，因为《世纪》编辑部也引他的话来为维诺戈罗夫先生开脱。这是他们辩解的主要依据。

是的，我读了颂赞者文章中那段引起维诺戈罗夫先生注意的话。

的确，再难找到更可笑的说法了。这要么是一颗赞赏进步的淳朴的心灵，想博得托尔马乔娃女士的欢喜，要么……要么……我再说一遍，全是杜撰，也就是说彼尔姆的来信是假造的，是为了编写文学丑闻。不知是哪个捣蛋鬼在显示自己。可惜的是，最有可能的是确有一位天真无辜的记者。令人奇怪的还有《圣彼得堡新闻》，它登了这么一篇报道却没有加任何的说明，也显得很天真。不过，如果说我对记者也这么看，那仅仅是指他对朗读情况的描绘。可当他转述托尔马乔娃女士的话时，则显得很聪明，这些话都不容置疑，其中没有一点儿胡闹的影子，就是从理论上看这也完全是正确的。

凭着这朗读一事和这番话（不论《世纪》编辑部同维诺戈罗夫先生是如何不同意这番话），难道就可以给托尔马乔娃女士罗织这些罪名吗？就算是记者的戏谑描写中透露着真相，就

算托尔马乔娃女士朗读《埃及之夜》时确实很是激动，难道由此便可引申说：如果读者醉心于俄国文学中一部伟大作品的美，并且读得动情，那她就是“有关系”，总之就可能（按维诺戈罗夫说法）存在着彼尔姆秘密吗？他凭什么这样说呢？是根据朗读者的表情？可他没亲眼看见，只是从记者文章中知道的呀！有人说什么他不是针对真的托尔马乔娃女士，而是指的记者文章中描写的那位；那一位在读到有名的诗句时，环顾听众，脸上浮现出激动的表情。

可是，如果托尔马乔娃女士朗读时（非常有可能）千真万确地十分激动（我认为这没什么值得非议的，我倒觉得记者的描写挺糟糕），那时又该如何看呢？要知道那时您的判断，您说的非常有可能，可就全针对托尔马乔娃女士了。然而《世纪》编辑部却以此为根据，替维诺戈罗夫先生辩解，尽管他直接攻击了托尔马乔娃女士，大谈她的什么姿势！试问编辑部不为此感到羞耻吗？

至于说到托尔马乔娃女士本人的见解和行为，我们只想指出一点。

我们完全赞同记者文中所引述的托尔马乔娃女士的话，只是觉得她有点炽烈而急于求成。在公众面前高声朗诵普希金《埃及之夜》这样的文学作品，当然丝毫谈不上羞愧，正如在展览厅里男女老少围观美第奇的维纳斯像[①] 前惊喜地驻足一

① 指希腊化时期维纳斯像的复制品，作于公元前 1 世纪的罗马。后为美第奇家族收藏，故名。按：美第奇家族是中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望族。家族创办了欧洲 15 世纪最大的商业银行；1434—1737 年（中间有两次中断）间成为意大利的统治者。其代表人物之一，罗伦佐·美第奇既是意大利统治者，又是诗人，奖掖文化，促进文艺复兴时代文艺的发展。

样。然而社会上存在许多成见：在公众面前陈列裸体塑像是允许的，朗读《埃及之夜》也是可以的，普希金的即兴作者①就朗读了这篇诗嘛！但要是女性来读，便有人出来反对了。在我们这里，女人还没有这个权利。我绝不是说女人不应该有这个权利，相反，我真心主张女人该有这个权利。我只是说暂时还没有这个权利。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某个维诺戈罗夫，带头发难。妇女还没有得到享用自身权利的理想自由。只有当社会成熟、道德规范确立时，才会确立这种自由。那时，女性也就能够不受惩治地高声赞美文学作品，朗读时可以热情享受最好的艺术上的喜悦；人们再不会一定怀疑这纯洁的女性怀有淫荡的念头、卑鄙的欲望；再不会因为来自艺术享受的兴奋眼神而怀疑这里有彼尔姆秘密。事实上，如果妇女、姑娘纯洁无暇，即使朗读《埃及之夜》也不会产生邪念。所以，老天保佑，希望这样的黄金时代尽早到来，让道德精神扎根更深，到那时人们将要更好地相互信任，而不是相互猜疑怀有邪念。如果心灵脆弱邪恶，就连美第奇的维纳斯也只能给它留下淫荡的印象。必须在道德上相当纯洁，才能观赏这天神之美而不动淫念。谢天谢地，这样的人已是很多。但还有不少维诺戈罗夫先生，所以女性到他们面前去朗读《埃及之夜》，就意味着去斗争。况且，老派妈妈们的意见也得尊重呀。她们看待这一切，依然是自己的眼光，因为她们替自己的女儿们担心。确实，对青少年来说，这种朗读甚至可能是有危险的。人在青少年身体和精神都还未成熟，美第奇的维纳斯可能无法给他们以充分的美学感受。对青少年此事确实应该缓一缓，总之要照顾到年龄。所以说，当妈妈的在这一点上是有些道理的，不过也就仅

① 指普希金的《埃及之夜》中的即兴诗人。

此而已。至于说到其他方面，那么不管是当妈的还是当爸的，要想通过公开朗读来说服他们，使之接受传统上不宜公开朗读的东西，那是极其困难的。既然如此，何苦强求于他们呢？再说任何的宣传都不是靠强力，而是靠善意、安抚、爱心、迁就，有时甚至得迁就某些成见。

就托尔马乔娃女士朗读一事，我想说的就是这些。但愿我没有讲出彼尔姆秘密和“生动的姿势”来。说什么事有什么语言和姿态，只有维诺戈罗夫先生们不懂得这一点，是呀，他们是幽默家嘛！

其实，维诺戈罗夫先生是道了歉的。他是这么说的：

> 我在坚持自己见解的同时，认为固执是最愚蠢的痼疾之一，并随时准备承认自己的错误。

您承认什么错误呢，维诺戈罗夫先生？

> 现在也是如此。我承认，并真心表示歉意，在抨击一种原则、一个既成事实的时候，我完全无意地，总还是在《圣彼得堡新闻》记者绝妙奇文的影响之下，使用了几个提法，它们理所当然地显得是对女性的极大侮辱。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您承认使用这些字眼可能造成对女性的极大侮辱，因而也就是承认侮辱了女性。那么米哈伊洛夫先生讲的也正是这个嘛，为什么您对他那么火冒三丈呢？您难道不许他讲话吗？哎呀，您说您无意地侮辱了人。我怎么也弄不明白，写文章竟可以在无意之间，不自觉之间，难道是在梦游？您说是受了影响，那您的道歉就如同我前面讲到的那个

行凶打人者的道歉：

> 啊！你们是说打耳光呀！请大家别太在意。我承认是有些忘乎所以了。这确是坏习惯，你们把我激怒了，我也就完全不由自主地扇了个耳光。

可是，不由自主扇人耳光的人，是要受到谴责的呀，好让他以后别再不由自主地打人。而您呢，却有人出来辩解，这正是《世纪》编辑部。

维诺戈罗夫先生接下去装腔作势地说：

> 我极珍视女性的尊严，我极尊重女性圣洁的权利（真不愧是幽默家！），所以我完全无意地绝无恶念地脱口而出的几个词儿，给我自己带来的痛苦恐怕要超过任何别人。

哎呀！这您太过分了！您又忘乎所以了，维诺戈罗夫先生，别又是不由自主吧。

> 而向全社会的这种坦诚自省，我希望能够使我免遭有意侮辱女性的难堪责难。

恐怕未必！人们只会说您退缩了，其余的则恐怕未必！

最后，为了完成这篇极端蛮横的辩解，维诺戈罗夫先生在数行之后的另一处说：

> 我没有歪曲托尔马乔娃女士一个字，我一字不差地转述了我认为不宜出自女性之口的语句，我讥笑的是事实，是《圣彼得堡新

闻》记者向公众宣布的事实，我没有增加可能歪曲这一事实的任何一个字。而可称诽谤的，只能是歪曲事实，只能是虚伪的杜撰，可绝不是对此或对彼的见解。

这可太不像话了！这么一来，“彼尔姆秘密”、可能有的关系，等等，在您眼里全不是歪曲事实，不是添油加醋，不是有意把事情往坏处想。照您看，这只是见解！您说怪也不怪。再说，难道《世纪》编辑部当真是为维诺戈罗夫辩解吗？我不相信。这里面另有文章。这简直是不光明磊落！

达尔杜夫看到多里娜裸露着脖颈，就对她说：“你遮上点。这要勾起邪念的。”多里娜回答说：“你就是把衣服全扒光，也不会勾起我任何的邪念。”①

我们把这个风趣的回答，赠给维诺戈罗夫先生。

① 引自莫里哀喜剧《达尔杜夫》（1664）中的对话（第3幕，第2场）。

“口哨”[1] 与《俄国导报》

我刚刚讲到了诚恳[2]。我完全相信，《俄国导报》[3] 今年第 2 期的文章《替〈现代纪事〉说的几句话》，是相当光明磊落的。尽管如此，它给我留下了十分奇怪的印象，其中有股子怒气，甚至可以说是种激愤，当然是出于高尚的义愤，同时，却又有害于事。人们不是说气盛坏事嘛，这您在任何的书里都可读到。事情是这样的：《俄国导报》告诉自己的读者（它的读者甚多，愿上帝保佑能更多，因为这杂志是值得一读的），从今年起，《俄国导报》要改变出版方法：它的《现代纪事》一栏将单独出版，尽管与《俄国导报》密切相关，同时，仍保持以政治为主的方针。在《俄国导报》上取代它的，是自今年起开辟的评论栏。依我看这样很好。现在只等看《俄国导报》在自己新栏目中有何新的见解。《俄国导报》第 2 期已出版，其中有了书评栏，但暂时分量还不够。我们再等一等看，我们是

---

① 杜勃罗留波夫在《现代人》杂志上开辟的讽刺专栏，共出 9 期(1859—1863)。

② 指《诚恳的典范》一文。

③ 文学与政治杂志，在 1856—1887 年间，发行人与主编是米·尼·卡特科夫（1818—1887)。

有耐心的，这里我想请大家关注我上文提到的刊登在《俄国导报》第1期上的文章。它不妨可说是杂志未来评论活动的引子。文章一开头便告诉读者：《俄国导报》初创时，有一个阶段受到其他杂志批评，说它的文学评论太少。后来这种批评沉寂下来，那些杂志自己也挤掉了文学评论，大搞起政治观察来。依我说，读者从中看出《俄国导报》最早发现，我们的评论在当前是不为人所需的。因此，把它驱逐出了文坛，而我们一些没有眼光的杂志很长时间一直责备它，最后才明白：评论在今天是多余的东西。于是，开展了政治述评，这自然是学了《俄国导报》的榜样。俄国的这些杂志做得很对，因为聪明人总是要模仿的。可我们对当代的现实是多么地不了解呀！我一直还以为，俄国各杂志中的政治述评栏，根本不是在效仿《俄国导报》，而是数年前俄国文学扩展势力的直接结果。不过，好事情任何时候知道都不为晚。接下来，《俄国导报》又说，当时各家杂志上都放弃了人们相互进行文学评述的习惯做法；从前《现代人》论证《祖国纪事》如何如何不行，《祖国纪事》反过来评说《现代人》如何如何不行，然而自从《俄国导报》问世，这种情况便突然结束了。《俄国导报》的文章说："在《俄国导报》出版的第一年，我们就指出了我们文坛风气的这一特征，指出了当时各杂志上盛行的这一习惯，即通过文学评论的形式吸引读者到自己这边来。这个习惯在那时很快就中断了，可是为时不久，还是本性难移。"就是说，从文章中这些有分量而且十分有意说出的话中可以看出，我们的文学所以能消除相互间可笑的评论，又是多亏了《俄国导报》。虽说维持时间不长，因为俄国的杂志编者本性难移呀。我当然非常可怜俄国的杂志编者，因为他们有如此的本性。至于说为《俄国导报》所消灭的杂志评论，我的看法倒不很同意，这使自己既吃

惊又有点惭愧。要知道文学全是在杂志上汇集起来的。因此，如果《祖国纪事》里出了一篇好文章，别的杂志的出版者义不容辞地应该给公众指出。而且，有些奇特的杂志编者及其同事甚至还格外喜欢文学，欢迎文学中幼稚热烈的青春活力，不由得想谈一谈有趣的文学新现象，可是突然冒出一种理智，强迫大家都闭上嘴巴。于是，形成某种令人奇怪的相反现象。过去是相互评论以吸引公众，如今是相互沉默不语，可能也是为了吸引公众。因此，我觉得，应该抨击的不是相互的评论，而是评论态度的偏颇和缺乏善意。可如今弄得杂志编者摒弃了相互间的评论，以为那是可笑又无聊的事，仿佛向公众承认自己做不到公正和认真；这样一来，也就是向公众承认过去相互评论时确是偏颇和缺乏善意的，目的仅仅在于招徕读者。如此自责令人奇怪，我甚至觉得有些可笑，尽管倒也可敬，因为表现出不少真诚。我不知为什么，也许由于年纪还轻，总觉得可以既相互评论而又不失诚实和认真。这样不仅于文学有益，而且是很好的道德示范。读者马上能够看出谁偏颇谁无私，明白这一点便会尊重文学和文学家。这犹如到了黄金时代。我承认，这是过于天真的想法……可令人奇怪的是，《俄国导报》说，这股风气经它一指出虽已立刻停止，却为时不久，很快又本性难移。我甚至觉得，《俄国导报》同样也本性难移。例如它对"口哨"怒不可遏，想狠狠地教训一通，开卷的前言就充满对"口哨"的仇恨。它到处盯着"口哨"，在我国文学的每一事实中，在历史中，它都发现了"口哨"，它甚而认为"口哨"对未来也将产生可怕的影响！……看我扯远了，说到下面去了。既然如此，我顺便插一句：这正是《俄国导报》文章中令我吃惊的激烈态度，导致情绪激烈的那股怒气。我们一齐来读一下这篇文章，读者自己就会看出来。接下去文章说：

> 就这样，本性难移，恢复了对骂，只是已非文学的口角。再捡起丢下的文学评说的假面具，已经是不好意思了。如今的争辩变得开诚布公，直截了当，一幕幕闹剧，有的带着歌唱，有的没有歌唱，有的吹着口哨，有的发出尖叫，这是不久前一位吹口哨者所形容的说法（此处附有脚注：《现代人》第一期。我们猜的正是《现代人》）。这难道不是某种证据吗，说明我们的时代是个不太要文学的时代。

可悲的现象，的确是可悲的现象。不过有必要指出，愤怒的杂志大可不必讲什么一幕幕闹剧，似乎有很多，又是唱歌，又是吹口哨，又是尖叫，等等。严格地正式地说，“口哨”只有一个，就是在《现代人》杂志上。如果《俄国导报》在这里不是运用以多喻少的辞格，如说我们的普希金们，我们的莱蒙托夫们，我们的口哨，等等，那么我敢说：《俄国导报》由于用了复数而过于抬高了这讨厌的“口哨”的地位。我不能肯定（因为我太年轻），不过觉得像《俄国导报》这么严肃认真的杂志，本可以对“口哨”毫不介意；事实上不是这样，《俄国导报》一气之下（当然是正当的义愤），眼睛出现了毛病。它到处看到的全是“口哨”，“口哨”在眼里成了许多个，变为一幕幕闹剧。不仅如此，可敬的杂志甚至据一个“口哨”来判断我国整个的文学，又据一个“口哨”得出结论说我们的时代是“不太要文学的时代”。假如要说说自己的见解，我倒以为我们的时代恰是一个文学的时代，“口哨”丝毫不能证明时代不要文学。我们继续来看这篇文章。

文章说迄今《俄国导报》适应时代的特点，没有触及普通性的理论问题，时代和社会的要求也不利于解决这些理论问

题。那么现在是否开始了另一个时代，是否出现了新任务，社会是否感到在纯粹实际的需求之外更有其他的需求，由培养和教育公民所引出的需求——这些问题《俄国导报》并不想去解决。不过它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这种需求……因此，也才宣称：鉴于这一需要，决定开辟一个从事评论和书报介绍的新栏目。

这使我很高兴。的确，近年来我们似乎顾不上文学了。我们这里一切都动了起来，好像在准备登程上路。我们仿佛发现了新大陆。有无数的希望和期待。可渐渐地，我们虽不是安静下来，虽不是感到失望，却也不再等待很快会有结果了。我们仿佛突然发现，我们脚下没有根，没有作为向心力的引导者，我们对一些东西没有表示赞同，有些事我们还不会做。总之，我们在责备自己，有时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我觉得这一切都来自我们的一知半解。事实上我们是有这种需求的，我们虽也议论这种需求，却不像有些地方那样，议论了便用于事实上，所以每个议论者都把这当成自己个人的事。我们尽管有这种需求，却只会抽象地说说，如提出为艺术而艺术，试着讲点辩证法，议论一下高尚和美好……仅此而已。当然，这期间我们是在学习。拿《俄国导报》来说，它就孜孜不倦地教导我们，讲解庭审、陪审员、监狱、村社、警察。在一旁听听，甚至很有意思。只是结果也仅仅在旁边一听。你们的争论、激动，你们的辩证法，你们的辩论，对我们来说都还只是书本上的东西，因此，渗透着没有活力的书卷气。好像你们的脚下也没有真正的根基，你们也没能融入真正的生活。你们身上越来越多的是夸夸其谈，迂腐气十足，沾沾自喜……你们的杂志上有一个很好的政治栏，其实政治与我们有何相干呢?！只不过是一个漂

亮的玩具而已。我读格罗梅卡[1] 先生的文章，抱着希望也感到乐趣。甚至读到七月间人行道根据警察官命令铺上沙子，我都很高兴。文章写得很聪明，但如果写这篇揭露性文章的聪明人有事可做的话，他就不至于啰里啰唆，写出这么多页来，弄得挺可笑。正是从这里出发，我得出一个结论：假若说我们这儿还有不全是一知半解的活动，那就是文学活动。再者，不久以前，十多年前吧，文学活动在我国曾是极有益的事，所以才融入我们的生活，并带来了美好的结果。那时形成了整个年轻一代，人数不多却很可信赖，他们为新的见解团结起来。这些新见解变成了社会切身的需要，得到不断地发展……这些情况就发生在别林斯基活动的晚期。总之，文学那时有机地融进了生活。因此，我觉得，我国文学界综合的文学评论活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在今天也仍然会受欢迎。我们现在如一盘散沙，我们渴望有精神信仰，有一个方向……我们甚至看得很清楚，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做的事还很多，不少的事还没有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以为今天更该是个文学的时代，一言以蔽之，是成长和教育的时代，自我认识的时代，精神成长的时代，而我们的精神培养是很不够的。需要教育，无论如何也得有教育，而且越快越好，还要从两个方面来做：一个方面是我们，另一个方面是不久前仰仗仁慈意志而大大扩展了自己公民权的人们。我甚至以为，没有道德上的纯洁，没有内心的成长，任何的专业事实，不论是帕默斯顿[2] 还是格罗梅卡，甚至是对命令铺沙子的揭露，都无法真正进入到我们的意识中去。当然

① 斯·斯·格罗梅卡（1823—1877），俄国评论家。他经常在《圣彼得堡新闻》和《祖国纪事》上发表文章。

② 帕默斯顿（1784—1865），英国辉格党首脑、子爵，曾任英国外交大臣、首相。

喽，这些也能促进精神的成长，甚至作用很大，可同时要有综合性的教育更绝无害处，甚至好得很。可惜我不太会表达这个思想。我感到就连高雅文学如普希金、奥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等，对我们来说也比我们杂志上最好的政治栏和 premiers-Moscou① 要有益得多（天哪！我这是说了些什么！不过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这么想，是因为我一向信任人道的审美表现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点点积累起来，逐渐深入人心，深入本质，培养人的精神。语文——这是个伟大的东西！如果人变得人道了，一切专业的活动也就容易适应于他。这样的人在我们这里还没有完全形成，这一点最糟糕！专业的东西虽然也能被我们理解，却不能与我们融为一体。当然，专业直到今天都是需要的。这是科学，是必不可少的，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不过两者都很有用，要能兼得，相互协调，这是最理想的。至少在文学这个领域，我们还不是一知半解吧。自然，文学及其影响还远不能包容一切，但它有助于包容一切。不错，当年有别林斯基，如今没有那么一个招人喜欢的人物。全都无所作为。若有个新人，一定会给我们说出些新思想，令人安慰的思想。也许应该等《俄国导报》说出点什么。

然而《俄国导报》还没开辟出新栏目，却已开始发表奇谈怪论了。正是这一点令我费解，甚至似乎感到失望。它刚讲起杂志新栏目该是何种性质的，却马上又转到《现代人》及其“口哨”上来。这恐怕会让人觉得《俄国导报》开辟新栏目不为别的，就是存心要刺激一下《现代人》和“口哨”。这想法很荒谬，认真说，我应该为产生这想法而感到惭愧。实际上，我也确实心有愧意，极力不去相信它。那篇“文章”里评价

① 法文：莫斯科的社论。

《现代人》时，讲的意思也就是现在人们都在说的东西，然而文章的激烈情绪却不由人不感到吃惊。文章说：

唯独不能起作用，没有生命力的很差劲的文学，才只知翻腾自己的垃圾，却看不见眼前的人世，放了正事不干而徒劳无益，或者只打家里的小算盘，在琐事上钩心斗角，搬弄是非。

这话讲得很厉害，但却有理。诸位是会同意的。接下去又说：

有人责备我们刊物上缺乏文学评论，可正是发难的那些杂志，因循保守，幼稚好斗，其所宣扬的理论使文学丧失了任何的内在力量，所有的文学权威都遭到诋毁，普希金也被夺走了民族诗人的权利，如此等等。

往下是这么说的：

这些杂志要求文学完全摒弃私利，杂志为事业也为实际需要而不加区别地取消了一切，但实际上这里一半是无聊的文学议论和逸言，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些或无私或为私利的习作。世界上哪国文坛上也不会有如此众多的文学丑剧，只有我们这个刚刚诞生的弱小贫乏的文学是这样；它还没有自己的科学，不久前才形成自己的语言。显而易见，这样来弄文学，不是什么好兆头，不能表现什么力量，反而表现了无能和毫无价值。

我觉得《俄国导报》的这番评论，是受到愤怒的过分影响所致，并且态度沮丧。这很令人遗憾。我认为是太夸大了这些

丑剧在俄国文学发展中的分量。的确如此！我甚至觉得，我们这类文学丑剧的产生，只是部分地由于文学的软弱无力和微不足道。我仍坚持认为闹剧是由我国文学的泰斗和巨擘造成的，他们口里喊着反对丑剧，可丑剧恰恰又来自他们。而这里是有原因的，我下面会讲到。但部分地似乎是因为有些人闲得无事可做。青年人血气方刚，躁动不安，有生活需求，需求这个那个，至少想活动活动，于是，就出现了丑剧。这虽说并不好，但却不表明无能和毫无价值。可有一部分丑剧，而且是最大的丑剧，出在文学泰斗和巨擘身上的，那才是他们无能和毫无价值的标志。尽管在这些泰斗之中有相当多的人并非无足轻重之辈，正好相反，他们十分聪明，本可大大有益于人。只是某种自尊心在毒害他们。人都分成了小集团，分成了帮派，个个如我们在某处说过的，都把家庭琐事当成全人类的利益[①]。人人认为自己是根本，是救星，是普遍的希望所在。大家全争着充当胜利者。聪明人有很多，也到了他们发挥作用的时候，人家都找他们，都希望他们拿出办法，指点迷津，寄希望于他们身上。而他们刚刚明白自己的时机已到，也就是明白自己能给人指引，为社会所需要，竟马上走入歧途。过去是宣扬人道和一切美德，当事情一涉及他们自身，他们便立刻相互争斗起来。他们的优良品质，跑到哪里去了呢?！有的泰斗说，我愿意行动，但有一个条件，必须承认我是整个宇宙围着我转的中心。妄自尊大和自命不凡，使我们的文坛盟主变成了笑料、漫画人物。甚至一位卓有才华的作家大白天里突然发了疯，高喊有盗贼，求人救命：

---

① 这句话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波夫先生与艺术问题》中曾说到过。

偷走了我的一摞诗！①

又有一位无疑是绝顶聪明的人，遇到另一位文学家，犹豫半晌拿不定主意怎么去握手，是伸一个手指，还是伸两个手指，免得对方以为同我能平起平坐。也许对方一犯胡涂，真会这么认为的。另一位遭到人家一阵嘘叫，便大事不好了。这意味着一切全完了，一切全被毁掉，世界末日来临了，大家都对我嘘起来了！把自己视为宇宙中心，把自己的家事说成全世界性的事件，这种狂妄令我想起不久前法兰西科学院接待拉科德尔② 的事。基佐③ 在回应他的发言时，先指出拉科德尔早在某些名人的葬礼上讲话也十分精彩，然后补充说："好像天意特地为您选择一些配得上您那口才的死者，您的口才的确没有辜负这种选择。"这是多么无聊！简直是荒唐。试想上天专门选些杰出的死者，目的仅仅在于让拉科德尔神父在他们灵前炫耀一番自己的口才！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这是基佐说的，他是个聪明人。这个可悲的例子说明，连聪明人偶尔也会失去控制，甚至在冷静的心态下。要是他情绪激动时又将如何呢?!让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话题上来吧。当然是由于我年轻吧，我总以为上面讲的那种不和，还有随之而来的种种丑剧之所以产生，还有个原因，就是我们这儿出现了太多同样聪明的人。要是在他们上面能有一个最聪明的，他们很可能会服从他，那就

① 引自侨民 U. U. 德米特里耶夫（1729—1807）的《我被窃贼偷得两手空空!》（1803—1805）一诗。

② 拉科德尔，法国天主教神父。此事发生于 1861 年 1 月 24 日。

③ 基佐（1787—1874），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曾任部长、政府首脑）。

万事大吉了。而没这么个人，这是主要的原因。于是便没有个中心，没有一颗热烈诚恳的心灵，没有崭新的思想。而关键是没有这么一个人，首先要有这么一个人。有书本，有人道的准则，有各种美德的规定，有许多聪明人，他们继承了天才的思想，并以为凭这一条自己就是天才。以上这一切倒是有的，但这很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路子对头也只好怨自己不行，不能怨道路不好。

这些话我现在说出来，无非想练练文笔和口才，这一切自然丝毫不涉及《俄国导报》。相反，我对它有很多的期望。只不过我觉得它上面讲到俄罗斯文学时有些忘乎所以，甚至说这是“刚刚诞生的微不足道的贫乏的文学”，“没有自己的科学，不久前才形成自己的语言”。《俄国导报》看来很生气，想找个人发泄一通，正好碰上了文学，文学就倒了霉，谁让你碰上了呢。我又认为，我们的文学虽说是不久前新生的，可并非渺小得微不足道。它完全不贫乏：我们有普希金，我们有果戈理，我们有奥斯特洛夫斯基，这已经构成文学了。在这些作家身上已经可以看出思想的继承性，而这思想是强大有力的，是全民共有的。除这些作家外，还有许多以前的和新的作家，都是任何欧洲文学所不会小看的。难道普希金现象仅仅为我们形成了语言吗？难道《俄国导报》看不出普希金的天才强有力地体现着俄罗斯精神和俄罗斯内涵吗？你们说文学没有科学，但我说文学有其意识，这意识虽还年轻而没定型，却已有广阔的开端而且极有发展前景。我们这里早已出现了俄罗斯的声音。善于听到它的人是幸运的。你们夸赞普希金的什么呢？如果你们承认他只是锤炼了俄语，那你们为什么自己又说普希金是位民族诗人呢？难道你们夸赞普希金仅仅为了故意刺激《现代人》吗？我不相信自己的这种怀疑！可耻的想法，快离开我吧！你

们是过于急躁了。我要等你们冷静下来。

令我吃惊的是，《俄国导报》并没冷静下来，反而火气越来越大。最糟糕的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完全又是那个“口哨”。真是叫人扫兴的“口哨”！往后还不知它在我们这儿会惹出多少麻烦呢！您自己想想看。《俄国导报》大谈什么强制性地融合不同民族的特点是很不现实的，相反，通过自由地发挥道义力量却可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作为例证，它指出斯拉夫各民族及其语言处于怎样可悲的境地，而德意志民族及其语言恰成对比，处在很有利的地位。接下去该刊忽然说：

> 在被历史遗忘或被压制的斯拉夫世界，它的任何一种民族因素迄今还没有达到无可争辩的强大，甚至不能超越眼前的一些因素。俄国毫无疑问是个巨大的强国，是横跨欧亚广袤空间的庞然大物，可俄罗斯民族算什么呢？俄罗斯文学，俄罗斯艺术，俄罗斯思想又怎样呢？如果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文学今后依然落后于欧洲任何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学，这对俄罗斯有利吗？如果我们永远总是吹口哨的顽童，只能干些小事，只会拨弄是非制造丑剧，这对俄罗斯有好处吗？

我的天哪！我不禁要喊叫了，难道“口哨”对俄国生活，对俄国未来，真有涉及全民的那种作用吗？把这样一些大问题直接同“口哨”联系起来，把有关俄国的疑虑，把它的产生和解决，全系于“口哨”一身，这样成吗？莫非整个俄国，整个俄国社会，全变成了口哨？不言而喻，落在所有人的后面是不利的。但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相信，俄国绝不认为把自己民众全变成吹口哨者会更有利一些。所以，你们向整个俄国社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完全是多此一举。说不定社会还没听说过有个

“口哨”。这个“口哨”弄得你们寝食不安。你们看它无处不在，因为它，你们对一切都视而不见。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提出上述的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对你们提出的见解：“俄国并没有超出任何一个斯拉夫民族”，我暂且不论。可你们提的一个问题：“俄罗斯民族算什么呢？”我却不能不谈。奇怪的是你们竟看不到俄罗斯民族。当然，坐在书房里是很难看到什么的，即便你们经纶满腹。必须环境逼着你们同人民一起生活一段，哪怕时间不长，但要直接地实际地接触，不能居高临下，不是仅仅在思想上同情他的利益。只有如此，我们才会认识人民和他的性格，明白他内心想什么，能干什么，有着怎样的愿望，包括意识到和没意识到的愿望。在了解了人民之后，我们也许就会懂得他的民族性，懂得他能够有什么作为，其中哪些一定会实现。对俄罗斯人民来说，如果不直接属于他，如果不同他共同生活一段时间，那么便很难理解他。但若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他们的性格就将在你们心中留下深刻鲜明的印象，你们再也不会不信任他们了。俄罗斯人民落后于自己的上层社会，早从改革时代① 开始便同这个上层社会分道扬镳了。从那时起，艰难的环境（这在今天已越来越好转）尤其加深了这种脱节。正因为如此，接近人民是很困难的。人民也同我们说话，也服务于我们，总在我们的周围，可是我们不了解他。不过，难道连下面的一些事实也没引起你们的注意吗？那就是广袤的俄罗斯有着一致的语言，一致的习俗，一致的观念、准则、期望，有着同等的智力水平。你们看，俄罗斯人甚至在思想上意识上的偏差，也都那么一致；这偏差既神秘有时又显得怪诞，不过总是很强烈又有着深刻的基础。不，应该说人民中

---

① 这里的“改革时代”当指彼得大帝的时代。

蕴藏着思想，而且是伟大的思想，说不定很快便会表现出来。我不理解你们的问题：俄罗斯民族算什么呢？究竟是什么意思。是说它迄今未能充分地表现自己吗？可这并不是它的过错呀！它在历史上只是表现出了抗争和自我保护的雄厚实力，如果考虑到过去一切不利的因素，那么单只这一点已经相当可贵了。即便说这个民族还没有长足的发展，也绝不可怀疑它会发展起来。至少可以肯定地说，“口哨”对它不会有任何影响，用不着担心。你们问，俄罗斯的科学在哪里？讲到科学我只想说，依我之见，科学只能在实际生活中得到发展，也就是同实际需求联系在一起，而不是通过脱离实际的一知半解，不能脱离人民本原。这就是为什么俄国至今没有自己的科学的原因。你们在这一点上说得对。但当你们问到“俄罗斯文学，俄罗斯艺术，俄罗斯思想又怎样呢?”你们可就大错特错了。俄罗斯思想已在多方面显示自己。须要的是细心观察，更直接地看待事实，少来点儿抽象议论，少来点儿闭门造车，不要把个人需求当成社会的需求，那样就可以看清许多事情。俄罗斯思想也已经开始反映于俄罗斯文学之中，而且卓有成效，以至于很难对俄罗斯文学视而不见。可你们却问：俄罗斯文学又怎样？它是从普希金肇始独立地成长的。我们只举普希金的一个特点，别的且不说。这就是他的世界性、普遍的人性、普遍的共鸣性。他汲取世界各国的文学。他在诗作中反映任何文学之前，对它已很理解，所以他人特点的精神，最深刻的奥秘都可进入他的诗作，仿佛他自己就是一个英国人、西班牙人、穆斯林，或是古代世界的人。有人会对我们说，他是个模仿者，缺乏自己的思想。可哪有这样的模仿者呀！他在任何方面都是一个 en maitre[①]。

① 法文：主宰者。

如此模仿，其实意味着自己创造，不是模仿，而是继承。这种现象在你们看来，难道真是不具独立性，无足轻重，不屑一顾吗？开天辟地以来，哪一国文学中，你们能找到这样一种善于全面理解的特点，这种对人类普遍性的证明，最重要的又是采取如此高超的艺术形式？这也许正是俄罗斯思想最主要的特点，这一思想在其他民族中间也存在，不过，只是在俄罗斯民族身上表现得最突出，而在普希金身上这一思想也有很圆满很完整的体现，不由你不相信（更不用说普希金对于我们，对于表现我们俄罗斯民族诗歌，意味着什么。莫非你们赞同杜德什金先生及其《圣彼得堡新闻》(1861 年，第 61 期）追随者的古怪见解？[①])。自普希金起，这一思想日益发展扩大。难道在你们看来，像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样的现象，对俄罗斯精神和俄罗斯思想，丝毫都没有表现吗？难道只因为有的地方有人吹口哨，你们便对一切都绝望了吗？“口哨”的有害影响好厉害呀！那让它吹去好啦。听我说，《俄国导报》，咱们私下里讲，“口哨”偶尔也还有用嘛[②]。对你们来说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这该死的“口哨”！

然而，你们弄错了！希望是有的。我们迫不及待地再往下读：

---

① 斯·谢·杜德什金（1821—1866），批评家、杂志工作者、纯艺术论者。这里指的是他的论文：《普希金——人民的诗人》(1861)。以及 Ю. А. 沃尔科夫：《文学观感》(1861)。陀思妥耶夫斯基称前者为“骇人听闻的”文字（参阅《——波夫先生与艺术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答〈俄国导报〉》(见上文）一文中曾同米·卡特科夫激烈争论过普希金问题。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早期（约在 1861—1863）的编辑工作和时评文章中，力图缓和对《现代人》，特别是对“口哨”的敌意。

> 在有利的条件下，俄语很可能在斯拉夫世界中获得伟大的前程。它能够成为团结这一世界各个分散民族的毋庸置疑的中心。而且看来历史已为实现这一使命准备好我们的语言。

谢天谢地！起码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口哨”这回不会碍事了。“口哨”不过是《现代人》上的一个小栏目，偶尔出现一次，怎么能妨碍“俄语在斯拉夫世界伟大前程”这样伟大的事业呢？

接下去《俄国导报》简单说了说今天的俄语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并且不胜感慨：

> 何年何月，这个长期而且在艰难中形成的俄语，这个负有某种伟大的世界性使命的俄语，才能在自己的文学中不辱没这一使命呢？何年何月，这个千年的孩子才能被承认是成年，才能独立地生活和思考呢？何年何月，这一语言才不再觉得自己是个随着教鞭学功课的小学生，除了吹口哨和尖叫就一无所能呢？

这是什么话呀！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是“口哨”在作祟，是谁妨碍俄罗斯和俄语的伟大前程呢？你猜是谁？是“口哨”！

我不敢相信，便读第二遍、第三遍，结果感到莫名其妙，甚至大吃一惊。是不是《俄国导报》有了什么毛病？

怎么能把整个俄语亦即整个俄罗斯文学，同一个“口哨”等量齐观呢？难道这种文学确确实实绝非儿戏地仅等于一个“口哨”吗？难道它的过去直至今天仅仅相当于“口哨”吗？这里明明白白写着，是整个俄语“觉得自己是个随着教鞭学功课的小学生”，“除了吹口哨和尖叫之外一无所能”。我不禁要

叫喊：这种文学在过去至少证明了除吹口哨和尖叫之外也还能做些什么。即便如你们所说，在今天的当代文学里除了吹口哨和尖叫再无其他，而且也不可能出现其他，那也不应该对这种语言的作用大加怀疑吧。

《俄国导报》接着说：

> 它是否能成为成熟思想与认识的工具呢？是否能成为生动表现文明的伟大需求的工具呢？它是否蕴藏着真正世界性的团结的力量和创造的力量呢？它是否准备好接受或迟或早会到来的生活考验，而不是对此措手不及呢？历史是不会等待的，时间是不会停止自己的进程的……

多么严峻而庄重的话呀！难道这一切全是由“口哨”引发出来的？难道“口哨”把《俄国导报》吓得如此厉害，以致后者瞻望未来，只看到一片恐怖在等待着它和所有的人，而起因仅仅在于《现代人》上有个小小的栏目——“口哨”！不用管它了，由“口哨”去吧！俄罗斯文学同它有何相干！说实在的，是你们自己吓坏了，气急败坏，就以为一切在毁灭，在崩塌，到了世界末日，而一切都因为存在一个“口哨”！

倒霉的不道德的“口哨”啊！倒霉就倒霉在自己的罪过上了。我对你说：你要牢牢记着，时间不等人，生活的考验一来，将使你措手不及，之后便是历史接踵而至，而历史更是不等人的！到那时你拿什么来为自己辩解呢？要知道整个俄罗斯可能就因为你而得不到发展，这一点你明白吗？这将成为你的一块心病，难道你不为此感到羞愧吗！

你看你对《俄国导报》干了些什么？

《俄国导报》于是奋起反击，做得也很好。结尾处它这样

说：

> 我们同样也不想放弃作文学界警察的责任，打算努力帮助善良的人们捕捉不务正业的流浪汉和小扒手；不过我们干这个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了事业的利益和荣誉。

很好，太好了！不过只是希望一点，让怒气早些消掉。我相信，《俄国导报》里不会有无益的和完全不成功的栏目。在新的栏目中它会对我们说出些新的有益的东西来。可怒气，怒气怎么办呢？比如上面说的“窃贼们，小扒手们……”，本可以讲得缓和些。不过，无论如何这篇文章倒完全是直率坦白的。

《Л. К. 自瓦西里岛致〈时代〉编辑部的信》[1] 附识

它开口讲话了，但不成功。我们真心地十分遗憾，它每一篇新的文学评论，越来越变得像吹口哨者。我们刚刚收到3月号的《俄国导报》，不能不承认看到它目前的状况颇感抑郁。它以昂然傲气对待我们当今可怜的期刊，把刊物骂得一文不值（见文学评论栏第21页），而且说“俄国文坛的优秀人物巴不得厌恶地躲开它们，闭门不出，让这些吹口哨者去左右局势”（这样说我们觉得也过于傲慢了）。《俄国导报》于是突然发起火来，卖劲儿地吹起口哨，愤怒地寻衅斗架。它的确出了什么问题。难道我们年轻的《时代》真能如此强烈地触痛已有五年历史[2] 的傲慢者吗？难道我们也给了它强烈的刺激吗？而我

---

① 此信作者当为批评家尼·尼·斯特拉霍夫（1828—1896）。它是针对《俄国导报》编辑部的文章《我们的语言和‘口哨’是什么》的。后者激烈地侮辱《时代》和《现代人》，斯特拉霍夫以此信回敬。《时代》（1861年，第4期）刊出此信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加此附识。

② 米·尼·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创办于1856年，至此（1861年）已有五年。

们很天真，在本刊上一期中还希望《俄国导报》能在我们评论界说出有分量的话[1]。这就叫做自尊心至上，是达到疯狂程度的自尊心；这种状态真会危及自身，而且不仅是危及自身，还可能采取我们文坛上专门形成的一切可怜但并非完全纯洁的手法，也就是说可能有意歪曲他人话语的含义；可能掀起可怜无谓的争论，只求占上风，不求有真理；可能在笑不起来的情形下，强烈地希望说句俏皮话，如此等等。总之，是会坐立不安的。不过，关于《俄国导报》我们找时间再细谈。目前，它还没恢复平静的心境，虽说已摆脱了五年来庄严宁静的沉默态度，在我国文坛上仍然只看到自己而看不见任何别人，而这个眼光是很不够的，也恐怕是不足取的。例如，我们讲到“别林斯基的伟大”时，它就龇牙讪笑，在那篇文章中便忙着讲起：有些“我们的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善于维护自己的见解，保护思想的尊严，不使见解失去积极的基础，亦即有才华和有学识的人们。接下去《俄国导报》又说：“然而他们终归是孤立的现象，他们的活动范围有限或者受到抑制，因此，他们产生的影响不足以为我们的文学、我们的社会观念定调子。”（文学评论栏，21页）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伟大的陌生人是谁呢？如果说我们这里的确有善于思考而有见地之人，他们敢于诚实大胆地捍卫自己的信念，从而赢得了人们的尊敬，那这是事实。过去和现在全都如此。不过，《俄国导报》的话里，似乎暗示着一位特殊的伟大的陌生人[2]。前不久，大约两个月之前，有一期《圣彼得堡新闻》也讲到有一位伟大的陌生人，并

① 见本卷中《‘口哨’与〈俄国导报〉》。
② 指《俄国导报》的出版者米·卡特科夫。

拿他同帕默斯顿勋爵[1] 相比较，说帕默斯顿勋爵虽然遭人嘘叫和嘲笑，终归得到了奖赏，而一位伟大的圣彼得堡陌生人却没能得到奖励。不过我们肯定地知道，《圣彼得堡新闻》指的是圣彼得堡的一个陌生人[2]，而不是莫斯科的陌生人。因此，我们强烈地感到《俄国导报》虽与《圣彼得堡新闻》思想上合拍，但它现在指的是另一个陌生人，是一个伟大的莫斯科人。从这一切可以看出，《俄国导报》正处于不冷静的状态中。我们等它冷静下来，再对它做出答复。

---

① 亨利·帕默斯顿（1784—1865），英国勋爵（子爵），曾任英国首相。

② 指《祖国纪事》的出版者安·亚·克拉耶夫斯基。

答《俄国导报》

首先我们决定作一番自白，对此，《俄国导报》也许会感到惊讶。事情是这样的：就在我们的刊物出版前一天，我们收到了《俄国导报》。读了上面针对我们的那篇凶狠文章，我们连忙写了篇短文登在我们刊物的杂俎栏里[①]。在短文中我们告诉读者，《俄国导报》如今火冒三丈，毫无冷静可言，完全失去了自制力。我们表示，待它安静下来稍稍清醒之后再作回答。这篇短文写得口气激烈，态度傲慢，这一点我们承认。几天之后我们就后悔了，因为发觉自己也失去理智。即使我们不同意论敌的见解，也应该尊重任何诚实严肃的看法，不管这是怎样的看法。《俄国导报》可能因我们的言辞感到屈辱，再说我们在读者面前也显得不善于争论，不会以尊严的方式捍卫自己的见解。倘如《俄国导报》相信我们的话，那它当然会对我们的自白感到惊讶。

不过我们认定，它非但不会相信我们的话，甚至也不可能相信我们的话。这种追悔无论如何在它看来是可笑而荒唐的。我们决定致歉，但不打算推迟对这篇文章的回答，于是又重读

---

① 指本卷中《Л. К. 自瓦西里岛致〈时代〉编辑部的信》附识。

了一遍。

令我们不胜惊讶的是，当我们冷静地再次读它时，愤怒之情反倒有增无减。我们觉得这篇文章不仅极端凶狠傲慢，而且是《俄国导报》方面的一个恶劣的行为。此外，我们又看到，这文章是如此无礼，如此小器而无容人之量，如此不尊重他人人格，相比之下我们先前的短文未免太温和了。起码我们已不再责备自己，不再把自己受屈辱之情说成是对论敌文章见解的激愤不平了。这其实是那文章倾向所引起的极其自然的愤懑，并非什么自私的感情。因此，我们不但不想否定我们的短文，甚至想为它补充证据，且要以此在公众面前表白我们并不傲慢。

首先，必须说明白整个事情的起因。《时代》第3期登了我们一篇幽默文章，题目是《'口哨'与〈俄国导报〉》。对此《俄国导报》深感屈辱。于是怒不可遏，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否则，它不会写这篇愤怒而又特别冗长的文章来攻击我们。它沉默了五年，如今才刚发现自己的敌人，这当然是出于对论敌的蔑视。我们在自己的短文中斗胆表示惊讶，说《俄国导报》过于看重了《现代人》上的"口哨"栏的意义，以致因此为整个俄国的未来担忧。试问对该刊这样的夸张怎能不觉得可笑呢，而且最滑稽的是夸张起因于自尊心受挫。《俄国导报》的这一不当之举，是以最幼稚的方式反映了它的最幼稚的自尊心。它在一种自满的幻觉中，把自己抬得太高，以至于不由自主地下意识地想象论敌十分强大，大概觉得《俄国导报》的敌人不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比如，要给戴金顶[①] 的清朝高官凑一局纸牌游戏，总得找与高官相匹配的牌友才行。如今《俄国

① 清代官品以帽上珠色质为别，谓之顶戴，亦称顶子。有红宝石、珊瑚、青金石、水晶、金之别，其制始于雍正四年。

导报》矢口否认，想让我们相信是我们夸大和歪曲了它那篇论“口哨”的文章的含义，似乎它没有借“口哨”题目来以世界历史吓唬我们。或许《俄国导报》讲的是真话，确实难以想象自命不凡会达到如此荒唐的程度，而且有如此充分的艺术表现。因此，我们现在愿意相信《俄国导报》的解释，这话是完全真诚的。可是您读读它的文章看（今年第 2 期），那里白纸黑字，印的正是逐字从我们的《‘口哨’与〈俄国导报〉》一文中引述的，这可以核对，事实俱在。为了揪住我们狠狠一击，《俄国导报》认为是我们对它的文章不满，所以把它针对《现代人》上“口哨”栏的抨击揽到了自己头上。我们要告诉尊敬的杂志：我们没有把任何东西揽到自己头上，那篇文章中没有任何哪怕是隐约的暗示，说是针对我们而发。就算是我们在自己刊物上开辟了名为“口哨”的栏目，我们仍要告诉可敬却敌视我们的杂志：那我们也不会为了别人攻击我们的“口哨”而生气不满。我们写出自己那篇文章，纯粹是从旁观察一位气势汹汹的文学界斗士。他早自年初便庄严地鼓吹说：他在“前进，前进！你们关注吧，颤抖吧，降服吧！”可他突然在一个平平常常的“口哨”身上摔了一跤。

促使我们撰文的还有一个原因，在这里也谈一谈吧。

事情是这样的，你们《俄国导报》一直在讲礼貌，以巨大篇幅向我们讲授明智的办法，可事情一触及到你们自己，便不能自制而火气十足，连最微小的矛盾也不能容忍。五年里你们保持了大度的沉默，虽说偶尔也恨得咬牙切齿，后来一下子爆发出来。起初你们想摆出一副高姿态，以蔑视眼光看待相互对骂的杂志，但后来忍不住自己也投入了对骂，而且骂得更凶。这类詈骂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可我们对你们完全是另一种期望，这一点我们要真心实意地承认。五年前我们自己是怀着欣

喜和希望来欢迎你们杂志的。你们不是对我们说，我们似乎嘲笑格罗梅卡先生[1]，想把他的名字变成取笑的绰号。我们曾经说过，当读格罗梅卡先生文章时，我们是怀着希望而且十分快意的。这个话我们讲得是千真万确的。我们还要保证，现在讲这个话也是出自真心的。那时整个俄国都突然热烈谈起了新事和新问题，人们感到很新鲜。仿佛大家一下子都弄明白了什么，看到了某种新东西，猛醒后大为振奋，变得年轻了。啊，当时欢迎你们，我们是寄予多大期望啊！这个时刻我还记忆犹新！对你们杂志也该说句公道话，其实即使到今天就它的某些栏目说依然是我国最优秀的杂志之一。随着时光的流逝，它的倾向却越来越不为我们喜欢。它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某种闭目塞听的自我欣赏，某种毫无节制的扬扬自得，渴望别人的赞扬和崇拜。我们已说过一次，你们杂志有点儿帕默斯顿和加富尔[2]的味道。说有加富尔味道，不意味着就是加富尔。我们只是用这个名字表示这种浅薄的自我陶醉，这种傲气，这种目中无人的自大，孩子般的任性。比如说我们觉得你们过分陶醉于自己杂志上优秀的政治栏取得的成功，以至于幻想自己正身临其境，生活在甜蜜的想象之中，满意得别无他求，甚至准备拒绝一切更好的东西。为什么我们称你们为加富尔呢？当然我们难以做出完全的回答，做不到这一点。无论对什么美好的期望，你们只是大度地一笑置之，最后把不同意你们的人一律称为毛孩子、饶舌家。可同时你们又利用一切机会宣扬要尊重他人意见，只要这是诚实的见解，如此等等。由于居高临下，你们竟

① 斯·斯·格罗梅卡（1823—1877），俄国批评家。

② 这里是以帕默斯顿（英首相）表示傲慢，以加富尔（意大利首相）表示自满。

不愿承认“饶舌家”和“毛孩子”也能有自己诚实的见解。不管多么鸡毛蒜皮的事，只要涉及到你们，在你们看来便成了重大事件、历史事件。你们气恼地妒忌别林斯基，多次影射他无知和饶舌，不久前甚至还对一首企图鞭笞别林斯基（自然是用题词这根鞭子）的小诗大为欣赏①。不过，主要是我们盼着你们拿出点儿新东西，结果却落了空，等到的只是长期抑制后突然爆发出来的怨气和怒火，尽情宣泄，无以复加。你们愤怒之下会对我们说：“对这一切，你们拿出证据来呀！”我们则要回答：“你们把我们的文章读完，也许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对你们产生这样的看法。”至少我们想完全开诚布公。

你们非常不喜欢口哨，当然，谁又能因此责备你们呢？你们认为吹口哨是可耻的最差劲的事，可你们错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口哨”对你们甚至还很有益。至少我们发现“口哨”里还多些思想，胜似别的道德说教，也胜似你们的火气。不过，火气上来时，你们偶尔也打算模仿它，只是盛怒之下无法老老实实地笑，结果你们弄得不像样子。我们对《现代人》的吹口哨的倾向，绝无迷恋之意。它的口哨声有时过于轻率，甚至十分偏激，至少我们感觉是如此。尽管这样，我们认为在许多方面它是有益的。依我们看来，“口哨”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文学中一种正常现象。它不愿意拿一些小故事、各种有趣的梦想来自我安慰。对活动家它要求应有活动，而不是糊里糊涂

① 米·卡特科夫在《俄国导报》（1861 年，第 3 期）发表的《我们的语言，‘口哨’是什么》一文中，激烈抨击《时代》上文学评论的观点，并讥讽地称“伟大的别林斯基。”又有传记作家 M. H. 隆吉诺夫（1823—1875）在《俄国导报》（1861 年，第 6 期）著文，利用诗人彼·安·维亚泽姆斯基公爵（1792—1878）一首小诗贬低别林斯基的思想。

地扬扬自得。它愿意无论什么事都实话实说，不把大雁当做夜莺。比方说，“吹口哨者”不会满足于自己参与文学为文坛增光。他们看到不可能对每件事都实话实说，有时便要靠吹吹口哨，也就是对扬扬自得的空谈家取笑一番，讥刺那些轻易自我满足的人，那些咬文嚼字的俗人，那些文坛的追名逐利之徒，如此等等。即便他们有时看法不对，走过了头，匆忙下结论，不够稳重。但他们的想法并不错，在我国文学中是新的思想，这是我们的第欧根尼之桶①，他们在里面相当坚定和独立。也许我们过分夸大和美化了这种讥笑的意义，不过倘若在这里我们说错了，那我们也会非常懊悔的……

当然，我们也理解你们的想法，因为你们看到自己周围一片混乱，于是就想能找到一个什么支柱。你们希望让自己安下心来，弄明白该找个什么支柱。你们要求脚下应有可以立足的土壤，我们在这一点上对你们实在太同情了。然而如果你们责备别人走极端，太出格，混乱不堪，那你们自己同样出了格嘛。你们打算创作点儿东西，塑造点儿东西，甚至不顾使用的材料不可靠不顶事。你们想不厌其烦地说服我们，甚而说服自己：你们那材料是顶用的。其实你们没有看到，这纯是幻想；你们没有看到，虽然想塑造什么却造不出来。你们没发觉，为了维护自己的思想，你们甚至不惜牺牲真理，不惜牺牲自己的信念，还给自己树立起偶像来。你们的东西，不由自主地显得有点儿书卷气，没有活力。你们在探寻生活，可是你们既看不到希望，也没有青春活力，再加上你们的冥顽固执。比如，你们绝不能原谅一切沉迷的人，一切有过错的人，对他们侧目而

① 古希腊哲人第欧根尼（约公元前404—约前323），主张知足安贫，住在小桶里。此处用来形容吹口哨者的社会文学立场。

视。轻蔑之极，你们便把他们全视为毛头小子和空谈家。你们甚至不肯相信，就在这些空谈家心里有时也会出现正当的见解，非常正当的信念。你们这种态度太蛮横了，甚至可说有些卑劣。你们只喜欢毫无过失的人，而毫无过失的人在你们看来只有你们自己。你们害怕犯错误，你们易于生气动怒，这似乎表现出了某种老态。现在回来谈正事。

大家都知道年初我国文坛上出现的一个问题，那是由所谓"《世纪》的无理行为"侮辱了一位女士所引发的①。这个问题终于使大家全都厌倦了，如今在刊物上怕再谈起它，各家杂志甚至准备以介入此事为由互相羞辱。我们要坦率承认，我们也曾热衷于此，还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编辑部写的，另一篇是外界给我们提供的。《俄国导报》就视此为我们莫大的耻辱。的确，我们表现得缺乏文学上的灵活性，过分激动了，但我们并不觉得这里有什么特别可耻的地方。我们不过想替受到严重侮辱的妇女说句话，表示并非整个文坛完全同意侮辱者的看法。我们要对一切不满我们过分激烈的人们，也对《俄国导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如果你们当着家人和公众的面受到侮辱，又会作何感想？大概那时你们就不会觉得揭露侮辱者的信写得太长了。不过，请读者们放心，现在我们绝不想再涉及这个问题。可是《俄国导报》（谈论这个问题的最后一个）就此发表了出人意料的见解，令人不能不重提此事，讲了上面的话。他在这里显露了自己真正的宗旨，显露了自家的面目。因此，老问题现在全然有了另一种意义。事情是这样的，当问题仅限于毛头小子和空谈家之间时，《俄国导报》傲然沉默，只是讪笑而已。等事情发展到可笑的地步，他才决定介

① 参阅本卷前面的《诚恳的典范》一文。

人，要说出最终的断然的英明的见解，一下子解决所有的疑问。不言而喻，他的愤怒和鞭笞首先指向我们。我们得真诚地承认，他这事干得异常巧妙。他在这里甚至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讲究实际，不同寻常的理解现实。他为此采用了一个老办法，老得像整个世界；此外又是非常庸俗甚至不很体面的办法，同时却也是非常有利的办法，当然这有利可图是对那种不择手段的人而言。不是说任何道路只要能达到目的都是好的嘛，这话是当代某位务实的哲人[1] 说的。《俄国导报》一开头就宣称我们是“解放者”，而后用这个绰号来挑逗、取笑我们。这办法很巧妙，可以向大多数人献媚，求得他们对自己的欢心，再依靠他们压倒对手。手段原来就是这样。自古以来在任何社会中，都有大多数人在维护他们认为不可动摇和固定不变的东西。他们之所以喜欢这种不可动摇性和固定不变性，主要原因是符合他们当前的物质利益，虽然时常不利于其他许许多多的同胞。在他们看来，整个世界全烧光了也无所谓，只要他们过得好就行。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为自己规定道德和其他规范，通常是利用原先正确的思想，却根据一己私利加以篡改，致使原先的本质连影子都不见了。很自然，这个多数人对任何一点关于进步的暗示，对无论来自何方的新事物，都是恨之入骨。这不过也是正常现象，是出于自我保全的需要。与社会上这个大多数同在的，总还有少数人，他们看到多数人的停滞不前，迟钝而又气恼，看到他们不懂得如何对自己有利，看到他们歪曲一切自然而正确的思想以迎合粗浅的利益，最主要

① 这里指的当是法国外交家塔列兰（1754—1838）。他是没有原则的政客，为了权力和金钱他可以为任何政府、任何政治服务。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以塔列兰比阿·亚·克拉耶夫斯基，以及米·卡特科夫。

是看到那些歪曲者、奉迎者和大众的诱惑者（他们几乎总是从个人私利出发），内心很是败兴。与整个社会的停滞相反，在少数人身上潜藏着进步的生命力。这两个方面各自都是合乎规律的现象，甚至是相互需要的。不过它们之间的敌视和斗争却是从不间断。在这两个阵营里，几乎总都有一些诚实和道德高尚的人。在少数人当中偶然还会有天才，此外总有正派、耿直之人，决心牺牲一切为社会造福，顽强地忍受一切可能的迫害。但与他们一起，还会有毛头小子和空谈家。这些人忙忙碌碌地跑在前面，宣扬新思想走到了极端，却只能平庸而毛糙地抓到新思想的一些皮毛。正是这种皮毛对任何新思想来说都最为有害，本来就敌视新思想的多数人，仅看到皮毛，于是新思想在他们眼里便庸俗不堪了。这种空谈家普遍存在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民族；而他们的存在，同样是符合某种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的。可是，无论他们如何可笑，其中却有很多诚实高尚、忠于事业的人。总的说来，人群中诚实高尚的要多于坏蛋。目光敏锐的人，不会根据这些空谈家的行为来判断社会精英在少数人中间传播的某种新的先进思想是否可靠，是否正确。不过那些为私利而向大多数献媚的人，会立刻抓住空谈家可笑的一面，向所有想听信他们的人指出并议论这可笑的方面，这用不着费什么脑子，需要的只是会取笑人，有时还得说点儿瞎话，也就马到成功了。瞎话是非说不可的。举例来说，发明了避雷针，城里人全都惊惶不安：这怎么成呀？这不是反对上帝安排的命运吗？这不是逃避上苍的愤怒吗？这不是要消除闪电吗？这不是要驾驭雷鸣吗？要知道那会成为新的巴比伦塔，那样做是不道德的，是违反教义的；那是同老天爷作对，会遭到天谴。把发明者关到牢里！审判他，绞死他！于是便出现一些帮凶。“这家伙想抓住闪电的尾巴，哈——哈——

哈！”大家都跟着笑起来。从此发明者在城里就寸步难行了。诽谤、歪曲某一思想，对之粗暴地取笑，这便是一切取悦多数人的主要手段。比如乔治·桑写作长篇小说来维护妇女。还等什么呢？应该马上宣称，她要求取消婚姻而允许女人公开地淫乱。需要多多地尽情地取笑她，使她漫画化，越粗鲁越好，那样人们就会更多地耻笑她。我还记得当时我们这儿把乔治·桑叫成叶戈尔·桑，把巴尔贝称为糊涂虫①。这类俏皮话，当时可赢得不少笑声。对那些“善于解开生活之谜”的人来说，如此取笑别人是很巧妙又很有利的做法。他们甚至能够影响到不了解情况的正派人，连非常诚实的人听到种种瞎话和讥笑，也没有兴致去打听事情的原委了。

这个办法，法杰伊·布尔加林② 及其同伙就经常采用。我也记得，在我们的剧院里，人们取笑进步，取笑当时的现代思想。那时我看过一出小喜剧，讲一个可敬的六品文官要把女儿嫁给军官。可想而知，这位文官的美德是难以估量的，再说他又不停地用手帕擦眼，哭个不止。军官呢，就不断碰得马刺脆响，浑身简直是完满的象征。

最后，文官之女作为待嫁闺媛应该体现出处女纯真的化身。可是求婚者中向她伸出手来的，却是惹人耻笑的某个维萨里昂·维赫利亚耶夫。维萨里昂这名字，显然是影射当时文学界的一个人物③。按创作意图，这个维萨里昂应代表一种最新

① 当时有的作家以诙谐或讽刺口吻将外国人名“俄国化”，戏称法国女作家乔治·桑（1804—1876）为叶戈尔·桑；利用俄语中的谐音，把法国革命家巴尔贝（1809—1870）改称为糊涂虫。

② 法杰伊·布尔加林（1789—1859），俄国作家，反动报纸《北方蜜蜂》的主编之一。

③ 维萨里昂是批评家别林斯基的名字。在 1830—1840 年代，别林斯基的思想和说话风格不止一次地在剧院舞台上受到嘲笑。

思潮。可惜我不记得剧情了。倒霉的维萨里昂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惹得观众捧腹大笑。他口若悬河，却前言不搭后语，讲什么解放、进步、蒙昧主义，尽用一些还未为俄语吸收的外来语。他的讲解不清不楚，糊里糊涂，一句话完全像是大发宏论。剧的结尾，据我记忆，他开始偷人们口袋里的手帕，被人抓住脖领摇晃，拧他的鼻子。这时一个军官表现得尤其突出，劈头盖脸，浑身无一处不打，招得楼座看客笑破肚皮。自然，维萨里昂偷的手帕越多，六品文官的尊贵高尚也就越明显。这种唾弃、讥笑甚至扇耳光的办法真是妙极了。最主要的是它极其方便又极其有利。马上可以招来一群人，大家把罪犯围起来，有的朝他吐舌头，有的冲着他单腿跳舞，有的挥拳头大叫："好个解放者！看呀，解放者来了！他想讨女性的欢心！你看他身上喷了多少香水！这个勾引人的家伙、大骗子、解放者！"《俄国导报》对我们，就使用了这种稳妥而又方便的方法，把我们也称做解放者，企图一下子打晕，让一切善良的人们觉得我们最可憎最糟糕。他叫我们是解放者，根本毫无理由。如果说我们不认同这个名称，那完全不是因为我们害怕这个称呼，而是因为我们的杂志还没来得及就这个问题发表见解。在有关前述问题的两篇文章里，我们同样没有表示对解放的见解。《俄国导报》只是觉得捉弄人的老办法很奇巧，就拿来要击败我们。不过，《俄国导报》说我们参与解放之事，是不是因为我们认同：小仲马小说和法国喜剧里确有许多猥亵、下流、粗暴歪曲的东西，而阅读或观看这类东西比听《埃及之夜》要更为危险呢？最后，是不是因为我们认为年轻姑娘同好色富翁结婚是不道德的；是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这种以伦理与顺从为名的出卖肉体，至少同任何其他的出卖肉体都同样是不道德的，是可耻的。当然，在这种事上有罪的常常不是可怜的牺

牲品，而是戕害她的刽子手。总之，《俄国导报》是因为我们持有上述见解，便称我们是解放者，并以此当众羞辱我们吗？那么，最后请问，你们说的解放是指什么呢？进行这种争论，先得商定，相互同意一些基本的看法，而后才能达到互相理解。如果你们把解放理解为任何女人只要一有机会就有权给自己的丈夫戴绿帽子，那你们对这种解放恨之入骨自然是有道理的。不过我们可从没有这么理解解放一词。别人爱怎么理解，随他们的便。但对我们来说，解放的全部意义就归结为基督教的博爱，归结为培养自己能互相关爱，女性同样有权要求这种关爱。我们的看法是，整个的解放问题就归结于一个极平常又无时不在的问题，亦即进步与发展的问题。一个社会发展得越是正规，它就越正常，越接近人道主义的理想。那时我们对女性的态度就会自然形成，不需要任何预想的方案和乌托邦。尽管如此，研究这个问题，告诉社会对女性必须采取更加仁爱的态度，甚至在理论上树立这种态度（虽然有时做得不对），这些在我们看来都是非常有益的。即便发生了错误，错误终究不能算是谎言。解放者至少是受了仁爱原则的激励，他们是值得同情和尊敬的。要是一个书呆子，坐在自己办公室里等待发展、进步、人道主义等现成地从天上掉下来，不需要历史的生活，不需要作什么努力，没有强烈追求也不犯什么错误（而这些正是他们盲目地粗暴地加以蔑视的东西），这在我们看来无疑是个冷漠的懒汉，失去了常理的判断力。以上就是我们对“解放”一词的理解，同时我们认为如今终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妇女也能有权要求得到尊重，同男人有平等的权利，至少在道德上是如此。

妇女的权利！“谁夺走了这些权利呢？”《俄国导报》惊讶地问，接着大发议论，说恰恰是在我国，妇女作为公民丝毫不比

男人逊色，并不需要照顾，是完全独立的，如此等等。一句话，它依据的是法律。可是，《俄国导报》，你们听着，难道你们真想使我们相信，你们讲这种法律依据是认真的，而不是说给大众听的吗？难道你们以为我们会相信你们讲这些话时自己是当真的吗？你们所希望的只不过是得到大众的认同，只求在争论中占上风，并不是为了真理。你们仅仅希望大众叫喊："看，真是好样的！一下子击败了对手，拿法律作证据，简直是位律师！就该这么对付他们！"你们要的不正是这种意见、这种喊声吗？可是你们在欺骗谁呀？难道问题在于法律吗？问题是说我们在家庭中的权利，是说我们的习俗，我们公认的准则和信仰。你们读过《家庭纪事》[①] 吗？你们还记得吗，巴戈罗夫的妻子成年在脑门儿上贴块药膏。你们会大笑："哈——哈——哈！这可是八十年前的事了。如今人们不再殴打妇女了。"是的，你们说的完全正确。是我们弄错了，因为如今没人再殴打妇女。你们又惊叹道："当然，我们这里没有女骑士团和女士区，不过妇女真的需要这些东西吗？"棒极了！就连法杰伊·布尔加林也未必说得更好。你们看，多么成功呀！周围大叫："哈——哈——哈！女骑士团和女士区！哈——哈——哈！《俄国导报》是好样的，真能琢磨呀！"我们则回答："不，我们这里女人并不要求参加女骑士团、女士区。现在谈的根本不是这个问题。妇女能够也有权要求的，是针对她的错事，不要在报上公布没有任何根据和事实的消息来羞辱她，说什么这个妇女一定有自己肮脏的隐私。"

① 是俄国作家谢·季·阿克萨科夫（1791—1859）的小说，写18世纪后半叶宗法制地主庄园生活。斯杰潘·巴戈罗夫是小说中一个宗法制家庭的专横的家长。

“骑士时代为有教养的社会规定了男人对女人的态度，细致得达到了理想的程度。”——《俄国导报》继续说。我们倒想给他讲一个很短的趣闻。我们在最近一期杂志上详细记述了拉法热太太的著名案件①。我们认为她被控毒死丈夫是完全不公正的。法庭在分析和讨论拉法热太太对她死去的丈夫的关系时，发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拉法热先生结婚后带妻子返回庄园，这是婚后几天的事。途中在一个车站上，太太要洗澡。等她坐进浴缸后，丈夫开始敲门，一定要她把门打开。妻子在上栓的屋里说正在洗澡，不能见他，但丈夫仍坚持让他进去。法官、裁判官和听众则决定，拉法热先生既是丈夫，就完全有权要求让他进去。我们不打算对这则趣闻再加任何的解释。你们会说，这只是个别事例。我们说，不错。可是法官、裁判和所有听众的决定却不能算作个别的事例。相反，这是多数人习俗的充分表现，而这又是在欧洲最文明的一个民族中间，在那里“骑士时代规定了男人对女人的态度，细致得达到了理想的程度。”如此等等。好个骑士时代！你们是在骗谁呀？不过，也许《俄国导报》也认同欧洲这一最文明民族中大多数人的意见，觉得拉法热先生作为丈夫有权要求让他进去。起码它是给妇女问题狠狠抽了一鞭：“她还要求什么权利呢?!”

这句“还要求什么权利……”，足够已故的法杰伊·布尔加林写一篇辛辣的周末小品了②。多么奇巧动听呀！

“女人能想要什么呢?”《俄国导报》依然巧妙地问。“莫非她真想在一切方面如男人自认的一样得到解放吗？况且男人认

① 拉法热是法国人，拉法热太太毒死丈夫一案发生在1840年。
② 法·布尔加林（1789—1859）在《北方蜜蜂》（日报）周六报纸上常发表讽刺小品。

为自己在一切方面都得以解放，这是好事情吗？女人难道愿意在一切方面都同男人比肩吗？如果愿意，那有什么东西会妨碍她使用同样的权利呢？确实，有难以胜数的女性过去和现在都使用这些权利，却从没听说什么解放，也不懂关于解放的什么特殊道理！为此并不需要受教育，不需要智力与精神的发展，这是天赋，与生俱来。只有当人的精神素养较高时，责任感在心里扎了根，无论是男人或女人才能逃脱这种白送的人人可得的解放。"

哎呀，你们真的在愚弄我们吗？我们关注的正是精神的高度发展，使责任感自由地在男人和女人的心灵里扎根。我们恰好深信，只有如此才会充分地、正确地、人道地、清晰地明确男女之间的相互关系，消除一切困惑；我们正想全心全意，竭尽自己绵薄之力，促进这种精神的发展。

"不过，这并非是什么解放呀！"《俄国导报》会这么说。

"随便怎么叫都可以，"我们回答说，"我们的理解就是上面解释的那样，也就是说这是精神高度发展的结果……"

事实上，《俄国导报》惯用这种伎俩，它假装相信谁也不懂得它要讲的东西。于是突然上起课来，发出各种教训，而且情动于中，不由得滔滔不绝地演说起来。其实这些东西大家早已知道。人们想，大概他就喜欢这个演讲过程，喜欢教训人和夸夸其谈。但再想一想就会明白，它是另有意图。"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们都不懂。我比一切人都聪明，你们听我的吧！"自然，这一切都是做给大众看的，做给多数人看的……

接下去的一页《俄国导报》，逻辑混乱得出奇，我们读来不知如何是好。这里可谓一字千金。我们不能不把它抄录下来。

"……无论如何，我们可设想一下，——《俄国导报》

说，——一个妇女解放到了与男人同样的程度。她拥有同男性完全相等的地位，由此也就放弃了女性地位所具有的一切特点。她再不能期望也不能要求得到男性的特别尊重，以及妇女在自己地位上应得的客气礼遇。妇女的地位本是至高而具特权的地位，谁也不能异议，大家反而都很珍视，都在保护着，不让解放者的脏手染指女性……”

我们要指出，例如你们为亲属欺侮妇女的行为辩解，就是维护妇女吧。先不说这个，最重要的是，你们当真以为现在为妇女该做的事已经全做了，再不需做任何事，绝对不需要了。甚至连任何愿望也不必要有，甚至我们上文提到的习俗同样不需改得文明些人道些。这就是说，一切如意，一切极好，一切都芳香扑鼻。能够认为你们《俄国导报》相信自己的话是真的吗？能够认为这不是你们的谎言吗？能够认为你们不是要以此取悦公众的直觉，使公众站到自己方面来吗？对解放主义者的忘乎所以，是可以取笑的。然而，要是拒绝最合乎情理的愿望，拒绝发展，拒绝合理的完美以便获得真理和关爱，那可就走得太远了。可你们正是通过自己的话，拒绝了这一切。你们用自己的话描绘出我们现今社会是如此高度的发达，以至于在你们看来是不能指望更好的了。

最后再请问：一位妇女如果在社会地位上真的赶上了男子，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为什么她就不能再要求男性像现在这样给予她特别的尊重，特别的客气礼遇呢？

你们接下去说：“解放主义者不懂得，他们的学说不会给妇女任何新的权利，而只会导致取消男人对妇女承担的义务。”

我们再次要问，你们所说的“解放”一词，指的是什么？你们如何理解它的含义？看来，你们把它理解成了妖魔鬼怪，由此自然要引出奇怪的结论。我们不是解放主义者，但我们仍

要说句公道话：他们多半比你们想象的要远为聪明、理智、仁爱。你们大概以为“解放”一词意味着一大堆最可怕、最反常、最不可取的规矩，它们使公众感到恐惧，而这正中你们的下怀。我们相信，解放主义者也会在许多方面犯错误，恐怕已经在犯错误。第一因为他们也是人，不过我们仍要问，男女社会地位相等的情况下，何以男人便解除了对妇女的义务，甚至如你们所说不需要再尊重妇女，不需要客气的礼遇呢？如果一个妇女获得了同我一样的权利，按你们的说法我便立即有权侮辱她吗？为什么是这样呢？如果她值得尊敬，我干吗不尊敬她？为什么男人不该像对妻子那样去保护她爱她，如果她爱这男人，并尽到了对这男人的责任？也许你们要强调的，正是在解放的条件下将不再会有义务。但这种情况几时会发生呢？你们这不是在愚弄和吓唬公众吗？婚姻是大自然创立的，因为婚姻是大自然的法则，倘如你们稍许还有点儿相信社会的进步，你们就不应该怀疑人与人之间（不论是男人对妇女，或是妇女对男人）那种自然的相互的义务，有朝一日是否会消失掉。倒是另有一些义务和习俗，不是自然就有而是人们错误地、笨拙地、糊涂地臆想出来的东西，这些却有可能被消灭掉，而且已在一天天地消失。历史不正是这样一幅图景吗，这些东西正在销声匿迹，而人类正逐渐接近合理的自然的正常的义务……你们是懂得历史的呀，你们是常常谈历史的。

你们在愚弄我们！哎呀，你们在耍滑头！

“男性既然是一切方面具有充分权利的人，同他是不讲客气的，”《俄国导报》继续写道：“假使妇女也应该成为一切方面具有充分权利之人，为什么要同她讲客气呢？”

简直是奇谈怪论！你们说的“讲客气”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指的是中国式的某些礼貌，那现在已经不少了，甚至在男人

之间也很多。但如果你们讲的“不客气”是威胁妇女，施以侮辱、粗鲁、不恭、撕拧、踢打、骂脏话和诽谤，那么你们凭什么一口咬定这些东西是不可避免的呢？要知道一个正派人如今总是要求自己尊重人，而不是打人。什么叫同男人“是不讲客气的”？莫名其妙！像是小孩子威胁人的话！

“谁要想离开义务思想（绕开它）建立人际关系，谁要仰仗（何必卖弄词藻呢！）别的什么而不是这一思想，那他一定会把人与人的相互尊敬以及妇女的尊严一类话，当成一堆废品抛到一边。”

我们不禁要说，有什么必要如此夸夸其谈！再说，谁想离开义务思想建立人际关系呢？可有什么人这么干过或这么想过？哪怕举出一个名字也好……至于这个义务指的是什么，这一点人们倒是在探索，自古以来一直想解决；现在和将来，直到世界末日，看来都得研究。不过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好哇，你们在吓唬人！

“确实如此，”《俄国导报》接着说。“谁在人身上看到的只是化学里的碱、酸和盐，一如我们在蒸馏瓶里见到的，那他一定不会讲什么人的权利、人的用处、改善人的生活，等等；他望一眼自己的观点相同的朋友，只是会心一笑；他不再毫无意义地动怒，不再炫示激情，而这激情也不过是愚弄人的招摇撞骗罢了；他不再会关注这些微不足道的蜉蝣，而是让生活听任强大环境的摆布。的确，当我们有意无意用脚踩着蠕虫的时候，我们难道会关怀它们并严肃地自问：它们是饥是饱呢……”

真是口若悬河呀！

我向你们保证，我这个文章作者，绝不认为也绝不相信自己整个是由蒸馏瓶里出来的。我无法相信这一点。但即便我相信是这样，我为什么不可以讲讲人的权利、人的用处，讲讲如

何改善人的生活呢？我为什么要对观点相同者会心微笑呢？为什么让生活听由摆布呢？单从机械的需求出发，人们只要想存在就得相互协商、达成一致，结果相互间便以义务相约束。这就是义务，因之也就是生活中的目的。没有这个，社会便不可思议。不论持什么信仰，他们总归是人，不可能把自己的本性也扼杀掉。自我保护的精神在他们身上是必定有的。此外，人既是人，一定感到需要爱自己的亲人，需要为亲人做出自我牺牲。因为爱不能离开自我牺牲，而爱心——我们再重复一遍——是不会被消灭的。要消灭爱心，人就得仇视自己的本性。你们能相信有这种事吗？至少这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像你们那样，要一下子解决，是不可能的。这是：

> 你们无法解决的问题！①

可你们解决起来是那么从容，那么庄严，光是这一点就值得怀疑……

例如你们也谈论起人道主义，谈论起成长，可你们是维护凌辱他人者，反对被欺凌者。你们是那么想为他辩护，以致不顾事实，睁着眼睛说谎，还觉得无所谓。你们直截了当地说："他没有瞎编事实，没有把什么低级诽谤当做真事来说。"你们这样说时镇定从容，尽管明知是在说谎。他没有瞎编低级的诽谤！那么，关于隐私的暗示呢？在你们眼里，这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暗示白纸黑字印了出来，你们难道是小孩子，看不出这是什么，叫不出它的名字来？

---

① 引自普希金《致俄国的诽谤者》(1831)一诗。

《俄国导报》还讲了许多别的，但我们最喜欢的是他论普希金的见解。

这里说的正是《埃及之夜》。在这之前关于普希金他已说了不少独到的见解。不过我们不准备在这里分析他的最终的意见。我们说最终的意见，是因为他讲这些的目的，是要最终地不容反驳地解决完由于我国文坛上出现杜德什金先生“不朽”文章引发的关于普希金的整个问题[①]。我们准备另写文章回答所有这些意见，这一点我们在创刊之初已经做过许诺了。只是我们不能不就《俄国导报》关于《埃及之夜》的见解，略谈几句。从这一见解中，我们鲜明地看到了《俄国导报》理解诗歌的能力。请看，他把《埃及之夜》称做“片段”[②] 而看不到它的完整性，事实上这是我国诗歌中最完整、最具整体性的作品。他说：“这只是一种暗示，一个情节，几个迷人的和音，从其中能模模糊糊感到些什么，却还没揭示出来（!）让人充分地明晰地直观的东西……”

杂志接着说：“需要有许多的条件，才能在优美诗句和动人形象之外，捕捉到这个短小作品内在意蕴的暗示。倘若诗人能把这作品整个写完，这种内在意蕴当能在诗中展现，让大家得以领会。在艺术创造中，的确很难抗拒细小的诱惑，不过首先要使整体的立意能把握住一切局部，并给局部注入灵魂。那以珍贵的人作牺牲上供的恶魔式的祭祀，那陶醉于自己权力的

---

① 在《我们的语言和〈口哨〉是什么》一文中，卡特科夫认为普希金创作囿于一时一地，不足传之久远，不具世界的意义。斯·谢·杜德什金文章《普希金——人民诗人》（《祖国纪事》，1860年，第4期），表达了相似的见解。这便提出了总体上如何评价普希金的整个问题。

② 《埃及之夜》是未完成的小说。

魅力而将头垂向酒杯的女王，那呼唤地下神祇为自己誓言作证的克莉奥佩特拉①，所有这些有血有肉的十分迷人的细节，本来可以向人们启示一个未曾见过的遥远而阴森可怖的世界。那样一来，整体的主旨便可统帅一切，从而使现在表现得过于突出的一切得到缓和。倘如以这些情节写成一个悲剧，那很可能成为一部天才的创作……”如此等等。

你们讲到悲剧，讲到这一片段（用你们的说法）的发挥。可是你们难道不明白，发挥和扩充这一片段，从艺术方面说是不可能的，而且那样就要出现完全另一个作品，有完全另一种形式，也许与此不相上下，也许价值更高，但已完全是另一个作品，而不是如今的《埃及之夜》。因此，也就失去如今的《埃及之夜》的全部感受和它的全部思想了。普希金面对的任务（假设他能给自己的灵感预先提出任务的话），正是表现罗马生活的片刻，仅仅是片刻，不过要借此造成最充分的精神感染力，以几行诗几个形象传达出当时生活中片刻的整个精神和意蕴，而且应从这片刻、这一角落推衍出可以理解的整个画面。普希金做到了这一点，且达到如此完美的艺术表现，堪称是诗歌艺术的奇迹。你们能说这些没有成为有血有肉的生动细节吗？有些细节竟是如此鲜明生动，使你为之惊讶，对诗人的艺术力量叹服不止。有些细节常靠一句诗、一个词、一个暗示来表现，但却表现得如此完整、贴切和充分，使得诗句为人念念不忘。这样的诗句传到后代，会变成某种概念的专用表达手段。不过，这类细节达到了极度的概括，如果增上某一个多余的细节，我们面前的画面的完整印象可能便会消失。这里的一

① 克莉奥佩特拉，或译克娄巴特拉（公元前69—前30），埃及末代女王（公元前51年起）。

切汇合成一个谐音，因为每一击键，每个音，甚至每个节奏、每行诗的音调，全都是为了创造出一个完整的印象。或许你们要求更加详尽地描写服饰，厅堂的建筑，亚历山大的、埃及的和罗马帝国的城市，分析罗马帝国的地理、统计数字、民族和艺术？可能你们要的是这些细节？至于杜德什金① 先生，他肯定是要这些材料的。

还有，你们讥笑我们就美第奇的维纳斯和米洛斯的维纳斯两座雕像的效果所说的话②。我们说过，在修养差、不道德的心灵里，即使美第奇的维纳斯也能引起淫念。需要在道德上达到相当纯洁的程度，才能观看这天仙般的美貌而不生邪念……

你们会反驳说："难道美第奇的维纳斯或米洛斯的维纳斯，是一种情欲的表现吗？如同克莉奥佩特拉语言里包含情欲吗？难道这奥林普山③ 的神人不正是充满纯洁优雅的风度的冰清玉洁的形象，不正是贞洁的灵魂吗？这些形象本身不正好体现着隐约的羞怯、体现着迷人的秘密吗？难道菲狄亚斯④ 和伯拉克西特列斯⑤ 的雕刻刀，甚至衰落时期⑥ 的雕塑家的雕刻刀，可曾落到极度表现情欲的地步？"

---

① 斯·谢·杜德什金（1821—1866），俄国作家，当时纯艺术论的代表人物之一。

② 古希腊的爱神维纳斯（即阿芙罗狄蒂。"维纳斯"为俗称。）雕像，制成于公元前2世纪，1820年在米洛斯岛发现，现藏于巴黎的卢浮宫。此后有维纳斯雕像的复制品完成于罗马，曾为意大利中世纪望族美第奇家族所收藏，现藏于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美术馆。此两者分别称为米洛斯的维纳斯和美第奇的维纳斯。

③ 古希腊神话中诸神居住和集会之处。

④ 菲狄亚斯（公元前5世纪初—约前432/431），古希腊古典艺术鼎盛时期的雕塑家。

⑤ 伯拉克西特利斯（约公元前390—约前330），古希腊雕塑家，古典艺术晚期代表人物。

⑥ 当指古希腊发展的衰落时期。

接下去则是：

“难道拉舍里[1] 在舞台上什么时候曾经闹到近乎克莉奥佩特拉发誓的地步？难道在欧洲或是美洲什么地方，一个女演员能够当众朗诵这个片段而单单突出极度表现情欲的地方，却无力赋予这个未完成片段中未能充分表达的思想内涵以崇高精神，不能隐蔽那种任何时候都不应公开的秘密？”

“极度的情欲表现”简直令你们走火入魔了。可是请问，假若美第奇的维纳斯和米洛斯的维纳斯雕像运到莫斯科来给我们善良的祖先看，就算是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时代[2]，它们虽然是纯洁的象征又流露着隐约的羞怯，但留给人的印象除了粗野甚至诱惑之外，难道你们以为还能有什么别的吗?!我们且不说当时根本就没有素养很高的人。这里我们是一般讲那些德国“蠢人”可能留给我们祖先的印象。难道我们说得不对吗：需要非常纯洁，讲道德而且正派，才能目睹天仙的美貌而不生邪念。形象的冰清玉洁并不能杜绝粗野甚或肮脏的念头。这些形象所以能给人以高尚的神圣的艺术感受，正因为它们自己就是艺术品。这里的现实是经过改造的，通过艺术，通过纯真圣洁的灵感之火，通过诗人的艺术构思。这是艺术的奥秘，每位艺术家都明了此事。但遇上没教养或是粗野的贪淫好色之徒，就连艺术也无法施加自己的影响。人的心灵越好越有教养，其艺术感受便越充分越真实。

不过问题是：你们为什么正是这样想：《埃及之夜》虽为艺术作品，但作为片段（你们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个片段!）、作

---

① 拉舍里（1821—1858），法国著名悲剧女演员，19 世纪 50 年代曾到莫斯科和彼得堡演出。

②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1629—1676），俄国沙皇，彼得大帝之父。

为情欲（仍就是情欲）的极度表现，不可能产生纯粹的艺术感受，反而却唤起可耻的不能容许的邪念。你们是不是在把《埃及之夜》同萨德侯爵[①] 的作品等量齐观？依你们看，作品如果是片段的未完成的，就无法遮掩任何时候都不应公开的秘密。

然而第一，哪里有公开的秘密，它又是什么样的呢？这里能谈得上发现什么秘密吗？其次，你们对《埃及之夜》理解得对吗？你们在其中看到的，是应该看到的东西吗？是多少能感受诗情、陶醉于艺术魅力的人所不由自主地看到的东西吗？不，据我们的理解，这里给人的感受是恐怖可怕，而不是“极度表现”。现在我们肯定地认为，你们所说的极度表现，就是萨德侯爵的东西、色情的东西。其实，这里并非如此，完全不是这样。这意味着你们自己失去了看事物的真正的纯洁的眼光。你们屡次提到的极度表现，在你们看来确实会有诱惑力，而在我们看来这种表现只是对人的本质的扭曲，但达到了可怕的程度，而且以诗人的视角体现出来（而视角才是最主要的），这样给人的印象就不是色情的而是震撼人心的。在普希金那里，即兴诗人站到“北方巴尔米拉”[②]（圣彼得堡）的听众面前，很实在地问了一句：“这里说的是什么情夫呢？perche la grande regina n'aveva molto（伟大的女王情夫可多着呢）？”这时他同样引发一片笑声。这批听众也是情场的行家和能手。他们这种人很多，还有两个记者是文学家，大概同样是情场老手。很可惜，普希金没有给我们讲即兴表演对这批听众产生了

① 萨德（1740—1814），法国作家，著有多部色情小说。

② 叙利亚东北地区古城，当时为商队、手工业的大中心，公元1—3世纪为极盛时期。此处称彼得堡为北方的“巴尔米拉”。

怎样的效果。

不过我们可以自己回顾一下这场即兴表演，自己检验一下这个效果。

盛大的宴会；它的场面。女王很开心，要让自己的客人们也活跃起来。可她忽然沉思了，头垂在金杯上；客人们沉默着，全不作声。这些宾客看来很了解自己的女王，正等待着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这些都是她的奴隶，而她所代表的那个社会，基础早已动摇。人们已经失去任何信心，希望像是毫无益处的欺骗；思想变得暗淡以至消失，因为圣火离它而去了；社会陷入歧途，在冷酷的绝望中预感到临近深渊，随时会坠了下去；生活失去了目标在苟延残喘，未来将一无所有；要在现在得到一切，需要以最实际的需求来充实生活，全神贯注于肉体，全身心投向淫佚。为了弥补高尚的精神感受的不足，于是刺激自己的神经、肉体，极尽感官之能事。最离奇的乖张之举，最不正常的现象，渐渐都变得很平常了。甚至连自我保全的情感也全消失了。克莉奥佩特拉便是这个社会的代表。如今她很寂寞，经常有这种寂寞感。某种离奇的反常的恶作剧的东西，也许还能唤醒她的心灵。她现在需要强烈的感受。她已经尝遍爱情和快感的一切奥秘。在她面前，萨德侯爵可能只算一个小孩子。淫乱会使心灵变得残酷，所以她的心灵里早就能感受到下毒者布兰维利耶看到自己牺牲品时那种阴暗的病态的可诅咒的欢乐①。不过她的心灵是刚强的，还不致一下子垮掉。她心中蕴积着许多强烈而恶毒的讥讽。这讥讽此刻在她心底蠕

① 布兰维利耶（约 1630—1676），侯爵小姐。她为夺取遗产，毒死父亲、姊妹和两个兄弟。1676 年被判处断头刑。在逮捕她时，发现她在叙述自己毒死父亲和兄妹时内心感受的自白。这一刑事案件曾轰动一时。

动。女王想用自己的挑战使所有的宾客大吃一惊。她想在当面向客人提出挑战时看到他们的战栗，感受这些为欲火引起的心跳，从而欣赏自己对他们的藐视心情。不过她的思想已完全控制了她的心灵。情欲如毒汁在她的神经里奔流。这时她很希望人们接受她这离奇的挑战。将会有多少闻所未闻的甜蜜呀，多少她尚未尝过的快意呀！那简直是魔鬼的幸福，亲吻自己的牺牲品，同它交合，一连几个小时成为它的奴隶；用一切神秘之吻，用疯狂满足它的情欲，而同时又每分钟都意识到这个牺牲品、这个对她片时的主宰，将为这场爱情，为自己片时占有她的高傲放肆的作为，向她付出生命的代价。鬣狗已在用舌头舔血，而她则在想象它的热气，这热气她要一直想象到享乐的最后瞬间。疯狂的残酷早就扭曲了她那圣洁的心灵，时常使它堕落为兽性，甚至还甚于兽性。在她姣美的肉体里隐藏了一颗阴暗、古怪而又可怕的恶棍的心灵：这是蜘蛛的心灵，据说，母蜘蛛在交媾之际总要把公蜘蛛吃掉。所有这一切，像是一场令人厌恶的梦。可这又令人陶醉，是极端的放荡……又是恐怖！……于是魔鬼般的兴奋充溢着女王的心，她高傲地提出了挑战。

可谁也没有站出来，她在自己的客人脸上看到的是惊慌和恐惧。她以无限蔑视的眼光环顾他们。但是，情欲震撼了人心，有三个人走了出来，接受挑战。

献身者抽签，第一个是弗拉维，是个老兵，在罗马卫队服役，为共和政体而战，直到头发斑白。他并不要欢乐。他接受挑战，因为他身上有一颗高傲的罗马人的心灵，不能忍受来自女人的蔑视。当然，这只是愚钝的高傲，是目光短浅的军人荣誉感，但这感情是高尚的，是无畏的，这已经是人而不是奴隶。因此，人身上的一切还没有完全丧失。淫乱和破坏，还没

有以自己的火焰吞没一切，还没有焚毁和毒害社会的全部心灵。这社会里还有能够斗争的力量，可是还能保持多久呢？你们看看未来的代表吧，比如克里顿，是个年轻的享乐主义者，他崇奉的神是塞浦里斯[①]，他崇拜的是享乐。他还年轻，生命力极其充沛，要以青春的全部热情及其无限力量投入情爱之中。不过这全是由于年轻。他趁着感受还新鲜而丰富，现在就死，也是痛快的，他是不知道什么是失望，什么是绝望……假如他能活下来，一定会参加历史上所记载的尼禄的怪诞的婚礼[②]……

可是诗人本人的心灵也承受不了这一场面。他无法结束克莉奥佩特拉-鬣狗的故事，于是在一瞬间他使自己的这一鬣狗获得了人性。

再就是一个小青年，名字不详，他眼里冒着情爱的惊喜之火。年少稚嫩的无穷情欲在他年轻的心里沸腾着。他怀着喜悦甚至是感激之情要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对生命毫不在意，只是凝视着女王，眼神里有那么多的快乐，那么多无穷尽的幸福，那么多纯真的爱情，这使得女王这鬣狗身上的人一下子苏醒过来。女王怜惜地望了一眼小青年。啊，她还知道怜惜人呀！

但这只是瞬间的事。人的情感重又消失，兽性的快乐之火在她身上一下子烧得更旺，也许是由于小青年的凝视吧……啊，这个牺牲品带来的快乐一定超过他人！在极度兴奋中，女

① 古希腊神话中阿佛洛狄忒的别名之一。阿佛洛狄忒（或译阿芙罗狄蒂）为肉欲、爱情、美和恋爱的女神。至公元前5—4世纪，哲学家开始区别出：阿佛洛狄忒·潘得摩斯为司粗野肉欲爱情的女神，阿佛洛狄忒·乌拉尼亚为司崇高理想爱情的女神，此处当指司粗俗肉欲爱情的女神。

② 指残酷淫荡的罗马皇帝尼禄（自公元54年起）与男童斯波儿的婚礼。

王庄严地说出自己的誓言……的确，诗歌还从来没有达到如此可怕的力量，激情从来没有得到如此集中的表现。看到女王表现出这种恶魔般的快乐，不由令人身体变冷，精神发呆……你们那时就会明白，我们神圣的救主当时是找了哪些人。你们也会懂得了“救主”一词是什么意思……

假如上面的这整个图景，只给了一种淫欲的印象，那我们的心可长得太奇怪了！

我们难以割爱，不能不在这里引述一段一位朋友给我们的信，这信是他读过3月号《俄国导报》上的文章之后写的。它对我们这篇文章恰好是一个补充。信里是这样写的：

“即使说《埃及之夜》只是个片段，像普希金这样的诗人，也难说他的片段作品没有灵气。而《埃及之夜》又根本不是什么片段。你在哪里找到了它的未完成性、片段性特征呢？正相反，这是多么完整的画面啊！各部分多么出奇地匀称、清晰而且完整啊。读者明白，普希金是用了怎样珍奇的框架给我们展示自己诗作中的精品，对他自己来说也是特别珍贵的精品。《埃及之夜》是篇即兴之作，但这是已经写完了的完整作品。一般说，这位伟大诗人总是尽自己一切可能，帮助我们理解他的作品。他让一位意大利人来朗读，这人生长在非常丰饶的艺术环境中，自己就是地地道道的艺术家，老实忠厚，不拘细节。他在一个贵族客厅里平静地读出‘伟大的女王有许多情人’一句，便惊奇地看到一些北方的异乡人嘿嘿地或哈哈地笑起来。

“这种情形，你们看到了，一直延续到今天。普希金在《埃及之夜》中，艺术地表现了他心灵里很珍视的一个问题——艺术与社会的某些关系。这个问题迄今没有解决。所

以，如今即兴朗读《埃及之夜》的人，也会听到北方异乡人对它的新的讥笑声。我们确实是个奇特的民族。看来普希金用彼特拉克[①] 的诗句来形容我们，是很有道理的：

在那白天短促的雾蒙蒙的地方，
出生了一个不知死亡痛苦的民族[②]。

“当有人对我们讲到死亡，当有人指天发誓要杀人并给我们看杀人刀斧和落地人头时，我们听着，表现出北方人的冷漠。这感动不了我们，也引不起恐惧。可要人们一讲到强壮的塞浦里斯和黄金卧榻，我们便竖起了耳朵。这能使我们激动，催我们行动……我们骨子里是清教徒，我们不很喜欢生活。因此，艺术在我们看来是一种诱惑。

“是的，我们对艺术的理解太糟糕。连普希金也没能教会我们这一点，他自己就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经历了痛苦而后死去，其原因看来主要在于他是个完全的彻底的诗人。只有对艺术的这样糟糕的理解，才可向我们解释为什么《俄国导报》从‘情欲及其种种表现’中做出了完全纯洁的分析。

“这就是我努力领会《俄国导报》的文章时，脑海里出现的沉闷的疑问。如何理解杂志这样奇怪的固执态度呢？怎样解释它一方面是谨小慎微而三缄其口，另一方面又大胆果断而充分自信呢？我不由得吃惊自问：如果它——《俄国导报》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如此糟糕地教导我们，那么我们将会怎样

① 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是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位人文主义者。知识渊博，广及文、史、哲各领域。
② 文中的原诗为意大利文。

呢？我们这些不幸的人该怎么办呢？

“《俄国导报》看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文学时，态度极其高傲。我要坦白地说，我喜欢这种态度。我高兴看到任何的高傲，只是高傲之人应真正有权利傲视一切。《俄国导报》责备我们的文学是半拉子思想、半拉子感情；它称我们的社会是‘空洞的’社会，没有自己的关心，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智力的生活，没有气节而且软弱。

“据我的了解，这些说得都很准确，总的看也极其公正。

“可是，《俄国导报》想出什么办法来帮助改变这样可悲的局面呢？他自己在这个社会里和在这个文学里在干些什么呢？

“说来奇怪，它感到了脚下是摇晃不定的地基，周围是混乱纷扰的社会，却忽然想用一个规矩森严、舆论强劲的社会的语言出来说话。为了证明我们的不成熟，他想用一种成熟的语言说话，但自己又没有这个语言，便到英国或其他某个成熟的国家去借用。

“这种做法的虚伪性，在眼前这件事上表现得最明显。只要一接触现实，面具就掉下来，喜剧也跟着结束。事实上，《俄国导报》徒劳地叫嚷什么一切都明了简单，什么只要不违背通常情理，就可以明晰地实现目标。它徒劳地粉饰和掩盖问题，而这些问题仍是现实的，保持着原来的力度，尽管说了那么多漂亮话，用了那么多华丽词藻。

“俄罗斯人要装成英国人或法国人的样子，总很别扭。在人家那里，社会已经稳固定型，的确办事会很快也很明确。不过要请《俄国导报》注意到一点：那里根本不会去大发议论，甚至根本不会去想拿女演员同尊贵女士作比较。《俄国导报》作为俄罗斯人，不能不大发议论，结果闹了个彻底失败。

“《俄国导报》叫嚷，事情明了简单。可是在它那漂亮话里

无法找到任何明确的见解。而且我觉得《俄国导报》没有那样的见解，而且也不可能有。

“如果看透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了它那文章夸夸其谈的语调、自以为是的语言，是多么虚假。这一场可怕的闹剧，目的是要干什么呢？如此殚精竭虑是要欺骗谁，而又是为了什么呢？

“《俄国导报》给俄国文学提供了一个坏榜样！”

在尼·尼·斯特拉霍夫《争论小议》一文中加入的话[1]

伏尔泰一生中都在吹口哨，并非无用，也并非没有后果。(可人们当时对他是何等气恼，也正因为他吹口哨。)[2]

---

①② 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争论小议》一文发表于《时代》杂志，1861年，第8期。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时代》的编者，在该文中加入这几句话。他肯定伏尔泰的讽刺（吹口哨），在当时，客观上是在支持杜勃罗留波夫所主持的《现代人》上的“口哨”栏。而这是斯特拉霍夫所不能同意的。

文学界的歇斯底里

我们在这里不加删节地转载《俄国导报》[①] 上反驳本刊第4期一篇小品文的文章。此文把我们同《家庭恳谈》[②] 相提并论。随后我们简要地谈谈自己对于《俄国导报》这一新举动的意见。

这篇文章语言晦涩，且篇幅较长，我们只从中节录与我们有关的部分。

下面请看这篇文章：

“我们杂志界的多产作家们只知道讥笑阿斯科琴斯基先生和他的《家庭恳谈》，最好能回头审视一下自己和同仁们！可是，还有一个问题是谁更可笑些：是写一些恬不知耻的东西的阿斯科琴斯基，还是那些喷着香水、扭捏作态、玩弄词藻的

① 文学和政治杂志，1856年起由米·卡特科夫在莫斯科出版，1862年后成为保守派的喉舌。在1860年前半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与卡特科夫论战，而在此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场变化，与他日益接近。

② 维·伊·阿斯科琴斯基（1813—1870），新闻工作者、作家、历史学家。他主编的《家庭恳谈》（1858—1877），据认为是当时俄国最反动的杂志。

人？我们这个社会的不幸还在于，我们的这些文化人虽学识渊博，不过都是些花拳绣腿，没有任何实际价值。我们有难以胜数的现成的词汇和句子、没完没了的夸夸其谈，却极少有一点思想，极少有一点确实体会到、感觉到的思想，偶尔有一点点，真是喜出望外。我们只是掌握了精于思考和体会、勤奋做事的人的所有表面技巧，可以像深刻洞察一切的人那样对世上之事无所不谈。我们不需要任何科学和任何思想，赫列斯塔科夫① 是我们伟大的、可包容一切的典型。到处都存在赫列斯塔科夫作风，不仅小品文作者，不仅乳臭未干的少年，就连一些 soi-disant② 学者和德高望重的长者也是如此。人们常常会从一些貌似十分规矩，甚至阅历丰富、颇有见识的人口中突然听到一些最无耻的言论，令人感到说话人根本没有正义感。的确，赫列斯塔科夫作风是我们社会的通病，果戈理塑造的这个不朽的典型，将来将日益受到珍视。甚至赫列斯塔科夫是彼得堡的小官吏——这一点也是这一典型的深刻的本质的特点。不知我们的读者是否在我们北方的巴尔米拉③ 遇到过这种外表体面的先生，一开始您会因其谈论任何事物都是妙语连珠、思维敏捷而被吸引，他讲得滔滔不绝，对所有的事物都是见解成熟果断，词藻华美，知识极其丰富，思想冠冕堂皇。但这种假相持续不了多久，您很快就会感到在您面前的是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这个能言善辩似有思想的先生从来就是个空虚

① 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角。他的名字和父称是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他是纨绔子弟，轻浮浅薄，爱慕虚荣，喜欢说假话，夸夸其谈，他来到一个小城，被误认为是钦差大臣。

② 法文：所谓的。

③ 叙利亚东北地区的一座古城，公元1—3世纪为其极盛时期。考古发现古城的布局、庙宇、墓地、雕像及壁画等。这里是喻指彼得堡。

的人，一个刚刚摆脱部里事务、将外衣甩给玛尔富什卡的真正的赫列斯塔科夫。请问，您可曾遇到过这种人……可是，还用问吗？如果您在北方巴尔米拉住过或来过的话，怎么会没遇到过呢？况且这类人现在到处都是：不论您住得多么偏僻，大概在您省城、在您县城，甚至在乡村的邻居中都会遇到这类人。

没有任何实际的内容、不动脑筋、缺乏真情实感地用一些现成套话来表达任何情感、任何思想，这就是赫列斯塔科夫作风，用阿斯科琴斯基的话说，这种作风像黑暗中的魔鬼一样笼罩着我们的文学界。我们认为，这种黑暗比任何一种黑暗都可怕，所以现在我们不由地在等待某种灾变，希望这灾变把我们田野上的这些垃圾一扫而光，使这田野重新成为一片丰产的沃土。

您可曾读过波隆斯基[①] 先生下面的这首诗？

高耸在灰色的巨石堆上，
透过深绿的枝条，显现出一座雕像。
岁月没有销蚀它的容貌，
依然是亘古的秀美。
只是一只手臂被打掉，
也磨平了它衣衫的皱褶，
都出自愚昧者无情之手。

现在您读了这首诗，那么您觉得怎样？您会对这个问题感到奇怪。再读一遍后，您会问，这诗是否值得摘引，是否值得谈论？波隆斯基先生写过许多亲切可爱而又富有诗意的剧本，

---

① 雅·彼·波隆斯基（1819—1898），俄国诗人。

但他这首小诗却丝毫都没体现出他的诗歌才能，且内容空洞：塑像在绿色树枝间耸出，岁月没有销蚀它的天生丽质，然而一些不懂艺术的人却弄断它的手臂，磨平它衣衫的皱褶：这就是这首诗的全部内容。这首小诗既不能使您展开遐想，也不能打动您的心灵，其中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内容。您这样认为吗？那么您听听关于这首诗会有何等的高谈阔论吧。彼得堡一份杂志的小品文作家是这样谈论这首诗的[①]：

> 如果因为这首诗我声音颤抖、热泪盈眶，我不会为此而感到羞愧，因为这诗字里行间充满了如此圣洁的忧郁，如此公正的责备，纯洁得透明的苦痛，我甚至以我能从中体会出这些而感到骄傲。这是我们诗歌中最好的诗作之一。由此我可以诋毁波隆斯基所有别的诗，可对这首诗再来挑剔，我可不能。

自然科学家常常长期细心观察研究某些极微小的昆虫。我们也请求您，从昆虫学的角度对此诗再关注几分钟，核实一下诗中所述究竟是意义深刻还是废话连篇。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这是赫列斯塔科夫作风的实证！它在我们这里竟达到了如此令人发指的地步！

不，果戈理的赫列斯塔科夫在这等惊人的欺骗面前显得如同侏儒。赫列斯塔科夫在市长客厅中的胡扯，同这等惊人的荒谬相比真是苍白而浅薄。这就是现今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文学批评，我们的小品文！

在同一篇小品文中还有极其令人吃惊的东西。

---

① 《时代》，1861年，第4期。小品文栏，141页。——作者注

请您读下文[①]：

我认识一个人，他十分平静地，不，哪里是平静，而是兴奋地、饶有兴致地讲他自己怎样欺骗了一个犹太人，又是怎样欺骗他的情妇。您以为我感到厌恶了吗？一点儿也不，我笑了，而且是由衷地、像读了普柳什金的故事一般笑了[②]。听他讲的其他人，他不只对我一个讲，都尽力想在自己的笑意中表现出鄙视，但露出来的是善意的笑。看到这个人对于自己诡秘的把戏，孩子般单纯地沾沾自喜，你不能不笑，而他发现反应不错，越发兴高采烈地讲起来。

"您不为此感到羞耻吗？"为了看看他怎么回答，我问。"噢，"他友好地拍了我一下，反驳道，"怎么会呢！"他接着又讲他的新奇遇。"他是一个骗子，"他走后我说。"但我却喜欢他，甚至欣赏他。""这只能说明，"许多人指责我，"您宣扬的善良与无私全都是虚伪的。""可能吧。"我耸了耸肩说。我很遗憾，这些先生不理解我。但我又从我为之受责备的人那里得到了补偿。"我很敬重您，"当我和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对我说（这我可不谦虚了），"因为这些看不起我的先生中只有您一个完全有这个权利，因为只有您能同我形成对比：您心地纯洁，我可以用脑袋担保，您是任何时候都不会有类似我这种行为的。而这些先生呢？他们同我是一丘之貉，只不过披着您的外衣，他们是比我还坏的贼，没有一点儿自己的东西，他们的一切都是偷来的。""从这个角度讲，"我向他伸出手说，"我们是一样的人，越是富有，就越快乐。"这使他很满足。"不过，"我补充道，"如果我碰上您正干那样的事，我还是会第一个喊警察。""而我，"他笑道，"如果跑不掉的话，我首先让您来审判我，因为

---

① 《时代》，1861 年，第 4 期。小品文栏，134 页。——作者注

② 或译泼留什金是果戈理《死魂灵》中一个令人厌恶的地主形象。

只有您的判决才让我心服。”实际上我不会叫警察抓住这个人，我自己和他讲清道理更好。我甚至深信，按我的请求，他会在我面前赔偿所有被他欺负的人，只是不会保证以后不再做这类事。他可以向别的人保证，但他是在欺骗。可我喜欢这个人，只有他敬重我的工作，只有他乐意听我的话，重视我的意见。他对我说，“我喜欢听您的，因为您从不撒谎，我不想在您面前做什么坏事，不是因为您让我感到羞耻，而是因为不愿惹您不高兴。”您是否感觉到这个人身上有着一种优秀的品质，这种品质已经使他同任何人友好相处。只要那人不忌妒他、不由于个人原因而迁怒于他。

这超过我们遇到的类似情况，甚至我们文坛上的类似情况。你简直说不清什么令人吃惊：是口若悬河、厚颜无耻的话语，幼稚的头脑，抑或是精神上的扭曲？这个夸夸其谈的人极为欣赏地听骗子讲他诡秘的把戏，欣赏地看着他，整个都被他迷住了，得到了他的青睐并以此为荣。他告诉我们这个喜欢听他的话的可爱的骗子讲了什么恭维话（好在这个赫列斯塔科夫的所有同事中，只有此人乐于听骗子的话并重视骗子的意见），告诉我们这个骗子如何爱戴他、敬重他，问我们：您是否感到这个人身上有着一种优秀品质？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光天化日之下，在公众面前竟如此厚颜无耻！欣赏骗子是因为骗子在自己的行当里演戏；他认为一个能将自己的卑鄙下流演绎到极点这便是真实；他欣赏骗子正是因为这下流已成为他的本性，他能轻松地周旋于这下流的包围之中，玩味自己的下流并以此为荣。最后他以自己的尊严感来美化这一切，夸耀自己是渴求真实的赫列斯塔科夫。然而与此同时，这真实的所有内容都是虚伪的。真是岂有此理！同这种令人恶心的肉麻相比，拙劣不堪的阿斯科琴斯基先生的恬不知耻又算得了什么呢？

不过，我的读者，请把您这杯酒喝干，把这篇小品文接着读下去吧：

我知道一个承认了二十三起谋杀案的强盗。当要他指出埋葬着受害者的地方时，他很情愿地指认了第一个掩埋地，但当挖出腐烂变形的尸体时，站在远处的他背过身去。叫他过来，他不动。当三个警察把他强扭过来时，他挣脱开又背过身去，整个脸像受罚的小孩那样可怕地歪曲抽搐着。把他带到尸体前，他看了一眼便昏了过去。这是一个不屈不挠的倔强个性。在这一刻每一颗心凭自己的直觉，都会比怜悯死者更甚地怜悯这个强盗。他给他们指证了被害人，而侦讯员要的就是这个。几天后他又被带到另一个地方让他指出另一个坟，他不想协助，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但说来奇怪，在场的人都认为要他指认的真实原因看来还不够充分。一个先生便向他解释说需要挖出尸体像样地埋葬，等等。他冷笑着道："躺在哪里还不是一样。"这时，另一个先生对他说，需要挖出尸体让他向死人忏悔。"你去吻一下那腐烂的嘴唇！"这位先生说。囚犯犹豫一下说，这原因才更真实些，但却没指认埋尸的地方。为什么他们不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却毫无同情心地以人为的说辞去惊扰他那痛苦的灵魂呢？"我们要知道这地方，挖出尸体，以防今后偶然挖出尸体时怀疑其他无罪的人。"这样一说，他会指认的。这颗灵魂在审讯时没有撒一个字的谎，没有牵连一个无罪的人。可是这些先生却不这样考虑。他们同杀人犯进行了新的一轮谈话：

"你为什么杀这个人？"他们问。

"因为我想喝酒却没有钱。"

"你在他身上找到多少钱？"

"二十五个戈比硬币。"

"为二十五戈比硬币就得杀人吗？！"

罪犯惊讶地望着他们："为一千卢布和为二十五个戈比反正都一样。"他说。这个人比审讯他的人更有理智。他们还好心地想迁就他简单的理解，但他却常常比他们理解得要好。他们没有掌握他的思想，他反而比他们更有威力，使他们常常觉得自己在他面前是个小学生。他笨拙的率直常常使他们不知所措，因为在这率直中越来越强、越来越可怕、越来越不可抗拒地呈现出他的人的形象，而他们的灵魂却越来越胆怯而渺小地隐藏在一大堆曾经读过的书本之下，隐藏在一大堆我们的陈腐规矩之后。

当时，我还是一个少年，这个人给我留下了令人倾倒的印象。

任何一个健康的人，不论他的理解力如何迟钝、如何简单，读了这一段话都不能不感到厌恶！多么虚伪，多么庸俗！与此同时，这些话又多像赫列斯塔科夫的表演。这位小品文作者口若悬河，似乎在讲一件什么正经事，还如此自信，似乎他在生活中真有这种感受。一个孩子会毫不犹豫地迷上一个杀了二十三个人的杀人犯，这是可能的。但硬说这孩子般的陶醉是有理由的，认为这是一个成熟之人的正常的、必然的举动，而且讲起这些时十分严肃，甚至带有某种道德的激情，还振振有词，毫不吞吞吐吐，像演戏般进入角色，这简直是地地道道的虚伪！面对野蛮的杀人犯，从美学上大为感动，而精神上却麻木不仁，甚至在杀人犯身上看到了优于其他小人物的、高大的人的形象，而这些小人物没有杀过任何一个人，他们惊讶这个恶魔何以为一小瓶酒就敢做这么可怕的事。请问，什么样的作者才能写出这种话呢！据说那个不满意欧洲的新的梅萨利娜，跑到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尔人① 那里去了。上面讲的情况比这

① 阿尔及利亚北部山区的一个民族，称卡比尔人。

个梅萨利娜又好在哪里呢？从道义上看还要坏！不过准确些说，这里谈不上什么道义。小品文作者没有表达出自己内心的任何真实情绪，一切表明他没有什么真正的情绪。他生活在语言的世界里，情绪和思想都是虚幻的，这些虚幻的东西发展、组合，形成为诗、评论，乃至整本的书。这种发展的过程和要素，就是果戈理为我们在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赫列斯塔科夫身上很典型地刻画出来的那些东西。赫列斯塔科夫在给自己的朋友、小品文作家特里亚皮奇金的信中就是这样写的，大概特里亚皮奇金就这样一字不差地写了自己的小品文。而且特里亚皮奇金毫不觉得他在其小品文中是胡说八道！这个丝毫没有人性的杀人犯，这个为了满足自己一时欲望就杀人的禽兽，甚至禽兽不如。因为禽兽至少没有这样的欲望。而这个恶魔在特里亚皮奇金眼中竟是一个高大的、迷人的、有魅力的人，他能压倒一些藏在一大堆陈腐规矩后的小人物。请看他多么会为这个伟大的人的形象辩护！请看特里亚皮奇金在这些惊奇于为二十五个戈比就杀人的凡人面前摆出了怎样的架势！“为一千卢布和为二十五个戈比反正都一样。”罪犯说。而特里亚皮奇金感叹道：“这个人比审讯他的人更有理智。”特里亚皮奇金深信他说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他还抬出了思想……正是所谓的这思想令普通人惊讶。“这个不屈不挠的倔强个性”想喝酒，所以就顺理成章地杀人并从人家口袋里搜走二十五个戈比，似乎这是最轻松最简单不过的事。在这个不理智的、愚蠢的、令人发指的兽行面前，我们的评论者竟顶礼膜拜，竟以某种道德上的信念，某种人道主义的腔调发议论，而这种人道主义因其娇揉造作而更令人厌恶。

在赫列斯塔科夫式人物中还有这样一类人，他们称自己是魔鬼般的个性。对这种人不能不怕，“他虽不见得杀人，您却

要把二十五个戈比放好”。

我们特意将与我们有关的全部内容都摘抄如上，以便让事实说话。回答这样的文章意味着有失尊严。我们呼吁读者来公断：让读者说我们的评论何时何地夸赞强盗，只因为他是强盗，因为他杀了人？何时何地我们欣赏过骗子、让骗子凌驾于诚实人之上？

在《俄国导报》反对我们的愤怒中，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妇人的歇斯底里，我们对它的指责做了认真的答复，但它没有回应，却对我刊的一篇小品文吹毛求疵，抛出了长篇文章蓄意歪曲事实①。它不正面应战，而是从后面走近，掐一下然后跑开。

至于文章结尾关于魔鬼般个性和二十五戈比之类的话，我们不明白，作为一个自尊的人，怎么能当众讲出这种粗野的东西。但我们回忆起《俄国导报》做这种事不是第一次了，它曾经以类似的方式向公众宣布过某人的桌子上丢了本书，因为它过去的一位工作人员离开了该杂志。总之，我们认为，反驳我们的那篇文章的结尾是病态的，确切地说，是在歇斯底里的状态下写出的，对于这种病态应用医疗手段来对付，文学手段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不能拒绝被《俄国导报》大骂特骂的小品文作者库斯

---

① 这里所说的“认真的答复”，指《普·亚·库斯科夫致〈俄国导报〉的信》。一篇小品文指普·亚·库斯科夫的《某些问题上的某些思考》。

科夫[①]先生，把他致《俄国导报》的信刊登在这里，但我们预感到，这封信会引出《俄国导报》方面难以胜数的回信，它过去信函往来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们预先通知我们的读者，我们准备在我们杂志上开辟一个特殊的专栏：库斯科夫先生同《俄国导报》的通信[②]。

①② 普·亚·库斯科夫（1834—1909），俄国诗人、批评家、翻译家。在1861年积极为《时代》杂志撰稿。《时代》为他开辟的这个专栏，不久就停刊了。

《时代》杂志 1862 年征订启事

时代
政治和文学刊物于 1862 年将以
二十五至三十印张的大开本按月出刊

我们杂志出刊的第一年即将结束，现在着手第二年的征订。去年我们的启事刊出后，广大读者很支持我们，订阅踊跃。这使我们深信我们杂志奉行的主旨是正确的。这并非自夸，广大读者给予我们的支持，其广泛的程度在我们杂志界里前所未闻①。那么问题是：我们服务于主旨做得如何？我们是否愧对兴奋地期待着的读者？我们是不是讲出了一些东西？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做得还不够，尽管希望做得多些，也讲得多些。我们自己首先承认这一点，如果说广大读者一直在关注我们，直至最近一期，那么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坚信我们的主旨是诚实的，这是我们最需要的，我们不会辜负读者的信任。

---

① 《时代》1862 年的订户是四千三百零二份，比《祖国纪事》和《俄国言论》要多，只是低于《现代人》和《俄国导报》，该刊于 1861 年创办，第二年就达到这个订数，是很大的成功。

在杂志出刊近一年的时间里，随之出现的各种情况，不仅没有使人们动摇，反而更坚定了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能够充分阐明我们的思想。要谈的应该还有许多，定要取得一定的共识。不应该让一些事件、一些情况使我们的文学无所措足。

所有的人都声明自己主张进步，不这样不行，这是 sine qua non[①]。但是如果 de facto[②] 我们还在死啃欧洲的教科书，还谈什么“进步”呢？前进——这是正常的、理所应当的事，上帝保佑我们不要去反对前进。我们在摒弃过去生活中无益而有害的东西之后，竟飘飘腾空，几乎脱离了我们的根基[③]。而失去了这个根基就不会生长出任何东西，更不会有任何果实。任何果实都需要自己的土壤[④]，自己的气候，自己的养分。脚底没有坚实的根基，要前进是不可能的，还会倒退或是从云端栽下。怎么能不承认，我们用过于狭隘的标准衡量许多现象，甚至是我们过去陈旧生活中的现象？我们常常急于用自己新的尺度看待一切事物，先就有了成见。我们急于想安慰自己，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正确，这正说明我们在暗暗地担心：自己有没有骗人？甚至在我们直接归之于“黑暗王国”的许多现象中，我们都忽略了根基的力量、发展的规律和爱心。[⑤] 对于这一切，应当培养一种更有远见的、新的、客观公正的观点，我

---

① 拉丁文：必须条件。

② 拉丁文：事实上。

③④ “根基”是指俄国人民（见上文注）。这里的“土壤”一词，在原文中与“根基”是同一个词，只是因为与“果实”相关，译文略作变通。（而“根基”与“土壤”在俄文中也确有同样的含义。）

⑤ 这里是继续与《现代人》的“否定”倾向、与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的“现实的批评”原则（见于他的文章《黑暗王国》、《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进行辩论。

们却一下子否定了一切，只是因为它是旧的东西。愿上帝保佑我们摆脱生活中旧的形式……不过问题根本不在于什么旧的形式，我们要讲的不是这个。

常常有这样的事，当移居者要从故乡搬到千里之遥的新家时，他们会流着泪亲吻生养了他们父辈祖辈的故土，觉得离开故土如同离开哺育过自己、被吸干了乳汁的老母亲，是忘恩负义。他们要随身带上一抔故土，奉若圣物。这一抔故土将传给子孙后代，成为永恒的、虔诚的怀念。然而时光飞逝，子孙们开始惊奇，他们的祖辈竟如此珍视一小把普通黑土。子孙们想得也对，他们早已有了自己的土地，有了养育、培养他们的土壤。但我们呢？我们有什么新的土壤呢？我们并不是移民呀。我们只是飘浮在空中而已。实际上我们内心的感觉就像飞在七千英尺高空的飞行员，尽管从高处能看到很多极其奇异的景色，但看一切都很空泛，都离得很远，况且最主要的是从极高处俯看。说到底，不管他多么热爱科学，他还是渴望回到地上。一个人甚至会感到害怕……呼吸困难，还有可能掉下去……要知道气球是会像肥皂泡一样爆破的……

最后我们要承认，我们要道出实情：就连我们对自己俄罗斯土地的热爱，也虚而不实，是学究式的。我们已养成了什么都不在乎的恶习。我们已懒散得习惯于别人为我们做好一切，给我们端来现成的饭，尽管做得不好吃，但毕竟是现成的。而虚荣、脾气却大行其道。坐享其成的生活——结果就是如此！拿医学来说，我们渴望有医生出诊，却躺着抱怨我们这里没有出诊的医生。如果懂得爱人的话，也许会找到医生出诊的。要知道即使发脾气，也还可以对人有爱心嘛。

不过，暂时我们有的只是分歧和争辩，内容倒全是关于十分崇高的东西：俄罗斯思想、俄罗斯生活、俄罗斯科学，等等。我们一些思想家甚至直截了当地问："究竟什么是俄罗斯思想，民族的根基一词的含义是什么?"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这事实就很重要，也很能说明问题。我们并不是在开玩笑，既然人们很痛快地提出了这些难题，我们当然是很想就此谈谈清楚的。其实，已过时的"欧洲派"更加彻底：他们也是从不兜圈子地直接讲，说我们至少应当成为法国人。即使没直说出来，那至少是已张嘴要说，没说出来只是噎住了……话噎在嗓子里出不来。如果别林斯基能多活一年的话，他会变成一个斯拉夫主义者[①]，就是说他才离龙潭又入虎穴，没有别的办法好想。再说他在发展自己思想方面是不怕什么的。这人有很博大的爱心！现在的很多人就站在别林斯基止步的地方，尽管认为自己已经继续朝前走了。[②] 我们的另一些思想家，因为穿着燕尾服，就不愿承认自己是人民的一分子；[③] 第三部分人想从英国引进俄罗斯的民族性，因为英国货是最好的[④]；第四种人等待发现全人类共同的法则、公式，要营造普通的人民形式，不分民族和种族而铸成共同的生活，即想把人都变成磨损

---

①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猜测。实际上，别林斯基一直遵循自己的道路前进，他的近于遗嘱的《致果戈理的信》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② 指《祖国纪事》，别林斯基曾在此发表文章，参加工作。他去世后，该刊物的一些批评家在文章中说他们在别林斯基去世后仍在探究人民性问题上取得成就。

③ 指斯拉夫派人士。

④ 指米·尼·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卡特科夫是英国迷，在1850—1860年代上半期常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嘲笑的对象。

了的十五戈比硬币。[1]

我们将完全遵循我们在去年出刊启事中申明的主旨。

尽管我们直到现在说得还不多，但我们一直在诚实地努力着。我们热爱、珍视我们认为是真理的东西。我们捍卫了文学，把文学看做一种独立的力量而不是一种手段，尽管也承认近一时期文学上种种偏向中有许多事还是正常的、合理的。我们没有向权威低头。我们没有容忍其他刊物的夸夸其谈、利己主义、自高自大，以及牺牲真理的虚荣心，也许我们激烈得近乎仇视这一切。我们在很多问题上表现激烈，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并不后悔。我们还要承认一个错误：有时我们难以反对别人的见解，那些可能是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令读者感到尖锐和过分自信、但却是诚实地勇敢说出的、且出于高尚目的的见解。我们之所以就这一点致歉，是因为我们曾保证论辩要不偏不倚。我们不认为我们很不公正，我们还要一如既往地对我们的公正负责。但我们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思想的交锋是必须的。怀疑论和怀疑的观点会扼杀一切，最终甚至会扼杀观点本身，形同完全的漠然和沉寂。而目前文学还是俄罗斯的自觉生活的最主要的表现之一。我们这里几乎一切都是外来的，从科学到最平常的生活方式。而文学却是我们自己劳动创造的东西，是我们自己生活的结晶，所以我们珍视并热爱文学，所以我们寄希望于文学。

这里我们不想列举我们今后同事们的名单，也不想夸耀我

---

① 指《现代人》、《俄国导报》以及在较小程度上指《俄国言论》杂志。“磨损了的十五戈比硬币”一词，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早用于他的《读书与识字》一文（见上文），指失去民族特性而变成全人类的人的类型。此后他以这个词挖苦地批评极端的“西欧派”及其自由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同类人物。

们的希望。我们同样也不想列举迄今为我们杂志撰稿的作家名字，以及他们撰写的文章。如果读者对他们感到满意的话，即使这里不一一列举也会记得他们的。

在即将来临的1862年，我们杂志将仍以原来的栏目、原来的内容出现。这里我们为没订过和没读过我们杂志的人提供一个栏目计划。

栏目计划

1. 文学栏——中篇、长篇、短篇小说，回忆录，诗歌等。

2. 评论和国内外书讯——包括最新上演的剧目评论。

3. 学术性文章——采用通俗易懂的叙述，使非专业读者亦可接受。研究现代人关注的经济、金融、哲学问题。

4. 国内新闻——政府决定，国内大事，外省来信等。

5. 政治评论——各国政治生活的每月述评，报章最新消息，政治传闻，外国记者来函。

6. 综合栏——（1）小小说，国外来信，外省来信等。（2）小品文。（3）幽默文章。

美术学院1860—1861年画展

画展上有一幅画，周围从早到晚聚满了观众，一些人刚离去，另一些人马上凑过来。为了能靠近些看看，人们挤着向前，在观众和画之间钻来钻去。观众是各式各样的人，有戴着昂贵帽子的，有头上包着围巾的；有穿长礼服的，有戴礼帽的；有穿呢外套的，有留大胡子的。所有的人都喜欢这幅画。此外没有任何一幅画前像这样熙熙攘攘。参观的人众口一词：很显然，这是本次展览会上最受欢迎的一幅画。

这幅画展出在第二古希腊罗马馆。画展目录上说这幅画描绘了“一群休憩的囚徒”，作者是雅各比先生①，价值一千五百卢布。这幅画曾为艺术家争得金质奖章第一名，这位艺术家因此还可用公费出国三至四年以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才华。可以说这位艺术家得到了画院学生所能得到的最高奖励。此外，在展览开始不久，画上就贴上了小条：已售。如此一来，艺术家的目的完完全全地达到了：作品很受欢迎，有了声誉，特别是荣誉带来实实在在的一大笔钱。另外，此后他还将在美丽的意

① 瓦·伊·雅各比（1834—1902），俄国画家，在美术学院学习期间就已有好画展出，被认为是真实地反映了现实。

大利生活三四年。为此，我们向这位以如此卓越才华开始自己艺术生涯的艺术家表示祝贺，祝愿他今后取得更辉煌和显赫的成就。

但为了艺术，我们还要谈谈这幅画本身。要知道，《三个火枪手》的故事也拥有大批的读者，并为作者带来了滚滚的财源呢。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大仲马① 的这一作品已臻完美无缺。我们下面拿大仲马来作比较，并非要贬低这位认真诚实的艺术家。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的评论界把大仲马的作品视作是某种很差的东西。这位闻名遐迩的幸运者有着某些特点，足以弥补他许多缺点，不应以完全不屑一顾的口气谈论他。我们的艺术家中间，也有与大仲马比肩的、同样著名的画家，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回忆起大仲马，我们想说的是，大多数人的判断并不总同后代人的评判相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犹如中肯的评论一样，表皮都会发黑脱落，实情则要显露出来。

"一群休憩的囚徒"，这休息是不得已的，因为一辆押运车坏了，一只轮子平躺着，一个破衣烂衫的人正给马卸套。车上躺着一个人，他的旅程已经结束了：他已经死了，双脚还铐着。他的尸体还是囚徒，到彻底入土的时候，才能从羁押站除名。但从手指上贵重的宝石戒指，可以看出这绝不是普通的犯人，显然他不是流浪汉、杀人犯和窃贼。尸体放在车上，用破旧的粗席半掩着。死者惨白的左手下垂着，五个手指从死的那一刻就攥着，一个指上戴着贵重的宝石戒指。可能这是死者最

① 大仲马（1802—1870），法国作家，以写剧作开始创作生涯，后来成为当时知名的通俗小说作家。《三个火枪手》（1844）奠定了他作为历史小说家的声誉，《基度山伯爵》（1844—1845）也轰动一时。他的创作多达五百卷（与人合作）。

宝贵的东西的最后标记：也许这是他钟爱的女人送给他做纪念的珍贵礼物，他至死带着镣铐也没有与这礼物分离。

还有一个犯人钻到了大车下，面目狰狞，像是一个顽固不化的骗子，被社会厌恶地抛了出来。他在大车底下难受地弓着身子，因为车下地方小，极不舒服。他正从死者手指上拽下那枚珍贵的宝石戒指。这个犯人衣衫褴褛，让人感到这是一个卑琐的恶棍，同时又像蝎子一样危险。

大车旁站着一个押送官。他一只手在翻死者的眼皮看他是不是真的死了。死人那大张的眼睛里眼珠向下垂着。押送官冷漠地抽着烟斗，若无其事地看着死人的眼睛。在他冷酷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没有同情，没有难过，没有惊奇，似乎他看到的是一只死猫或路边的死狗。他甚至更注意自己的烟斗，只是随便瞥一下死者的眼睛。在这位先生的同行中，有许多这种人。他们只能这样。他们一辈子都在押送犯人，已经看够了这些倒霉的人，对他们的痛苦、疾病已习以为常，习惯地认为犯人之中大部分都是恶棍。公务使他们渐渐地丧失了同情心，有时对犯人像敲自己的烟斗一样说打就打。

画面近景的左边，一个衣衫破烂的犯人旁若无人地干着自己的事：在看他脚上被镣铐磨破的伤口，这个人大概在不同的监狱蹲了好多年，多次从一个监狱押到几千里之外的另一个监狱。他那张麻木的脸上有着这类人共同的特征：对世上的一切都已然无动于衷，如对天气、时间、同伴的虐待、自己的痛苦。他就这样痴呆呆地、无所谓地看着自己的伤口，此外，在他那被乱蓬蓬的头发半遮着的脸上，再也看不出什么表情。

另外，画面上还有许多次要人物：一个带着孩子的妇女、其他犯人、马、农夫、大车，但这些都是在远景中。整个画面极其逼真，如果从表面来看生活的话，艺术家画的一切都像真

的一样准确。观众的确在雅各比先生的画里看到了囚犯们，就像看到镜子中或经过仔细加工的照片上的囚犯一样。可正是这一点表明了缺乏艺术性。拍摄的照片或镜子中的映像，这都还远不是艺术作品。如果这两者算艺术品的话，我们只要照片和好镜子就够了，美术学院就变成了一无用处。不，对艺术家的要求，不是照片的真实，不是机械的精确，而是一种别的更大、更广、更深的东西。准确和真实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但只有准确、真实就太不够了，这还只是用以进行艺术创作的材料，是创作的工具。在镜子映像中看不出镜子是怎样看待事物的，或者最好说，镜子不会观察事物，只能机械地映照。真正的艺术家不是这样。画面上、小说中、音乐作品里一定有艺术家自己的影子。他会不由自主、甚至是不情愿地体现出自己来，他会带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个性、自己的修养水平。这一点并不需要证明。让两个人随便讲同一件哪怕是普普通通的街上的事，常常从隔壁，根本看不到讲话的人，就可以猜出讲话人多大年纪、做什么工作、是军队的还是老百姓，哪个人头脑更发达，甚至能猜到讲话的每个人是什么官阶。四平八稳、丝毫无动于衷地叙述在今天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如果有的话，那肯定是毫无头脑的人，或天生像蛤蟆般没有心肝的人，或者是完全的呆子。而在艺术家身上，则不可能存在这三种可悲的情况，观众就有权要求艺术家不要当照相机镜头，而是要作为一个人去看世界。古代这叫肉眼看世界，甚至说是用心灵之眼、灵魂的眸子看世界。艺术家应从“倒霉”的囚犯身上看到人，并向我们展现人的一切。就算押送官的职业不允许他们多愁善感，因而（从事这一职业的）常常是些没有感情的人，但还是有艺术家在著名的长诗《押送官的故事》中敢于在冷酷

的主人公身上挖掘出有血有肉的形象来①。即使大多数犯人对于自己身处绝境已习以为常，对一切都漠然处之，但这时也不能不说他们仍然是人。所以如果您是一位艺术家，就要把他们当做人来表现，还是让相士和法院侦查官去研究他们的照片吧。

在这种意义上的艺术性，从雅各比先生的画面上是丝毫也找不到的。他摄下了镜头中的每一个人，但却不是在作画，而是犯了一个侦查错误。在他的笔下，所有的人一律都是恶棍，似乎全都一样。因为他认为，镣铐把他们变成了一个模样。在他的笔下，从独眼的押送官到农夫正在卸套的驽马，一切都是丑陋无比的。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画面上的主人公，盖着破席的死者。这个人可能还是个美男子，根据他身上的迹象可以断定，而且学院画派的要求也应该是这样。不可能赋予他普通的身份，不可能取消他典雅的特点：这个世袭贵族在一群下贱的人中已经很显眼，他一生中一直认为这些人是下贱的。

从这幅画里看得出，作为美术学院学生的雅各比先生，在以自己的全力正确、可信、准确地反映现实。这种努力当然是有益的、必须的，对一个美术学院学生来说是值得称道的。然而，这还只是艺术的机械操作，是艺术的入门。当然，如果要涉足艺术创作的话，就必须完全掌握这个方面。首先要克服困难，以便反映生活的真实，目的在于而后提高到艺术的真实。

不过，雅各比先生，您可曾想过，就因为要追求摄影的真实，您的画成了虚假的东西？您的画一点儿都不真实，只是一

① 指俄国诗人、革命家尼·普·奥加辽夫（1813—1877）的长诗《押送官的故事》（1857—1858）中押送官对犯人的同情。当时他流亡国外，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提及他的姓氏。

个情节剧，而不是现实。您过分地追求效果而至强求效果，您甚至不放过农夫身上的破皮袄！可是皮袄怎么会是这么个破法（整个后背上横着一个大口子）呢？您想画出绝对的混乱场面。怎么小偷偏偏会在押送官过来的一刹那去偷戒指呢？我们确信，还在向押送官报告死了人之前，犯人们就都众口一词地告诉押送官这个人手上有颗宝石戒指。他们甚至是争先恐后地说，还可能因此而争吵起来。还可确信，在这批人离开莫斯科之前，在戴宝石的新犯人出现在自己同伴中之前，犯人们还没看到他就已知道他手指上有宝石戒指了。您知道吗？小偷绝对不会在车底下偷戒指。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所有这一批人都太知道这枚宝石戒指了。当这个犯人病得快死的时候，很多犯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他死了就下手偷！"如果一个什么伊万诺夫、彼得罗夫、亚历山德罗夫这样干，那么多犯人能把机会让给一个瓦西卡·米尔诺夫吗？他们出于忌妒也不会让他得逞。就是他偷走了，别人也会立刻把他搜出来。每个人都在想：我得不到，别人也休想得到！所以每个人都紧紧地盯着别人。可是您，雅各比先生，热衷追求效果，您需要的是就在押运车过来的那一刻，让那个精明的小偷去行窃。这里既有行窃的技巧，又有对神圣的亵渎，一箭双雕，效果强烈。我们觉得，在查看死者眼睛之前，押运官大概要先看看宝石戒指还在不在。这戒指可是公家的财物，因为犯人不允许拥有财物。押运官难道忽略了这一点吗？我们相信，他（当然是出于公家的利益）在查看眼睛之前定要先看看死者的靴子（相当好的）。而犯人们玩牌时打斗，似乎也是为追求效果而安排的，因为此时犯人不可能玩牌，他们定会上前看看押送官怎么处理死人，特别是戒指有什么结果。

还有一个很可笑的失真之处，当然这也不值一提。戴了镣

铐的犯人们，有一个还被镣铐磨出了伤，却都没有戴镣铐垫。可想而知，不戴皮垫不要说走几千里，就是一里也走不了。只要走上一站，就能磨得见了骨头。可这里没有画出皮垫。当然您是忘记了这一点，也可能根本不了解这一情况。自然这算不了什么大失误，尽管这几乎如同画马却没画尾巴一样。您既然追求的是摄像的真实，我们还是想指出这一点。整个画面真正的艺术形象，当然是押运官，他画得非常好。

我们相信雅各比先生是走在正路上，不会半途而废，他已经达到了生活的真实，而为达到另一种更高境界的真实，他不能靠创作学院式的作品，不能靠自己绘画老师的指导，而要靠全面的发展、综合的教育。而这一点即便不是所有画家，也是大多数画家一向都缺乏的。

在这方面美术学院是不能有所作为的。学院的一切努力，都是致力于培养专业人才，所有课程都具有功利的色彩，局限于专业知识范围内。比方说讲历史……是从服装的角度讲，讲建筑艺术抛开画法几何学（即靠摸索实现透视法），讲美学理论抛开哲学知识，从骨骼、肌肉、毛发的角度讲授解剖学，却抛开人的自然史。这样的急功近利当然培养不出艺术家必须具备的综合素养，而如果大学里不认真地从这方面下功夫，我们的艺术当然不会有进步，这样，我们永远摆脱不了或好或差的达盖尔① 画法，摆脱不了难以消除的伪古典主义。

关于最后这一点，需要谈得详细些。今年展出了三幅画，是描绘卡戎把鬼魂摆渡过斯提克斯河② 的。为了有益或是美

① 当指法国的路雅·芒·达盖尔（1787—1851），美术家与发明家，摄影术的首创者之一。此处似指使用其摄影方法。

② 或译卡龙，在希腊神话中，他是用独木小舟把鬼魂载过冥河的艄公。斯提克斯河为希腊神话中的冥河。

观，那第四幅画只是一个空框却没有内容，贴了一张小条写着：画即将完成。猜得出这幅画肯定不错。因为画还没有，美术学院就将画框拿来展出了。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画框，作者的名字也没有标出。美术学院之所以让学生画摆渡灵魂的卡戎这一主题，就是因为这里有人体可画。学院式的画是离不开人体的。美术学院认为，如果画面上的人是裸体，或者仅披着一点（不可多）衣服，那么这画就特别精彩。的确，艺术家必须像医生那样学好解剖学，但无论对医生还是对艺术家来说，解剖学都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并且现在已不是那个时代了。克洛托那的弥隆们① 即便不是制伏牛而是制伏大象，现在也引不起我们的兴趣了，而在古代希腊他们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时人们既不知道有猎枪，也不知道有手枪。某一块肌肉的发达与否会关系到国家的命运，仅凭这一点，人民就应以爱惜的态度看肌肉，更何况希腊的气候允许人们尽可能地少穿衣服，不像我们现在必须多穿才行。这就是古希腊艺术家崇尚人体的另一个原因。此外，他们还有一个与我们相同的原因：对美的偏好，没有比美丽的身体更美的东西，这是当然的。可是我们的艺术家在哪儿才能找到这样美的人体呢？在哪儿才能找到模特以便画出的确美丽的人体呢？到哪儿能找这种近乎完美的模特呢？我们这里肯花大价钱的话，好的男模特还能找到，但过得去的女模特却是根本找不到。不是矮腰皮鞋扭曲了双脚的正常形状，就是吃土豆和紧扎裙带使肚子变了形，所以可怜的艺术就只好凭想象来塑造女性。实际上，在画展上我们看到的是什

① 弥隆，公元前6世纪半传说性的大力士，克洛托那人。他能举起一头大公牛，当代人为之惊叹不已。据说他在奥林匹克竞技会上举起一头牛绕场一周，然后在一天之内把这头牛的肉吃光。因此，他的名字在现代文学中成为“大力士”的代名词。

么样的女性呢？阿列克谢耶夫[①]先生展出了一幅露着硕大左乳的《荡妇》，还有来自巴黎的马奈[②]先生的《自由女神与萨蹄尔》。简直是荒唐！展出这最后一幅画显然是为了说明艺术家的想象力何等蹩脚，只能描绘最平淡的东西，把自由女神身体画成了暴尸五天的死相。另一方面，身着目前时装的女人不会画进严肃的画里，因为钟式裙带和紧束的腰是再难看不过了，画家定是避之唯恐不及，因为要追求比时髦画更有生命力的东西。可是在画展上，这样的画不止一幅。比如斯特拉申斯基展出的《哥哥书房中的少女》。这位姑娘手里拿着一本未读完的小说，正在扯开一幅不太体面的画上的帷幔观赏。问题不在于情节，少女画得很好，很纯真，穿着粉红色的衣裙，束腰、钟式裙、相配的紧胸衣。但过不了五年，流行新的时尚，她的粉红色衣裙就过时了，看上去就会显得可笑，让人觉得像是从电报局扯下的画片。那么艺术家如何是好呢？人体模特找不到，而钟式裙、紧胸衣、燕尾服又令稍有品位的人们感到厌恶。

那究竟怎么办，这以后再说。我们想指出，伪古典派不仅离不开人体和夸张的宽大披风，而且还非得要卡戎是个肌肉极为发达凸显的健壮男人。美术上的伪古典主义，或确切地称之为学院派，毫不顾及卡戎是一衰弱的老人，他运的是灵魂而不是粉袋子；毫不顾及卡戎不需花什么力气，因为他的船并不

---

① 尼·米·阿列克谢耶夫（1813—1880）的这幅《荡妇》，被视为低级趣味的作品。他后来画宗教画，为彼得堡伊萨基辅大教堂制作了一些绘画和镶嵌的作品。

② 爱德华·马奈（1832—1883），法国画家。他的创作接近印象派，一些作品运用印象派的画法，与印象派创始者莫奈等关系密切，但从未参加过印象派的画展。

沉。并且，卡戎不是一个爱生气的老头，他只是看到鬼魂中还有一个活人但丁[1] 才生了气。不久怒气平息下来，又冷静地做起自己永恒不变的事。学院派才不管在思考这个题材时出现的这些考虑呢！他们要是画一个渡手，就得要他拥有像泰万先生的摆渡工人那样健美的肌肉。

但观众如果注意到展出的这些画都出自学生之手，则会很容易认可这些描绘卡戎和鬼魂的画。因为作画者从中只是追求写出实景，追求画面和明暗的准确。从这方面讲，这几幅画还是令人满意的。从中可以看出对模特的研究和他们的努力，将来在这些先生中可能会产生艺术天才。弗拉克斯曼[2] 的影响，在画面上看得很明显，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弗拉克斯曼最好、最高超的方面，而只是他的画技本身，无论在布局上还是在色调上都没有体现出他的艺术蕴涵。当然，弗拉克斯曼的画里还谈不上色调，但人物轮廓本身就表明，他像看某种透明的东西一样看待但丁的灵魂，而躯体却模模糊糊地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如果画家想在自己的画面上表达这些的话，可能会更有艺术性，更接近但丁的幻觉。但这会不符合美术学院的要求。老头卡戎不是大力士，他衰老的肌肉接着命运的不可违背的意志活动，他不去努力干，他不会去拼命。他的活动是下意识的、不由自主的，不费一点儿力气的。学院派原则却不允许这样来描绘他，因为这样大概就没有了轮廓分明的肌肉，可说不定倒会诞生真正的艺术品呢。

---

① 见但丁：《神曲》，第 1 部，《地狱》，第 3 歌。冥河上摆渡的艄公卡戎看到游地狱的但丁，生气地说：你这个活人，离开鬼魂吧。

② 弗拉克斯曼（1755—1826），英国雕塑家、英国皇家美术学院院士。他的一些作品表现出“新古典主义”的“永恒性”的理想。

观众又观赏四幅同样内容的画《王妃索菲亚·维托夫托芙娜在瓦西里二世（失明者）的婚礼上扯下了瓦西里·科索伊公爵的腰带》①。其中三幅获得了画院最高奖——一等金奖。也是这些画家中的三位②，在去年的画展上以自己作品招来彼得堡观众的讥笑，后来却凭这幅《奥林匹亚运动会》获得了二等金奖。今年的《扯腰带》也是很吸引人的故事。四位画家画得出奇一致。主要出场人物索菲亚·维托夫托芙娜，一个稍胖的太太，拿着腰带站在舞台的中央，像舞蹈演员完成舞步，用一只脚尽力转身，然后张开手和脚，面对观众站住。三幅画上的索菲亚·维托夫托芙娜，都是这样站着，如果要找区别的话，那就是舞蹈演员通常是空着手，而她手里拿着瓦西里·科索伊公爵的腰带。其他人物的分布都同芭蕾舞落幕前最后一个画面一模一样。舞台上的布局是由芭蕾舞教练指挥的，剧团表演就是要产生最大效果，而不必太顾及是否自然，舞台效果完全不同于自然效果。舞台效果是有条件的，受舞台需要的限制。且不说其他条件，只讲一点：演员不能背对观众，转身最多不能超过侧影。只这一点就扭曲了自然效果，但观众已习惯并认同了舞台效果，只能如此。这种习惯使观众在一个芭蕾舞剧中看到一只普通的船桨却能忍耐而不吹口哨。当然，这桨也稍稍不同于一般的桨，它要粗一些，中间还突出了一块或者刻有小槽，饰渔人的演员举着这么一只漂亮的粗桨。后来人们弄清楚

① 1861年以这一题材参展的共有五位画家：波格丹·波格丹诺维奇·韦尼希（1837—1872）、瓦西里·彼得罗维奇·韦列夏金（1835—1909）、卡尔·费达罗维奇·古恩（1830—1877）、尼古莱·德米特里耶维奇·德米特里耶夫（奥连堡）（1837—1898）、巴维尔·彼得罗维奇·奇斯佳科夫（1832—1912）。其中韦列夏金、古恩、奇斯佳科夫获一等金奖。

② 他们是韦尼希、古恩、奇斯佳科夫。

了：当开始群舞的时候，男演员要站在舞台中央用脚的动作表达各种情感，船桨的一端支在地上，另一端顶在肩头。这动作要柔软、协调、优雅。之后领舞的女主角在另一个男演员的帮助下，也是通过各种优雅的旋转，一只脚站到上面提到的船桨的刻槽上，另一只脚要抬起，像法尔科奈的彼得大帝塑像高举手臂一样[1]，然后，她慢慢地用脚画一个圈，强健的男演员要牢牢地握住桨，却尽量显出这在他毫不费力，甚至是一种快乐。女演员为了保持平衡要一只手扶着他的肩膀，而另一只手只用手指拉住他的手，脚踩到槽上做完整个动作。而后，女演员像埃俄罗斯[2] 口中飘出的羽毛一样轻快地跳到地上，继续用脚表达她的情感。观众丝毫没有被戏弄的感觉，相反，对表演很满意，还要求重复这个动作。在迷人的音乐声中，男演员又用肩膀擎起重三四普特却轻如羽毛的女演员。她的脚令人联想起法尔科奈雕塑的手，于是端正地、慢慢地画了一个圈。

显然，舞台上的自然不同于生活中的自然。所以舞台上的美，也不同于生活中的美，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如文学的美。例证是很多的，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有的剧本在台上演起来很好，读着却不尽然，有时甚至恰恰相反。尤其是舞台上的画面不适用于美术创作。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外国画册中出现的芭蕾舞或歌剧的绘画就能得到证明。画索菲亚·维托夫托芙娜

---

① 法尔科奈（1716—1791），18 世纪法国杰出的雕塑家，所塑造的彼得大帝像《铜骑士》，1782 年落成于彼得堡议会广场，是他的不朽之作。

② 风的主宰者，在荷马时代和后来传说中他并不是神，只是诗歌中的诸风的主宰者的形象。但后来与埃俄利亚人神话中的始祖埃俄罗斯相混同。以后人们以他来比喻风。普希金在《叶夫盖尼·奥涅金》第 1 章第 20 节中说“飘飘飞舞……像埃俄罗斯吹送的羽毛。”

举着瓦西里·科索伊腰带的四幅作品，正是给人留下这种印象。这几幅画中的姿势纯粹是舞台上的，而不是生活中的。而五颜六色的服装、金饰、无领袍等，只能形成芭蕾舞的效果，与真正的绘画艺术毫不相干。

类似这样带有舞台痕迹的画，还有巨幅的《伊万·扎莫伊斯基在国家议会上向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陈诉民怨》。画上有近百名穿着淡紫色长衣的合唱演员，他们或坐或站，其中的一位坐在特别的椅子上。表情全都严肃，心情关切：都在关心人民的利益，亦即关心他们自己。而其他的人都是淡紫色衣服，带着小碎皱褶。事实上很可能正是这样，国王的坐椅和议会的大地主们就是这样的坐次，就是这样都穿着同一种颜色的衣服。但生活中常常有一些事若出现在画面上定会损害艺术价值。再说，这幅画里还罕见地大量使用了淡紫色。

还有并排摆的两幅画也很吸引观众，这是茹拉弗廖夫先生[①] 的《弥留的父亲》和切尔卡斯基先生的《遗嘱》。前一幅比后一幅好得多。在《遗嘱》中，所有人物排成一行，像跳芭蕾舞一样朝观众的左方走去；右边站着一个衣衫褴褛的晋见者，肮脏不堪，像莫斯科的伊万·雅科夫列维奇[②] 一样。他面向观众的左边，对着弥留之际的女主人公。女主人公躺在床上，刚刚立下或打算立下遗嘱。她的手伸向左方的笔。再左边一点，在床后站着一个侍女模样的人。她面向左对着满脸卑鄙狡诈、掩饰不住欣喜的侄子。这位侄子也面向左，对着更卑鄙

① 菲尔斯·谢尔盖耶维奇·茹拉弗廖夫（1836—1901），后来成为著名风俗画家。杰作有揭露社会黑暗的《婚礼前》（1874）。

② 伊万·雅科夫列维奇（1780—1861），莫斯科的狂信苦行的基督教徒，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谢苗·雅科夫列维奇的原型。

的书吏，而书吏不知为什么伸手向左，似乎是朝着门。尽管弥留之际的女主人公的面色苍白，表现得很传神，整个画面的调子还是轻松的。这个作品无论构思上还是技巧上都看得出是出自学生之手。作者去年得了一等银质奖章。

那么，不成功在哪里呢？这是习作，那也是习作，再看下去——还是习作。几乎整个画展都是学习性的作品。这是怎么回事？画展的目的是什么？主办者的意图是什么？怎样看待这次画展呢？

既然大部分作品都出自美术学院学生之手，那么可以说一年一度的画展不过是一种类似于其他学校中司空见惯的、公开的、隆重的考试和结业典礼。这种考试更方便，每个学生的成绩一目了然，只需打量一眼就可给出分数。说它是一种公开的考试和结业还因为：凭公开的成绩可以给每个人以显而易见的奖励。所以，这里似乎应该没有任何其他人参加，清一色的学生作品，不过如果美术学院是把其课堂活动向公众展示，那么自然也该展示获得银质奖的画，从一等奖开台，以及临摹石膏像和模特的画。这样观众就会对美术学院的课程有一个清晰的轮廓，观众也能了解成绩的连续性，最主要的，美术学院的整个活动也就更清楚了。如此也还不是最全面，迄今为止院士和教授们极少展出自己的作品。即或说从学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教授和老师的影响，但有一些教授并不是实职而只是头衔，有一些院士不是学术会议成员，但也算是学院的人。他们做了什么不愿意让公众知道，认为这没有必要，毫不考虑艺术失去了公众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就不会有让社会花费巨资的美术学院。

无论如何，不论是作为美术学院工作一年一度的汇报，还是作为美术学院单纯的教学工作的汇报，这次画展都不是很全面的。更何况其中还有一些外国画家、一些非美术学院的俄国

画家的作品。画展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为了培养观众的艺术素养？如果是的话，在这方面俄罗斯埃尔米塔日博物馆[①] 不是有十分丰富的收藏吗？

由此可见，讲来讲去都是学生作品，这并不奇怪，因为本来这就是学生作品的展览，只有几幅作品是例外。关于这几幅作品，我们还应从头说起。

在早就公认是大师的作品中，首屈一指的当属著名教授艾瓦佐夫斯基[②] 的三幅画：（1）《被暴风雪逼向大海的羊群》；（2）《克里米亚南岸的帕尔杰尼》；（3）《叶夫帕托里亚郊外的暴风雨》。艾瓦佐夫斯基的才华有口皆碑，就像大仲马的才华一样，这两位艺术家有着极多的相似之处。大仲马先生写起来异常轻松、快捷，绘画之于艾瓦佐夫斯基先生也是一样。大仲马的创作惊人之多，艾瓦佐夫先生也是如此。两人都追求独特的效果，一定要独特，因为他们根本不写、也不屑于写平常的东西。其情节的引人入胜也是不容怀疑的：人们都是如饥似渴、着迷似的读大仲马的作品，艾瓦佐夫斯基的画作也为人们争相购买。两位艺术家的作品都使人仿佛置身神话境界：孟加拉烟火[③]、轰响、叫喊、呼啸的狂风、闪电。两个人都是用极普通的色调，然后再增加这样或那样的艺术效果，也是取自自然，但这效果是极尽夸张之能事，近于漫画。说实话，这样的比较对艾瓦佐夫斯基先生并无任何不敬之意，所有的艺术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张，只是这种夸张不可过“度”。肖像画家非常懂得这一点。比方说，原型上的鼻子稍有点儿大，在艺术创

---

① 彼得堡的美术、文化、历史博物馆，世界最大的博物馆之一，1764 年建立，1852 年对公众开放。

② 伊·康·艾瓦佐夫斯基（1817—1900），俄国著名的海景画家。

③ 一种烟火剂，燃烧时放出闪烁的火花。

作时为了逼真就要画得稍大一些。但如果再大一点点，就是漫画了。蹩脚的肖像画家明明知道这一点，就是画不好鼻子不大不小、嘴巴和下巴都很适中的平常面孔。平庸的作家，而不是果戈理，是无论如何也塑造不出巴维尔·伊万诺维奇的肖像，写不出他那招人喜欢的举止、军人般的敏捷、平和的性格和行为。大仲马不会描绘这样的形象，艾瓦佐夫斯基先生也不喜欢这类司空见惯的事物。大仲马的三个大名鼎鼎的主人公，总是碰上不寻常的事：一会儿是他们三人包围了城市，一会儿是他们挽救了法兰西，建立了丰功伟绩。艾瓦佐夫斯基先生的作品也一样：岩石，惊涛拍打着山岩，上面落着海鸥，此外别无他物。犹如阿拉密斯或是波尔托斯[①] 追赶敌军一样，羊群被晃得十分耀眼。艾瓦佐夫斯基先生将这一切都表现在画布上，他的绵羊看上去的确十分耀眼。现实是写出来了，甚至有点儿夸张，但这还不是艺术，这个鼻子比应有的大了两倍。艺术家在一大幅画上也许可以画两三只这样耀眼的绵羊，但若是画一大群就不合适了。整个画面这样刻意渲染效果，看起来都刺眼了，让人一下就联想起大仲马笔下的达达尼昂[②]的奇功。本次画展上有一幅画羊群的画，绵羊被暴风雪的灰色笼罩着。的确，这都是可能的，生活的真实是有了，但却不见艺术的真实。哈姆[③] 所作狩猎漫画的著名主人公克拉克男爵，一天走出沼泽地去捡一只被打死的野鸭，脚被绊了一下，摔倒了，起来时一伸手碰到了躺在草地上的野兔。这时，他的猎枪出乎意料地走了火，打中了从旁飞过的田鹬。这些实际上有可能发

①② 阿拉密斯、波尔托斯和达达尼昂都是大仲马的小说《三个火枪手》(1844）及其续篇《二十年后》（1845）和《十年后》(1848—1850）中的串篇人物。

③ 法国漫画家阿-什-赫·诺埃（1819—1879）的笔名。

生，但一个艺术家不会把这些都画进画中。正如阿克萨科夫[①]遇到这类事也不会写到作品中。但艾瓦佐夫斯基先生面对这种非艺术的真实并没有止步。常常有这样的瞬间——夕阳把一切都辉映成了金色。艾瓦佐夫斯基先生截取这样的瞬间而把画面镀成了金色，请看《克里米亚南岸的帕尔杰尼》。画面上靠岸抛锚的船被夕阳映照，整个右舷都像是金子做的。实际上该像果戈理描绘草原那样[②]略点一两笔就可以了，要爱惜观众的眼睛，不要作金色的画吧。大仲马在自己的无边的幻想中不能控制过分夸张的效果，因此他不能算是艺术家。比方说，基度山伯爵是很富有，但何必非用绿宝石瓶装毒药呢？写那吃一小撮就管几天饱的营养素又何用之有？现实中当然能找到做一个小瓶用的大绿宝石。但要有分寸，要适可而止。众所周知，太阳光的明暗构成无数美妙图景，如果注意观察阳光的艺术效果，那么就会看到许多难以言传的、几乎无法把握的情形，与其说是美景，不如说是奇观。所以在向人们展现这种景观时，要注意适度，是一年、一天中的“罕见”的现象。同时，不能忽视太阳每天寻常的有益的再现。否则，如果只表现奇景，就会变成神话，变成基度山。真正的艺术家是对“度”有精确把握的，是十分讲究分寸感的，对于分寸体会得惊人地准确。在果戈理笔下，马尼洛夫用他那甜腻的腔调同乞乞科夫谈话，只有一次说到“盼望已久的节日”[③]。如果不是果戈理，换一个

---

① 指俄国作家谢·季·阿克萨科夫（1791—1859），他写有《钓鱼笔记》（1847）、《奥伦堡省猎人笔记》（1852）、《猎人讲的各种狩猎故事和回忆》（1855）等。

② 指果戈理在其小说《塔拉斯·布尔巴》（1835）第 2 章中对草原的描写。

③ 见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第 1 卷，第 2 章。马尼洛夫与乞乞科夫均为该书的人物。

人写他们站在门旁商议谁先过去，要回答乞乞科夫“为什么说他有教养”的问题，就会让马尼洛夫大谈“盼望已久的节日”、“心仪已久的庆典”之类的胡话。但艺术家分寸掌握得极好，马尼洛夫的回答也很受听，同时很简单：“就因为那个。”大仲马和艾瓦佐夫斯基先生绝对忍不住，绝不会用这样没有个性的回答。遇到这样的好机会，其中一个定会胡诌一气，另一个定要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

艾瓦佐夫斯基先生的《叶夫帕托里亚郊外的暴风雨》，同他所有画暴风雨的画一样极为精致。这方面艾瓦佐夫斯基先生是一位大师，无与伦比，是位真正的艺术家。他笔下的各种暴风雨体现出兴奋，总是美不胜收，让人感受到真正的风暴。艾瓦佐夫斯基先生的这一才能不可谓不全面，因为暴风雨本来就是变化无常的。或许对于描绘永远变化无常的暴风雨来说，无论怎样追求效果都不算过分夸张，是不是因此观众才没有在艾瓦佐夫斯基先生这幅描绘暴风雨的画上感觉到过分追求效果呢？

这次画展中画水的作品相当多，除了艾瓦佐夫斯基先生的作品外，有瑞典风俗画家拉尔松[1]先生邮来的十三幅参赛作品、有赖斯纳先生的《尼亚加拉瀑布》、戈拉夫斯基[2]先生的两幅、韦列热夫先生[3]的暴风雨、卡拉姆[4]的《四州之湖》，甚至还有伊万诺夫[5]先生的画，摆在第一展室，令所有参观

---

① 马库斯·拉尔松（1825—1864），瑞典写生画家和风景画家，主要画海景。

② 阿·吉·戈拉夫斯基（1833—1900），俄国风景画家和肖像画家。

③ 德·瓦·韦列热夫（1841—1861），俄国画家。

④ 亚·卡拉姆（1810—1864），瑞士写生画家和风景画家。

⑤ 伊万诺夫，俄国画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提及他的父称和名字。

者大失所望。在不知怎样上了画展的伊万诺夫先生的这幅风俗画上，右侧是岸、两座塔，左边就是水。作者要表现什么，不得而知。这幅画没有收进参观指南。为什么要展出这幅画呢？这并不是学生的习作，这是绘画界有经验的老画家的作品。在县城的车站或小酒馆倒是常见有这种风俗画。但愿展出这幅画不是为了反面的目的，不是要向学生表明不应该怎样画，有哪些禁忌，平庸的后果是什么。

瑞典画家拉尔松的十三幅画，特点是画幅大、标价高和使用黄褐色。他的画在黄褐色的天空下是黄褐色的波涛击打着黄褐色的礁石。生理学上说有一种人对颜色的识别不正常，但普通人的这种毛病就不像在画家身上的那么显眼。画家若是分不清黄色和蓝色就会出现拉尔松先生作品上那种可悲的情形。他有一幅画描绘夕阳中岩岛群沉船的景象，画幅几乎有《庞贝的末日》① 那样大。如果画面上的水、天、礁石都是自然色的话，这也许是一幅很好的画。

卡拉姆的《四州之湖》堪称本次画展的精华。高耸的群山间，静卧着蜿蜒的大湖。画面十分逼真，不仅每个部分、每个细节都精雕细琢，更吸引人的是艺术家魔术般将自己的感情融进了画中。画面上其实并无出奇之处，群山，薄雾中的静水。但每个观众都无一例外地深深陶醉于这幅画的意境中，仿佛看到画家自己凝望远处的群山、明朗的苍穹、薄雾的远方，陷入了忧郁的深思。他是怎样把这一切体现到画面上，达到这种效果的——这是他的秘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他不是简单地将

① 庞贝，意大利南部城市，公元 79 年火山爆发时被湮没。《庞贝的末日》是俄国画家卡·帕·勃留洛夫（1799—1852）据这座古城的印象所创作的名画（1833）。

自然景色拍摄下来，而仅仅是以之为工具，用自己亲近平和的、静谧凝思的心绪感染观众。复制这样简单的画面，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但复制后是否还保留了原作中的灵魂，就大可怀疑了。

还有一个瑞士人迪代[①]，展出了阿尔卑斯山的赖兴巴赫瀑布。这幅作品也称得上是大师手笔，不是简单地将瀑布拍摄下来。迪代没有寻找超自然的或偶然的表现方法，他不追求奇特效果，也不单纯地为瀑布照相，而是通过自己的画来表现气势磅礴的赖兴巴赫瀑布给画家留下的印象和唤起的心境。

如果比较一下拉尔松巨幅画《沉船》（标价四千卢布）和卡拉姆的小幅《湖》（标价一千二百卢布），或迪代的不大的《赖兴巴赫》(标价一千五百卢布)，那么，打算买拉尔松的充斥着黄褐色调的巨作就很不划算了。也许拉尔松先生想以大取胜，认为我们这些不开化的人会视之为优点。

我们的风景画很繁荣，远远超过历史风俗画，俄罗斯很可以以几位大师的名字为荣。在这些大师画前，拉尔松之辈尽可搁笔不画，卖掉所有的黄褐色彩。我们在风景画方面的成就，大概得益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是以农事为主的民族；二是在风景画领域学院派难以立足，这样它就不易限制、约束天赋的发展。在风景画方面老师是多种多样的。无论何等天才的教授都难以与之相媲美——这就是大自然本身。面向大自然的人，学习无疑会是成功的、顺利的、亲切而非傲慢的，不仅不折磨学生，还按着每个学生的能力或快或慢地引导他发展特长。

---

① 费·迪代（1802—1870），瑞士写生画和风景画家，瑞士写生画的奠基人之一。

我们难以把今年画展上出色的风景画都一一列举出来。首屈一指的当属戈拉夫斯基[①]先生的两幅作品。其次不能不提到列扎诺夫[②]、达利盖姆[③]、卡缅涅夫[④]、迪克尔[⑤]、苏霍多利斯基[⑥]、格里亚兹诺夫[⑦]、波波夫[⑧]、梅谢尔斯基[⑨]先生，尤其是大克洛特[⑩]先生等人的优秀作品。这些艺术家的许多作品中，体现了对大自然的生动感受。其中有一些艺术家如大克洛特先生，以一种艺术的率真而不雕饰的真情来描绘大自然。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的特征。有些地方可以看出，像戈拉夫斯基先生就总是冷静地避免艾瓦佐夫斯基先生那样的夸张效果，虽然不是贯彻始终。在这些作品中还有一些透着极好的追求和出色的构思。但画得不经心，还没正式上色，如达利盖姆先生的作品。或许由于画得匆忙（可这幅画并没人订购），或许是由于对观众的轻慢，达利盖姆先生的这幅还没上色的作品，尽管显示了其杰出的、前途无量的才能，毕竟还只有基本的色层。

今年的风俗画家中，居于首位的当数展出《捕鼠》的布拉格列耶尔[⑪]先生。这幅画的场面率直有趣，没有一丝牵强做

① 阿·吉·戈拉夫斯基（1833—1900），俄国画家（风景画家和肖像画家）。
② 维·米·列扎诺夫（1829—?），俄国画家。
③ 伊·达利盖姆（生卒年不详），俄国画家。
④ 瓦·康·卡缅涅夫（1823—1874），俄国画家、美术学院院士。
⑤ 叶·爱·迪克尔（1841—1916），俄国画家。
⑥ 彼·亚·苏霍多利斯基（1834—1903），俄国画家。
⑦ 瓦·费·格里亚兹诺夫（1836—?），俄国画家。
⑧ 亚·帕·波波夫（1835—?），俄国画家。
⑨ 阿·伊·梅谢尔斯基（1834—1903），俄国画家。
⑩ 米·康·克洛特（1832—1902），俄国著名的风景画家。
⑪ 费·布拉格列耶尔（1792—1883），比利时画家。

作。尽管描绘的是生活中的寻常小事，内容简单，却生动有趣，令观众忍俊不禁，当然不是嘲笑，而是感到亲切。画面上一只老鼠跑到柜子里，一个老头儿和一个老太太想把它赶出来打死。老头儿手里拿着笤帚等着打死这个家贼，老太太用镊子把柜子里挡着老鼠的东西一件件地往外夹。看得出，女主人真是着了急，为了家里的安宁已经顾不上什么整洁了。

莫罗佐夫① 先生的《割草小憩》和科尔祖欣② 先生的《家中醉酒的父亲》，获得美术学院的二等金奖是名副其实的。由此一来，不熟悉伪古典主义要求的观众就糊涂了，怎么利托夫琴科③ 先生的《摆渡灵魂的卡戎》也能获得二等奖呢。不过，在学院派的要求中，有我们的聪明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奇迹。

希尔德④ 先生和佩罗夫⑤ 先生可称得上真正的风俗画家，绝非一般。希尔德先生因其《同债主清账》而以学院派闻名，佩罗夫是以《乡村布道》荣获一等金奖。《同债主清账》极似传奇剧，情节的巧合很像平庸的轻喜剧，这类剧的结局不是事物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完全是偶然性。这部传奇剧的主人公是一个外貌漂亮的年轻人，他碰巧在债主来讨债时到达。借债人是一个年迈的病人，坐在椅子上高兴无比。地上是撕碎的期票和刚打开的皮箱，看得出是从这个箱子里拿出钱还债的。病人的女儿搂着主人公的脖子向他表示谢意。而这位主人公对她甜

---

① 阿·伊·莫罗佐夫（1835—1904），俄国画家，后为巡回展览派成员。

② 阿·伊·科尔祖欣（1835—1894），俄国画家。

③ 阿·德·利托夫琴科（1835—1890），俄国巡回展览派画家。

④ 尼·古·希尔德（1828—1898），俄国画家。

⑤ 瓦·格·佩罗夫（1833—1882），俄国现实主义画家，巡回展览派创始者之一。

蜜的拥抱并没太注意，而是威吓地盯着正要开门溜走的债主，债主身后是地区督察官涅墨西斯。此外还有几个人物：妻子，孩子。房间陈设破旧，但女主人公，那位少女穿着却相当华丽。观众可以想象接下来的事情：为了向使父亲免受牢狱之灾使财产免遭查封的救星表示感激之情，女儿嫁给了这个恩人，尔后当然她会深爱自己宽宏的丈夫，再之后老人在椅子上盼来了外孙后无憾辞世。接着还会是这样的发展：现在的救命恩人老迈生病，也是坐在椅子上，也需要帮助，但并没有发生现在这样的事，因为这样的巧合只有在传奇剧中才有。

佩罗夫先生的《乡村布道》以其特有的率真而打动人心。画面上，农夫、农妇、瞌睡的地主、晴朗的天空、宗教游行、孩子们，一切几乎都很真实。这是一种只有真正的艺术家才能达到的艺术真实。还有一幅出色的作品得到了美术学院的最高奖——一等金质奖。这就是小克洛特先生的《最后的春天》：敞开的窗前病入膏肓的少女坐在一张大椅上，她患了肺病，捱不过这个春天了，家里人都知道她的病情。一个姐姐站在窗户旁边哭泣，另一个姐姐跪在病人身旁。病人的父母坐在屏风后面交谈，他们的话题定是很伤心的。少女的情形很糟糕，她的姐姐们情绪更差。而窗外一片和煦、明媚的春光。整幅画作得很精细，无可挑剔，但结果却不太好——谁会在办公室或客厅挂上这么一幅描绘病容的画呢？当然没有人愿意，谁也不愿意。我们知道，人们针对自己和亲近的人总是不停地 memento mori[①]，其实应尽可能回避不提。否则，除了不断让人生活得不愉快之外，不会有任何好处。死亡本身就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而等待死亡就更令人忌讳。这样一来，这位画家就给自己

① 拉丁文：想到死亡。

出了一个非同小可的难题：把令人厌恶的事表现得很美。这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做得好的，我们每个人都熟悉这亲人辞世的情况。这是一个极其沉重的、必须承受的打击，据说任何人都应对此有所准备。这都是废话，因为无论人们怎样对这种事有心理准备，总还好像是出乎意料。有的戏剧作品中，舞台上就表现死亡，为什么不呢？正如以哭灵为业的女人所说，死亡是人间常事。不过试想，一个男演员或女演员在台上要像真实情况那样演出濒死状态，一会儿要把他像火炉中的树皮一样翻腾一下，一会儿他又欠起身睁着弥留之际的大眼睛，一会儿他用嘶哑的声音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话，发青的手朝空中乱抓，像要夹起空气，一会儿直翻白眼，像外省演奥瑟罗[1] 的三流演员，他的双腿发硬，脚趾跷起。观众看到这种演出，一定要四散而逃。小克洛特先生就是要向我们展现濒死的少女，同时还有几乎一家人的惨状，而且不止一天、一个月，只要将这幅技艺精湛、情节悲哀的画挂在墙上，就永远处于这种情绪中。任何一个观众都受不了，非逃开不可。不，艺术的真实同生活的真实完全不同，完全是另一回事。

有的画家利用现成的内容，把绘画当做完成一种任务。如几年前有一位画家，好像是布龙尼科夫[2] 先生，展出了自画的取自莱蒙托夫作品的濒死角斗士[3]。画面上角斗士果真就要咽气了，但因为在诗人笔下他临死时想到了祖国，布龙尼科夫先生就把这种回忆画成角斗士头上的云，很是模糊。这很像从主人公嘴边拉出一条线的古代版画。还有，也是几年前，一位

① 指莎士比亚同名悲剧《奥瑟罗》的主人公。
② 费·阿·布龙尼科夫（1827—1902），俄国画家。
③ 采用的是俄国诗人米·尤·莱蒙托夫（1814—1841）《垂死的斗士》（1836）一诗的题材。

先生展出了两幅画，一幅是画得不错的松树，另一幅是画得同样不错的棕榈树，解释说这取材于莱蒙托夫或是海涅的作品——松树在想：棕榈树在南方多么遥远哪。

今年也有三幅类似的作品：据波隆斯基先生作品画的《女祭司》，由普希金小说而来的《上尉的女儿》，由歌德而来的《浮士德与梅菲斯特》。这类作品很少有成功的。文学作品可以描绘出感情的来龙去脉，而绘画只能表现一个瞬间。怎么办呢？要么是画五个、十个情感色彩各不相同的"女祭司"，或者不做这种根本不可能的事。

值得称道的是，此次画展好在没有表现战事的作品，这类作品过去每次画展中都有许多。这很自然嘛。时代已经变了，社会如今关注一些别的同样重大的事情。当然，这次也有几幅取材军事生活的场景，但好在为数不多，其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类东西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艺术性可言。《军事生活小景》是耶本斯先生① 的作品，画展说明书中对此极其推崇："阿道夫·耶本斯（Jebens）先生是波利·德·拉罗什② 的学生，1848 年来到俄罗斯，有幸向沙皇尼古拉一世进献描绘军事场面的作品，因而奉陛下之命创作军事场景组画直到今天。"耶本斯先生展出两幅场景，确切地说是两组士兵，都穿着制服，佩戴相应的绶带和领章。由于他在这方面是专家，应该说一切都画得很好，形式上没有什么毛病。

这次画展上肖像画相当多，同样，摄影作品也不少，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结合达里先生的文章再谈。

---

① 阿·耶本斯（1819—1888），德国画家，1845—1866 年侨居彼得堡。

② 波利·德·拉罗什（1797—1857），法国历史题材画家。

这次展出的建筑设计很少，不超过十一幅，都富丽堂皇，气派非凡。总的说，画院对我们的简朴、实用的建筑不感兴趣，所作的建筑设计总是规模宏大的。关于它，我们也留待以后再谈。

有感于《俄国导报》一则哀伤的短评

花鸽子在呻吟……[①]

首先，我们摘录我刊5月号上我们对《俄国导报》谈过的一段话，这是有必要的：

“从世界之初起，任何一个社会中总是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他们维护自己认为不可动摇、永不改变的观念。他们之所以喜好这种不可动摇性和固定不变性，主要是因为这符合他们当时的物质利益，而有损于他们的大多数同胞。而对于他们来说，只要他们自己活得好，即使全世界着了火，也不在乎。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形成了自己的道德准则和其他准则，常常是利用初始的正确的道德思想，为了个人利益加以歪曲，使其失去其原有的本质。自然，许多人仇视一切进步的迹象、一切新事物，不管这是从哪里来的。不过，这种现象是正常的，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同社会上的这种多数人一同存在的还有少数派，他们面对多数派的僵化、令人憎恶的迟钝、对于个人利

① 这是俄国诗人伊·伊·德米特里耶夫一首诗（1760—1836）的首句，曾多次谱成音乐。他是俄国感伤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益的错误理解、为蝇头小利而歪曲一切自然的、正确的思想，感到很痛心。尤其是当他们面对那些几乎总是出于私利而歪曲事实的人、腐蚀人群和阿谀奉承的人。在这少数派中蕴藏着与整个社会的停滞相对立的进步的有生力量。这两个方面的存在各自都是合理的，甚至是相互需要的。但两者总是处于不断的敌对和斗争中。同时，两个阵营中又常常有一些诚实的、道德高尚的人。在那少数派中还有一些天才的人物。另外，还总是有诚实的、正直的、准备为社会的利益牺牲一切、坚强忍受一切可能的迫害的人。但其间也有幼稚的、爱大吵大嚷的人。他们四处奔走，冲在最前面，粗通新思想一点儿皮毛，鼓吹新思想走到了极端，使新思想在本已对其仇视的多数派眼中变得庸俗不堪。正是这些人常常会危害任何新思想。这种人的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在各个时期、各个民族中随时随地都存在，他们的存在也是符合某种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的。但无论这种人有多么可笑，他们之中还是常有为数不少的人诚实正直，一心忠于事业。总的说，人群中诚实、高尚的人还是比卑鄙小人多。有远见的人看到一些人在社会少数优秀代表中宣传新思想，绝不会根据这种大吵大嚷的人的表现来判断新的进步思想的坚定性和正确性。但那些受利益驱使逢迎多数派的人，会很快抓住大吵大嚷的人的可笑之处，拿出来向他们的听众大肆渲染。因为这用不着费神，只要会挖苦人，有时诽谤一下，就万事大吉了。”

现在我们再为读者摘录《俄国导报》以“哀伤的短评”为题在最近一期（8月号）发表的一篇冗长的气愤话的主要部分。第8期还有另一则“短评”，但我们只谈这则“哀伤的”。

我们原打算在本期谈的东西很多，但人有人的打算，上帝却另

有安排。情况迫使我们将对俄罗斯文学的观察留到一个更合适的时候再谈。

可怜的俄语创作，可怜的俄国教育！等待你们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呢？以往的东西很少，未来是混沌和黑暗。各方面都让人感觉空虚和乏力，缺乏生活根基，缺乏取之于事和用之于事的思想。我们从来没有用现在这么多话语来谈论独立的思想。然而，最平庸的陈腐之论，谄媚逢迎地重复来自他人生活的见解，僵化的被遗忘的或是偶然和零散的见解，缺乏相互联系和意义的见解，这些从没蔓延到今天这种无所不及的地步，别看现在所有的人都好像极力要按自己的想法生活，不向权威屈服。如果不是情况复杂，那么弄清冒充思想的每一个语句的来源、揭穿其贫乏和庸俗的内容，该是很容易的事！将来研究现代教育史的人会做到这一点，那时，我们生活中这些一时的现象产生的原因便一目了然了。这些现象更替极快，我们经历着一个又一个阶段。看来在我们的生活基础中，蕴藏着不尽的创造力，并不停地发生作用，每时每刻都在摒弃旧的，产生新的。

但实际上，众所周知，是什么都不存在的，这个进步、所有这些变化、种种学说的交替、一个又一个发展阶段——全都如同肥皂泡一般。没有什么能比我们的思想家们谈论生命和进步时那一脸庄重和慷慨激昂的模样更滑稽了。他们以为自己在钻研热门的问题，就嘲笑那些献身科学、研究抽象或遥远学问的人。但是在科学上只要研究，就会有益于事业。对于真正的知识而言，没有不值得研究或研究而无成果的问题或现象。相反，那些专为生活杜撰的、自夸为有生命力的学说，常常是没有一句有补于事的话，没有一点儿对事业生活的可取之处。这些大谈生活的学说，常常比数学计算本身、比分解研究的学问本身更加脱离生活。数学公式是从无数生活现象中得来的，并且对于理解生活现象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无论多么专业化的学问，都以现实生活中的事实为自己的对象，同样为认

识生活所必须。所有这些无谓的空话，所有好听的和尖刻的语句，虽充作真实的生活，却大多只表现了这些人头脑中缺乏生活，说明了思想的无力和保守。这些学说中没有讲出他们产生的原因。现在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很明显。我们的社会谈不上有生活。磷光闪闪的腐烂物、毫无思想的高论，这些成了缺乏生活的证明，是不足奇怪的。我们至今没有可称科学的东西，至今科学也没有在我们这片土壤上发芽，科学被我们认为是一种奢侈，是多余的，甚至是危险的东西。人们让科学屈从于各种与之毫不相干的条件，蔑视它、轻慢它。在我们的社会中，科学成了可怜的书呆子，成了被吹倒、吓住的特列季亚科夫斯基。人们感觉得到，精神活动的萌芽被践踏了。唯求真理而无其他目的的精神，自由的求知精神。唯求知识而无其他目的的思想，显然是不存在的，如在我们的文学中；有的却是我们肥皂泡般的理论，对思想、知识、进步的拙劣歪曲。当代大讲空话的人教给我们一些什么东西呢？他们不是就在说科学实质上是多余、没用的赘物吗？他们不是要攻击一切只知求知而无他求的人吗？他们不是要把我们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一些东西硬树为理论吗？他们不是很善于发挥和表现主宰我们生活的那种态度吗？那就是蔑视、怀疑人的最高天赋。

你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社会、这样的一个社会事业，能使每个人都积极参与，能提供活动的对象、方向和内在的准则。我们不拥有这样的社会，却有一些类似于社会的小圈子。这小圈子空气沉闷，微不足道，却幼稚地沾沾自喜，它脱离生活，失去了一切根基，在精神上实践上都无所作为。就是在这样的小圈子中，却出现了我们上面提及的各种进步的奇迹，正是在这里出现了迅速的发展。说它迅速，是因为这里完全是空中楼阁，在口头上移山倒海。在这里几个月几周就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变换着一个又一个哲学体系、社会学说，变换着一个又一个传递进步火种的伟大天才。

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处境可怜的原因。这就是我们的文学不断充斥大量无用之物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会如此幼稚而肆无忌惮，无知却盗用学术词句来掩饰，同样因此一切荒唐之事都可在我们这里大行其道。实际上，任何的荒谬在我们这里都不会遇到抵制，我们已经找不到可信赖的诚实的人——很难保证他们不会突然出人意料地跳起特列帕克舞①，这怪谁呢？又怎么办呢？难道应当把那些不易发现的、微不足道的知识和思想的萌芽用力去彻底扼杀吗？难道应当更多地产生这些无聊的小圈子、空洞的学说、维护幼稚的思想和不负责任的言辞吗？无论我们认为小圈子里产生的这些荒谬之谈多么骇人听闻，我们是否有必要赋予它严肃的意义呢？如果我们认为这些荒谬之谈很重要，不管它实际上只是空中楼阁，是不是要支持它并为之 raison d'étre② 呢？

我们的 esprits forts③，进步人士，我们这些小圈子里的人物，报刊界的多产空论家，都不具备任何的未来精神，所有的人全不过是腐败的破烂货。让生活开始吧，让腐败之物自生自灭吧。

我不想用自己的话转述《俄国导报》的文章内容，以免受其责难（因为有过此类事），说我们断章取义，恶意地歪曲事实。因而特意把这一处完整地摘录下来。

由此可见，《俄国导报》关于我们的文学、科学，直至我们生活的现状抱有怎样的意见。《俄国导报》说现在我们没有“诚实的人”而且毫无例外。“不具备任何的未来精神，所有的人全不过是腐败的破烂货……”一句话，所有的东西、所有的

① 一种快速的俄罗斯民间舞，四分之二拍子。
② 法文：解释。
③ 法文：自由思想家。

人都是腐败不堪的。

好大的口气。

但愿《俄国导报》别向我们要赖，以后别说是我们把一切的一切都臆想成这样，而他们从没说过类似的话。如果他们不是将所有的人都一概而论，那么他们对这个“腐败”阶层的态度，就会同我们给这一阶层在全局中的定位相吻合（见本刊第5期摘录）。他们就不会将大吵大嚷的人视为活动家，不会将所有的人视为平庸的空谈家。“一切，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这未免太违反常理，真是闻所未闻的武断！”读者会这样喊。

读者说得对。但读者的声音，有时甚至是常理，对《俄国导报》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它只是要证明，一切都毫无例外地腐败了，这“腐败”完全不是由某种情况造成的，而只是由于我们自己不诚实……其实，它并没有去论证，而只是下定论……但我们要弄清楚，它的叫嚷是否切合实际。

在《俄国导报》的短评中，把我们的科学比做“特列季亚科夫斯基”[①]，这一处我们觉得很重要。我们觉得你们指出了一种弊端，而且你们已接近于揭示我们教育处于可悲状况的真正原因。但我们的希望马上又落空了，你们把事情扯到哪里去了呢？你们骂起了我们的“进步人士”、“多产作家”、“爱大吵大嚷的人”，不只是因为他们狂热。狂热也就随他们去吧！你们还非要证明他们是不诚实的人，是不负责任的。我们甚至认定，你们正为此才大放你们的悲歌……否则你们一再重复说我

① 似指俄国诗人瓦·基·特列季亚科夫斯基（1703—1768），他曾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1745—1759），著有《简明俄罗斯作诗法新编》（1735），确定了俄诗音强音节体原则。

们没有科学、没有文学[1]，这又何益之有？这些都是老调重弹！以前你们也是常讲到这些的……你们甚至武断地说不存在俄罗斯的民族性[2] ……不，你们是另有目的，正是我们所指出的那种目的。你们是被惹恼了，我们知道你们缘何恼怒……但这下文再谈。

这样一来，在多产的空论家中，在迷途者中（这一点上我们暂时完全可向你们让步）便再没有一个问心无愧的人，没有一个诚实的人，没有一个不空虚的人，没有一个为了思想和科学真正劳动而关切而痛苦的人。你们不是说"让生活开始吧，让腐败之物自行消失吧"？而在这样的环境中，处于这样的人群中，生活怎么开始呢？像童话中那样，单凭想当然吗？

好，现在让我们依次说来。

你们说，从来没有像现在出现这么多的高谈阔论，人人都在讲思想的独立。我们说，的确如此。但这很容易理解：世上没有现成的东西，一切都需去创造，甚至历尽艰辛去体验。一切都要从头来。而开头时常常如此。谁也不能一下就得出最后的结论，一下就达到生活中完全的和谐。你们说："最平庸的陈腐之论，畏畏缩缩地重复来自他人生活的见解，僵化的被遗忘的或是偶然和零散的见解，缺乏相互联系和意义的见解，这些从没蔓延到今天这种无所不及的地步，别看现在所有的人都好像极力要按自己的想法生活，不向权威屈服。"但你们也深知，如果没有必须的根基，如果没有可能去行动，那么孜孜以

---

① 《俄国导报》主编米·卡特科夫在一篇文章中说到现代的"不科学的文学"的贫困。

② 卡特科夫在上面谈到的文章中还极其随便地议论俄罗斯民族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口哨'和〈俄国导报〉》一文（见上文）已予以激烈批驳。

求的精神只能体现为种种不正常的、混乱的现象，将空谈视为生活，借用他人现成的模式，为之欣喜甚至以此替代现实！在幻想的生活中，一切前提也都是幻想的。但我们以为，这是一种磨难，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而依你们之见，所有的人都是爱说漂亮话的空谈家。这可能吗？难道热衷于空论、热衷于现成模式的人就一定是不负责任的人、无聊的大吵大嚷者、肥皂泡吗？莫非真正的踏实的爱钻研者、诚实的负责任的人就不能有所热衷、不能犯错误吗？在痛苦中寻出路，这样的人也会走弯路，也会摔跤……的确，也只有这一类人才会摔跤。为什么就此骂他们是不负责任的人呢？除了泰然自若地稳坐在办公室里的你们，谁都不会（特别是没事的时候）想嘲笑这些人。而你们似乎有些乐此不疲。只有那些在扭曲的现象中擅长看到其严肃的历史意义的人，才是幸运的人！只有那些不认为天上会有馅饼掉到嘴里来的人，才是幸运的人！只有不要求钻烟囱的工人必须具有望楼上的阿波罗① 古典美的人，才是幸运的人！最后，只有那种不以自己的口哨去侮辱处于不幸时刻的不幸者的人，才是幸运的人！

你们说“这些关于生活的学说常常是比最玄乎的数学计算还要脱离生活（好个最玄乎！三十个书呆子坐在一起也想不出比它更好的词来！）……数学公式蕴藏于生活现象中，它对于理解生活现象是不可缺少的……”

你们知道这种公式吗，若是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听你们高傲的口气，好像你们已找到了这种公式，并把它保藏了起来。你们做什么似乎都不费吹灰之力，在你们那里，生活似

① 望楼上（或译观景殿上）的阿波罗塑像是公元前 4 世纪中期雕刻家列奥卡列斯的作品。原作已毁，现存梵蒂冈的是仿制品。

乎会在某一时刻自动走来；你们气恼至今还没有一个社会，而只有一些小圈子，似乎社会不是由初始的小圈子发展而来，而是自动形成的。对于你们说来，一切都轻而易举，但要是有人偏要寻求你们讲的这种公式，不满足于只说说应该有这种公式，而想亲自找到它，或急于发现它而去寻找，有时要犯可笑的错误，要摔跤。而此时你们只是站在那里讥笑他们，讥笑他们的挣扎和错误，却不肯伸手去帮帮他们。其实你们不正是你们深恶痛绝的那种空谈家吗？并且，你们的想法太肤浅了，以为人们很容易欺骗："我可在发愁，我在捍卫被大吵大嚷的幼稚人们破坏了的科学。看到这种状况，我感到悲哀和苦闷，因而大放悲歌。"你们虽有讲空话的本领，还是幼稚地道出了自己的真正的目的！你们并非在捍卫科学，也不为任何事情悲哀，只是须要将一切的"进步人士"骂为不负责任的放空炮的人和木偶。一个严肃、敬业地献身事业的人，擅于识别事物的人，不可能有这样的蔑视的态度。你们多么厚颜无耻地暴露了自己！上帝啊！如果你们只是数落那些拙劣地只认思想皮毛的人，片面解释并无耻而轻易破坏一切新思想的人，那么，我们也会加入你们的阵线，不管你们欢迎与否！但首先，你们将除自己之外的勤于思考、渴求光明的人通通看做是爱大吵大嚷的人。其次，依你们看来，所有这些爱大吵大嚷的人和进步人士都是不负责任的。你们正是以此为基点，正是想证明这一点。你们称"现在已没有可以为他担保的有责任心的人……"这是你们的原话。接着你们说，我们（这里用"我们"，当然是好听）所以是进步人士，原因在于担心被认为是落后的人。"只要不怀疑我们是进步人士，我们准备说也准备听一切胡言乱语"（这么说，是有意地违心）。最后，"倘要是有人高喊：无所谓进步，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偶然事件，那么，只要

能把我们算作是进步人士,我们也可以妥协,也同意这一观点。"

果真如此吗?从常理来看,难道能将所有的人通通说成这样吗?整个社会怎么会没有一丝生活的迹象,这可能吗?这种观点未免太悲观、太荒唐、太离谱了!很可能这些进步人士的努力与实际生活不相适应。但难道会如你们所称,不是生活,不是对生活的追求和表述这种追求的愿望支配着他们的行为,而只是一味亏心地想得到进步人士的名声?难道他们都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木偶?难道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总想说出些什么、表达些什么的人,只是一些没有思想的人造木偶,支配他们的是机械弹簧,而不是认识真理的渴望?难道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吗?莫非在整个罗斯大地只有你们,只是大有学问的《俄国导报》,可以轻易地唾弃一切、践踏一切?莫非只有你们才能拯救我们?那就赶紧救救我们吧!"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快去掌管局务吧!"①

那么,你们宣扬的是什么呢?谁不知道(我可以向贵刊担保,即使最平庸的爱大吵大嚷的人和幼稚的人也理解这一点),现实和真正的行动,能够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能赋予我们应有的分量和意义,能衡量我们的力量,使我们认识自我。谁不知道,只要一接触现实,一开始行动,原先的一套想法、那些令人宽心的公式等就不攻自破。而当今几乎每个渴望从事活动的人,都曾有过这类想法。但依你们之见,尽管放宽心而不必忧愁是很容易做到的,避免幻想和主观臆想、不摔跤、不出

---

① 这里借用果戈理《钦差大臣》(第3幕,第9场)的一句话。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采用米·卡特科夫在同他争论时使用的武器来回敬他。卡特科夫曾责备《时代》杂志同仁有"赫列斯塔科夫习气",这里的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就是赫列斯塔科夫的名字和父称。

错，也是很容易的事。这种平静，这种轻松，是很令人怀疑的，体现了一种冷漠态度和自我得意的利己主义（请原谅我的用词）。你们自己就相信这类公式！空洞却好奇而不安分的头脑，若是脱离了实际，自然就要偏离常轨而沉醉于理论的妄言。本该思考这种现象，本该深入它的实质（就像你们当初那样），可你们竟转而把这些不幸的、这些渴求的人们称作卑鄙小人，甚至要剥夺他们一切生活权利，说他们不过是一些小丑，甚至否认他们有人的情感。难道犯过错的人就一定是卑鄙小人吗？实际上有时生活越丑陋，越杂乱，越不像话，越无转机，它却越要强烈地表现自己。而你们却说，已不存在生活。这里的苦闷、煎熬，与你们又有何干！这与你们隐秘的心思不符，因而当然就用不着承认这其中有苦闷，也有对生活的渴望。一切都是肥皂泡！

而你们却在高谈阔论，在给人上课，其实都不过是一些陈腐说教，那么抽象，那么玄乎的东西（噢，“玄乎”一词真是可爱，你们是怎么想到这个词的，真不愧为艺术家）。而那些被你们排斥的人，总还在做些事，总还努力地往正道上走，总还犯了一些错误从而使后来的活动家避免类似的错误。总之，尽管这些都是负面的，但终究是有益的。而你们却做作地抱起胳膊，站在那里讥笑别人。一个犹太人雇人劈柴。农夫每砍一下都呼哧呼哧地喘气。犹太人见了问：“你干吗呼哧呼哧地？”“这样好砍些。”“那你砍吧，我替你呼哧。”犹太人说。于是，农夫每砍一下，犹太人在旁边呼哧一下。劈完了柴，农夫要工钱，犹太人给的比原先谈好的要少。“这是怎么回事？我全都劈完了呀！”农夫说。“我替你呼哧了呀，你不就省了力气吗？”犹太人说。犹太人很狡猾呀！你们是不是在白白地呼哧呼哧呢？不是的！你们在心里是图好处的。你们正是要说，别人都

是在假装唱歌，只有我才是夜莺。我们哪里会相信你们呢？当然不会。正如你们很熟悉的谢德林先生所说，您把自己的啾啾呖呖唱给我们听听呀！[①] 的确，如果你们想做好事，那就请在那之前做出个不犯错误的样板来！看得出你们会高傲地一笑。你们认为生活自会来到，自会带来最好的东西，带来英国货[②]。在那之前，没什么可担心的。你们背上了沉重的负担……[③] 自然，你们因之而得到的好处，则是如今能站在所有人面前表现出神秘的镇静。人家说不定把你们当成深沉的哲学家，这样的事怕是在英国也找不到呢！

说实在的，你们何必同这类"腐败的东西"纠缠呢？贵刊认为，生活将至——腐败自会消亡。生活何时将至？怎么到来？如此洞悉现实真是惊人啊！的确，布尔加林和阿斯科琴斯基先生解决生活之谜要容易得多。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是现成的，都画在表格里。"生活何时将至"……看来你们对此也尚未加考虑。考虑它做什么呢？关注这个的人都可能出错误，丢面子，而你们若是犯错或是丢了面子，那可非同小可！干这类事有勤杂工嘛！他们是嘲笑的对象。他们爱大吵大嚷，又腹中空空。这种活儿又脏又累，枯燥、琐碎。得要爬高、清扫烟囱、搬运货物、低头弯腰……这些实在是有失体面，显不出学院派的架势，要知道我们可是显赫的人物！

---

① 谢德林在《市侩文学家》这篇文章中抨击有人标榜揭露却空洞无物，说夜莺有权自我赏识，因为它唱的是自己的歌，"您把自己的啾啾呖呖唱给我们听听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把卡特科夫比作这种市侩文学家。

② 暗指米·卡特科夫的英国迷。

③ 这里是间接引用《新约全书·路加福音》中一段话（第 11 章，第 46 节）："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

我们可是向你们作了让步的。我们同意说，这些爱大吵大嚷的人在犯错误。是的，他们不承认科学，思想简单，急于做一切事……的确如此！但你们可知道事情的历史进程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有时与理论上的东西极不相同。总是如此。坐在屋子里凭理论似乎可以推断一切：就是这样，一切应当是这样的，有这样的先例——在英国就曾经这样。可一看实际情况，不是那么一回事。事先是什么也预料不出、猜测不出的。这真是很奇怪，甚至令人懊恼！

你们可知最后我们要向你们说什么吗？其实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先生不久前以其《论战之美》[①] 惹恼了你们，于是，你们才大放悲歌。我们对此至少是深信不疑的。他甚至不屑于同你们用文雅的语言说话。实在是令人气愤！我们可以议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先生，而不怕人们说我们是他的赛义德[②] 和狂热的支持者。我们总是冒犯我们这位任性的政论家，时常不同意他的见解。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先生在俄国文学中的遭遇真是太奇怪了！大家都竭力向所有的人证明，说他一窍不通，甚至是个无赖，说他简直是空空如也，徒有其表。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先生突然拿出了《论战之美》……天啊！于是，引起切齿痛恨，有人大放悲歌……在这次论辩之后，《祖国纪事》在一期里竟刊登了六篇之多的文章(对，正是六篇)，一致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先生，以期向世人证明车尔尼雪夫斯基微不足道[③]。一个

---

① 《论战之美·第一部分》，刊载于《现代人》杂志，1861 年，第 6 期上，是批评《俄国导报》的。

② 穆斯林学称穆罕默德的后裔为赛义德；穆斯林化之前的阿拉伯，则以赛义德称部落贵族，但此处的“赛义德”或别有所指。

③ 在《现代人》杂志 1861 年 7 月号上发表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战之美》后半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是指由此引起的《祖国纪事》批评车尔尼雪夫斯基这篇以及其他论文的文章。

爱开玩笑的人甚至说，在那一期《祖国纪事》中，只有《十个意大利女人》一篇没有提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先生的名字①。但如果他是这样的微不足道和滑稽可笑，何必要在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刊物上一期之中就发出六篇文章谈他呢？在莫斯科也是如此：那也像是来了一次小地震，甚至还专门写了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先生的小册子。何至于如此惶惶不安呢？真是令人费解。这个奇特的作家的遭遇的确奇特！

既然说到费解之谜——请问《俄国导报》，在刊出自己忧伤的短评的第 8 期上你们登了维亚泽姆斯基公爵② 的《纪事》是何用意？当然我们并不是对这首诗本身感兴趣，而是因为贵刊将其发表出来。贵刊绝不是着意于这些诗句才发表吧：

对一切投以闪电般的一瞥
人们的敌意……坚不可摧

当然，不是这样的诗句吸引了你们。其实又何必刨根问底呢？何必提这样令人费解的问题呢？……

是的，《俄国导报》，我们从前就曾向贵刊预言，你们或早或晚要走上一条小路。这条路是平坦又顺利的③。或许还会找到知己吧……愿你们一路平安！并祝愉快又能渔利！我们不再打搅了！

---

① 《十个意大利女人》是英国作家特罗洛普（1810—1892）的历史小说，它的俄译最后部分刊载于《祖国纪事》1861年8月号上。

② 彼·安·维亚泽姆斯基（1792—1878），俄国诗人、批评家。这里指的是他的组诗《在途中和家里》。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读书与识字》中说《俄国导报》走上新的布尔加林的道路，布尔加林是效忠沙皇政府的反动文人（参见上文注），所以此处说“这条路是既平坦又顺利的”。

尼·瓦·乌斯宾斯基先生短篇小说集

乌斯宾斯基先生[①] 将自己的所有短篇小说结集成单行本出版，这确是一件好事，如此可使人对这位新作家的全部活动一目了然。算起来乌斯宾斯基先生从事写作已有相当时间，有一些年头了，并且常常是在《现代人》上发表作品[②]。实际可以说，他已不算是新作家了。但我们难以断定，乌斯宾斯基先生能否有进一步的发展，他最终能不能给我们说出一点儿新东西。至少迄今为止，在其总共二十四篇短篇小说中，他没有写出任何有新意的东西。尽管如此，他引起了读者一定的注意，尤其是在《现代人》的举荐下[③]。他真实地再现了人民日常生

---

①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乌斯宾斯基（1837—1889），俄国小说家，具有民主派思想，擅长写民众生活，深得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评论家的赞赏。

② 乌斯宾斯基只有两个作品发表在《祖国之子》杂志上（1857年，第18、24期）。此后，从1858年2月起他经常为《现代人》撰稿。

③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不是转变的开始吗?》一文中给乌斯宾斯基以很高评价，说他“写人民的真相而没有任何的夸张”，主要是指“他以毫不隐蔽、掩饰的笔触给我们描绘老百姓那种因循守旧和墨守成规的思想、感情、行为和习俗。”这是为了激发他们要求“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这样，有异于此前俄 （转下页）

活中的场面，而在我们俄国真实地反映日常生活的作家常常是寥寥无几。如果从这个角度评论乌斯宾斯基先生的话（这恐怕是可以评论他的唯一角度），那么就应该注意到，乌斯宾斯基先生是继奥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皮谢姆斯基和托尔斯泰之后的一位新秀。虽然乌斯宾斯基先生给我们的文学做出的贡献还远远不够，但假如他是早于上述作家率先将人民生活的景象展现给我们，我们对他也就刮目相看了。正所谓“万事开头难”！套用他在小说《格鲁什卡》中的话：“现在他的价值就完全不同了。”

但是读者不要以为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把乌斯宾斯基同奥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皮谢姆斯基等作家相提并论。我们在这提到的先于乌斯宾斯基的杰出作家们，已然说出的新意比他要多上一百倍，而且说得对，因此而享誉文坛。尽管这些作家对人民的观察总的看还不够十分深刻，视角不够十分广阔（对人民并非很快就能观察透的，再则我们的时代也没有达到能广阔、深刻地观察的阶段），但至少他们率先将目光投向人民，以新的、在很多方面都很真实的角度观察人民，在文学中有意识地提出了社会上层阶级对于人民问题的新思想，而这一点最令我们瞩目。要知道这些见解代表着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发展、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历史。

不过有些人一定要把乌斯宾斯基先生视为描写人民日常生活的某种新视角的创始人，对人民应取的某种视角的发明者。

（接上页）国文学同情农民“小兄弟”，有时加以美化的做法。因此说是“转变的开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主要是赞美平民的温顺的。杜勃罗留波夫在一篇书评中把乌斯宾斯基与莱蒙托夫、丘特切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皮谢姆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大作家并举。

他们说："乌斯宾斯基先生看待人民很朴实，没有任何偏见、任何预先的成见。他总是直截了当、根据事情的本来面目来分析问题，因为社会还不能接纳正确观察人民的观点，在其现阶段的发展水平上，它甚至对人民没有真正的理解，因而文学所取的一切看法都是错误的。暂时我们还只是满足于取用素材"等诸如此类的话。尽管他们这些话说得还不够坦率，但我们是尽量点明了这种观点的实质。我们要回答说：预先设定的看法当然是错误的，虽然作家很难避免这种看法。

其实，作家通过研究积累的素材而得到的看法和思想，完全是另一回事，完全不是预设的和理想的，而是现实的看法。视作家的能力的大小，这种看法有时甚至能反映当时整个现代社会对人民生活的见解。这一点是很自然的。不能对一个人说：你只满足于分析和积累素材吧！不要去思索、去下结论。这就等于说：不要用眼睛看，不要用鼻子闻。这样的规定中就含有强迫，而任何一种强迫都是不自然的、不正常的，是一种犯罪。当然，甚至不仅在设定的看法中，就是在经过仔细研究材料而得出的观点中，错误也在所难免。但通过错误可以接近真理。无论如何这是经过现实生活体验得出的见解。而坐在素材上等待思想从天上自己掉到我们头上来，无异于模仿那位发誓不学会游泳就不下水的先生。有时，《日报》就是这样做的[①]，他们认真地认为，如果全部地主和贵族不肯自愿、完全、无条件地转向地方自治机构的话，我们俄罗斯人当今就不能着手任何内部的、我们最必须的改革（《日报》，第 9 期）。转为地方自治机构这个主意极好，也极有益于社会的发展。那

① 指伊·谢·阿克萨科夫为《日报》写的一篇社论，声言如不改为地方自治则一切势在必行的改革均无实行的可能。

你就等着这件事自然发生吧……好，不远扯了，还是让我们回过头来谈乌斯宾斯基先生。

我们完全同意这样一种思想，即对人民要谦虚温顺，要普遍意识到，我们还没能做到很好地理解人民，而且我们竟是如此远离了人民，以致现在我们有的聪明人对于英国社会的特点比对俄罗斯人了解得还清楚得多，他不仅看不到、不理解俄罗斯人，甚至失去了识别和理解他们的能力。我们重申，上述这种思想，如果能成为普遍的意识和要求的话，那将是很可喜的。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那些描写人民生活的作者能接受这一思想的指导，那么这一思想就会很快地把他们引向正确而富有成效的道路。但是，对人民持谦虚温顺态度，绝不会导致害怕因忠实地研究材料而得出关于人民的某种结论。需要的只是避免成见，而对人民持谦虚温顺态度自然会有助于这一点。但我们觉得，假如硬说唯有乌斯宾斯基先生承认我们脱离了人民的根基，唯有他谦恭地认为我们现在缺乏深入研究，因而没有能力正确地观察人民并得出关于人民的真实、准确的概念，这将是不适宜也是不对的。实际上，只要我们稍微仔细观察一下乌斯宾斯基先生，我们关于他的结论就会得到证实。如果他真有这种特殊的见解，他就不会重复在他之前被写过一百遍，比他写得更鲜明、更典型，特别是挖掘得更宽、更深，也更真实的东西。我们有一些作家，尽自己的能力和才华研究素材之后，不怕将自己的观点、自己关于人民生活的见解袒露于人，比起乌斯宾斯基来说，依靠同样素材而使我们得到的收获要多得多。比方说，乌斯宾斯基先生有一篇描写小商贩生活的讨人喜欢的小小说，名为《格鲁什卡》，这是他这本书中最好的作品之一。可实际上怎么样呢？这不过是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三流人物身上拾得一点儿牙慧而已。乌斯宾斯基先生大多是这么

干的。他来到广场上，也不选角度，走到哪儿算哪儿，直接就摁动照相快门。这样一来，广场上某个角落里发生的事就如实录下来了，自然，一些对于整个画面，或者说对于画面主题完全不必要的东西，也进入了画面。乌斯宾斯基先生不在乎这些。比如他想在自己的照片上描绘市场，要让我们对市场有一个概念，而当时正有一个气球降到了这个市场上（有时是有这种情况的），那乌斯宾斯基先生也会把这个全然偶然、同介绍市场毫不相干的现象拍摄下来。若是当时有条牛尾闪入画框，他也会把这条牛尾巴留在画面上，毫不在意这对于画面是否必要。乌斯宾斯基先生的每篇小说中几乎都有这种情况。他对所有不必要的东西抓住不放，甚至也不想把这些不必要的东西同要说的事情联系起来，至少向读者做个交代，免得出现唐突而令读者摸不着头脑。有人会对我们说："这也很好，正是这种准确如实才好。"难道这就是准确吗？难道准确就体现于此吗？这是混乱，而不是准确。单纯地只凭对材料的描述您能表达什么呢？要这样就得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拉长成二百卷，即使那样，也没有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两卷表达的内容多。再说，单凭照相，连素材内容也不能真实地传达出来。

我们并不是说乌斯宾斯基先生的手法仅仅是照相术。乌斯宾斯基先生是有自己的观点的。并且无论这见解是什么样的，只要它存在，这一事实就有力驳斥了一些人的推测，他们认为他害怕有见解，所以只研究环境。不仅如此，乌斯宾斯基甚至还有一些预想出来的观点。比方说，小说《大车》通篇都在嘲笑乡下人，说他们不会数数。我们以为如果实实在在、没有任何成见地看问题，那么至少应把小说的重心放在乡下人数数上。我们不相信，也不可能相信除此之外在现实中，在材料本身就再找不到任何其他的内容。有人会说：表面上看客店里就

是这些内容，再没别的。可是这可能吗？当然还有别的，只是乌斯宾斯基先生有了自己的成见而没有注意到，因为只有他要写的东西对他来说才是重要的。换个人去观察，还会找到些别的内容，第三个人又会找到第三种内容。而所有的人观察到的都是事实。甚至还会有这种情况，同样的一件事，乌斯宾斯基先生看来只是可笑而已，而另一个人却只发现了悲剧，并且他们两个都可能是正确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无意识地存在着的自然界。如果无意识地描述一个材料，那么，我们从中不会获得任何东西。但如果来了一个艺术家，针对这一材料把他自己的看法告诉我们，讲出这是什么现象，告诉我们，参与这一现象的是什么人，而这些人有时会转变为一种典型，最终当大家都认可了这个典型，他们的名字就变成了这一类人的普通名词。艺术家越是卓有才华，越能准确而深刻地说出自己的思想，说出自己对于一些社会现象的看法，从而对社会意识越有助益。自然，这里几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艺术家自己是否善于观察，他个人的观点是怎样的——人道主义的，洞察一切的。最后，艺术家本人是公民吗？艺术创作的任务和使命正在于此，同时，也就明确界定出艺术在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作用。顺便说说，现在有人指责我们杂志，说我们企图仅凭艺术和艺术家、诗人的激情来理解和研究当代现实。我们从未有过此类无稽之谈，我们一向只是坚持并申明艺术的独立意义、艺术独立的自然之理、艺术在社会发展和社会意识中的绝对必要性，但决不是独特性。不过，我们的文章是写给那些多少有点儿理解能力的人看的。艺术极其强有力地帮助人类发展，生动、形象地作用于人。而评论同艺术一样自然而然地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同样应有的作用，它将艺术通过形象展现给我们的东西有意识地加以分析。评论体现着当时社会信念和见解

的全部力量和精华。不过，除评论之外，还有一种完全独立的力量，它同样服务于人类的发展和人类意识的提高。这就是科学，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与人类一起诞生，并相伴至死。我们过去承认并且还将继续承认这一切，因而指责我们把社会发展和社会意识提高的全部希望仅仅寄托在艺术身上，这是毫无根据的。不过，我们无法回答污蔑我们的所有谬论。

回过头来，我们对乌斯宾斯基先生做个结论。

我们这篇文章上面所讲的这些话，目的在于驳斥一种平庸糊涂的思想，就是对素材只能消极地俯首听命，并且申明，实际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为了结束这个话题，我们要说：应该力戒从我们人民生活的研究中匆忙得出结论，这样做是有益的、必要的；这可以避免理想化倾向，以及许多其他错误。但在做结论方面过分谨慎和缺乏自信，也几乎是同样有害的。我们害怕出错，常常只是出于自尊心，但事实上，研究人民生活是十分必要的。有错误不要紧，错误不会长期存在，而且只有通过错误，我们才能得到真理。真理向来是不易达到的。谁若是相信自己的见解、自己的结论，让他说出来好了。这比胆怯而沉默不言更为光明磊落。认为我们一下子就会得到全部真理，这是可笑的。何时发生过这种情况？何时有过这种先例！只是不可草率下结论。这才是首先需要做的。乌斯宾斯基先生也不能没有任何思想就写作，他也有思想。的确，他没有提出最后的结论，无论是艺术上的还是思想上的，这或许因为他的才力还不足以明确地表述出推动他的全部思想。但他还是有开阔而丰富的思想萌芽。读他的作品时不可能看不到这种迹象。乌斯宾斯基先生首先是热爱人民的，并不是为了什么或因为什么，他就是热爱人民本身。人民身上的一切以至每一个特点对他来说都是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他把每一个特点都看得如此

珍贵。表面上他的小说似乎是不动感情的，乌斯宾斯基先生从不称赞谁，显然，他也不想去称赞。不突出表现人民的好的方面，不以众所周知的、公认的、由文明衍生的美德的尺度去衡量这些好的方面。他也不痛斥恶行，甚至似乎对之不恼怒、不气愤，他让读者自己做出自己的结论。而实际上有迹象表明，这种冷静态度决不是由于漠不关心和内心平静。在一些微小的细节上都可以观察到这一点，虽然这些细节似乎不含有任何暗示。两个做工的青年，躺在火炕上，他们还不想睡觉，一个在给另一个讲童话①。乌斯宾斯基先生的艺术功力足以仅仅通过两人的对话，不加任何说明就让人了解他们的环境、思维方式、对生活的看法、年龄，甚至性情特点。从读第一行起您就会感觉到，他们的对话很真实、很典型，这种实际情况很吸引我们。但从表面上看，这场对话没什么用意，没有任何特别的内在联系，没有特别地暗示着什么，甚至是“没有任何倾向”。他们在谈论一些死人。小伙子讲到些完全不必要的、同他的故事毫无关系的东西。说得最详细的，是一个叫什么安东什卡的主人公，养了一些鸟啊、兽啊的，讲他是怎么驯养的，讲这个怪人安东什卡怎样教会了它们什么。看得出小伙子对这些很着迷。但小伙子感兴趣的这些离题而不需要的东西，却表明了他的心中所想、他的天赋，表明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这个年纪上小伙子喜好什么，表明他的头脑中还有很幼稚的一面。同时，又表现了我们的农村青年的纯真和朴实，等等，等等。无论是表现了什么，主要的是所有这一切对于乌斯宾斯基先生都很重要，他似乎唯恐漏掉他们谈话中的每一个词。如此一来您会感到，我们也跟着乌斯宾斯基先生觉得这些很重要，可能其原因

① 这里是分析乌斯宾斯基小说《蛇》的内容。

部分地正因为作者认为它十分重要。此刻我们发现，现在我们也夸赞起乌斯宾斯基先生的小说不断地抓住不放的并非必要的细枝末节，也开始夸赞他所采取的倾向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不过，即使现在我们也感到很遗憾，乌斯宾斯基先生还不善于驾驭这些细枝末节。他要用十页来说的事情，高超的艺术家只用一页篇幅就够，并且这些细枝末节也还可以保留下来，同时，您还会更清楚更透彻地理解到这些是并非必要可又不可或缺的东西，你会懂得它们要表现的内容。而在乌斯宾斯基先生的笔下，除了必须的、意义深长的细节，还有完全没用的细节，它却只能遮蔽主要内容，所以我还要再说一次，要是画框外闪过了一条牛尾巴尖儿，乌斯宾斯基先生也要把它留下，而不介意这是否破坏了画面的统一。

我们说这一切，不是因为我们特别重视作品的艺术加工（尽管加工精美在这里也绝非多余），而是因为艺术加工会使思想更明确、突出，生动可感，真实可信。艺术魅力就在于真实和鲜明地描绘真实。在乌斯宾斯基先生的杰作《猪仔》中也体现着这种对人民的朴素热爱。通篇小说都会使您忍俊不禁，但这不是嘲笑。如此您便已经受到了作家思想的影响。我们知道，有人不假思索就会喜欢上这篇小说，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善良的人们，请看在我们的社会里，贫穷妇女辛辛苦苦养肥的小猪就这样轻易地被偷了，这个可怜的女人因而失去了她过活必需的钱。再看看在我们的社会里要找到丢失的小猪有多难，她得说假话，行贿，可小猪还是没找到，最后反倒罚了她的款。不，暂时还谈不上法律……物质保障……对事物的明晰态度、发展……如此等等。”这都很好，的确很正确。但我们更看重的，是乌斯宾斯基先生给我们展示出了事情的真正本质。对这种丑恶行径（难道在丢失小猪一事上不能用“丑恶行

径”一词吗？要知道事情并不仅在小猪身上)，光是读一读统计报告也会产生抽象的义愤。而艺术家则要描写事情本身的发生过程，这甚至能独特地解释一些统计数字。乌斯宾斯基先生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您不仅看到了建立在老百姓中间的行政机关的最终的形式和状态，您更感到惊奇的是，这种难以想象的事、这样理想的乌托邦如何能存在于老百姓之中，而且能牢固生根，好像是世界上不可抗拒的事情。这里最令人吃惊的，是维系行政机关与老百姓之间的那种和善关系。这种和善关系正是我们研究的目标，但它是障碍物，是严重的课题。而描绘现实的成功而且真实的画面，在这里对研究者极有帮助。小猪丢了，我们且不说小说中体现的无限善意，也不说这个诚实的、一点儿也不笨的妇女的忠厚，她丝毫不觉得自己的故事有什么好笑（听她讲的那个女伴也不可能笑，她们不像我们，她们顾不上笑，她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可能碰到这样的事儿）。可是您瞧，这个妇女完全知道，即便不知道也能预感到，应该预感到（她毕竟在世上活了四十个年头），通过长官是很难找到小猪的。可她去找了长官。他们都要她出钱，但这倒也没什么，向来如此，一时改不了。重要的是交钱不是因为帮了她找小猪，而是认为她本人有过失。遇到了倒霉事，你就怨自己吧。从每一次接见的情况来感觉，这个妇女最后就认定是自己有过失了。这么一来事情就糟了，别人倒全没错。因为大家都认为就应该这样。这篇小说高超的幽默也正在于此。最后给了她一顿训斥：她竟敢打扰长官，这自然要给她做记录（这种情况怎么也得写上两三页纸），最后把她放了。当然小猪是没找回来，而她由一个士兵押着。这个士兵还是向她索取了贿赂，倒不为什么事，不因为愤恨，只因不能改变自己的信念：他从没想过可以不向她要钱。一方面是淳朴、忠厚，一方面又是扭

曲最平常、最自然的概念。一些事根本算不上事实而只能看做发热说胡话，看做脑子有病，却都被忠厚地当做理所应当的事，这只能说明是由于行政当局已远远地脱离了人民。假如行政制度来源于人民精神，来源于人民本质，在某种程度上与人民沟通，那么，它就能理解人民，在滥用职权时会为人民着急，人民也容易理解它，理解它的乖戾和缺点。但人民感到的是行政当局的神秘，认为它是个谜。最后，我们认为乌斯宾斯基先生选择这样一个日常的事来批评是很好的。寻常的事件比不寻常的事件多：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就是由寻常事构成的。而且在这样环境下写人民精神的忠厚纯洁能更加真实可信，尽管小说很引人发笑。

乌斯宾斯基先生还有一篇小说题为《老妇人》，我们认为，这是二十四篇小说中最有价值的一篇。这位老妇人温存地讲出自己心中最珍贵的东西，讲给世上一个最冷漠的人，一个粗通文化的傻瓜听。这个傻瓜自认为比老妇人高明，是出于无聊才听她的故事。老妇人心甘情愿地、几乎并不自觉地忍受着轻慢，她明白自己的痛苦已令这个听众厌烦，也就原谅他，甚至对他的毫不理会也不抱怨，还认为人家让她倾诉自己做母亲的巨大悲伤是帮了她一个大忙。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得很艺术。

您会感到这是真实的，您不由地惊讶地想到人民的道德有其内在的正确性，想到人民的心灵的深邃，他们的人道观点的天生的开阔性。而最主要的，是这一切鲜明地反映在最不起眼的人身上，这是一个被折磨、蹂躏得几乎神经错乱的农村妇女。但她的这个听众已经脱离了人民。他朝文明迈出了第一步。而在迈向文明第一步时，他比文明人更加粗鲁，更严重地脱离人民。

我们不知乌斯宾斯基先生以后能不能有进一步的发展。乌

斯宾斯基先生获得的内在推动力，是正确而有效的。他看待人民的角度是正确的、诚恳的。您会感觉到这一点。但他能不能在看问题时更深更远一些，能不能说出自己的见解，而不重复别人的东西。最后，他在艺术上会不会有进步，他能不能形成自己的思想，从而清晰可感地表达出来，这些都还是问题。但他的天资是很好的，我们寄希望于他。

关于大学问题

且慢，老兄，且慢，等一等！
要弹乐曲，你们坐得不对！①

《日报》第1期登载了已故的霍米亚科夫先生② 关于大学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没写完的片段，也是作为片段登出来的，其中有很多有见地的思想，同时，也存在一些惊人的疏忽，似乎是有意为之，暗含某种目的。在这里我们不想多谈这篇特别

① 这是伊·安·雷洛夫一则寓言《四重奏》中猴子说的话，讽刺人们干事外行，不像个样子。

② 阿·斯·霍米亚科夫（1804—1860），俄国宗教哲学家、作家、诗人，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这篇文章写于1850年，一直没有发表，此次在1861年10月15日的斯拉夫派报纸《日报》上，也只是摘要刊登。文中反映了斯拉夫派对如何教育年轻一代的见解。

重要的文章。可是科斯托马罗夫教授[1] 就此也写了一篇关于大学的文章。显然，霍米亚科夫先生的文章只是引起大学话题的诱因。大学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上早已见诸报端。科斯托马罗夫先生的文章在《圣彼得堡新闻》第237期一登出来，谈论大学的文章似洪水般铺天盖地而来。几乎所有的杂志、报纸都发表了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而没讲出自己观点的人，则复述别人的观点。我们不认为大家只为赶时髦才大谈新问题，不认为唯恐落人之后是议论大学问题的原因。我们以为这一现象的意义比看上去要深刻得多。大概近一个时期整个俄国都在考虑关于大学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自然出现的，亟待解决。不过，我们首先从科斯托马罗夫先生的文章开始，详细地谈一谈我们文学中出现这一问题的由来，并做些摘录。对于那些不了解这一问题或对这一问题一知半解的人来说，按照事实来全面描述这个问题还是有必要的。因此，我们用整个第一部分来描述这个问题的原委。

当然，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改革。科斯托马罗夫先生否定现在这种大学的形式，认为它的基础就是错误的。他要求大学要成为传授文化的学术机构，而不是教育人的教学机构。

> 我们的大学是一种介乎于中学和学术机构之间的某种不确定的东西。很多大学不知自己应该是什么样的：是教育人的教学机构还是教文化的学术机构？他们迄今为止期望两者兼得，而实际上则两者都不是，因为这两者在本质上是不能相容的。

---

① 尼·伊·科斯托马罗夫（1817—1885），俄国和乌克兰历史学家、作家、教授（1859）、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1876）。著作甚多，有关于俄国和乌克兰的社会政治史和经济史、乌克兰民间创作和古文献等论著，并写有诗歌、历史剧、小说等。

正因为这样，按照科斯托马罗夫先生的意见，只要我们把大学变成教文化的学术机构，那么，所有那些旨在教育人的训谕、规矩，对学生的监督，对其“学习”和“行为”的观照，特别的权利和规定，等等，都是不需要的。自然，大学的社团机构也是没有必要的了。依科斯托马罗夫先生之见，学生团体作为特殊的群体也是没有用处的。

学生的联合作为特殊群体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在这里使用“联合”一词，我们指的不是从事同一活动、为了同一既定目标的人们的自由聚结，互相之间除了协调见解和共同工作之外没有任何义务。相反，这一联合组织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上将其成员联系起来，规定他们有义务根据预定原则行事，甚至要违背个人的要求和信念，共同隶属于某一团体，并将自己的成员看做是兄弟。当需要一起维护共同的事业，或是保护某些特权时，就会出现这种联合会。不难理解，中世纪在欧洲，当个性遭到意外打击，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寻求他人的支持和保护时，生活便要求组建这种联合会。17世纪，在我们俄国南部和西部，为抵抗极端的罗马天主教而组建了一些兄弟会、联合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社会越是趋于合理，联合会就越没有成立的必要。因为，一方面共同维护每个人的安全的方法在发展；另一方面，教育普及的结果常常能导致特权结束。

接下去又说：

如果把大学看成是教文化的教学机构，那么，学生联合组织便会使大学失去这一崇高的意义，因为大学不再是直接沟通科学和社会生活的机构，却变成了中小学校。在精神方面，这样的联合会甚

至是有害的。因为它使学生脱离社会，使他们以“我们”同联合会之外的人相对立，而这会导致失误，导致对社会的不理解、漠视社会利益，从而不能同社会步调一致地行动。这种联合会的存在对科学也是有害的，因为它使科学似乎变成了少数人的特权，科学的理想应该是在社会上最广泛地推广其积极成果。在这种情况下，联合会就会在人类最值得尊敬的事业——教育事业中形成对社会自由的束缚。它使科学脱离生活。然而献身科学的人应当记住，只有为社会的直接利益努力工作，他的活动才会卓有成效。

对此，第 44 期《俄国导报》上的《现代纪事》立即做出了反驳。《俄国导报》的反应同往常一样是十分刻薄的，它嘲笑科斯托马罗夫先生说：

如果我们没有搞错的话，我们那些先进人物的使命就是否定大学的教育意义。俄国的先进人物实际上怎么能够不否认世人所公认的东西呢？否则，他就显不出自己的独立性了，就证明自己还不够先进。

接着，《俄国导报》特别维护大学的教育人的意义，并认为科斯托马罗夫先生是主张以大学之名建立一种在世界某处可能存在的东西，认为科斯托马罗夫先生的这种大学自然而然会变成开放式讲座的机构，没有真正的学术意义，目的只是在成年人中普及科学知识。

这种开放式授课与大学课堂的区别，在于听课者不同，但同样具有大学课堂教学意义，进行公开授课的学者成了科学与社会之间沟通的桥梁。因此显而易见，这种公开授课必须是在那些真正有科

学的国家才会对全民教育有效力，没有这个条件作保证就谈不上科学与社会的沟通。科普则势必变成哗众取宠。首先要有严肃的科学，而后才谈得上由十分成熟的学者来进行普及。

《现代纪事》说，巴黎有 Collège de France[①]，在那里就设有公众课，特别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听课者甚众，其成分是各式各样的。

比如在彼得堡也设过公众课，但第二年起公众就开始对之表示冷淡，以致公众课开不下去。结果我们这座进步城市彼得堡，就不能指望“教文化兼学术”的大学会繁荣起来。

科斯托马罗夫在文章中说，如果在我们俄国增加以教育人为目标、教学内容较中学广泛的机构，这会带来益处。但这样就要求把这种新学校同非教育性大学区分开来，即同教文化兼学术的机构区分开来。对此，《现代纪事》说道：

这样，科斯托马罗夫先生自己就又回到了大学问题上来，即回到各国都称为大学的机构上来。其观点的实质在于：“把现在的大学改成开设公众课的机构，而不是什么大学，但仍要保留大学之名。与此同时，新设一些同外国的大学相类似的教育人的教学机构，但不要冠以大学之名。”我们不清楚为什么搞冒名顶替，但事情本身我们倒可以同意，前提是作者能告诉我们克服以下难题的方法：如果把现在的大学都改成开设公众课的场所，鉴于我国人才的不足，没有可能在俄国建立几所新的大学，因而我们担心，若按科

① 法文：法国中等专业学校。

斯托马罗夫先生的计划改造俄罗斯的大学的话，那么，我们俄国在一段时间内会处于完全没有高等教育院校的状态。而教育人的、教学内容比中学广泛的大学对俄国教育来说，比科斯托罗夫先生设计的教文化的学术机构更为需要。

在这两种对立的观点之后，接着出现了第三种观点——斯塔秀列维奇教授先生[①] 的观点，刊登在第 241 期《圣彼得堡新闻》上。斯塔秀列维奇先生完全同意科斯托马罗夫先生关于必须进行改革的观点，但不是改造大学，而是在大学内部进行改革。他认为改造并不在于取消大学目前的形式。这样改造难免在根除弊端的同时也丢掉优点。斯塔秀列维奇先生指出，改造最好仅限于消除弊端，而且适可而止。可见斯塔秀列维奇先生显然认为现在大学的基本建构形式绝对不是弊端之所在。他谈到，科斯托马罗夫先生认为大学的缺点在于听课人员的构成不当，因而教学也不当。他提出来的改革模式，正是我们现有的状况。斯塔秀列维奇先生提到，比方说，彼得堡大学的课堂本来就有年长的、年少的、各行各业的听课者，有时甚至男性、女性都有，所以问题不在于要改造大学，而是应保持大学已达到的发展和繁荣。斯塔秀列维奇先生说，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更需要保守派，而不是改革派。

是什么使教授先生迄今为止只重视教育人的教学目的呢？斯塔秀列维奇先生问道。他肯定地说，没有听到过正式的抱怨，说大学生这名称的存在妨碍了某位教授的授课具有教文化的教学性质。那么，是什么使教授关注教育人的教学目的呢？

① 米·马·斯塔秀列维奇（1826—1911），俄国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编辑出版《欧洲通报》（1866—1908）。

他问，“难道我们还要在上课时维持课堂秩序或讲些起码的道理吗？”

按照科斯托马罗夫先生的说法，教育人的教学机构所用的方法，在于“讲课、指导、训育……中学教师传授给学生的东西，对学生来说是必不可缺的，学生应坚信教师所言，可以说是要靠教师的智慧生活，完全接受其训导，按其指导发展自己”。这一切本都是正确的，但迄今为止，我国教授的情况可曾是这样吗？难道我们可曾讲过教训，以某种指导来统辖听课者、训导过他们？我们的讲坛哪里具有科斯托马罗夫先生主张应根除的育人的教育呢？

接下去斯塔秀列维奇先生坚决维护大学生联合会和大学生这一称谓。他承认，大学生这一称谓本身便具有育人的意义。同时也承认，这种意义在大学的生活中是完全必须的。他谈到，区别在于大学的育人性质应从根本上有别于那些中等教育机构，学生应努力进行自我教育。要培养一个全面的大学生，只靠课堂讲课还不够，因为自我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能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但这必须在大学生的生活圈子中才能得以实现。

大学不令人满意的原因，应是缺乏正确的大学生自我教育。取消大学生这一称谓意味着完全取消这种自我教育。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使取消了大学生这一称号，也还取消不了自我教育。这种自我教育在没有大学生的大学里还会出现。只是将采取一种任意的、常常是扭曲的形式。应该只消除某种现象的不好的一面，这不更好嘛。以消灭来改正某种错误——这自然简单，只是如此就不能再希冀建立任何持久的东西。我们的创造总是囿于形式方面，而按一定的规

矩所提供的材料，总是现成地为我所用。大部分的创造都不成功，恰恰是因为把我们自己视为创造用的材料。因此，我认为不要那种走极端的改造，而要合理的改造。我们的课堂已具有传授知识和学术的性质，所以，改造不是针对这一方面。可以说，至今为止，对大学生自我教育的这种形式，即由大学校领导实行警察式的监督，有许多反对的意见。而以消除的方式进行改革，不过是意味着将错误换个地方，而像大学法庭这种机构已经朝着合理改革迈出了第一步。大学法庭将是重要的、大学中可行的教育人的机构之一。我们不能说还能做什么，但我们想指出已实施中的事情。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巴尔索夫先生[①] 在《圣彼得堡新闻》第 245 期上表示完全赞同科斯托马罗夫先生的观点，认为需要把俄国的大学改造成 tabula rasa[②]，以便让生活本身产生出新的机构。《俄国导报》在第 45 期《现代纪事》中强烈地反对这一观点。

简直没有比认为自由运动需要同过去决裂这一观点更错误的了，没有比意志薄弱、一遇挫折就半途而废、另起炉灶的做法更违背真正的运动的了。这种对于过去一味地破坏和鄙视的思想，认为不存在的或仅仅可能存在的东西才有一切权利，却拒不承认已存在的事物具有权利，这对生活来说是最致命的。

当然，我们俄国的大学还远不够理想，但令我们遗憾的是有人对之竟如此轻率和傲慢。对斯塔秀列维奇先生关于俄罗斯大学高度

① 尼·帕·巴尔索夫（1839—1889），俄国历史学家、华沙大学教授（1888），有俄国历史、地理以及斯拉夫人历史方面的著作。

② 义不详，疑为讥讽不成样子。

繁荣的观点，我们不敢苟同。但无论我们的大学是何种境况，它在我们俄国生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所以说到它的改造，无论如何不容许把改造理解为破坏。我们的大学有些方面是不错的，以此今后能在欧洲大学中占据一定地位，它们原就是以欧洲大学为样板建立的。

总之,《现代纪事》在其第二篇文章中也是既维护大学的组织，又维护大学的教育人的意义。它指出，不可能要求每位教授都去训导学生，因为这种教育不在于严厉的管束，不在于中学式的监督，而是由大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实现。教授对学生的影响极大，但更有效的影响不是靠个别教授，而要靠存在于大学中的普遍精神。

大学的教育人的意义之大小，取决于有多高程度的集体精神，取决于大学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其历史形成的优秀传统精神。正是这种多年形成的大学的普遍精神，给学生以精神上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个别的教授所能起到的。即使把所有的教授加在一起，按照罗马皇帝卡里古拉① 的说法，也只是*没掺和石灰的沙子*。这种普遍精神是不能用法规来规定的，但它却有着极大的作用。大家都感受得到，能约束所有的人，对所有的人都有益，能振奋、团结所有的人（既包括教授，又包括学生）。所有成功的大学都有这样一种普遍的、有巨大作用的精神，有这样一种大学的氛围，它起着教育青年的作用，并且能同化每年从各方面流入大学的各种各样的成分。

---

① 卡里古拉（公元 12—41），公元 37 年起为罗马皇帝，称米里亚-克劳狄王朝。他谋求无限的权力，要求尊其为神，激起元老院和御林军的不满，旋为御林军所杀。

从实质上说，这种普遍精神主要应存在于教授的群体中。但事实又表明，尽管校内学习的青年人不断来来往往，学生的生活中也能保持学校的传统。大学若没有学生就不成其为大学，除去学生群体，也就扼杀了大学。大学作为一个整体，应既包括教授，也包括学生。学生生活是这一机构的教育要素之一。若是学生生活存在不好的倾向，就该注意将其改善，而不应取消学生的存在。

学生之间各种关系构成的世界，是一个比社会要简单得上千倍的特殊世界，因而也极其适宜于取得初步的生活经验。在学生生活的紧密圈子中的同学关系、同学间的接触，在学生的历代传统的影响下，在善意的训导者的监督下，能够培育、发展青年人的精神力量，无怪乎几乎每一个在正规大学学习过的人都有着关于大学生活的美好回忆。这是无私地交换稚气天真的思想和感情的时光，这是容易萌生友谊的时光，这是生活艰辛尚未到来的时光，这是人刚刚预感到未来的生活考验并积蓄力量以战胜生活考验的时光。打散大学生生活中原先的小圈子组织，会极其有碍于学生在校能获得的精神成长。而为求学生生活不至于分散，需要学生间有紧密的关系，而不是单纯地只在学校听课，还需要大学生中有一种联合的关系。这当然不是欧洲大学那种虚假的群体关系，只求服饰统一或佩戴外表的标志，引起学生本身的不满。这是一种真正的联合，能够成为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联合的本质就在于保持良好传统，对新同学施加影响，是实现不断继承传统、不断同化的条件。毕业班应影响新入学的班级，已经毕业的班级应影响毕业班，这样直至来自教授的影响。学校所有的人之间既要有一种相互联系，同时，在这种联系中还应有不同层次，从教授直至刚入学的新生。

随后，《现代纪事》特别强调要加强大学中的联合，并直接宣称，改革的成功正在于强化而非削弱联合。在这一点上，

《现代纪事》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

> 困难在于，我们的大学不是应社会培养青年一代这一自然要求而出现的，却是按政府的意志建立的，因为国家机关需要人才。我国大学产生的由来，反映在大学的性质上。这使大学科学的面目，像是由异地移植于俄罗斯大地的植物，因此，改进俄国大学就很困难。不过也不要夸大或害怕困难。

接着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一点，《现代纪事》自己也开始谈起改造来。它谈到，既然已经做了相当多破旧方面的工作，既然已经应该更慎重些，应该从容地利用大学的精神和财力，尊重已有的东西，那么首先，应加强联合的关系，应重视大学里已经具有的因素，并以此巩固大学。比方说，在莫斯科的大学里就有奖学金获得者、毕业后又留在大学工作的优秀学生。因为这些获奖学金者已经在古代语言课上帮助了在校生，就应该加强并用各种手段促进奖学金获得者和学生之间的密切联系。要对奖学金获得者特别重视，其中的优秀分子已派往国外。为使他们不虚度在国外的光阴，不单单去到处旅游，还应当像斯佩兰斯基伯爵① 那样做，由俄国政府挑选，让他们师从著名学者。

而除了这些奖学金获得者外，还有很多获硕士、博士学位者，同大学只保持着精神的联系，这种联系应该有物质的保

① 米·米·斯佩兰斯基（1772—1839），伯爵、俄国国务活动家。1808 年起为亚历山大一世亲信，拟定自由主义改革计划。一度遭流放（1812—1816），旋任西伯利亚总督（1819—1821）。1826 年后实际上掌管第二厅，主持编纂俄国国家基本法（1832）。他在这个时期曾主张挑选大学生去国外留学。

证。如果没有报酬，这些年轻的学者不能像奖学金获得者一样去帮助学生，所以应实行编外副教授制，发放教授酬金。另外还可以讨论：是否可吸收他们为大学联合会的成员，并让他们部分地参与学校的管理，如参与推选校长，参与选举五年制教授，参与编外转正的评选……凡此种种，都属于改革的内容。

最后，依《现代纪事》之见，在学生中也存在很多优秀的方面，但他们或由于谦虚、或由于害怕、或由于错误地理解的义气使长处含而不露，反倒是学习不好的人在左右局面。因此，要注意培养好学生在同学中的威望。

> 不止在一所大学里，成绩差的学生事事要排在成绩好的同学前面。学校应注意树立优秀学生在同学中的威望，过去的督学就是起这个作用的。斯特罗加诺夫伯爵[①] 就很了解所有的好学生，经常关注他们，在他们学习期间注意他们，毕业时帮助他们寻找出路。我们能证明，督学的这种关注，于大学十分有益。但这种办法要视督学个人而定，因而是不牢靠的。

所以《现代纪事》认为，应当用一种普遍的方法来替代一个人的偶然行为。按照它的说法，首先必须要有这样一些措施：发放奖学金，举行升级和入学考试，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取消。

用《现代纪事》的话来说，所有这些只是加强了联合的外在形式，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个联合的精神，这就是科学的精神。这种精神应能把教授和学生团结起来。毋庸赘言，只有在

① 谢·格·斯特罗加诺夫（1794—1882）任莫斯科大学的督学时（1835—1847），注意发现优秀人才，提拔了大批年轻教授。

崇尚科学的地方，才会产生这种科学的精神。

为了推崇科学，更主要的是为了适当地完成在大学中的改革，《现代纪事》在第46期上想出了如此绝妙的主意。

《现代纪事》说，迄今为止，大学的成员间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积极的、活跃的关系，大学里的联合离它应达到的程度极远，只是个别的、松散的。

> 大学委员会与其说是一项严肃的事，不如说仅是一种形式。委员们既意识不到其权利，也意识不到自己的义务。与学术、教学、大学设置等有关的一切决定都没有他们参与，只是交给他们实行。而当需要他们认真协助的时候，他们自然又表现得十分外行。共同的事业感并不能激励他们，一切都变成了蝇头小利，拉帮结伙，钩心斗角。每个人不管好坏只顾干自己的事，不同的教研室讲授不同的学科，科学精神在大学校园内没有形成独立的力量，没有把其成员团结成一个活跃的整体。人人都只考虑自己而极少关心具有普遍意义的事。我们的大学在较小范围里重演着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状况。

《现代纪事》认为，这里有些不对头的地方，掺杂有某种性质不同的成分，有碍着关系的正常发展。那么，这性质不同的成分是什么，它是由哪里来的呢？

据说是这样："我们的大学不仅是高等教育机构，还是给青年人以做官资格的地方。[①] 因而，我们的大学除了自己的使命还兼有公务机关的性质，人们在这里寻取功名。"《现代纪

---

① *根据1835年大学条例的规定，学位获得者毕业后担任国家公职，可得相应的官阶：博士为八品，硕士为九品，学士为十品。*

事》说这自然不坏，但问题是这一机构的这种额外的、并非其固有的因素，不能加强而只能削弱它的力量，不能充实而只是损害它的组织。那么，或许应当取消大学在提供国家公职方面的特权。然而《现代纪事》给自己的回答是，不，完全不必，并且提出了一个解决这一特别棘手问题的特殊的方案。

> 不要使大学教育失去其一直具有的谋取公职的优势，但要尽力使这种优势摆脱令其变质并危害大学教育的一切因素。可以保留这个优势，但要取消现有的垄断性。若是需要的话，可以让大学的考试提供某种任职的资格。然而，大学的考试必须恢复其纯粹的教育性质。

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据说是这样：

同德国大学不同的是，我们的年轻人一入大学，就再没有权利选择某一课程的讲课老师。我们的大学里学生必须跟某个教师上课，教授决定学生的命运。学生未来的前途，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教授，学生习惯地把教授看成是压迫者。

> 一个大学生来到考场，却完全不感觉到考试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手段。他忘记了考试的益处而只认为这是其人生道路上的障碍。考试变得不是鼓励和支持其青年活动的学业检验。相反，在学生眼里这是同学术及大学教育无关的解决谋生问题的考验。考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被学生看成是某种敌意和狠毒。学生对教师关心他的学业不是感激，而是懊恼、厌恶，认为越是努力热心地关怀，对学生未来生活的不良后果就越严重。站在教授主考官面前的年轻人暗暗地想："行行好吧，你们少关心我智力发展吧，别跟我过不去，别妨碍我未来的仕途。"

《现代纪事》指出，这样一来教授同学生之间就不能保持正确的、良好的关系，考试也失去了真正的作用。怎么办呢?只好组织专门的国家公职考试,而允许大学毕业生有免试的特权。

> 说起来容易：组建考试委员会吧。国家公职考试应同大学毕业考试相一致。但不要说在外省，就是在首都，哪里能找到这个委员会的考官呢？我们大学里连教研室都很难聘到人，又如何能找到大学各门学科的考官呢？
>
> 我们认为，组织上述目的的考试委员会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难。我们甚至认为，如果需要的话，虽然我们的社会教育条件还不够完善，但组织这样的考试委员会不仅在首都，即使在外省的城市也不是不可能的。
>
> 为组织这样的考试委员会而挑选同大学教师学术上相当的考官确非易事，不过并不需要这样。需要的不是各学科的验证者，而只要有那么三四个人，他们甚至可以完全不懂大学学科的底蕴，至少可以没有什么特别的学术威望，这三四个人要能够负责地、明确地履行赋予他们的职责。委员会组织的国家公职考试应该是笔试，按照种种公开的通行大纲进行。考试委员会成员的职责只是监督抽签笔试的答卷，由考生自己在没有他人帮助、没有舞弊的情况下完成。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考官，而只是不评卷的监考，他们只负责把考卷上交，并保证考卷的真实性。答卷或由大学委员会评阅，或由中心委员会评阅，其成员可以有一些教授，但不是以教授身份出现，而是具有特殊性的公职。国家公职考试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免得应试者过多而使考试委员会难以负责地实现自己的职责。

这个设计怎么样？不过我们先不要着急。我们暂时还是在

叙述大学问题在我们这里讨论的简要过程，将我们报刊上至今所有的说法尽可能清晰全面地告诉读者。自然，我们不打算把我们所有报纸上有关这一问题的意见都介绍给读者。我们只给读者综述了那些出色的文章。下面还剩“教育家”① 的文章和A. 别克托夫教授的文章。这两篇文章都刊登在《圣彼得堡新闻》上。

但在介绍“教育家”的文章之前，我们先提一下《圣彼得堡新闻》第245期上苏霍姆利诺夫先生的短评②。苏霍姆利诺夫先生赞成学生的联合，但是是自由的、自然形成的联合，他同科斯托马罗夫先生一样，反对任何法定的联合。他引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话来证明，以法律介入本应靠风俗和习惯自然产生的东西，是不恰当的：“本应由习俗来改变的却用法律来规定，这样的政策是很糟糕的，按照我们的天性而随意自然地做事，比硬做效果要好得多。”③

《圣彼得堡新闻》第252期上“教育家”的观点，是相当精彩的。文中认为发展我们的大学的必备条件，是尽可能地削弱学生的联合。同时，主张要尽可能地加强教授的联合。文章指出：

按照1835年的条例，维系教授联合的纽带是担任教职的同等权利和优惠、加入联合的同等条件，通过系全体会议和系委员会集

---

① 系A. C. 沃罗诺夫的笔名。他的文章为《关于我国大学的一些想法》。

② M. 苏霍姆利诺夫：《四论我们的大学》，《圣彼得堡新闻》，1861，第245期。

③ 引自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文集第1卷，圣彼得堡：1849年，第12～13页。

体决定问题、大学作为学术机构所具有的各种特权。

按照这个条例，大学生联合的基础也是具有平等的条件：即获得大学生称号、顺利完成学业和取得学位等方面的平等条件，还有平等的优惠，甚至是相同的服饰。再有，无论在校内还是校外，学生都应同样地服从大学警署。①

对科学的兴趣是教授与大学生两个团体之间唯一的联系。同时，除这两个团体外，还有由大学非教学人中组成的另一种组织，即大学警署。

随后，苏霍姆利诺夫先生得出结论说，虽然不能否认科学的力量取决于优秀的教授，但只有把所有学者联合起来，互相补充、互相监督，按照协调一致的计划行事，学术才能得到保证。依他看来，学生会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是由德国引进的。它的出现，开始是为了抵御外来影响，后来，随着国家制度的发展，学生会初始的目的就渐渐地被取代而具有了教育的性质。按照1835年条例的规定，我们大学中的学生会正是具有这种教育性质。因此，正如“教育家”的文章所指出的，维护联合组织的人，在逻辑上自然认为大学是教育人的教学机构。“教育家”也承认教育人是大学的主要目的，但据他说，教育人的力量几乎全在科学之内，而完全不在于大学领导在校外对学生实行监督。“教育家”认为，在校园内对学生实行监督则是必须的。

“教育家”赞同削弱学生之间的联合，并提出相当有趣的

① 这里我们不包括杰里普特大学，该校的学生会较之我国其他大学更接近德国大学的做法。——作者注。按：杰里普特为塔尔图市于1224—1873年间的旧称。

论点。文中说，学生的任务首先是学习。学生做的事就是根据教授的授课以及教授指定的或自己查找的材料来研究学问，这需要好学的精神和埋头苦干。学生还能顾得上把宝贵的时间花在与其功课无关的事情上吗？在这些与功课无关的事中，“教育家”毅然把学生必要的聚会也划入其中，这种聚会是为了大家一起来讨论学术问题和其他各种问题。“教育家”甚至否认，在这种讨论和争辩中学生能发展其思维并形成独立的见解。“教育家”倒是赞成学生小组的存在，但必须是出于最自然的需要。因为三四个人总难免要聚到一起的。然而，它把学生聚会的权利也只限于这类小组活动。它还允许更大些的小组，如文学小组、音乐小组，等等，也就是学生按共同的爱好、同一活动、同一家乡等联合到一起。可只要一涉及学生的全体聚会，那“教育家”可是坚决反对的。

个别的小组同联合会不同，因为小组的每个成员参加都是自由的，有着一定的目的，而如果他加入的目的没有达到，他也可以自由地退出。联合会就犹如一个法律单位，有共同的权利和义务，每个成员都要服从共同的精神，不同看法的人必须承担共同的行动，对一个成员的抨击会引起整个集体的反对，一个成员受到侮辱也是对大家的侮辱。而在这个人数众多的联合会中，会出现与不属此会者的冲突。这样在没有领导者的联合会中，成员之间就会出现各种不和的因素。证明这一点的例子俯拾即是。

由于这个原因，“教育家”完全赞同我们这里近年来采取措施削弱学生联合会，使学生在校服从于警署，并取消学生制服。一句话，“教育家”现在希望彻底取消学生社团，除学位考试外取消一切校内的考试，并将大学向所有学校开放。接着

文章进一步阐述这一思想，努力证明（并且是不无根据地）在校园外对学生实行监督是几乎不可能的，这需要很多的监督人，因而应由警署管理学生。入学考试也应取消。升级考试依“教育家”之见也是毫无益处的，这种考试不过是一种强制学习的手段，这一点无疑是宣判了这一考试的死刑，因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试问，教授能在一两天内对三百多学生进行严格的考试吗？

> 如果教授在两天之内每天抽出五小时（再多就吃不消了），集中精力，那么分摊给每个考生的只有两分钟。试问，这样的考试还会有什么意义吗？在这样的考试中，即使最差的学生也可升入下一个年级，那么，这种考试无疑是徒有虚名。如果给升级考核以足够的时间，则单是考试就要占去每学年课时的三分之二（这是很容易证明的）。这样一来，教授就没有时间做其本职的工作——讲课了。有人建议组成特殊的考官组，但不要教授参加，这既可克服这种困难，还能加强考核的严肃性。但这一办法在我国难以实现，其一是因为学者的人数不够，现有的从事教职的人数尚嫌不足；其二是这样的机构就意味着在教授和考官之间要发生无休止的冲突；其三是那些考官也同教授一样需要三分之二学年的时间用于进行考试；最后，这一计划将会徒劳无益地耗费大量经费。

“教育家”在发表了这样看法后，再次以如下形式申明其观点来结束自己的文章：

> （1）教授的联合会要尽力保留。
>
> （2）取消学生的联合会，取消入学和升级考试，取消所有学生必须上课的规定以及一切学生特权。

(3) 所有的人，不分头衔、性别和年龄都可以听课，适当收费，但真正的贫困生可免缴。

(4) 不规定学习的年限。

(5) 学科考试严格把关，只有具有中学学历证明、掌握中学知识的人才能参加考试。

我们还不能不指出，实行上述措施并不意味着根本的变化，我们现在的大学里所谓的旁听生几乎就是如此。就是说，整个改革也就是把旁听的办法无一例外地套到所有学员身上。

最后，A. H. 别克托夫教授还有一个意见也很精彩，他也完全反对组织官方的大学生联合会。

很多人认为，在我们的大学中，学生群体绝不应同西欧的学生群体一样。很多人认为，俄国的大学生应承担特殊的义务，而没有特殊的权利。这些义务应包括：经常上课和学习；校内外的行为应遵守特别的规范；听课付费；听从特别长官的管理。一句话，按这种观点，大学生已不是联合的群体，却是与中学生毫无差别。这种观点的依据是：俄国的教育和文明的发展程度还很低，社会上为数不多的学生大部分对科学没有强烈的渴求，但同时俄国又亟须学者专家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因而必须用强制性的教育手段来强迫学习。暂时就要让大学成为高级的中学，让欧洲指责我们好了，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的社会发展水平还很低，没有严格的管束教育事业就维持不下去。

他进一步驳斥了这种观点。

如果大学生同高年级（假定是八、九、十和十一年）中学生一

样的话，那么，他们同中学生之间就不应有任何本质的区别。首先大家都看到他们年龄上有差别。在大学里听课的是十七岁至二十三、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中学里学习的是孩子。中学毕业后可以、也常常是去服现役，要是没考入大学的话。因而国家认为大学生是成熟的公民，能给政府带来实际的利益，而中学生却还是些孩子。按照法律，大学生可有不动产，而中学生则没有。所以，国家在这一点上也认为大学生是公民社会的成熟成员。请问，在这种情况下，用中学的教育手段强迫拥有真正公民权的人学习，这是否可能，是否合乎情理？我能够参与国家管理，可以买卖财产，可却要在别人的指挥下学习！

把成年人（尽管他们还年轻）变成孩子，把公民变成中学生，是大学里一切混乱的根源。而这样做的结果，便成了教育停滞的主要原因。大学生中有一些孩子，这毫无疑问。但因此就可以把成年人都当成小孩子吗？如果在大学听课的除了大学生之外还有中学生，那教授就应当把大学的课改成中学的课吗？成年人总是比孩子有优势，他们常常能吸引孩子们跟着走，无论是在科学上，还是在其他事情上。是要努力不让孩子去大学听课，还是把成年人赶出大学？只有一种选择：如果大学是高级中学的话，就应该有孩子们来，否则就不能把中学的那一套带到大学里来。

一句话，别克托夫先生认为，不能也不应该在大学里用强制的教育规章来强迫学习。要使大学课程具有学术性和实用性，中学毕业生正需要这样，学科考试要严格。这些就是大学所应要求的一切。如果因此国家和社会能给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以比其他人更多的信任，那么，这比用任何强制教育措施都会更有效地督促大学生学习。

文章的作者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思想说，大学培养年轻人走

向生活，而中学是通过育人为孩子们进一步受教育做好准备。所以，大学生绝不应该脱离生活，教育规章也不应该人为地规定各种关系。青年人如果被人呵护着走向生活目标，被人为地隔绝于生活的诱惑之外，便一定要丧失自己部分的能力。

社会为大学生提供许多好处，而为实现这一切又提出一定的途径和必要的条件：这途径是大学生要去听课，条件则是要通过考试。社会则为此保证他能获得精神和物质状况的提高，但不要求他受任何的辖制。如果他不喜欢为他提供的途径，他可以不利用。学位和与之相伴的种种好处，只是一个事实即考试成绩优秀的结果，正如一个好工匠的收入是他精心完成活计的结果。大学生要做的，只是要会思考，这同商人、同工匠、同公民社会任何成员都一样。大学是这样一种社会机构，*人们按个人的要求经过个人的思考*来此就读。谁要想听大学的课，就应该这样考虑：科学一旦同生活相结合，就会最大限度发展我的智力，从而保障我获得精神和物质的好处。谁若认识不到这一点，他就不是一个大学生，应该到中学去。如果学生是根据他人的要求来上大学的，那么，他们或者不久后就不再去听课，或者经过一年、两年，甚至三年才达到自觉地研究科学，成为*真正的大学生*。这也正说明，上大学不应规定年限。

要取得学位，就必须毅力、坚定、努力——这正是大学培养学生品质的几个主要因素。与同学们交往也是要培养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校外的充满诱惑和考验的生活，则是一种强大的教育因素，它要伴随人的一生。

综上所述，我以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以*讲课必须充实和学位考试必须严格*二者来取代大学的一切强制性教育手段。我觉得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关键就在于这两点，另外，还加上第三点——中学毕业考试要严格。因而，一切都取决于中学教师和大学

教授，应向他们呼吁，应要求他们落实这三条原则。我想，若是没有全体或大多数教员对这三点的支持，任何人为的措施都不能使俄国的高教水平有丝毫的提高。而一旦停留在某一点上，便会越来越落后。

最后，别克托夫先生认为要完全取消大学内的团体，并进行如下改革：

允许一切人不分年龄、性别到大学听课。如收听课费，可按每人所听的年级和科目计算。

取消入学考试；只保留正式大学生和副博士等的学位考试。

大学的校级和系级建制继续保留，其权利和义务也不改变，因取消大学生正式称号而自动取消者例外。

学位考试要严格，所有志愿者都可以根据迄今为止旁听生申请的条件和方法参加考试，区别只在于还可以参加正式大学生的资格考试，这后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考试公开进行，所有具有某种学位或从事某一学术研究的人都可以出席。

还要提一句的是，因为讲课和考试都是公开的，社会很容易借助于刊物对教授和考官实行监督，即通过公开性监督。

二[①]

以上我们尽可能详尽地摘录和说明了有识之士关于这个新

---

① 本文共为两部分，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在前一部分之前写上“一”字，而只在此处写“二”字，以说明此下为第2部分。

问题的几乎所有的意见。我们所引用的每篇文章的作者，在大学问题上都可称得上是内行。想到认真履行了杂志对读者的责任，我们是不是应该到此就满足了呢（因为杂志总还是发挥了其作用：详细地叙述了整个问题的由来并使读者了解了这个问题）？还是一定要说出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不管是什么样的方案？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杂志现在不发表自己的想法太不像话了。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甚至听到了类似的观点，循规蹈矩把我们害苦了，非得有文章！哪怕是为了装饰门面，也得登一篇大学改革的文章！

噢，读者们！我们决定不提出自己的关于大学问题的方案，这并不是因为关于大学问题我们无话可谈，而是因为我们看待这个问题完全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的。

有人会对我们说，"既然如此，你们也是有想法的呀？"

我们的回答是："正是。而且我们对整个这件事的看法，完全不是搞什么方案。我们认为单单只对大学进行改革还不够。不能是在这里堵住个窟窿，在那边再打个新的通风口。大学的要求比想象的要高得多，大学的改革也要从根本上着手。如果认为只需换个地方或是做点儿修修补补就可以达到目的，那就错了。因此：

"我们的调子不大对味儿！"①

下面我们尽可能地解释一下。

大学问题的产生，以及我们社会对此的深刻反响，恰好说明，大学如今自己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俄国机体的一部分，而不

① 引自伊·安·克雷洛夫寓言《四重奏》。

是人为地从外国拿来的舶来品。大学作为舶来品已有很长的时间了，正如我们的文学曾是舶来品一样，还有我们的欧化风，还有整个新的俄国人。这个新的俄国人只是到了现在，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才开始意识到自己、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状况，只是不久前才环顾四周，梦醒般询问自己“我在哪儿？我是怎样的人?”，只是现在才觉到自己是实实在在地在生活，并且有着不可剥夺的生活权利。

大学同我们祖国的肌体紧密联系着，是它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整个肌体的病患也就是大学的病患，肌体的繁荣也就是大学的繁荣。若是整个身体是健壮的，大学就是健壮的；若是整个肌体疾病缠身，那你不能单单只治好一个鼻子。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所有改善大学的办法，我们上文综述的那些深思熟虑的真诚的想法，都有某种治标的性质。我们赞赏上述这些办法，尽管它们大多数是相互矛盾的。不过每种办法又都有其正确的方面。最主要的是，所有这些意见都是认真研究的结果，而认真在这里是最重要的关键。不管是谁讲的！上述的办法许多都能够甚至应该付诸大学的改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重视这些想法，如此详细诉诸于世的原因。但从我们这方面讲，我们坚信，如果在我们肌体中对教育事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在见解上发生了基本的变化，那么对大学改革的看法也会发生根本变化，现在提出的很好的改革意见许多也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因为都是机械的、治标的、软弱的、几乎没有活力的东西。

比方说，很多方案，几乎是所有这些新改革的办法，目标都要抬高科学，完善教授，主要是在大学生中培养一种振奋的精神、学习的渴望和对科学的尊重。毫无疑问，上述某些相应的措施现在就有助于形成这种气氛。不过现在我们深入一点儿

来看这个问题：例如一个对科学有浓厚兴趣并热爱自己专业的青年，想成为一名官员或是律师。他上完大学之后，渴求一个职位，这是很正常的。可走出校门他就看到所做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为什么当时那么努力钻研呢？他面对的是一架开动了的行政机器，是自古因循到现在的形式，是官场的诀窍，是种种规矩。人们对他不信任，上级长官认为他的追求完全不合时宜，下级长官甚至嘲笑他…… “真是毛头小子。”但我们假设，年轻人很理解地忍耐着，对这些反应不加理会，他决定等待，他自己也有意地去习惯这一套：“哪怕要等上十年、十五年，我会达到目的，可能为社会带来好处的。”他这么想，但十年后他有了相当经验，自己就会知道他年轻时的幻想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官场的这一套运作起来是永无休止的，他只不过是这轮子里的一根发条。而为了这个完全用不着：

……研究桑洪亚托恩，
啃柏拉图的《理想国》……①

事实就是如此。在我国，科学几乎没有实际用途。有一些专业的需要，都很简单，是由一些专门的机构完成的，并且实践要求我们的科学工作者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独特性，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自己的创意。这样从一开始就压制了任何的发展，扼杀了天才的火花，把人拉入原有轨道，因袭旧的形式，维护旧的秩序。与此同时，社会的需求也微乎其

① 这里引用的是屠格涅夫长诗《地主》中两行诗。桑洪亚托恩为传说中腓尼基的历史学家。在1836—1837年，人们曾说《腓尼基史》是他的著作，事实上是伪托的。

微。教育水平低到了极点。科学没有进入现实生活，生活暂时也还不需要科学。对什么都没有自己的见解，也没有自己的研究。科研经费极少。此外，在我国，人们甚至害怕科学太多了，人们还有些不相信科学。比如，在我国做教师是很可怜的！而教育工作能唤起渴望造福社会的人产生极大热情，现实却无情地扑灭了这种渴望，因为无论是从事教育，或是从事研究，都是不现实的。别说什么科学了，就连普通道理都忘掉了！就像现在我们的一些医生，大学毕业时很有发展前途，确实也有才华，但在自己的偏远县城有时就忘记了科学。我们的学者、教授，甚至任何学科的信徒，不要说别的原因，就单单因为人们的冷漠，便常常忘记了科学。

教育需要人们的信任。社会应当意识到教育的力量，对此坚信不疑，不能以敌视的态度对待教育。人们常说，为什么不发展工业？为什么不发展商业？做什么都需要有保障，要同社会需要相协调。比方说，工业和商业需要科学。科学在工业和商业领域能得以运用。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科学就失去了很大的一块用武之地。这样，我们就不会觉得科学有用，就会抽象地看待它。而在我国人们总是抽象地看待科学。

我知道，就这个题目可以写上它三十五个印张，所以还是不写的好，因为写也写不全面……我只强调一点：难道大学中对这些情况就一无所知吗？当然知道，因为这一切直接与大学相关。即使不知道，这些情况也会不知不觉地反映到大学中，因为大学是社会这一肌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不单是作为点缀才移植过来的温室植物。如果教育总是以某种抽象的形式存在，如果科学不能植根于现实，如果对科学没有直接的需求，如果科学现在不能得到应用、不能展现自己，——试问，那么科学会不会自行消亡呢？即使不完全消亡，也不会正常地发

展。这就是为什么学生在精神上的联合遭到削弱的原因。不过在学生中这个过程还不会那么快，因为他们还幼稚，有着青年人的激情，热爱科学，以欧洲的眼光看待一切，还有种种不切实际的希望，所有这些都会鼓励青年人。但在教师教授队伍中，这种困惑则表现得要很强烈。抽象化、僵化、冷漠、因循等渐渐地侵蚀教师阶层……大学里人们的精神纽带由于脱离现实而不断弱化。教育水平、科学中的主动性、科学发明的水平、独立性不断下降……如此一来，至少当今我们的大学无论自身如何努力都无法与欧洲大学相比……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自己没有提出任何改革的方案，也不想多谈已有的改革方案。不过我们多少还是说一点儿吧。比方说，在所有的这些改革方案中有十分重要的一点很令我们大为惊讶，那就是这种摧毁呀、改造呀、连根拔掉呀、移植呀的情绪。这种立时摧毁重建的决心也许不是一时轻率之举。我们觉得，这是很说明问题并且十分恼人的事实。这就是说，我们什么都没学会，不珍视任何东西，对自己的一切都冷漠无情，没什么心爱之物，也没培植出什么，不过是在租用别人的东西，而不是从事研究。哪一个主人不爱自己种的树，不爱自己建造并生活其中、养育孩子的家园呢？而我们呢——迫不急待地要摧毁、要迁徙。这是多么冷漠无情啊！可错在谁身上呢？

然而，大家都在谈教育，看得出新问题困扰着所有的人。虽然大家提出的全是内部的改革，但对挽救我们的科学大厦是热切支持的，都希望科学生长并植根于我们的土地。到处可见对事业的无限忠诚。这已经很可喜了。这给人以希望。不过，我们本来就是些幻想家！没有实际行动，人自然而然地就要变成幻想家。

说一点意见吧……当然，我们所有大学设计师和改革家都

没有考虑到最主要的一点，那就是我们的科学现在所处的状态和境况（要是可以这样表达的话）。若是从头说起的话，我们觉得科斯托马罗夫先生把我们俄国从高到低所有学校划分为教育人的和做学问的两类，未免有些随意、理论化、抽象化。在高等教育机构中，例如在大学中，使用中小学那种教育人的方法自然是根本不合适的，但这并不等于说，除了这些之外就根本没有其他的方法。其他的方法还存在，这主要是因为，青年人跨入大学的门槛后，整个教育人的过程并没有结束。果真那样，简直是鬼使神差了。这种划分太随意、太绝对。科斯托马罗夫先生要摧毁一切，完全取消几乎任何的真正的联合（除自然的、精神上的联合，还有学术上的联合）。而如果他不赋予摧毁之举如此重要的意义，如此重大的后果，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或许还是很正确的。依他之见，大学一切问题的症结仅在于此。如果仅仅分析科斯托马罗夫的这一思想，我们觉得他排斥任何真正的社团联合是不公正的。这种联合至少保护了在校的市民免受警察的树枝抽打①。有些支持科斯托马罗夫先生的人说，大学生需要真正的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将会更好地更实际地发展而不会封闭在大学的狭小世界中，不会因自己联合为群体而牺牲自己的公民精神，联合将使人丧失个性。这其中可能也有一些正确的成分，但是我们认为，我们的大学生即使联合为群体也绝对没有与现实生活隔绝，甚至能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很多东西。俄国大学生的精神决定了他不会因自己的联合而失去个性。德国人才是这样，形式高于一切，可那些德国的

① 这里的联合指大学生在校形成有组织的群体。根据1804年大学章程，学生有过错不由城市警方而由大学审理。大学审理的惩罚排除了体罚一项。这一条规定在1835年的章程中保留下来。

形式早已令我们生厌了。最后，科斯托马罗夫先生如何能保证，在按他的方案实行改革的大学生中，不会出现联合呢，如果我们的学生一直有这种精神的话？然而这种群体联合的极端做法，恰好都不符合我们的精神。不过，至于科斯托马罗夫先生想使学生免除过分的限制、过多的汇报和义务，这倒是完全正确的。科学不宜处在别人的管束和监督之下。科学需要最大程度的主动性。

我们也不想详细讨论《俄国导报》上与科斯托马罗夫先生完全相反而坚决维护联合的意见。关于加强联合精神，《俄国导报》讲了可取的，却有点儿抽象的意见。而其实际的方案，则更显现出很强的抽象性……我们这里所指的抽象性是说，有的人一有机会就说得天花乱坠，可说飘游在浮云之上。而一旦说到实际，他就成了井底之蛙，什么也看不清。前面是宏篇大论，后面是躲躲藏藏，有时不由得要抽象地议论。不过，我们不想细谈《现代纪事》三篇文章中的不妥之处。这些文章的作者常常是过分不冷静，过分激动，甚至极爱夸张。比方说，他谈到保护传统。传统当然是个好东西，起着连接作用，一切像亲身经历一样可贵，因为并非虚构而是现实的生活。不过传统也能害人，把人同化，使之失去个性。凡事都要有个限度。可您则是走得太远了。譬如您当然想到的全是一些好传统。可若是想随时能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首先就应随时以批判态度研究和对待事物。而这样的态度却排除了保留传统的单一目的，否则有时就会为保留传统而保留传统。比方您谈到的发放奖学金的事，这其中当然有不很自然的地方，但我们可以认为，这于大学来说是一件好事，尽管有些治标的味道。您希望把获奖学金者派往国外，不是让他们去旅游，而是要政府亲自为他们在那里选择好教授做导师。您还补充说，斯佩兰斯基伯爵就是

这样做的。请注意，您派的是副博士，而且是选拔出来的。难道您对选拔出来的人也不能信任？别忘了是您选拔的呀！若是这些精英都没有用，那太令人失望了。刚一放松监督，他马上就要去 bal-Mabile①，去寻欢作乐！既然选拔了他，您自己挑的，认为他值得培养，那就不要用不信任的态度去刺伤他，至少对他的年轻单纯要尊重。而如果整个俄罗斯的科学连一个值得尊重和信任的青年人都教育不出来，那么为这个科学操心，派人出国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二流子派出国也不会改邪归正。不尊重他，只是在他身边不断地加以监督，您不能使他改好，也绝不能令他变得自尊。请一个德国教授也不能像您希望的那样将他培育成人。他只会在您的管束之下让教授感到厌倦，而他却会把教授画成漫画，说不定还会去纠缠教授的女儿。至于在国外挑选教授，要知道您的获奖学金者已经是副博士了，他完全有能力自己挑选，这比旁人为他选要好得多，哪怕这个旁人是斯佩兰斯基伯爵。对科学的忠诚和热情会帮助他，合乎心意的教授也会帮助他。难道我们的优秀副博士在科学上还需要别人牵着走吗？那不成了张着嘴让别人往里面放面包，面包可还是我们自己挣来的。教授先生，尊重一点科学吧。

您还谈到升级考试，主要是希望不要让学生中那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成了气候，要让优秀学生来带动整个大学。可以说对这种思想我们极为愤慨。您也太不尊重年轻一代了，您这么一讲，您还怎么指望青年们会自尊呢？您怎么会认为二流子可以左右局面并影响全校呢？我们对此绝不相信。即使偶然

① 法文：马比勒酒吧。按：它是巴黎的一个娱乐场所，在那里可以跳下流的康康舞。

发生这种情况，那是靠欺骗，并且绝不长久，是这些二流子采取某种手段，装作一副高尚的样子，蒙蔽其余的过于信任他们的人。所以他们还是用高尚的东西来蒙蔽别人的。青年要比您想象的要单纯、高尚。他们还看不惯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不能像高明的成年人那样以一种庸俗的实利态度看待问题。您要区别不同的学生，让长官挑出那些品行端正、勤奋上进的学生。您提到，挑选出来的学生自然会在学生中受到尊敬。如此一来，我们就须实行奖金和奖状的制度了。

最后，谈到考试的纯科学性质和通过考试分配官职之间的矛盾，《现代纪事》为解决这一矛盾提出一个很幼稚的方案，即成立特殊的考试委员会，向各地开放，甚至各省均可设立。"想取得职位的年轻人到这个委员会参加笔试。委员会不一定由学者和懂行的人组成，——您会这样说，否则各处的主考官恐怕不够。而且只要主考官是诚实的人，能保证考试的真实性，保证想取得公职的年轻人是自己答的卷，这样的主考官还是能找得到的。"人们读着这话就无法相信。怎么保证这个年轻人是完全独立答卷的呢？要是带小抄呢？难道他得由考官亲眼看着来答题，他们盯着他一字一字地写吗？您可曾在外省居住过，是否知道，您的方案实际上是完全不可行的。我们倒不是说在外省很难找到四个诚实可靠，同时又并非学者的人。可您了解外省的生活吗？您知不知道，在这样的考试交卷时会有多少舞弊的事情？哪一个考试委员会不把这考试看成玩笑而马马虎虎呢？而且他们绝对不会认为这样做是什么耻辱。医生中有许多正直的人，但没有一个正直的医生会认为不收受任何礼金和贿赂而给一个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开疾病证明是一种耻辱行为。新考官的情况也同样如此。更何况还有各地方的殷勤好客，还有设牌局实行贿赂呢？还有闺中待嫁的女儿呢？以及数

不清的其他种种家中情况。最后还有考官那可笑又可怜的处境，他们诚实但不懂科学，而他们面对的年轻人却真正是有学问的，因此不由得单凭自己的学问傲视考官的正直和无知……

对于《圣彼得堡新闻》上那篇同样反对联合而极力想消除联合的“教育家”的出色文章，我们同样不再多谈。也不想涉及文中所讲的允许大学生建立中小团体——音乐小组、文学小组、科学小组，等等。但一提到成立大的组织，如出于某种目的，哪怕为了学术目的把学生全都联合起来，文章可就极为害怕了。不过我们对这篇文章叙述得如此详尽并大量引用原话，想必读者自己会认真研究，尤其会同其他文章联系起来看。别克托夫教授的文章则更加有趣，可以说是一种诚实、热切的申说。在很多方面我们都不得不同意别克托夫先生的看法。当然，我们也不是对他的全部观点都完全赞同，读者大概已经理解了这一点。我们觉得，别克托夫先生认为一切都取决于教师和教授们，只求他们或规定他们讲好课是不够的，这看法并不完全正确。教授是大学肌体的一部分，而大学又是整个社会肌体的一部分，因而，问题不只在教授身上。而别克托夫先生只想以讲好课和考试严格来取代大学中强制的教学手段。他说不能牵着科学的手走路，不能靠体罚督促学习，这是正确的。但如果强制的手段是不可行的，那么治标的手段也是不可行的……一句话，大学的问题已经具有了真切的现实的意义，我们对此感到高兴。这就是说，大学已经扎了根，已经有了生机！……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17卷　文论　上
作者=陈燊主编
页数=462
SS号=12825622
出版日期=2010.01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